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三册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三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给朱德的电报 (1)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苏区工会工作的决定 (3)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
- 张闻天关于取消第二“中央”等问题
 给张国焘的电报 (7)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
 决定 (8)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 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
 给张国焘、朱德的电报 (9)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 张闻天关于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
 给朱德的电报 (10)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 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
 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1)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转变目前宣传工作
 给各级党部的信 (15)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 东征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 周恩来 (20)
(一九三六年一月底)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
策略路线的问答 (23)
——供各级党部讨论时的参考材料
(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
- 林育英、张闻天关于红四方面军战略方针等意见
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 (38)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
-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宣言 (40)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
- 毛泽东、彭德怀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 (42)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
-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
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 (45)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 周恩来关于粉碎蒋军进攻的部署
给萧劲光等的电报 (47)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日)
- 张闻天等关于同南京当局谈判的意见
给周继吾的电报 (51)
(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
- 张闻天等关于我方与东北军王以哲部
订立口头协定的通报 (52)
(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
- 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
统一战线的方针 张闻天 (54)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
- 关于世界战争问题 周恩来 (61)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 彭德怀、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情况的通报 (63)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第一方面军改编为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命令 (65)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
- 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刘少奇 (67)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
- 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
关于执行改变对富农策略的指示 (77)
(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
- 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
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 (81)
(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
- 彭德怀、毛泽东关于双方会商问题给王以哲
并转张学良的电报 (84)
(一九三六年四月六日)
- 周恩来关于同张学良谈判情况给张闻天等的电报 (86)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
- 为反对蒋介石帮助日本拦阻红军抗日去路、
捣乱抗日后方讨论提纲 (88)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
- 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 张闻天 (92)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
- 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 (101)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 中共中央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
抗日人民阵线宣言 (103)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 彭德怀、毛泽东关于西渡黄河扩大陕甘苏区
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106)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 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 刘少奇 (108)
(一九三六年四月)
- 毛泽东、朱德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115)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 共青团中央给全国学生的信 (117)
(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
- 毛泽东等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 (122)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
- 林育英等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与张国焘关系问题
给朱德等的电报 (125)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 (128)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 林育英等关于目前形势与战略方针
给朱德等的电报 (131)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 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信 (133)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 毛泽东关于当前军情变化和基本任务
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135)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 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和
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 (137)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

-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
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 (142)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
给红二、四方面军的指示 (146)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
- 林育英等关于红二、四方面军宜北出甘南
给朱德等的电报 (148)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为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 (150)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 (154)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
- 林育英等庆祝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给朱德等的电报 (164)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
- 毛泽东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和任务
给彭德怀的电报 (168)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
- 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关于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和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 (171)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
- 毛泽东关于外交问题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177)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 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刘少奇 (187)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 (192)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
- 毛泽东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196)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 (204)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 毛泽东等关于我军应继续执行三大战略任务
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207)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 左权等关于回民工作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209)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
-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苏区群众组织的几个决定 (211)
（一九三六年八月四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北方局工作
给刘少奇等的指示信 (215)
（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
- 张闻天给刘少奇的信 (222)
（一九三六年八月九日）
- 任弼时关于三个方面军大会合的准备问题
给陈伯钧等的信 (227)
（一九三六年八月九日）
- 毛泽东给章乃器等的信 (232)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
- 张闻天等关于今后战略方针问题
给朱德等的电报 (242)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

- 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信 (246)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
- 毛泽东给宋子文的信 (248)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 毛泽东给傅作义的信 (249)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 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 张闻天 (250)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
- 朱德给唐淮源等的信 (253)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
-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的指示信 (255)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262)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 彭德怀关于西征中开展抗日统战工作的指示信 (272)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276)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
- 周恩来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 (278)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
- 张闻天等关于抗日反蒋不能并提
给朱德等的电报 (280)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
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282)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 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信 (289)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 毛泽东等关于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
给朱德等的电报 (290)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
- 毛泽东给蔡元培的信 (293)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信 (296)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 周恩来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 (299)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 周恩来关于中央长征到达陕甘北部后的情况
给张鼎丞等的信 (301)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 朱德、张国焘等关于目前作战部署问题
给毛泽东等的电报 (302)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 朱德关于少数同志拟推翻静会战役计划原案
给林育英等的电报 (304)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同美国记者
斯诺的谈话 (305)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 周恩来给胡宗南的信 (310)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 朱德、张国焘等关于红四方面军今后
行动方针的电报 (312)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红四方面军
宜迅即北上给朱德、张国焘等的电报 (315)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 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 (317)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
- 中共中央等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318)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
-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十月份作战纲领
 给朱德、张国焘等的电报 (321)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
- 毛泽东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 (324)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 怎样进行群众工作 刘少奇 (325)
 ——给群众工作的同志们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 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张闻天 (336)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
- 周恩来关于希望南京当局对日取强硬态度
 给彭雪枫、张子华的电报 (354)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等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
 和全世界人士书 (356)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 毛泽东给傅作义的信 (359)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 红军将领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 (361)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365)
 (一九三六年十月)
- 周恩来给陈诚的信 (368)
 (一九三六年十月)

- 周恩来给陈诚、汤恩伯等的信 (370)
（一九三六年）
- 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 (373)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
-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及领导机关
名称人选问题给朱德、张国焘等的电报 (376)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
- 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 刘少奇 (378)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 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386)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毛泽东关于捉住敌军矛盾彻底击破胡宗南部
给朱德等的电报 (388)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
长征经过 任弼时 (389)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 中共中央、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
绥远抗战通电 (403)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 毛泽东等给蒋介石的信 (406)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提议东北军确占兰州、汉中
战略要点给张学良的电报 (408)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 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 张闻天 (410)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西安事变后促进南京当局停战
抗日运动的方针办法给刘少奇的电报 (412)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 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给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电报 (414)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 (417)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 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后的情况
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 (419)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 (42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
通电 (424)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 进行和平调解，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 张闻天 (426)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 毛泽东关于配合张学良、杨虎城部消灭东来之敌
给周恩来的电报 (428)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新发展地区的地方工作的指示 (429)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给周恩来的电报 (435)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毛泽东关于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
给潘汉年的电报 (437)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周恩来关于同张学良商定的作战计划

- 给毛泽东等的电报 (439)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信 (44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关于同宋子文谈判情况

- 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443)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周恩来、秦邦宪关于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 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445)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447)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毛泽东 (449)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

- 和我们的方针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452)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 (455)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 给朱德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

朱德同志：

(一) 三十号二十时电悉，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

(二) 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连系，对国际^{〔1〕}亦有发生连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三) 环绕我北方苏区之敌共一百七十五团，计张学良六十团，杨虎城二十五团，阎锡山五十八团，井岳秀七团，高桂滋四团，马鸿逵十团，蒋介石十一团。

(四) 以张学良为主力对北方苏区之第三次“围剿”已为我彻底粉碎了，计消灭张学良四个步兵师，击溃其三个骑兵师，活捉百〇九师长牛元峰^{〔2〕}，打死百一十师长何立中，共缴步枪七千余支，轻重机关枪百余挺，敌现在全部退守城镇。

(五) 我们目前正猛烈扩大红军，不日即可扩大一倍，游击队亦可扩大一倍。游击战争正向陕甘晋绥宁五省发展。

(六) 苏区有极大发展，南抵耀县，距长安仅百余里，西南抵泾川、长武，西抵庆阳，西北抵靖边，北过长城，已与蒙

古民族取得联系，东面已过黄河，但敌尚有一部占据绥德、米脂、榆林、洛川、韩城等城市未退。民众斗争十分热烈。苏区富源广大，主要是洋油、食盐、皮毛、棉花、煤炭，对外贸易无阻，中央政府宣布不收一切租税，以发展经济。一、三军团与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九军团结巩固，已开办大规模之红军大学，为造就扩大五万之新干部而斗争。

（七）国际除派林育英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塞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八）日本对华北急进，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河北、河南、浙江、福建的游击战争转入反攻形势，陕南有大块苏区。苏联准备与日本作战。

（九）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十）兄处方针望告。

毛 泽 东

一月一号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共产国际。

〔2〕牛元峰在直罗镇战役中毙命。

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苏区 工会工作的决定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

(一) 在一切有工人阶级存在的地方，去团结与教育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会，领导工人群众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拥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并领导他们积极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这是共产党最重要最基本的任务之一。

在苏维埃区域中，工会是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群众柱石。乡村中的雇农与手工业工人，是共产党在乡村中唯一可靠的基本的阶级群众，是共产党的路线在乡村中最可靠最重要的传达者，是城市无产阶级与乡村农民兄弟联合的最重要的桥梁。

(二) 陕甘党的组织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因为没有正确的估计乡村工人雇农与工会在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忽视了工会工作，忽视了特别组织与教育工人雇农的工作，及保护他们的特殊利益。虽然最近是开始了工会的组织(在陕甘苏区工会已有一万多会员)，并计划系统的来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但工会的发展仍很迟缓，工会中的文化教育工作未开始进行，在工人的要求中还有过高的地方，还没有表现工会在苏维埃政权中各方面的活跃，广大工人雇农群众的参加革命与战争的积极性，还没有很大的发扬与组织起来，工会还没有确实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柱石。这里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

于在陕甘党的组织中，还没有完全克服忽视工会工作的倾向，各级党的组织还没有经常的系统的来注意检查与帮助工会工作的进行，同时在工会中工作的同志也没有将工会中各种重要问题，提到党的组织中去，并经过党的各级组织，取得党的指导与帮助。

（三）为着在陕甘以及将来发展的苏区中，创立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并使工会真正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党的各级组织（省委、县委、区委以至支部）必须加强自己对于工会工作的注意，选举有工作能力的同志到工会去负责，在工会机关中建立党团，经常系统的检查与帮助工会党团的工作，注意吸收工会去参加各方面的活动，训练工会的干部，并提拔工人干部到各个组织中去负责。在没有工会组织的地方及新苏区，党应指定几个同志组织“工会组织委员会”专门负责去组织工人建立工会。

（四）在目前各级党部必须督促和帮助工会，立即进行以下的工作：

1. 全总执行局与陕西省工会筹备处规定在二月二十日召集全省工人代表大会，成立省工会及成立陕北各县各区工会的计划，必须使其完满的实现。党的县委与区委，应立即讨论召集县与区工人代表会的工作，督促下级党部与工会党团立即到工人群众中去动员，务必在代表大会以前“在吸收每一个苏区工人雇农加入工会”的口号下大大发展会员，按照章程正式成立各乡各区各县的工会组织系统。在陕甘省委应与工会党团规定召集陕甘工人代表会的计划，在最短的时期内，正式成立陕甘各级工会组织的系统。

2. 在组织工会的运动中，应确实打破关门主义。对于在革命前凡是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活资料唯一来源与主要来源的

工人雇农，应普遍的征求他们加入工会。在革命前按庄稼的（即仅有劳动力的雇农，使用地主的土地、耕牛、耕具、种子，而与地主共分收成）雇农亦吸收他们加入工会。应除去加入工会一定要两个会员介绍的规定，免去一切加入工会的繁重手续。对于稍染流氓习气的（如吸洋烟等）工人雇农亦应吸收他们到工会中来再教育他们。但加入工会以自愿为原则，一切带有强迫性质的加入工会的办法（如将雇农划分到工会组织的办法等），应彻底取消。在工会的各级组织中，应实行广泛的民主；工会的领导机关与负责人，应由工人群众的选举来取消委派工会负责人的办法；应大批提拔工人的积极分子到工会机关来负责；工会领导机关应按时向会员报告自己的工作；吸收工人群众来参加和管理自己的工会。各级党部应督促团经常去注意工会青工部的工作。

3. 有计划的改善苏区工人生活状况，是工会主要的任务之一。工会机关应过细去了解各部分工人的生活状况与各地社会生活程度，提出工人切合实际与可能的要求。关于雇农缺乏耕牛、种子及粮食的问题，应立即与苏维埃实行许多实际的办法，去求得解决。边区的失业工人、黄河的水手，以及其他失业与半失业的工人，应该设法去救济并领导他们去参加红军游击战争。劳动部应根据陕甘的实际情形，颁布一些个别的劳动法令，使苏区工人的生活得到系统的改善与保障。但在改善工人经济生活的工作中，必须纠正行会主义的倾向，必须注意不要提出过高的使企业无法接受的要求。行会主义只注意到部分工人暂时的利益，忽视了工人阶级全体的、长久的利益，结果将使工人阶级的过高要求，妨害民族革命战争，妨害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党在发展工人群众为争取自身直接经济利益的斗争中，主

要的目的是要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工人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参加苏维埃和红军的积极性与热忱。

必须使工人群众了解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与参加革命战争、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是不可分离的任务。

4. 为着要提高工人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工会要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各种的文化教育工作，使工会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要首先在城市中、在国家企业与工人集中的地方，去组织工人学校、识字班、俱乐部、讲演会、讨论会及墙报等，吸引工人来参加各种文化的、娱乐的与体育的运动，并应设法出版工人的刊物。

5. 为着要实现工会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柱石作用，党应推动工会积极去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动员广大的工人群众到红军中去，到游击队、到赤少队中去；提拔最好的工人干部到苏维埃和红军中去负责。在国家企业中要推动工会去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遵守劳动纪律，提高国家企业的生产，节省材料，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工业而斗争。在目前民族危机特别紧张的情况下，党应推动工会积极去参加抗日反卖国贼的民族革命运动。

在边区的工会及船夫工会，应特别注意去进行白区工人中的工作，组织白区的工人到边区来参观，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物质上帮助白区工人的斗争，特别要吸引白区工人来参加反日反卖国贼的运动及进行白军工作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张闻天关于取消第二“中央” 等问题给张国焘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

国焘同志：

电悉。

一、S同志消息，绝对不可轻信。

二、此等外间情报，一般是不可靠的。如徐海东同志事，纯系敌人造谣，即是一证。因此不应将S同志消息通知二、六军团，以免引起内部纠纷。

三、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四、兄处情况如何，甚为系念，请时电告。

闻 天

一月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 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中央政治局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 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 给张国焘、朱德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 育 英

二十四号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张闻天关于解决党的组织路线 问题给朱德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朱德同志：

甲、党内统一一致才是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1〕}兄均为党内有数老同志，此间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的组织路线，则他事更好商量。

乙、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发。

张 闻 天

一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张国焘。

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 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张副司令、于主席、王军长、何军长、董军长、万军长^[1]并转东北军各师团长及全体将士：

从“九一八”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在这四年中间，不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刀下鬼与俎上肉，而且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亦相继被占，整个的华北，快要变成“满洲国”第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事实上证明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要把整个中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军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之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家乡与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让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蹂躏、压迫、奸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东北军不共戴天之仇，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三省以及整个华北而奋斗！

因为东北军的将士们绝大多数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不喜欢东北军的。自东北军退出东三省后，蒋介石

总是不给东北军一个休息整理的地方与时间。他不要东北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却要东北军打红军，因为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卖国。他把东北军今天调到鄂豫皖边去打红军，明天又调到甘肃、陕西来打红军。他要中国人与中国人自相残杀，他要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同决心要抗日的红军打仗，教日本人欢喜，教东北军受牺牲、受损失。你们想蒋介石卖国贼的毒计可恨不可恨？！

蒋介石不但要东北军打红军，而且处处压迫东北军。他不给东北军一块好地方，把东北军调到最穷苦的陕、甘两省。就是这两省比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陕南他也是不肯给东北军的。对东北军官兵的待遇是极不平等的。东北军官兵的薪饷，哪里及得上蒋介石嫡系军队的一半？东北军官兵的生活，真是痛苦得很，贍家养子更是说不上。

蒋介石的毒计还不止此，他把他自己法西斯蒂的党羽派到东北军内，监视东北军官兵的行动，到处挑拨离间，威逼利诱，破坏东北军内部的团结，以瓦解东北军。人员的补充，武器弹药的补充，东北军从蒋介石那里是得不到的。

总之，蒋介石是要消灭东北军，使东北军官兵流离失散，冻死、病死、打死，好教日本帝国主义少一个敌人，好教蒋介石少一个对头。你们想东北军的前途危险不危险呢？东北军现在是在彷徨歧路上面，东北军现在是在困难的中间，东北军内部现在没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因此军心涣散，上下不团结。东北军长此下去，好不危险！

试想，东北军的出路在哪里呢？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不要认错了你们的冤家对头，不要把你们的朋友认作了你们的仇人。一错不能再错，一误岂堪再误。

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东北军中间哪一个爱国的军人说起打日本帝国主义、打卖国贼，不磨拳擦掌，挺身而出，愿意为中国民族争一口气呢？哪一个东北人不愿意为了收复东三省，收复华北各省而去赴汤蹈火呢？

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部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那时，哪一个中国人，不愿意拥护东北军，爱戴东北军，在精神上、物质上援助东北军。哪一个有热血的爱国男儿不愿意投效东北军，共同杀贼，为中华民族伸义愤，争光荣！哪一个东北军的将士不将成为全中国的民族英雄，闻名全中国全世界。试问大丈夫立功救国，不当如是耶？

东北军在过去是有过抗日的光荣历史的。长城各口之战，声震华夏。假使当日以东北军的全力，与全中国人民的拥护而抗战到底，那东三省是早已收复了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不会如此猖獗的。但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们现在要重整旗鼓，发扬当时抗日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誓死不作亡国奴，是全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侵掠的响亮的回答，也是东北军抗日的鲜明的口号。

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有抗日光荣历史的东北军是极端爱护的，对于他的发展的前途，是非常关心的。因此，我们不揣冒昧，敢为东北军的领导者与将士们贡献一点意见。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素闻东北军将士，均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志士，定能抛开过去的一切疑虑误会，来首先响应红军与苏维埃政府

的抗日号召。在四万万同胞中，甘心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孝子顺孙，甘心作亡国奴的，除了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是没有的。只要我们来登高一呼，我们相信响应我们的不是十万百万的中国人，而是几千万几万万中国人。拿四万万中国同胞的人力、财力、武力、智力，是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无力抗日”，是蒋介石辈汉奸卖国贼欺骗中国人民、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口号，而不是我们有数千年历史的黄帝子孙的口号。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救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请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一切愿意抗日的个人或代表，都是苏维埃红军的朋友，我们都欢迎他们到苏区来，并愿竭诚招待。同时苏维埃制度的是否适合于中国，亦请亲来考察，加以判断。

书不尽意，敬布腹心，望公等熟思之。顺致
民族革命敬礼！

毛泽东 周恩来 彭德怀 林 彪 叶剑英
杨尚昆 聂荣臻 朱 瑞 程子华 徐海东
张云逸 郭述申 刘志丹 陈 光 刘亚楼
彭雪枫 萧 华 杨 森 高 岗 阎红彦等 同启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张学良、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万福麟。

中共中央关于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后，在日本强盗进一步的吞并中国与蒋介石卖国政策下，河北、察哈尔、绥东，又相继沦亡于日本了！亡国灭种的大祸，刺激着全中国，最广大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抗日救国的漩涡，民族革命战线大大的扩大了！民族革命高潮的来临与澎湃的向前发展，划分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在这种形势之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展团结和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不管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下层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中央一月二十五日决议）。

因此目前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的力量去暴露日本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与蒋介石无耻的卖国政策及欺骗，去说明日本强盗与蒋介石是灭亡中国的当前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去煽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两大巨潮，结合

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去战胜日本强盗及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

（二）根据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来检查我们过去的宣传工作，显然的暴露着下边的弱点。

第一，没有能够迅速抓紧每一新的事变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抗日反蒋的宣传工作显然赶不上日本侵略与蒋介石卖国的迅速，反对日本强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宣传并没有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同时在抗日反蒋的宣传中，每每没有能够与土地革命、与群众的当前实际生活实际问题，紧密的联系起来。

第二，好些口号在今天是不能适用的了，如“打发财人”，“进攻富农、反对富农”，“没收富农好土地及剩余农具”等等。有些错误的口号是要根本纠正的，如“杀尽地主富农”（有些同志是这样说的），“杀尽反革命，杀尽团保甲”等等，因为这种口号一方面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另外还足以吓退小资产阶级及那些在民族革命高潮中动摇着的与有参加可能的中间势力，同时还可动摇革命的基本群众，这对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运用是有妨碍的。

第三，不善于依据群众的阶级觉悟程度和分别对象去进行宣传工作，平均主义的宣传工作还是存在着。我们的同志往往将新苏区的群众与老赤区的群众一样看待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更奇怪的，还有把学生当作农民一样看待去宣传。这种现象的继续，必然使我们的宣传工作离开群众，而不能从宣传鼓动的动员上去动员群众执行党的策略路线。

第四，在我们宣传品上和报纸上还常常表现着似乎极其“清高”、极其“革命”的口吻与内容，譬如我们抗日救国会的报纸与宣传品，常常将党的主张、党的口号都囫圇的吞下去，这就失了抗日救国会在联合战线中的作用，使抗日救国会不能

更广泛的去动员与团结群众。

这些缺点必须迅速的、彻底的改正，才能转变我们的宣传工作去为实现党的新的策略路线而斗争。

(三) 目前我们的宣传工作必须为适合于党的策略路线，适应于夺取更广大的群众，适应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而急剧的转变。

第一，一切文字的、口头的宣传都应该以反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强盗及其走狗蒋介石而出发。要最广泛、最深入的暴露日本侵略的行为与蒋介石卖国的事实，进一步的揭破蒋介石所谓“抗日必先剿赤”，进行新生活运动，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中日会议调整中日关系”等等的欺骗宣传，更深入的去揭穿日本吞并全中国的阴谋毒计，指出灭亡中国最凶恶、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日本强盗与蒋介石（参看目前时事宣传要点第一号）。

第二，必须以最痛切、最警惕的宣传去指出亡国灭种的大祸已经近临在全中国民众的头上，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派别、团体、队伍，都应该联合在一条战线上以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共同的主要敌人。要大大的宣传抗日联军、抗日救国政府及其纲领，说明不管什么人，只要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都要在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联军的联合下才能自救救国。白色区域一切民族革命运动，要及时的作广大的宣传并予以援助。

第三，要在群众中解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各种政策的改变，如中立富农、给革命小资产阶级以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抗日反蒋的军官及士兵一律优待、优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及土地劳动经济选举法等，为的正是团结更广大的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迅速去直接对日作战，

解救中国的危亡。说明苏维埃积极扩大抗日红军，扩大抗日的苏维埃区域，为的是创造抗日的巩固根据地。积极进攻卖国军薛岳、刘湘，为的是巩固抗日后方，肃清抗日障碍，迅速对日作战，保卫中国。

第四，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丝毫也不能一刻放松去揭穿那些动摇妥协以至叛变投降的倾向。我们一定要大大的以党的主张去和一切改良主义倾向对立，要鲜明的去揭发一切其他派别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与代表敌对阶级利益的主张，去夺取广大群众，去孤立那些改良主义者。

第五，要分别群众的觉悟程度，分别宣传的对象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千篇一律的平均主义的宣传工作须迅速的改正。对于那些半途的朋友与中间势力的分子，我们的宣传口吻与态度要有转变。我们的同志要学会一些必要的外交辞令，当然不能去迁就中间势力的主张而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

（四）在宣传工作的方式与方法上也必须力求迅速的转变。

第一，一切的宣传必须普遍深入、通俗简明，改正过去一些高谈阔论使人烦厌的宣传。要多多利用一切活动的宣传方式，利用一切的机会，如各种会议、演剧，逢场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要多多采用挨户的、口头的、化装的宣传方法。各个部门、各个宣传机关都要一致为党的策略路线而迅速的总动员。

第二，目前我们的宣传必须着重的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深入到白区，去利用群众的社会关系，运用水上的（放木板）、空中的（放孔明灯）方法去达到这一目的。在红军中火线上的喊话联欢更应大大的动员。在番民群众中须尽量的将宣传品翻成番文散发张贴，并须与番民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

第三，在我们一切的宣传工作中须与组织上的团结紧密的

联系起来。从宣传鼓动中，不失机会的、及时的去团结群众，组织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到党的任务上来。

各级宣传机关与部门须立即讨论这一指示，按照自己的当前任务转变与规定自己的宣传工作，并将实际的经验报告前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东征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

(一九三六年一月底)

周恩来

一、目前新形势与新事变

(一) 日本帝国主义分裂华北与向西急进。

(二) 世界的新阵势——日、德、意的扩张与英、法、苏、美从旁观望，反映在远东方面的斗争。

(三) 南京政府的新阵容——亲日派占了上风，出卖和分裂了华北；英帝国主义渐渐积极起来与胡⁽¹⁾粤结合；蒋介石的新策略——但蒋介石现在仍然是卖国罪魁。

(四) 反日的新潮——涌现出“全国一致抗日”的要求。由这点出发，苏维埃红军在其胜利和政治主张下逐渐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

二、我们的任务，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一) 要实现抗日救国会议，要建立国防政府、抗日联

* 本文是周恩来在红军东征山西前夕写的提纲。

军，苏维埃红军在全国尤其在西北的胜利和发展，是有推动和决定作用的。

（二）粉碎敌人对陕甘的三次“围剿”之后，陕甘的敌人是缓进，山西的敌人是封锁，日本帝国主义则在后督促和急进。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1）巩固地发展和扩大抗日根据地；（2）大量消灭阻拦我们抗日的敌军，扩大红军；（3）力求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准备与日帝作战。在这一方针下，我们采取了东征的计划。

（三）东征的胜利估计及其影响：（1）将要消灭阎锡山的一部或大部；（2）将可能创造出沿河东岸的大片苏区；（3）将调动河西的晋敌，减弱河西敌人的力量，便于河西的发展；（4）将争取抗日根据地向东扩大的先机；（5）将更加暴露阎锡山的真面目；（6）将使群众看到，红军是真正抗日的；（7）将掀起东方民众的抗日热潮；（8）将推动晋、直、豫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9）将推动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实现；（10）可能引起南方敌人之前进与北方敌人之进援，红军主力不拒绝有利的回击，陕甘武装更要努力打击敌人、保卫发展现有苏区。

三、我们后方同志的责任

（一）集中一切力量为着前线上的胜利，主要是东线上的胜利。

（二）开展其他战线，一直深入到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发展。

（三）继续扩大红军与地方部队，完成原定计划，动员担架队、运输队，动员妇女做鞋子等。

（四）努力春耕，增加生产，增加贸易，补充前方。

（五）百倍加强边区、白区、白军中的工作，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到全中国去，首先是华北及沿海中心城市。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胡汉民。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问答

——供各级党部讨论时的参考材料

(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

(一) 民族革命新的高潮划分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问：为什么在目前爆发了民族革命新高潮？

答：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后，自去年十月到现在又占领了河北、察哈尔、绥东，并积极准备全部占领绥远和山西、山东进而吞并全中国，蒋介石卖国政府却执行其一贯的卖国政策，一步一步的要将全中国卖给日本强盗，亡国灭种的大祸逼临在全中国民众的头上，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中国人，都积极起来反日反卖国贼，全中国掀起了民族革命新的高潮，在中国革命史上便划分了一个新的时期。

问：民族革命新高潮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答：目前民族革命新高潮的特点在于：不仅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及比较落后的阶层，都卷入了抗日救国的漩涡，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又转入了革命，在反革命营垒中也发生了新的动摇和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展着的反日巨潮有采

取局部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同时整个民族革命高潮，更走向进一步的深入与广泛发展的趋势：由学生的首先发动而普遍到工人、农民、兵士的动员，由城市而深入到乡村，由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而走上与军警武装冲突，由赤手空拳而走向组织纠察队、义勇军、抗日救国军的武装动员，更猛烈的革命巨潮将随着新的趋势而泛滥全国。民族革命的战线已经大大扩大了。

问：目前的革命形势与一九二五年——二七年大革命不同之点何在？

答：目前民族革命新的高潮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不同的地方是：

第一，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许多地方已经胜利了，苏维埃红军已经成为民族革命强有力的支柱，这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所没有的，而同时也就是目前民族革命新高潮顺利发展与取得彻底胜利的主要条件。

第二，中国的阶级斗争经过大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叛变的教训，经过大革命后几年来土地革命的开展，比较大革命时更其深入了，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比任何时候都尖锐。因此工人农民的阶级觉悟程度进一步提高，资产阶级地主仇视革命的心理也随之而增长，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像大革命初期那样积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了。

第三，第一次大革命时的任务是铲除封建势力和一般的反对各个帝国主义，现在民族革命新高潮的任务，却是打倒当前的主要敌人，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结合的南京卖国政府、卖国汉奸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党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也不能和第一次大革命时一样。

问：民族革命新高潮对中国革命发生了什么影响？

答：民族革命新高潮的来临，第一，使统治阶级内部发生

了新的分化与冲突，削弱了卖国政府的力量，利于我们去利用敌人的矛盾；第二，新的事变的发展更揭穿了卖国汉奸的欺骗，削弱了蒋介石的统治基础；第三，广大的民众日益离开改良主义的影响，走进革命的漩涡，中间势力也动摇中立，以至参加民族革命，中国革命的势力大大增强了；第四，新的高潮是中国革命胜利一支强有力的巨流，使土地革命得到最有力的配合去争取苏维埃中国的胜利。

问：为什么说国际形势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

答：目前国际形势是处在革命与战争新时期的前夜，一方面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帝国主义间重分殖民地的战争和被侵略民族反对侵略者的战争同时紧张起来。另外是广大群众日益离开法西斯蒂和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共产党的威信大大提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伟大胜利，这一国际事变的发展将会帮助中国革命，瓦解帝国主义加于中国革命的重大压力，便于中国革命去取得彻底的胜利。

（二）目前党的策略路线

问：什么是策略路线，根据什么来决定？

答：策略路线是每一政党在一定的政治形势下行动的方向和方法。策略路线是根据革命任务、各阶级态度、当时革命形势以及主观力量来决定的。因此策略路线并不是刻板的、不变的，而是有时是进攻有时又是退守的，但总的目标都是为达到革命的胜利。

问：为什么要改变我们的策略路线？不改变又有什么危险？

答：改变目前的策略路线，根据于：一、中国已经到了生

死存亡的关头，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汉奸蒋介石成为灭亡中国的主要敌人；二、民族革命新的高潮的到来，阶级力量的变动；三、苏维埃红军的胜利和发展，还不能依过去的策略路线，在最近的将来取得决定意义的胜利。因此为着结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为着使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去迅速争取中国革命胜利，所以要改变党的策略路线。如果党依然不改变策略路线，那么不仅会使党不能去紧握着新的革命高潮汇合革命的力量，取得革命的领导权，争取革命的迅速胜利，而且将使党成为革命事变的尾巴，成为狭隘的小团体，离开广大的群众。

问：以前党的策略路线是不是错了呢？

答：以前党的策略路线是根据过去的政治形势来决定的，一般来说是正确的，当然某一事变或某一部分上是有缺点和错误。改变党的策略路线主要是为的适应于目前新的形势的。

问：目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有没有变动？

答：中国革命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与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两大任务，是根据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决定的。中国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中国革命性质依然没有改变，目前党的策略路线的改变只是根据目前新的形势而决定，决不是因目前革命性质与任务有所变动而变更。

问：然目前党的基本策略路线是什么？

答：目前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展团结和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不管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下层的、各阶

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中央十二月二十五日决议）。

问：为什么要把民族革命提到第一位，是否把土地革命丢掉了？

答：中国快要亡国了！为争取中国独立和解放的民族革命高潮也到来了，因此把中国从灭亡的危境中解救出来，取得中国的独立，成为中国革命当前第一等的任务，不然，中国灭亡了，什么也烟消云散了。但并不是因此便丢掉土地革命，而是要将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去求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

问：反日统一战线的意义怎样？

答：反日统一战线的意义是集中全国所有抗日反蒋的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汉奸蒋介石，在最广泛的、下层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去夺取最大多数的群众，利用敌人的每一间隙和矛盾，去分散与削弱敌人的力量，去孤立反革命派别。从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去争取民族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结合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

问：统一战线是宣传口号么？

答：不是的，共产党每一策略路线的决定决不是白纸黑字与仅作宣传的口号，而是党实际行动的方针，因此统一战线不仅是宣传的口号，而是目前党紧急的斗争方针。

问：工人农民革命还不够么？为什么还要统一战线？

答：工人农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但是在民族革命高潮中还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与中间势力都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党的策略的灵活就在于能够去利用这些势力，增强革命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不管是暂时的朋友，半途的同盟者，只要在抗日反蒋的同一目标下，都应该去团结他们到统一战线中来，如果

不去利用这些同盟军，那在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损害革命。

问：中国社会各阶级对民族革命的态度都是一样么？

答：不一样的。工人农民是民族革命的动力，能够为民族革命的胜利而坚决斗争到底。小资产阶级能够积极参加民族革命的，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是坚决反对民族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小地主表示动摇中立以至有参加民族革命的可能。

问：统一战线联合什么人，反对什么人，基本力量是什么？

答：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是工人和农民。联合学生知识分子和一切小资产阶级，利用一部分可能参加民族革命的中间势力，中立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反对日本强盗卖国汉奸蒋介石及其靠山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

问：要建立统一战线是否还要阶级斗争？

答：一方面我们建立统一战线，但绝不因此而牺牲基本群众的利益、放弃阶级斗争，在反日战线中，广大群众革命利益的要求，应当得到满足的解答，牺牲群众利益的倾向，不但不能加强反日战线的势力，反会使之削弱下去。

问：为什么要反对民族改良主义？

答：民族改良主义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的主义，一部分参加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族资产阶级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子，他们参加统一战线并不是为着革命的彻底胜利，在某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得到相当的让步与利益，或斗争更进一步深入时，他们就会动摇、妥协，以至投降叛变，这就是民族改良主义的实质，因此我们在统一战线中要随时去批评、指摘、斗争，去反对民族改良主义，使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

问：群众会自动到统一战线内来么？领导权会自然落到共

产党的手里来么？

答：不，那是不可能的，只有从党的艰苦的、灵活的实际工作中，才能团结广大群众到统一战线中来，也只有党在统一战线中正确的、积极的执行反日反卖国贼的斗争，坚决反对改良主义，满足广大群众的利益，灵活的运用一切可能的外交手腕，才能争取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问：过去没有很好运用统一战线，我们受到了些什么损失？

答：的确！过去我们是受到了一些损失，失去了夺取广大群众的机会，失去了开展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时机，譬如福建事变与北方事变，因为我们党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事前不去组织事发后又疑疑惑惑，以至错过了这一最好的时机，不然，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将有另外一个新的局面。

（三）抗日救国政府和抗日联军

问：什么是抗日救国政府和抗日联军？

答：抗日救国政府，就是凡中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不分派别，不分阶级，不分团体，不分部队，在抗日反蒋的共同意志下组织起来，指挥全中国抗日反蒋斗争，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解放的一个政府。抗日联军就是不管什么武装队伍，不管什么阶级，不管什么派别团体，只要是抗日反蒋的都可加入而组织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军队，抗日救国政府、抗日联军也就是反日反卖国贼统一战线最广大最具体的形式。

问：用什么方法来实现抗日救国政府？

答：现在我们还不能从脑子里空想实现的方法，要看革命的发展来决定。大概有几种的可能：一、在白色区，以群众的

力量暴动起来成立抗日救国政府；二、在灵活的外交政策下，苏维埃政府与某一抗日反蒋的势力结合而成。一般来说，第一种的可能是比较大的。

问：抗日联军由谁指挥？

答：这要看谁的力量大来决定，如果在抗日联军中我们的力量大，那么，当然是我们指挥，反之，则指挥权将落在他人手里，而我们却要从斗争中去争取抗日联军的领导权。

问：抗日救国政府实行些什么政纲？

答：抗日救国政府实行下边的十大政纲：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经费。

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和汉奸的土地财产，发给工、农、兵士、贫民和难民。

三、给予民众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

四、组织民众的抗日救国军和义勇军。

五、救灾治水，救济被灾民众。

六、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七、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兵士和教育界的生活，发展教育和生产技能，救济失业的学生知识分子和专门家。

八、实行民族自决，联合中国内各少数民族一致抗日，反对在日本卵翼下的反动民族运动。

九、联合朝鲜、台湾人民，赞助他们的独立解放运动，并联合日本国内工农及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力量，使他与中国反日战争结成巩固的联盟。

十、与一切表示同情和赞助中国伟大民族运动，或守善意中立之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问：抗日救国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是怎样的，哪个大些？

答：抗日救国政府是指挥全国抗日势力反日反卖国贼的政府，在反日反卖国贼的共同主张下，苏维埃政府应当与抗日救国政府一致行动，可是苏维埃政府又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如果苏维埃政府的力量强大，抗日救国政府将随苏维埃政府的政策而转变，反之，便是另外一个结果。

问：抗日救国政府能否指挥抗日红军？

答：在抗日反蒋共同一致的行动下，抗日救国政府是可以指挥抗日红军。

问：抗日救国政府与苏维埃政府有不同意见时，红军听谁命令？

答：如果有不同意见时，红军要听苏维埃政府的命令。因为不同意，它发生将是抗日救国政府的某些分子动摇或者妥协，正需要与它坚决斗争。因此红军应该站在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方面。

问：抗日红军出发抗日，是否也到处组织苏维埃？

答：抗日红军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当然要坚决执行党的主张，一面依照党的主张出发抗日，同时又执行党的主张——建立苏维埃。

问：在新苏区，抗日救国政府和苏维埃是否同时存在？

答：这是不可能的。在新苏区只有苏维埃政府，而没有抗日救国政府，两个政权同时存在是不可能的。在某种情形下，在某一个区域，原来就有抗日救国政府存在，红军到达该地后，依照阶级斗争的转变，或者也有两个政权出现的可能，但这仅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是不能继续的，谁胜谁负要依照斗争来解决。

问：在抗日救国政府下，反动派别宣传反共产党的言论，应当怎样对付？

答：在抗日救国政府下，不能和苏维埃政权下一样。在抗日救国政府下，各派别都有宣传的自由，反动派宣传反共产党的言论，我们也用我们的宣传武器去揭破他，去打击他，去争取广大群众，孤立反动派别。

问：共产党叛徒在某个军阀那边，如果这个军阀现在也愿参加抗日反蒋，对那些叛徒如何办？

答：如果这个叛徒并不是罪恶滔天，那么，我们也不一定要采取激烈的手段去对付他。反之，而我们的力量又超过某一愿意参加抗日反蒋的军阀的话，那么处置的权力和办法将归诸我们。

问：抗日救国政府和苏维埃政府哪个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

答：这首先要认识抗日救国政府是某一时期的过渡政权的性质。在过渡时期中有这种可能：如果我们的力量强大，那么，可以将抗日救国政府逐渐转变为苏维埃政府；如果我们的力量比较小，苏维埃政府将融化于抗日救国政府之内，那时或者用暴力去解决谁胜谁负的问题，或者采取别的办法，那要看当时的整个形势与统一战线的裂痕来决定。不过我们须认识最后的胜利还是属诸苏维埃的。

（四）苏维埃红军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问：为什么苏维埃的政策要有一些转变？

答：苏维埃政府，把自己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于反对日本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这种改变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中央决议）。

问：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意义是什么？

答：人民共和国的意义就是：第一，能包括更广大的群众，不仅工人农民，革命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权力；第二，更能适合于当前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第三，现在苏维埃的区域大部分是在缺少无产阶级，经济上比较落后的中国西北部，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也正适合于目前的地区环境。

问：为什么要给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以选举权、被选举权，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是指哪些人？

答：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是指那些参加民族革命的作坊小工厂厂主、中小商人、独立生产者、城市贫民、自由职业家（教员、新闻记者、律师、医生）及革命的学生等。苏维埃给以选举权、被选举权的作用是团结更广大的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下参加民族革命运动。

问：对抗日的白军军官应采取什么态度？

答：苏维埃优待参加抗日救国的白军军官，其家庭如系地主又在苏维埃区域内，土地虽然依照苏维埃法令无代价没收，但其本人及其家属，苏维埃将给予一定的优待。

问：以前反对富农，为什么现在又中立富农？

答：在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的现阶段，党对富农的政策是中立富农，六次大会决议也是中立富农，以前党的策略并不是反对富农，不过以后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阶级斗争的尖锐，而逐渐走上反富农的道路。在民族革命高潮的今天，富农表现着动摇中立，一部分以至有参加民族革命的可能，为着减弱敌人营垒的力量，分清革命的主要敌人，并使中农不至因反富农而动摇，所以我们现在采取中立富农的策略。

问：中立富农的具体政策怎样？和联合富农有什么不同？

答：中立富农的具体政策就是只没收富农出租的一部分土

地，富农自己耕种与雇人耕种的土地不没收，富农的财产农具等等不没收。对苏维埃政府表示中立或同情的富农，在苏维埃召集的群众会议上有发言权，在雇工与富农斗争时，党要站在雇工利益的方面并领导与组织这一斗争，当然富农有意见时可向苏维埃政府控诉。中立富农和联合富农的政策是有显然的分别，联合富农的政策是拥护富农的利益，压制雇工斗争、牺牲雇工利益，并由联合富农政策的推论走上中立中小地主，而使土地革命成为一句空话。

问：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有什么新的政策？

答：为着中立民族资产阶级及吸引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去对付主要的敌人，所以苏维埃政府对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采取更宽大的政策，欢迎海外华侨投资并保护他们。在遵守苏维埃的法令下，工商业资本家得自由营业，苏维埃并加以奖励；工人应遵守劳动合同，工人有故意违反合同时，资本家得向苏维埃控诉；在工人与资本家发生斗争时，党须站在工人利益出发去组织与领导工人的斗争。

问：政策的转变还影响到苏维埃哪些实际政策？

答：不能破坏市场，除反革命首领的商店外绝对不能没收商店。苏维埃政府不规定市场货价，奖励商人与白色区域通商。在城市里住，商人房屋须纳房租。粮食须用钱购买或采取借粮食与乐捐的办法，不能随便征发。土地买卖完全自由，富农资本家也有买卖土地的权利。富农得组织生产与消费合作社，但苏维埃政府同时组织劳苦群众的合作社，以备抵制奸商富农的操纵与故意高抬货价，劳苦群众缺乏耕牛农具时得向富农租借使用，但须依苏维埃的规定纳一定的租金。

问：苏区富农能否有武装的自由和参加红军的权利？

答：红军是阶级的军队，不像抗日联军，苏区富农依然不

准其参加红军，但在红军中有长期斗争历史而坚决积极的个别富农分子，准许仍在红军中工作，不宜开除军籍，有个别的确坚决参加革命的例外富农分子在其热烈的要求下可分配其红军中的别种技术工作或婉言拒绝之。在苏区依然绝对禁止富农组织一切武装队伍。

问：苏区的群众团体组织也有改变么？

答：也有多少改变，原则上是吸收更广泛的群众加入。譬如工会来说，不管带多少徒弟的师傅都可以加入工会，自做自卖的独立生产者也可加入工会，店员除掌柜的头把手外均有加入店员工会的权利，自由职业者、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可组织职员工会等。女工农妇协会改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妇女也可加入革命妇女协会。学生可组织学生会、互济会，抗日救国会则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则依照原来的组织原则。

问：党与苏维埃在目前要进行哪些紧急的工作？

答：目前党与苏维埃，为了很快的同日本作战，为了争取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必须更加努力去扩大抗日红军，扩大抗日的苏维埃区域，成为抗日根据地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卖国贼军队的进攻，肃清抗日障碍，巩固抗日后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争取工农大多数，争取卖国贼军队和日本军队内士兵，向少数民族建议，建立共同斗争的联盟，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等（中央决议）。

（五）共产党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问：为什么关门主义是目前主要危险？关门主义的具体表

现是什么？

答：因为我们的同志都是在原来的策略路线下工作惯了的，学熟了那一套。而另外又有发生对民族革命新高潮不甚相信的可能，因此在新的策略路线下关门主义便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它将会在各种形式上表现出来，如死守旧策略的观点。以为只有共产党才是革命的，只有工农群众才是革命的力量，保持其“清高”的态度，不愿意到自发的群众组织与自发的群众斗争中去工作，形成宗派主义等等，所以党要集中火力去反对关门主义。

问：怎样去反对关门主义？

答：要反对关门主义，主要的一方面要将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在干部中、党员中作最广泛的深入的教育工作，另外便要从一切实际的群众斗争中、工作中去反对关门主义。对某一关门主义的表现必须深刻的揭发，并从实际执行新的策略路线的转变去证实关门主义的错误。

问：陈独秀主义的表现是什么？为什么要反对？

答：在新的策略路线下，陈独秀主义有复活的可能，他表现在以为新的策略路线下一切都没有界限了。在统一战线中压制工农群众的斗争，牺牲基本群众的利益，迁就资产阶级，单纯进行上层勾结，不艰苦进行下层统一战线，不和民族改良主义斗争，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等。陈独秀主义以前已经而且将来也会断送统一战线、断送革命，党应与之作坚决斗争。也只有这样才能胜利的克服“左”倾行为。

问：此外还有哪些错误倾向？

答：在新的策略路线下，在党内可能发生一种过分的幻想，以为民族革命高潮来了，革命就要胜利了，不用进行艰苦斗争了，或者过分幻想军阀会来参加民族革命了，敌人不会向

我们进攻了等等乐观主义的错误倾向，另外便是不相信民族革命高潮与敌对阶级分化的错误倾向，这些倾向我们同样要坚决的反对。

问：如何扩大和巩固党？

答：在目前我们要在组织上扩大和巩固党，党现在需要数十万以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因此党更须大量的吸收大批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应当吸收大批的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入党。其次，党必须大量的培养干部，更多的教育他们，发挥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把他们团结在领导机关的周围，为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奋斗。最后，在党内必须大大的发挥自我批评精神来保证新的策略路线的正确执行。

问：介绍党员拿什么做标准？

答：过去我们以阶级成分为吸收党员的主要标准，而对好些积极坚决参加革命斗争的其他分子常常摈诸党外，这是不妥当的。现在以能否为党纲和党所提出的主张坚决奋斗为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党员的出身和社会成分是应当注意到的，但不是最主要的。

问：党章上关于候补期问题现在有什么变更？

答：一般说候补期要比以前缩短，才能更广泛发展党的组织，具体规定另有决定。

中央宣传部

根据档案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中) 刊印。

林育英、张闻天 关于红四方面军战略方针等意见 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

此电请后方发朱德、国焘同志：

(甲) 三电均悉。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

(乙) 国际⁽¹⁾指示都是原则上的。即是：

(1) 统一战线，这是基本策略方针；

(2) 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是统一战线之最广泛与最高的表现；

(3) 工农苏维埃之改变为人民苏维埃；

(4) 富农政策。

以上这些均已电达，政治决议及抗日救国宣言即根据此基本原则出发。

(丙) 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拟在上海、北京、东三省等地同时发表，此时不宜再有变更，因原则上并无不妥当处。十条纲领亦是国际指示，且已在各地宣布，为实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此时即应宣传召集全国代表会议，此会议即名曰抗日救国代表会议，内容不日电告。

(丁) 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问题，已见弟等前电所述，此外办法国际都不能同意。

(戊) 关于战略方针，弟等有如下意见：

(1) 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2) 二、四方面军，现在□巩固的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计划，但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二、六军团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互相呼应。

(3) 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发展，寻求机会的前进。

以上三种方针，请兄等考虑选择之。

(己) 此外，关于苏联的、国际的、中国的许多情况将续电达。

育英 闻天

二月十四号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共产国际。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宣言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

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危机，已经到达最后关头了！

九一八事变，在“不抵抗主义”下轻轻地断送了东北四省；“一二八”的停战协定，徒然是增高了敌人侵略的气焰；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完全奠定了日本吞并华北的基础；冀东独立与冀察政委会成立，更说明中国的领土主权已完全破碎的沦丧了！最近在接受广田三原则及新二十一条的默契下，又来召开中日南京会议，这正表现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整个中国殖民地化，同时也显示出我们政府的屈辱退缩。其他，如目前土肥原奔走天津，公开宣布增加华北驻屯军，这些事实，都在告诉我们华北问题又展开了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华北国不久要出现了！

应着这种空前的危机，处在国防第一线的平津学生，发动“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英勇的示威斗争，不到一个星期，便掀起了全国各地抗日的怒潮。在这两次血的经验教训里，我们一致认为抗日救亡这伟大的任务，绝不是单独的学生所能胜任。因此平津学联会发动徒步南下扩大宣传团，使民众知道当前的中华民族危机的严重和救亡策略，这样才能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大众，充分地觉悟到只有自动武装起来，共同抗

日，才是活路。果然，我们的伟大行动是胜利了；徒步七百里，历时三星期，博得民众同情，散下了抗日的种子。

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收获，引起了卖国汉奸们的红眼，他们用最残酷的方法来破坏我们伟大的救亡运动。然而我们明白，救亡工作是繁难的，我们也只有在反汉奸、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前提下，作长期抗战，才能争取到中华民族的解放。所以我们的第一团和第二团在保定决定结束时，大家便议决了要永远并扩大这个组织，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经过全部南下宣传同学们同意，回平后，我们便着手组织起来了。

根据目前危岌局面，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一、揭破汉奸及其走狗的阴谋，并打击其种种阴谋的破坏手段；二、联合一切抗日反帝的力量，不分党派地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一致团结起来。以下便是我们具体的斗争纲领：

- (一) 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境；
- (二) 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
- (三) 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
- (四) 铲除汉奸卖国贼；
- (五) 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在华财产及汉奸卖国贼的产业，充作抗日军费；
- (六) 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抗日；
- (七) 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被压迫民众共谋解放！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毛泽东、彭德怀 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

一、情 况：

(一) 满洲军一师占领张家口，日本在太原包头两处设军事机关，北京傀儡政府正进行华北的满洲化。

(二) 阎锡山在日本指挥下进行各种卖国贼工作。其兵力部署如下：太原一师，晋北大同一带一师，晋南长治、长子一带一师，汾河下游及大宁、吉县一带一师，晋西永和、石楼、中阳、离石、汾阳、柳林、军渡及沿河守备一师（七十一师杨耀芳），晋西北兴县、临县、碛口、保德一带两独立旅，侵入陕北吴堡、绥德、佳县一带一师（七十二师李生达），绥远全省两师。孙楚之“剿匪”总指挥部似在碛口（孙楚现去南京谒蒋^[1]，职务由参谋长代），杨耀芳之晋西防守司令部在汾阳。

(三) 河北抗日义勇军在发展中（大名、昌平、阜平等地）。晋豫之交有红色部队活动（阎锡山派兵一旅去对付）。内蒙德王^[2]独立与晋方对抗。阎锡山部队中抗日革命情绪在发展中。黄河东岸民众有欢迎红军之表示。

二、任 务：

在党中央及军委会抗日讨卖国贼，向山西消灭阎锡山部

队，发展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号召全国抗日讨卖国贼运动，并在军事上巩固向前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下，方面军第一步有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的任务。

三、渡河战役：

（一）敌情判断

我军渡河区域是晋敌七十一师杨耀芳防地，判断其六个团分布：永和一团，石楼城一团（一说一团部附一炮兵连），石楼所属沿河防御（河口对岸之辛关至沟口对岸之三交镇百余里）两团，中阳城及中阳沿河防御一团，柳林一团，师直属队在汾阳。我军渡河之第二日（二十二号），在三交镇附近地区敌有以二个至三个团与我作战可能，而在义牒镇附近，有以一个至两个团与我作战可能。在三天至七天之内，敌有以两个师左右兵力与我在石楼、中阳、永和一带作战可能。至于以更大兵力集中前进则须时间较多。

（二）我军部署

我军以从沟口、河口一带渡河，占领留誉镇、义牒镇并相机占领石楼城之目的，部署如下：

1. 集中地区

一军团沟口附近。

十五军团主力河口附近。

十五军团之八十一师解家沟附近。

方面军直属队川口镇附近。

2. 渡河地区

一军团沟口附近。

十五军团主力、方面军直属队河口附近。

十五军团之八十一师准备跟一军团渡河。

以沟口、河口两处为主渡点，老关、舍峪里两处为辅渡点（两辅渡点均属十五军团）。

3. 渡河指挥

每个渡河点由两军团派出渡河司令员、政治委员及船只指导员（每船一人），保证最敏捷最有秩序的渡河。

4. 渡河时间

以二月二十一日二十时为各兵团在各个渡河点同时开始渡河之时间。

5. 渡河手段

先头绝对隐蔽乘夜偷渡，以坚决敏捷手段夺取敌堡，割断电线，控制前进阵地及翼侧掩护阵地，以保证后队渡河及与援敌作战之有利地位。偷渡被敌发觉，立即改为强渡。

6. 渡河后之动作

一军团须准备与进入渡河点附近二三十里地区之援敌战斗而消灭之。在消灭该敌后或该地区无敌情，均须于第二日（即二十二号）或第三日（依渡河快慢及敌情决定）相机占领留誉镇地区。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即德穆楚克栋鲁普，蒙古王公。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中央政府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 代表大会通电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自本政府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来，全国人民纷纷响应群起拥护，可见四万万同胞中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谁也不愿意做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的。

但救国大计，事不宜迟，因此本政府今特主张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开始实行抗日战争的具体步骤。

为使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真能代表全国爱国同胞的意志，本政府主张在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前必须保障实现下列条件：

(一) 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容许一切党派自由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

(二) 实行外交公开。

(三) 取消国民党一切禁止抗日反卖国贼运动的命令（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出版物取缔检查条令、禁止抗日命令等），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四)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讨逆。

(五) 凡愿意抗日反卖国贼的政治的、社会的、职业的团

体与武装的队伍，都有公开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的权利。

（六）确实保障一切参加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代表言论行动自由与生命的安全。

同时，本政府更认为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开会后，必须立刻讨论并决定下列紧急问题：

一、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失地。

二、公开宣布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的完全无效。

三、惩办丧权失地卖国殃民的最高当局。

四、立刻颁布对日作战的动员令，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

五、号召与帮助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对日作战，拿所有兵工厂军械库的武器来武装抗日反卖国贼的人民。

六、正式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并实现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提出的十大纲领（见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抗日救国宣言）。

最后，本政府欢迎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苏维埃领土内开会，因为在苏区内，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势力都已彻底肃清，苏区是抗日的根据地，是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模范区。

根据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红色中华》刊印。

周恩来关于粉碎蒋军进攻的部署 给萧劲光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日)

劲光并飞转令托夫、云逸、赤兵^[1]：

甲、谍息蒋^[2]贼指示林空蔡一部进剿关中，分期完成合洛、洛富县、黑水间碉线，然后企图大举进攻的模样，其部署似分几路：

(一) 东路为冯钦哉部，进至宜川洛生镇、洛川之线筑碉，以王以哲部固守原防，增筑碉线；以孙蔚如部及特二旅、警三旅固守耀、铜、中、宜之线，孙部由三原、泾阳、淳化北进，警三旅控制北原镇至黑水一带。

(二) 南路以百〇五师进驻耀县、蒋家山、土桥镇之线筑路，准备进剿陕西路，以一百十二、一百一十五两师在南之土桥镇、织田镇、永乐镇正亭、旅子镇之线，以百十一、百十二两师居中，在南某镇、平氏镇、永乐镇、某头堡之线，以百〇六、百〇八两师在北之某头堡、盘客镇、古城镇、黑猫原之线，均筑堡修路，准备之骑兵军在其后方及平凉、泾川、长武、彬、乾、醴泉大道。

(三) 西北路以毛炳文三十七军接防黑水、太白、合水之线，增修碉线，准备进剿，以马鸿宾之七十五师及骑兵围合水、曲子、环县、定边之线筑碉。

以上部署，显是准备首先进剿关中，并截断我渡河向西发

展道路，而东北军则力求向我靠拢，巩固西兰大路，并企图封锁我关中苏区，以便打通其东西南三路阵地。至于以后向北进剿之敌，在进剿关中的部署中，东北军将为主攻，而毛炳文、杨虎城将起平和协助边境作用。

乙、我们作战方针应是：

（一）三月份迅速完成二十九军三个团、关中两个独立营、陕甘六个独立营的发展计划。

（二）广泛发展关中、陕甘的游击战争，深入到底翼侧后方积极活动，抵制和破坏敌人的筑堡垒、修路和前进的计划，并极力和缓杨虎城部队的行动。

（三）以小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进行保卫苏区与围困敌人的任务。

（四）集中主力。集中关中、陕甘两省主力，打击和消灭运动中之东北军的一部，或毛炳文向直罗、张村驿前进的一部，以粉碎蒋、张^[3]首先占领我关中苏区的企图。

丙、目前部署大要：

（一）关中苏区：

1. 以一个独立营或基干游击队，深入到耀州、淳化、三原地域运动，另以游击队挺入到白水、澄城、耀州、富南、同官五县之间活动，并极力和缓孙蔚如特二团、警三旅的行动，以抵制百〇五师的右侧及其后方。

2. 以独立营及得力之游击队，分向西路敌人三个纵队的翼侧、后方及其结合部，积极活动并破坏其筑堡。

3. 发动扩大各游击小组、赤少队，活动于敌人的正、侧面，以阻碍其前进。

4. 红一团应集结使用于打击和消灭在运动中的东北军中某一小部，或深入到东北军某部的侧后方，去袭击其暴露的翼

侧，在红一团作战时应调动独立营与之配合行动。

(二) 陕甘区：

1. 中宜独立营或其基干游击队，应向着西路敌人第一纵队的左侧停止活动，以阻滞其前进，破坏其筑堡，并截断其与毛炳文部的联络。

2. 中宜另一游击队，应维持关中与陕甘的交通。

3. 富县、华池两独立营，应活动于炳文部的两翼侧，并切断和捣袭其交通联络。

4. 肤施部队应配合当地游击队、赤卫军，担任围困肤施、甘泉两城民团的任务，并极力进行联欢，保持通商，肤施民团继续出扰，应集中独立营给予打击。

5. 甘洛独立营应活动于富县、洛川中部大道两侧，并经常深入到洛川活动。

6. 宜川独立营及驿合游击队，应深入到宜川、韩城、合阳的大道积极活动，以牵制冯钦哉的北进。

7. 二十九军两个团，应集中先以一个团配合甘洛、富县两独立营，打击毛炳文部队的接防。

(三) 陕甘区应令保安总部、地方部队，应向西北活动，以牵制马鸿宾部队的调动。

丁、上项部署大半只是指示作战的主要方向及其兵力的使用原因，各军区得依作战方针及实际情况变化之，惟执行情况须随时电告。

恩 来

三月三号

注 释

〔1〕即贾拓夫、张云逸、钟赤兵。

〔2〕指蒋介石。

〔3〕指张学良。

张闻天等关于同南京当局谈判 的意见给周继吾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

博古^{〔1〕}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 毛 彭^{〔2〕}

四号十二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即秦邦宪。

〔2〕 指毛泽东、彭德怀。

张闻天等关于我方与东北军 王以哲部订立口头协定的通报

(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

林聂朱，徐程郭，刘宋，阎蔡，罗迈，云逸，洪涛，理治，劲光^[1]诸同志：

甲、关于我方与东北军整个协定尚在磋商，现先与六十七军王军长以哲所部订立如下之局部的口头协定，并于三月五日开始执行。

一、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对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之防地）。

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准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

四、恢复红白通商，红军采办货物经过洛川、富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但为暂时掩饰外人耳目计，红军出白区办货可着便衣。

乙、两省苏、省委^[2]及军区，应将本协定各项之意旨，向延安、甘泉、富县等靠近六十七军防地附近及交通路上之县、区、乡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红军游击队、赤少队解说明

白，并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之目的。说明方法，应口头传达，不得出布告，因为此种协定对于蒋介石还要保守秘密。特达。

张闻天 毛泽东 周恩来

彭德怀 博古^{〔3〕}

三月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刘志丹、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李维汉，张云逸，郭洪涛，朱理治，萧劲光。

〔2〕指陕西省苏维埃政府、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陕西省委、陕甘省委。

〔3〕即秦邦宪。

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 统一战线的方针*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

张 闻 天

共产国际“七大”决议^[1]中特别重要的，一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二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反战的统一战线，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殖民地的人民统一战线。决议中关于欧洲的问题讲得多些，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从这些决议看，中央以前的决议基本上是同这些决议相符合的。

一 世界大战的危险与争取和平的斗争

“七大”关于战争决议，是去年八月通过的。八月到现在，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呢？首先，日本继续侵占华北，并且废弃海军协定，开始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破裂了由华盛顿条约建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平衡。其次，意大利去年十月初开始了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这也是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它使欧洲发生了变化。第三，德国公开废除凡尔赛条约的

* 这是张闻天在晋西地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

有关条款，进军莱茵非武装区。这三个国家公开破坏平衡，是主要的挑衅者。三国之中，德、日酝酿签订军事协定，意、德则开始接近。

由于日、意、德三国的上述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英国从前与德国签订了海军协定，意阿战争以后，它同法国开始接近。法国则通过了法苏协定。美国重新宣布了中立法，英美开始接近。

总之，一方面，德、日、意接近，另一方面，英、法、美、苏接近。这种形势表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增加了，其一触即发之势时刻威胁着人类。世界革命运动（工人运动，殖民地人民运动）的发展，和平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发动大战较为困难，但同时也使帝国主义急于在战争中求出路。

正因如此，争取和平的斗争更加重要了。全世界的群众，不但工农，而且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反对战争。和平的口号可以团结最广大的群众为反战而斗争。资产阶级的许多派别攻击我们不要和平，现在我们正可以揭破他们，从而争取最广大的群众。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是进攻苏联和侵略殖民地的战争的反对者。要为世界和平斗争，就要反对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拥护世界和平，反对进攻苏联，反对日本侵占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中心。我们要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世界和平，而坚决反对日本的“和平”和蒋介石的“和平”，因为这是侵略者与卖国贼的和平。

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对日。这种国内和平是必要的。同这一口号相联系的，是联俄联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

号。这是群众的口号。在中国劳苦群众面前，这个问题是十分明白的。日本的所谓三大原则之三，就是中日“满”联合反对赤化，即反对中国红军与苏联。蒋介石想在日本同中国红军、苏联之间“渔翁得利”，是办不到的，只能是或者联日，或者联俄联共。在中国，甚至一些反革命分子都想找出路来联俄联共抗日。有些人可以去幻想中间道路，但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我们提出这一口号，是否挑衅，使日苏打起来呢？当然不是。不能因为拥护苏联而连这个口号也不提。我们要继续团结全国力量，联俄联共来反对日本。李德的意见^[2]，依照我们的分析，全是无稽之谈。

总之，我们的和平政策是战斗的，动员的，是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二 国内形势与统一战线

现在的情况证明，中央决议是正确的。

日本在继续进攻。东京事变进一步完成了法西斯的统治，日本政府采取更积极的侵略政策。

南京政府仍在继续出卖，它承认了广田三原则。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为第二傀儡，德王、卓什海^[3]正在活动“独立”。

全国反日运动，特别是学生反日的壮烈运动，到处在酝酿。

反革命内部即南京政府内部和一些军阀也在与我们接洽谈判。

现在有许多派别在抗日口号下表现活跃。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一）地主买办集团，但处于另一帝国主义影响之下者（如广东）；（二）分裂出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正在发

挥其民族改良主义；（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这些派别要与我们接近，有些积极，有些动摇。但地主买办集团坚决反共（如广东），资产阶级有的主张联俄联共，有的不主张。这种分化很明显。

红军东征获得胜利，苏维埃影响正在扩大。

以上事实证明，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局面正在形成，尤其在华北。那里成为所有矛盾集中的地方，是首先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地区。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现在证明，这种统一战线对我们是完全有利的。

我们的方针是：

（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应与群众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国际决议说，不应当只是号召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而是要告诉群众，今天应做些什么。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环境，提出群众迫切的要求，并使这些要求与抗日联系起来。如只喊抗日，不联系切身利益，就不能吸引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

（二）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订立协定时也应考虑今天所需要的是些什么，先订部分的、地方性的协定。这些协定可以是公开的或秘密的，但一定要着眼于争取广大群众。

（三）不论统一战线是上层的，下层的，或上下同时进行的，统一战线的协定如能公开，就一定都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讨论。即使是秘密的，将来也要公布的。我们不订立那种不讲原则的“拉拢”的协定。

（四）订立协定后，我们忠实遵守这种协定，以取得同盟者尤其是其群众的信任。只有如此，才能对于违反协定的领袖进行批评以至斗争，并迫使玩弄左倾言辞的空谈者不得不表示态度。

（五）不放弃对同盟者的立场进行严肃的批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主张。

（六）对最反动的法西斯分子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而不是迁就，如对蒋，这样可以使动摇者倾向我们。

（七）成立统一战线的组织与机关，使其愈民主愈好。吸收左倾分子，发挥其积极性，排斥不好的分子。

（八）在各种问题上实行统一战线，不限于抗日。利用每个小的要求（如工资、抗捐、民主自由的要求），利用每个事变，在各种阶层以至各种反动阶层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没有死板的公式。

（九）不要进行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学习从防御到进攻的各种斗争策略，学习巩固力量，以及必要的有组织的退却。掌握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

（十）朝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方向发展。

国际决议提出，要力求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或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的政府”，这种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但采取坚决措施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可以说，这是某种“第三种政府”。这种政府的产生，国际决议指出需要三个条件。

在中国，有两点不同。一是革命的发展不平衡，二是已经有了苏维埃，所以有可能在某些地区中首先建立这种政府。条件也是三个。这三个条件现在还没有得到。因此，国防政府、

抗日联军现在还未产生。它们要从斗争中得来。消极与等待是不能使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自动来到的。

三 准备大规模抗日战争与东征

苏维埃与红军要在实际行动中充分表示它们是抗日的先锋队。

(一) 发展的方向，应该对着日本前进的方向。我们向华北发展，不仅因为它是矛盾的集中点，而且因为这是直接指向日本侵略军。

(二) 以组织抗日斗争、抗日团体为中心任务。

(三) 争取红军对日直接作战，直接对抗。这不是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而是准备这一战争的重要一步。

党的东征决定充分体现了这个方针。东征的目的是要在这一行动中进入山西，发动抗日，争取对日作战。这个方针，是使苏维埃和红军发挥抗日先锋队的作用。

现在应该特别注意于扩大红军、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扩大与巩固，现在应该特别着重于扩大，这是必要的。运动愈是大胆，就愈能巩固。如在狭小地区中与敌人作战，则巩固也困难。军事上政治上都是如此。政治方面出现了新形势，是利于发展的形势，所以政治方面的要求也是如此。只喊巩固，什么行动都害怕，局促于一个地区，这是保守观点，结果并不能巩固。中央苏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土地革命与抗日斗争联系起来的方式应随环境而异。这种联系也不是公式，是要根据环境而采取的。在统一战线已建立的地方，要实行国防政府十大政纲。我们要细心的了解当地情况与群众需要。

政权是抗日政府，这正确不正确？是正确的。应该告诉群众，中心任务是抗日。

四 党内问题

为了彻底执行建立广泛的人民战线，要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

不分析反革命派别中的各个人，视同一律，就不能有统一战线。

不用策略而只是背诵教义，就不能有统一战线。

国际决议说，“在广泛地应用统一战线策略时，右倾危险将会增长起来”。这对我党来说也是正确的。右倾主要表现在对形势估计不足，消沉的不积极的不满意的各种情绪都产生了。这与“左”倾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着的。

我们要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求得党内布尔什维克的一致。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注 释

〔1〕共产国际“七大”的两个最主要的决议是《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作出）和《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根据陶里亚蒂的报告作出），均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通过。

〔2〕李德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曾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对战略的意见书》，强调要“帮助苏联的和平政策”，说中共中央的战略会起“日苏战争的挑拨者的作用”。

〔3〕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蒙古王公。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卓什海，即卓特巴扎普，伪蒙古军副司令。

关于世界战争问题^{*}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周 恩 来

(一) 世界战争的估计。每天恫吓着人类，较前夜更进一步，但革命运动各国有程度上的不同，因此，拥护和平是战斗任务，动员群众反抗战争，推延战争，仍是目前基本要求。苏联遂成为世界的和平支柱。苏联对德，尤其对日。英尚未完全脱离与德国关系和反苏组织者的作用。日本对华，希望以极小代价完全取得中国，首先华北，以便专力地进行反苏战争。因此，帝国主义打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由于帝国主义间冲突，军备扩张未完成好，彼此关系还未确定好，尤其是苏联强大，被侵略国的反抗等等，是有可能推延世界大战的。推延对于动员群众反抗战争，准备力量发展革命是有利的。

(二) 中国反动统治及其在野各派对世界战争的态度：
1. 认识日本只有前进；2. 英、美对东方问题不能积极到战争程度；3. 唯一的希望寄放在日苏战争上面；4. 有一部分认识须先自己抗战才能真正联苏。因此，先有国内联合抗日，才能有力求国外联合。我们应认识降日联苏之间还有余地，挑拨日苏战争与企图牺牲苏维埃红军并非无人，我们在这里必须分辨

* 这是周恩来所写《对未来的世界大战的分析与目前任务》一文提纲的第一部分。

我们的立场与各派的立场，然后才能分辨谁敌谁友，才能领导我们的朋友随着我们前进，而抗日与降敌是分水岭。

（三）中共领导群众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

组织抗日战争的基本主张，是红军东向抗日，一切抗日军队集中河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内和平。

1. 红军的胜利、扩大与根据地的扩大，首先是北方；
2. 组织全国的抗日运动，首先是北方及其游击战争；
3. 正确地运用国内上下层统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正确地解释和宣传联苏问题。

（四）红军抗日行动方针：

1. 主力集中与分开活动的原则：
主力的集中与号召；
红军的实际可能；
国民党统治下的游击运动。
2. 消灭卖国贼军队仍为中心，部分的接触有可能，应准备。
3. 扩大抗日根据地——山西是第一步，巩固在扩大中求得，巩固与过去不同，但主力在现时不应是跳越的。
4. 发展游击。
5. 争取苏维埃运动扩展及其抗日影响。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彭德怀、毛泽东关于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的通报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林聂，徐程并告朱郭^[1]：

甲、中央政治局会议^[2]完毕，完满地讨论了政治、军事、外交三问题。到会同志对于方面军各兵团首长及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及扩红伟大胜利，深致慰劳与庆祝之意。

乙、关于政治问题，分析了华北时局，决定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

丙、关于军事问题，批准军委的提议：

1. 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

2. 决定了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

3. 十月革命节前扩大红军三万六千人，前方担任三万，争取超过。

4. 四个月内完成三个军九个师二十七团的编制，每团七百五十人。

5. 地方红军，三个月内完成四个军，每军一千五百人。

6. 陕甘及华北五省发展游击战争。

7. 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水平与军事水平，保证红军战争中优秀的与坚强的领导。

8. 政治工作保证红军的统一与团结。

彭 毛

二十八日一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朱瑞、郭述申。

〔2〕指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在晋西地区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 第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 抗日先锋军的命令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

我方面军：

甲、为执行党中央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决定，将第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军团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十五军团改为第二路军，并在五个月内成立第三路军。

乙、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础方针。以山西为方针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跃入绥远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为临时步骤。反对以跨越山西向河北、绥远作为第一阶段之基本战略方针，也反对不能以临时的跳跃作为战役方针。

丙、以发展求巩固。

丁、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为目前军事指挥的基本原则。

戊、先锋军七个月内完成五万人的编制并武装起来，扩红为总方针的第一等任务。

己、地方三个月内完成四个地方军，陕西、山西各两军。

庚、在新苏区每县创造一个独立团。

辛、提高抗日先锋队到全国抗日红军的领袖地位，提高抗日先锋队及其他红军干部人员的政治军事水平到列宁主义原则与战略原则的程度，保证红军的团结与统一。

（传达到团以上的干部）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毛 彭 周^{〔1〕}

四月一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

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

刘 少 奇

立三路线在各种基本的重要问题上被克服过来了。但立三路线之中的一个问题，至今还残留在党内，还没有被完全克服过来，那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因为这个错误长期残留在党内的缘故，因为在党内揭发与反对这种错误之斗争异常不够的缘故，更因为这种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与实际斗争中千百次重复表演的缘故，所以它给党、给革命的损害也最大。如果从今天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来看，那末，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就成了党的主要危险。

今天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变为完全殖民地的地位。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除开极少数甘心做亡国奴和汉奸的人之外，甚至从前是动摇的、反对革命的，现在都开始或已经同情、赞助与参加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斗争了。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这时如果我党不能完全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出版的《火线》第五十五期。

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障碍着我党和革命的前进。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过去若干年来所给予党的损害之具体事实，差不多每一个党龄较长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和参加过群众斗争的同志，都可以说出很多来。如果简单地说，那就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情况下，当我们在某些工厂学校创立了我们的组织，积蓄了一些力量时，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它弄到塌台的；当我们在反日或某种口号与纲领之下，创立了公开的比较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时，它不把参加这种组织的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弄到这种组织完全不能公开，只剩下几个“布尔什维克”的地步，是不止的。自然，还有根本就不到群众中去，仅仅坐在房子内空叫的关门主义。至于在党内斗争中对于这些事实采取什么态度呢？那就是：把组织基础和工作弄塌台的、把群众和同盟者赶跑了的同志有奖，提升他的工作地位，派他去做更负责的工作；而那些在长期艰苦工作中谨慎将事的、把组织和工作创立起来的同志，倒少有不给他们戴“和平发展”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打击和撤销工作的处分。这就造成党内许多同志害怕犯右倾错误，故意表示左些的现象。结果是助长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党内的巩固和发展。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略战术。“六大”的决议说：“准备武装起义”；最近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说：“积蓄工人群众雄厚的力量，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在大城市中所做的，恰是与这些决议相反。当我们的工作仅仅在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做好了，就要指挥这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去和敌人决斗，要这些

工厂学校单独举行政治的罢工、示威游行，给予超过他们当时力量所能胜任的斗争任务。党内许多同志跑到这些工厂学校去，在报纸上宣布这些工厂学校为党所领导等，结果就没有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我们开始有了一点基础和力量，就这样被消耗和浪费掉，这就自然不能积蓄工人阶级雄厚的力量。所以每到一个重大事变（如“九一八”、“一二八”）来临，广大群众起来斗争时，我党常因自己在群众中缺少基础和力量而无从执行当时所提出的任务感觉痛苦。我们不知道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不知道只有将那些已有的工作、组织和力量保存与巩固起来，才能在这些基础上去扩大与加强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和敌人进行胜利的决斗。我们同志常常是急性的、不顾胜败的，不顾事后结果与影响如何，总是盲目、莽撞。结果不能不使得我们的工作环境与条件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在红军中，要保存与爱惜我们的力量，要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作战，要集中最大的力量去打击敌人较弱的一点，以取得胜利，那末，我们在白区城市中指导群众斗争，却完全是违反这种战略战术原则的。对已有的力量，尤其是对群众中的领袖与干部，不设法保存与爱惜，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只要是纪念节就同敌人作战，不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而盲目地进行斗争。结果，我们在红军的斗争中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而在白区中心城市的斗争中则与此相反。

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在这一天，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关车、罢工、到马路上示威、叫口号、开会等。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不管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不管自己的力量和群众的情绪，不管敌人

的戒备和阴谋，我们是照例要做这些事的。甚至完全没有群众，仅仅只有我们的干部，也要到马路上叫口号、散传单、打石头——示威。为什么在形势与条件不好的时候，眼看着要受到敌人严重的打击还不停止这些事呢？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不承认形势与条件也可能对示威有不好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礼拜日”，不管天晴落雨总是要作“礼拜”的。结果在这些纪念节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懂得领导党和领导群众的不同，不懂得党的基本口号、基本纲领与目前的行动口号之联系。我们的同志常常不懂得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而是常常要群众去背诵我们的基本纲领和基本口号，或是提出今天群众还不了解、还不能为群众所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强迫群众接受，强迫群众斗争。甚至不经过群众的同意，用群众团体的名义发表同党一样的、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允许的宣言、传单和文件。对于任何一次群众斗争，不管条件怎样，都要机械地“坚持到底”，即坚持到任何力量都耗费尽了才止。在形势极不利于战斗继续延长的情况下，他们还认为“在相当条件下结束斗争、复工、暂时退守、保存力量”的提议是机会主义。这样，就使得群众斗争不能发动；或者在斗争发动后，群众离开我们，不接受我们的领导；或者放弃了某些胜利的条件、机会，使斗争受到打击，直到最后的失败。他们领导群众的方式与领导党组织的方式一样，使群众团体的工作方式重复党的工作方式，结

果在侦探严密监视下，就没有法子不使群众团体的组织也缩小到和党的组织一样。

当着群众或者某些派别起来斗争，反对日本，反对现政府时，只要他们的口号纲领不完全和我党一样，我们的同志常常是不积极去参加与援助这些斗争、帮助他们达到目的，并努力使斗争扩大，以实现更大的要求。我们的同志常常是站在旁观的地位，忙于去批评这些斗争、口号和纲领如何不彻底，如何成为反革命的欺骗群众的东西，咒骂这些斗争的领导者，甚至号召群众脱离这些斗争，去反对他们的领袖。结果，把这些群众和同盟者完全关在门外。群众或某些人要起来抵制日货，我们同志忙于批评抵制日货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不去参加、赞助这些人抵制日货，使之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群众与某些人提出口号要枪毙王正廷，我们同志忙于批评这是反革命欺骗群众的口号；某某人拿出钱来援助反日罢工工人，我们同志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某某派提出工农商学兵大联合抗日，我们同志硬要把“商”字去掉；“九一八”日本武装占领了满洲，我们同志却强调地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这样，怎能使我党和同志走到广大群众中去！

当着我们在某种部分的纲领和口号之下，团结了比较多的群众和各种派别的人在我们周围，建立了真正的群众组织时，我们同志是一个纲领之后再加上一个纲领，一次冒险斗争之后再加上一次冒险斗争，使这些组织中的群众和同盟者完全离开，直到剩下我们同志几个人。上海工联、反帝同盟、民众抗日会、左联、社联以至许多工会，开始时都是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我们同志总是不会把这些组织的群众基础更加扩大，而只会把它缩小到完全没有群众。在这些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总不

能容许其他派别有一个人和我们共事，而必须是“清一色”。我们夺取了黄色工会的群众和领导机关，总是忙于把它“转变”成赤色工会，以至弄到塌台。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似乎是不许党外再有群众组织的。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爆发，不懂得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以削弱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破坏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而我们同志常常自以为“最革命、最彻底”，要打倒一切敌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打倒一切豪绅、地主、资本家、富农，以至打倒一切在朝在野的反革命派别和黄色工会。我们同志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什么都要打倒，但实际上是什么都打不倒。结果是拒绝了今天还可能与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把他们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扩大，一切可能公开进行的工作，都应公开地进行。而秘密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缩小，仅仅只有不能公开进行的工作，才应该秘密地进行。但我们同志所做的恰与此相反，许多可以公开的工作，要拿到秘密机关来做，许多可以公开发表的主张、论文，要拿到秘密刊物上来发表，或是发行秘密的传单、宣言等。我们同志忽视与放弃公开工作的可能，而把秘密机关无限制地扩大起来，秘密的刊物、文件特别多，特别长，一般文件“机械化”、“八股化”，这样就使群众工作极端缩小，而使秘密机关到处膨胀，结果是便利了敌人的侦探。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严格分开，在内容上与

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但我们所做的是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混淆错杂起来，这样就破坏了秘密工作，妨害了公开工作。我们同志甚至在秘密的刊物上宣布某些群众行动、某些群众团体、某些工厂学校为党所领导，在某些地方开了某些秘密会议，在会议上决定了某些事项，便利了敌人来监视我们。在某些地方或工厂，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组织，我们的活动还可以避开敌人的耳目，但我们同志在这些地方却完全无必要地散发党的秘密传单，写出党的口号，使敌人能从这些地方来找我们。对公开的群众团体，不是设法让它更公开些，范围更广泛些，而是要使任何公开的范围都逐渐缩小，直到完全不能公开，甚至要把工人中一切灰色的公开的附属组织都转变成为赤色工会，说是什么“赤色工会的中心作用”。结果就是取消一切公开工作，使一切附属组织都秘密起来。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了解群众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轻视经济斗争，对经济斗争的重要性和意义估计不足，不了解群众的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要机械地在群众经济要求上加上政治口号和政治要求。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而我们硬是一成不变地提出这么多纲领、这么多口号，少了一条也不行，结果是拒绝了这些同盟者。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也在党内组织问题上严重地表现出来。反对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害怕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加入进党内来，尤其害怕某些军官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加入进党内来。党内斗争许多是过分的、机械的。对于那些思想上、理论上没有准备的同志在工作中偶然犯的错误，关门主义者硬

要依照直线的理论，说这是“系统的机会主义”，替他造出系统来。下层同志的自动性、创造性、自我批评被抑制着，在党内造成了害怕犯错误，害怕犯右倾，害怕说话，不敢放手工作，故意要表示左些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在哪里？负责者是谁呢？自然我们不能怪那些下层的同志，而是领导机关在党内斗争中犯了错误，不采取同志式的、诚恳的态度爱惜同志和教育干部，往往是过分地打击同志与干部，把打击下层组织、打击干部的错误斗争方式，认为是“推动工作”的唯一方法，不采取教育与说服的方法去推动下级和干部的工作。我们没有在党内造成同志不怕犯错误、不怕批评、欢迎批评和放手工作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发展下层同志自动性与创造性的必要条件。

以上这些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党内长期继续与重复的结果，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同盟者离开我们，使某些部分的群众和同情者对党产生某些疑惧，使许多企业中的很好的同志和群众离开我们，不愿见我们的面，使许多的工作和组织塌台，使许多的同志和干部受到不必要的逮捕与屠杀。而在另外一方面，就为取消派、右派提供了向党进攻的资料，帮助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便利了敌人的侦探和奸细对党进行破坏。过去我们用力量最多、工作最多的地方——上海、汉口、广州、香港、天津、北京这些最大的中心城市，受这种错误的损害也最大。在这些中心城市，我们现在的基础也最弱。原因在哪里？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

关门主义的根源是：因为害怕那些反革命派别，所以不敢和他们暂时建立斗争的联合战线，甚至不敢和他们来往谈话；因为不相信自己，恐怕那些反动派别会动摇自己，影响自己，所以自己关门；因为对新的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目前中间阶

层和许多社会上层分子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所以不要统一战线。左的关门主义在实质上与右倾机会主义是同一根源。

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还常常对目前形势作一种空洞的、夸大的估计。上海、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反革命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有时竟可以估计这些地方似乎明天就要成为苏维埃区域。所以他们敢于冒险，认为不必要做长期艰苦工作，不必要聚积最雄厚的革命力量就可以和敌人决斗。对于一个工厂的罢工，他们可以从世界革命如何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分析起，要这个工厂和敌人立即进行决斗，似乎世界革命在当天就可以与这个工厂的罢工直接配合，推翻一切的敌人，不必根据这个工厂革命与反革命实际力量的对比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当着他们在上海举行一次没有成功的示威，甚至是受到很大损失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估计这次示威如何“成功”，有如何深远的意义，如何影响了多少人，如何推动了革命、加速了反动统治的死亡，如何成为什么什么的信号，以及如何要反对对这次示威意义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等。但对示威中被捕的大批干部以及在组织上的许多损失，他们是看不见，也是不愿意看见的。似乎这不算什么，不要紧，明天革命胜利，这些损失马上就可以弥补起来。对于形势的这种空洞的、夸大的估计，常常成为冒险主义的基础。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没有想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现在有九年了，为什么上海、汉口、天津这些地方还没有变成苏维埃区域？倘若他们早想到这一点，以九年的艰苦工作来聚积革命所需要的力量，那末，他们也许不会那样浪费革命的力量，而认识到积蓄力量和保存干部的必要了。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就在党内滋长起来，到立三路线时代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四中全会

以后虽有改正，但基本上没有转变过来，而这些错误的恶劣影响直到现在党内还是残留着。过去我们揭发与反对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斗争是不够的，有些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种错误给予党的损害有这样严重。在以前，我们没有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以应有的打击，更说不上致命的打击。有些同志把工作和组织弄塌台，但是我们没有拿这些事实来研究，开展斗争，给这些同志以应有的必要的处罚，以教育同志。因此，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就在党内严重地长期存留着。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教育我们同志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大胆放手地让我们的同志和干部到广大群众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组织起来。虽然我们一些同志和干部在这里可能犯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我们有久经锻炼的、经验丰富的党，有无数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干部与同志，只要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我们完全能够克服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完全不应该害怕这些错误以至裹足不前，我们要率领无数千万的革命群众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央政府 西北办事处关于执行改变 对富农策略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

自从党中央及中央政府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命令与《陕甘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颁布后，由于一般干部的努力执行，在最近两三个月来，已经显明的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使陕甘苏区的土地一般的得到了正确的解决，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巩固了我们和中农的联合，大量提高了群众生产兴趣。过去逃跑到白区的群众，亦不断的大批的回来，就是富农对于苏维埃这一政策的改变，一般的亦表示了同情的态度，那些过去成分定错了的分子，在改正后，更表示热烈的拥护，在白色区域，尤其是在附近苏区的群众中，影响更大，这证明了党与苏维埃在目前的新的政治形势下，对于富农策略的改变，完全是正确的。但在执行改变对富农策略与纠正过去陕甘土地斗争中过“左”错误时，在许多地方，又发生了许多新的严重的问题与偏向，主要的表现在：

有些边远的地方（如米西、吴堡、靖边）过“左”的错误，还没有能一般的纠正过来，甚至还有个别的继续过去的错误。对于改正过去错误决定的成分，虽然一般改得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地方（如安塞、子长）把某些真正的豪绅地主改为

富农，富农改为中农，而真正过去错误决定为豪绅地主富农的中贫农，却没有纠正，有些在改正成分时，表示了脱离群众，不通过群众会，也不经过一定的组织，只是某些机关工作人员私人去改，发生了个别地方的群众不满。有些地方（如延长、安定）由于当地一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富农策略的改变《陕甘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没有清楚的正确了解，没有深入的传达，当某些豪绅地主及过去已经分配了土地的某些富农，企图在“过去一切都错了”的谣言下，曲解党与苏维埃的决定与命令，要求翻案，拿回他们原来的土地、牲畜、财产时，有些同志表现了模糊与缺乏警觉，而另外有些同志却表现了张皇，企图单纯用行政手段来镇压（如决定要枪毙翻案的富农或没收其土地等），不知利用这一事件来教育广大群众。当然这里还要指出在个别的地方机关中，还有个别坏分子，故意违犯法令，做豪绅地主富农翻案的应声虫。

发生上面这些现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对富农政策的改变及《陕甘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还没有普遍的深入的传达，没有为每个干部所深刻的正确的了解，由于对农村中的基本组织（如支部、乡苏贫农团等）的阶级教育，还做得不够。其次，个别地方机关中个别的坏分子，对于某些豪绅地主富农翻案也起了一些作用。党西北中央局与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责成各级地方党与苏维埃，尤其是农村中基本组织，对于富农策略的改变及《陕甘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来一次详细的讨论，讨论时应切实的与本地实际斗争联系起来，对于那些故意违犯苏维埃法令而做豪绅地主富农翻案的应声虫的个别坏分子，必须开展思想斗争，给以充分教育，最后还顽强不改正的分子亦不惜采取组织上的制裁，此外还重复的指出党与苏维埃对富农策略的改变，是为着适应目前的新的政治形

势，为着更便于集中力量，对付目前的主要敌人，为着抗日讨卖国贼，为着消灭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孤立地主阶级，为着更巩固的联合中农，为着发展农村生产，一切说“过去一切都错了”、“中央来了，一切都变了，地主亦要改变”或者“富农与中农没有什么分别”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应该给以清楚解释。我们对于富农政策，现在是对的，过去亦是对的，原因是因为过去与现在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不同，不过陕甘苏区，过去许多地方，在执行富农政策时，犯了过“左”的错误，对于其他成分，有些也决定错了，或对土地财产处置错了的，但这决不能说“过去一切都错了”，至于富农与中农有极大的区别，更不待说明了。

除了以上这些解释以外，对于翻案的或改正成分分子，应采取以下的具体办法：

一、依照过去政策处理了的富农，仍属有效，不得翻案，已翻案而从群众手中拿回原土地、窑洞、牲畜等的富农，应立即退还给群众。

二、在还没有分配土地的地区，分地时，应坚持的执行中央对富农新的策略。

三、积极进行破坏苏维埃法令的豪绅地主，应给以严厉镇压；积极进行破坏苏维埃法令而企图翻案的富农，应在广大群众面前彻底揭穿，必要时举行公审，以教育群众，但须严格防止采取单纯的行政手段的过“左”办法。

四、正确的彻底的改正过去决定错误的成分，还是目前许多地方的重要工作，在改正后，土地牲畜等，可由普通公地或没收来而未经分配的土地牲畜，按其成分尽量补偿，但不得再从群众手中抽出。

五、纠正成分，一定要经过支部会、乡苏主席团或代表

会、贫农团等会议讨论、本村群众会通过，经区苏土地科批准后，才作有效，一切过去私人改而未经群众会通过的，概作无效，应该重新审查通过。

六、中农过去自动欢迎出来的土地、窑洞，已经分配了的，亦不应退还，党与苏维埃应向他们做充分的解释。

正确纠正所发生的偏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各地党与苏维埃应有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去辨别事实，不使一个贫苦工农错定为地主富农，也不使一个地主富农假称贫苦工农，同时对于反对地主富农的反攻翻案，尤其是对我们犯错误的自己的同志，开展思想斗争时，应把故意曲解、故意违法或是真的不了解，严格的分别清楚，分别处置。这里应特别注意广泛的教育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斗争正确开展起来，使土地问题得到正确的彻底的解决。

中共西北中央局

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

四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拦阻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下 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

(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

全中国爱国的同胞们！

自华北五省名存实亡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们正向着并吞整个华北与整个中国的目标急进着。

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一再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联合抗日，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迈进。为了响应全国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渡河东征，抗日讨逆，为全国抗日同胞打先锋申义愤。乃山西阎锡山甘为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动员他的全部武装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万恶的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则又以上十师的兵力协助阎锡山进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更命令张学良、杨虎臣等部队向北推进，以捣乱我陕甘苏区的抗日后方！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三日《红色中华》。

看吧！当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五省，日本与满洲国军队开入平津察绥时，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全部退出华北五省。但当红军东下抗日而危及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五省的安全时，蒋介石则又把他的军队调入山西，进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现在谁都明白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的新的阴谋毒计，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谓广田三大原则的具体实施。中、日、“满”联合“防共”的协定，现在由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坚决执行了。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全国爱国同胞宣言：日本帝国主义想在中、日、“满”联合“防共”的名义之下灭亡中国，动员所有汉奸卖国贼的军队向我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进攻。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与领土完整，我们誓以全力消灭拦阻我先锋队抗日去路与捣乱抗日后方的汉奸卖国贼军队，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新计划，以争取迅速的对日直接作战。我们更号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奋起，抗日讨逆，响应与拥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以救中国于灭亡。红军抗日讨逆的胜利，即是我全中国爱国同胞的胜利，即是中华民族的胜利。

停止一切内战，一致联合抗日，创立各党各派抗日的人民阵线！

反对中、日、“满”“联合防共”，灭亡中国！

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取得中国的独立自由！

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拥护红军迅速对日直接作战！

拥护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打日本！

全国海陆空军集中河北打日本！

打倒拦阻红军抗日、捣乱红军抗日后方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

石、阎锡山！

全中国人民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彭德怀、毛泽东关于双方 会商问题给王以哲并转 张学良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四月六日)

王以哲兄并转张学良先生勋鉴：

甲、敝方代表周^[1]同志偕（克农^[2]）依约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为：

1.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 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3.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 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 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学良先生有何提议，即祈预告为盼。

彭德怀 毛泽东

鱼午

注 释

〔1〕指周恩来。

〔2〕即李克农。

周恩来关于同张学良谈判情况 给张闻天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

张毛彭^{〔1〕}：

一、关于外交谈判的基本问题，彼方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亦愿酝酿此事，以促其成。彼方认为红军一与日帝接触，彼即可公开号召抗日，不打红军，对于红军主力集中向北，愿助其成。彼决派代表赴友邦^{〔2〕}，并助我打通关系。

二、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3〕}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降日，彼即离蒋独干。目前受蒋命令进占苏区，势在必行，商谈结果，改为我方在关中加强力量，钳制其东南地区军队，在澄城、韩城、彬县积极行动，阻止杨^{〔4〕}军前进。以陕南红军逼近西潼大道，以陕甘地方部队在耀、铜、宜、中、洛、富、甘、肤大道积极行动，以造成后方借口，延缓前进，并保留我方在此大道上之东西交通。

三、关于经济通商，彼方已有诚意赞助，但我方派出办货人员须统一。

四、其他详细情形，待张浩^{〔5〕}同志面述。

周

十日十一时

此电望密写送拓夫^{〔6〕}。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指毛泽东、彭德怀。
- 〔2〕指苏联。
- 〔3〕指蒋介石。
- 〔4〕指杨虎城。
- 〔5〕即林育英。
- 〔6〕即贾拓夫。

为反对蒋介石帮助日本拦阻红军 抗日去路、捣乱抗日后方讨论提纲^{*}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

(此提纲立即同中央政府与军委宣言，在所有党的支部中讨论)

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征的伟大胜利使华北形势急转直下，一方面是山西与华北五省民族革命浪潮的新的高涨，另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中、日、“满”联合“防共”计划的实际施行。

二、中、日、“满”联合“防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与全中国以及进攻苏联的整个计划的最重要的一部。蒋介石这一次出兵山西、陕西，拦阻红军抗日去路、捣乱抗日后方，即是这种联合的最露骨的表现。

三、蒋介石过去只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前面表示不抵抗，消极的把自己的军队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区域到处撤退，秘密的订立卖国协定。现在由于红军的进入华北五省，而不能不最公开的无耻的站到卖国贼的地位，积极的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护日本的利益，来反对中国民族、反对苏联。

四、中、日、“满”联合“防共”计划的实施，在全中国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出版的《斗争》第九十四期。

一切人民的前面最尖锐的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还是联合日本、联合汉奸卖国贼去“防共”、去使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还是联俄联共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救中国。在全中国人民的前面只有两条道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五、这种形势，必然更加推动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前进，把更广大的抗日人民卷入民族革命的浪潮中，同时促使反动统治内部的进一步的分裂，这更顺利于我党进行抗日反卖国贼的人民阵线，以开展抗日民族革命战争。

六、在这种形势下面，苏维埃与红军必须最坚决的表现出他们是抗日的先锋队，是民族革命的火车头。为了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成为苏维埃与红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并在这一方针下，提出“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迈进”的口号。

七、为了“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苏维埃与红军目前最中心的紧急任务就是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计划，消灭蒋介石、阎锡山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与捣乱抗日后方的部队，这是决定民族革命形势的新的开展的紧急关头。

八、应在全党中、全体红色部队中与广大群众中解释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凶恶计划，与我们目前所处的紧急关头。在这一解释中指出我们是有着一切胜利的条件，能够把胜利的条件变成胜利，这决定于我党自己的努力与奋斗。

九、一切我们的努力，一切我们的牺牲都要为了抗日讨逆的战争的胜利，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民族革命的英雄与先锋，应该投身到最紧急的、最危险的、最艰难的战线上去，领导成千成万的人民大众，到抗日讨逆的阵地上去，应该千倍百倍的紧张起来，加速度的完成我们所负担的每一工作。我们要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进行殊死战！

十、我们的口号：

（甲）在全国范围内的：

1. 停止一切内战，一致联合抗日！
2. 创立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
3. 反对中、日、“满”联合“防共”灭亡中国！
4. 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取得中国的独立自由！
5. 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6. 拥护红军迅速对日直接作战！
7. 拥护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打日本！
8. 全中国海陆空军集中河北打日本！
9. 打倒拦阻红军抗日去路、捣乱红军抗日后方的蒋介石、阎锡山！
10. 全中国人民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11. 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乙）在苏区与游击区的：

1. 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
2. 拥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
3. 猛烈扩大抗日根据地，变名存实亡的华北五省为抗日根据地！
4. 打倒拦阻红军抗日捣乱抗日后方的汉奸卖国贼，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
5. 武装上前线，加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
6. 加入独立团营游击队，坚决发展与保卫陕、甘、晋苏区！
7. 抗日赤卫军、少先队紧急动员起来，打击进扰抗日根

据地的敌人，保卫抗日后方！

8. 抗日的赤卫军、少先队大批的加入到红军中去！

9. 拥护中国民族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

10. 抗日讨逆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万岁！

（注）这都是目前一般的动员口号，部分口号由各级党部规定。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

张 闻 天

去年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与中共中央十二月的决议都明确的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是创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

根据国际的与中国党的经验，在创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中，我们应该注意下列的一些问题：

第一，必须集中力量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全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抗日是全中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所以要创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必须集中力量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但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一方面依靠于他自己的武器力量，另一方面依靠于他的走狗汉奸卖国贼的帮助。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同时反对他的走狗汉奸卖国贼。

我们所以要讨伐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是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主要负责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但汉奸卖国贼不只是蒋介石。在殷汝耕公开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斗争》第九十七期。

府时，全国人民都起来反对他，因为他是最露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第二傀儡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的宋哲元、萧振瀛等都是这一类的家伙，是谁都知道的了。反对这些汉奸卖国贼也是中国所有抗日人民的迫切要求。

在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中，我们到处看到汉奸卖国贼指使他们的军警侦探、流氓向抗日的大众进攻，利用枪杀、鞭打、酷刑、逮捕来残暴的对付自己的同胞，汉奸卖国贼是到处存在着的。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必须同当地的汉奸卖国贼做斗争，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我们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创立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等口号，完全不是要停止同汉奸卖国贼的斗争，而正是为了要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去顺利的开展反对他们的斗争。反对汉奸卖国贼的斗争即是抗日斗争中的必要的与有机的一部分。而打汉奸卖国贼的战争，即是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活的统一的联系。

这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斗争愈是坚决，愈是彻底，则全中国人民的斗争的目标愈是明确，斗争的力量愈是集中，各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统治内部的动摇、分裂与分化愈是加深，因此愈是便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创立。

第二，必须把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同群众直接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利益联系起来。

只有把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同群众直接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利益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到运动中来，才能使运动有着雄伟的力量。

当平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立刻就提出了民主自由权利的要求。这种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的要求的实现，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必要条件。同时更因为这

种要求，是在长期的法西斯蒂的白色恐怖的统治下窒息着的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最迫切的要求，所以抗日救国运动与为民主权利的斗争的联系，更能吸收广大的人民群众到运动中来，使抗日救国运动成为伟大的群众运动。

当河北直南的盐民开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要求就是取消盐警，取消使他们不能忍受的苛捐杂税。斗争从他们直接的经济要求开始，而这种斗争迅速的转变为伟大的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数十万盐民群众的暴动与游击战争。从他们直接的切身的痛苦开始，他们懂得要解决他们自己的痛苦，只有最坚决的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做斗争。

显然的，为了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斗争，共产党员不能以抗日救国的号召与宣言为满足，而应该告诉他们为了开展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他们今天应该做些什么。共产党员应该根据于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使抗日反卖国贼的斗争同群众最迫切的政治的与经济的要求在一定的形式中联系起来，并且随着斗争的开展，随着群众觉悟程度与组织力的提高，这种联系的形式也应该随之而改变。

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联系的形式，在各种不同的具体环境下是不相同的。但在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过程中把农民的斗争最后提高到土地革命的实现，是中国民族革命彻底胜利的必要条件。因为中国的民族革命，以其社会实质说来，即是农民的土地革命。

第三，必须依据具体环境规定统一战线的条件并使之成为共同行动的纲领。

统一战线的形式是依照各种不同的环境而变化的。概括的说来，有：（一）上层的统一战线，（二）下层的统一战线，（三）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同时并用。但不论哪一

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必须有一定的具体的条件，这些条件应该成为实行统一战线的各方面的共同行动的纲领。

因为各地的环境不同，因为实现统一战线的对象不同，所以大家虽是在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在大家为了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总的目标而斗争时，今天应该做些什么，这是到处不相同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清楚的审慎的依照各种不同的环境提出各种不同的今天能够实现的条件。在一定的环境下提出过高的条件，就会使统一战线不能建立，或是使统一战线成为不能行动的空谈，而过低的条件，则就使统一战线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这些对于统一战线都是不利的。

比如以上层统一战线的例子来说，某某将军虽是同意于我们抗日救国宣言，然而他现在认为时机未到，不便发动，那末我们就应该提出现在他所能够实行的“互不侵犯”或其他条件作为共同行动的纲领。再如以下层统一战线为例子，某某工厂中的工人领袖，虽是同意于我们抗日救国的总的纲领，然而他们认为今天更切的问题是反对开除，那我们即应以“反对开除”成为我们共同行动的纲领。只有这样，一切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口头的宣言才能变成为实际的行动。

所以虽是我们同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武装部队，在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一个共同点上成立统一战线，而我们订立的协定可以是各种各色的、部分的、地方性的，而协定的时间可以是长期或短期的。共产党也就是这样推动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武装部队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行动起来，以实现共产党在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中领导者的作用。

第四，必须使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成为统一战线坚强的核心。

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彻底的抗日反

汉奸卖国贼的主张与积极的坚决的行动以创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是要在行动中、在斗争中推动、创造与扩大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我们是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火车头与推动机。我们反对一切消极与等待的倾向。我们自信：没有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坚强的统一战线的创立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应该最忠实地遵守统一战线的协定的每一条文，而且应该为这些条文的实现而最积极的奋斗。我们应该及时的揭露个别人员或组织对于共同行动的消极怠工与破坏协定的行为的错误，不疲倦的为着统一的行动而斗争。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应该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模范。

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在统一战线中决不抛弃自己的立场。我们对于一切改良主义的思想决不放弃严肃的确实的批评，我们以最诚恳的同志的态度，以最具体的实际的材料，向自己的同盟者指出，只有共产党的主张是最彻底的最革命的主张，以诱导他们同我们更进一步的合作。但我们认为，只有在行动中，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更能影响与诱导同盟者走上正确的道路。

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对于自己的同盟者有最清楚的了解与恰当的估计。我们应该知道，谁是民族革命中的朋友，谁是半途要退出的同路人，与谁是一天两天的暂时的同盟者，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知道谁是民族革命中的左派，谁是中派，谁是右派。我们的方针应该是同左派结成坚固的同盟，联合中派，而孤立右派。只有我们同左派的联盟愈是牢固，我们愈是能够使中派倾向于同我们联合，愈是能够孤立右派。同时，只有当我们向右派的斗争愈是坚决，愈是能够揭破他们的每次的动摇、欺骗、出卖与叛变的事实，我们愈是能

够使中派脱离右派，使左派同我们结成牢固的同盟。在这里，我们共产党员的坚定的、不动摇的、明确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对于统一战线策略的能否彻底实现有着决定的作用。

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实行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动与争取最广大的群众到彻底的抗日反卖国贼的旗帜之下。最广大的群众是我们最根本的依靠，是我们力量的泉源。因此不论是上层的或是下层的统一战线的协定，我们必须力求公开，力求能够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讨论、宣传与解释，以取得最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即使暂时是秘密的协定，我们也必须准备必要时的公开，凡是破坏协定的行动，我们应该向着群众申诉，使群众知道谁是破坏协定的负责者，谁是真正为协定而奋斗的人，使群众反对破坏者而拥护我们。一切统一战线的组织，如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或是各党各派的人民阵线，都应该在群众中进行公开的选举，并吸收群众中大批积极的、勇敢的与坚决的分子参加领导工作。

最后，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的行动中，猛烈扩大自己的核心的组织，灵活的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

第五，必须使统一战线朝着准备与组织大规模的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目标进行。

一切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统一战线，都应该向着一个目标前进，即是准备与组织大规模的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员首先应该在思想上在实际上证明中国的有力抗日，揭破各种各样中国无力抗日的亡国奴的理论。有这样众多的人口中国，有这样广大的土地的中国，再加上誓死奋斗的勇气与决心，那抗日战争是必然会胜利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员在开展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应

该把斗争提高到武装人民的阶段，提高到人民的武装自卫队伍的组织的阶段。没有这些人民的武装队伍，抗日战争是不能有力的开展并使之得到胜利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员应该把争取白军的官兵到抗日战线上来，当做在目前形势下比职工运动还要来得重要的任务，没有几百万白军官兵的参加，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将发生极大的困难，这就要使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的统一战线应该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只有当对方成为抗日友军或可能成为抗日友军时，我们才能不使下层统一战线走到反对那些压迫与阻止抗日运动的军阀的起义。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员应该推动一切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走向抗日的人民政权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建立。没有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大规模的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展开是不可能的。

估计到中国革命形势的存在，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产生的主要条件是：（一）某些地区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已严重地瘫痪，因而无力阻止这种政权的建立。（二）最广大的群众已经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但还未进至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三）一部分愿意抗日的当权者与广大群众公开要求同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讨蒋。

显然的，这些条件正在迅速的成熟着。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统一战线愈是扩大，愈是坚强有力，则这些条件的成熟愈是迅速，而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产生也必愈快。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与红军应该以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作为自己的当前的任务。只有苏维埃与红军在实际行动中表现他们是抗日的先锋队的时候，他们才

能成为整个中国人民在解放斗争中的团结的中心。

最后，共产党员在准备与组织大规模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应该学习如何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与保卫中国的防御性口号下组织进攻，在进攻中知道如何巩固自己的阵地，如何组成源源不绝的后备军走上前进阵地，如何使先锋队与后续队密切的联系起来，而且同可能发生的保守主义或冒险主义做斗争。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在这中间我们应该运用一切作战的方式，对付顽强的敌人，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六，必须在党内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保证统一战线的正确执行。

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决议指出，统一战线的建立，要求共产党员克服自己队伍内的高慢的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

中央的十二月政治决议同样指出，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做坚决的斗争。

共产国际的决议更指出，高慢的宗派主义在现在的许多时机内与许多场合中已不是共产主义的幼稚病，而是一种根深的罪恶。同样，中央的决议上也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共产国际与中央的指示，一直到今天依然是完全正确的。

不去克服“左”的关门主义或高慢的宗派主义，我们决不能以最大的决心与勇气去创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中国党在创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中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成绩，然而在许多地方对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还表示怀疑、犹豫与恐惧，似乎统一战线的门一开，什么复杂的分子都会跑到里面来，使我们无法领导运动走上正确的革命的道路。显然的，这种怀疑、犹豫

与恐惧的根源，正是关门主义或高慢的宗派主义。这种关门主义或高慢的宗派主义正是表现在不会拿群众的领导方式去代替狭窄的党内小组的领导方式，拿领导群众的艺术去代替抽象的宣传与“左”的教义，拿适合于各地具体环境的口号与策略去代替不顾一切具体环境的口号与策略的公式化与机械化，以推动和率领各种各样复杂的人民群众走上抗日反卖国贼的阵地上。

此外，也像国际决议与中央决议所指示的，当我们大胆的与坚决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时，我们应该严密的注意到右倾危险的各种各样具体形态的表现。这种右倾的每一表现都会使统一战线的策略成为降低或甚至放弃党的领导作用的投降的策略，因而同时也成为关门主义者或宗派主义者用来反对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彻底执行的口舌。

所以在大胆的与坚决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时，我们应该不断的纠正一切可能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种纠正丝毫不是为了恐吓同志们，使他们对于统一战线的策略发生怀疑、犹豫与动摇，而是要及时帮助与教育他们更有把握的去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使他们坚决的自信他们是能够抓住这一统一战线的策略的中心环子，来完成党在目前形势下所给予他们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共产党员必须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学习如何正确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错误是免不了的。但错误决不能使我们消极。我们要在积极行动中学习，要在积极行动纠正一切可能发生的错误，大踏步的勇敢的前进！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张闻天文集》第二卷刊印。

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汉卿先生：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1〕}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并颂
勋祺！

周恩来 拜

四月二十二日晨

以哲^{〔2〕}军长处恕不另笺。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周恩来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即王以哲。

中共中央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 抗日人民阵线宣言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中国国民党、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国大众生产党、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同盟、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回教徒联合会、全国公教联合会、全国青帮、红帮、哥老会、理门、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总商会、全国邮务总工会、全国律师公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世界语学会、上海大众生活社、上海世界知识社、中苏文化协会、中山文化教育馆、平津新闻学会、平津抗日同志会、北平独立评论社、北平教职员联合会、北平自由评论社、旅平东北同乡会、南京留俄同学会、黄埔同学会、励志社、复兴社、边疆评论社、蒙藏学校、广东明德社、西安东望社、复东社、太原中外论坛社及全国各党各派、各报馆、各军队、各工会、各农会、各商会、各学生会、各团体、各会社、各帮各业的全体同胞们！

中国共产党年来为抗日救国而奔走呼号，而艰苦奋斗，其精诚保国的决心，谅早为全国同胞所洞悉。不久以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更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当头棒喝，响应了全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了全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励与振

奋，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

因此，在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国各党各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

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至诚特向全中国各党各派提议：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盗匪们的长驱直入，以反对汉奸卖国贼丧心病狂的无耻行为，并提出下列条件作为共同行动的纲领：

（一）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讨逆！

（二）全国红军与全国海陆空军集中华北打日本！

（三）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四）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的完全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实行外交公开！

（六）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与国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欢迎各党各派的中央与地方组织能接受我们的提议，互派代表同我们与我们的地方组织共同协商具体进行办法，组织各党、各派的中央的与地方的行动委员会，以创立中央的与地方的抗日的人民阵线，为上述的纲领的彻底实现而奋斗。

各党各派抗日人民阵线万岁！

中华民族的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四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彭德怀、毛泽东关于西渡黄河扩大 陕甘苏区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周副主席，林聂，徐程，叶杨^[1]：

甲、目前情况：

(一) 在山西是阎锡山加蒋介石（五十一个团），再加堡垒主义。

(二) 在陕西是张学良、杨虎臣在蒋介石令下向陕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但神府区域、三边区域空虚。

(三) 在甘肃是蒋介石之胡宗南、周晷两部入山西，毛炳文调甘南，王均、伍诚仁等在陕南与甘南，张学良原在环水区域之部队，大部调陕西，环水区域及其以西均空虚。

乙、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此外则有派一支队去陕南扩大苏区，吸引敌人之必要。

丙、我军决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渡河时机、渡河秩序及集结地域之区分，另命令定之。

丁、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

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

戊、此命令仅给军团与师两级主要军政首长。

彭 毛

二十八日二十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

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

(一九三六年四月)

刘 少 奇

一、中心城市与大的产业中心，是反革命的支撑点，是反革命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反革命在这些地方对于革命的防护最为严密，同时，我党在这些地方的工作基础与组织基础，是十分薄弱的。所以，我党目前在中心城市与产业中心的工作任务，还是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目前还不是革命与反革命决定斗争胜负的时候，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情况下，应当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

二、为着要积蓄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雄厚力量，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我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组织，只有这些组织和组织能够大体保存和巩固起来的时候，才能从这些已有的基础上去扩大和发展我们的组织和组织。因此，必须彻底肃清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更加改善我党的秘密工作。要使我们逐渐建立起来的组织和组织，不致有无谓的损失，并且能够防御敌人的袭击，然后我们才能积蓄工人阶级中的雄厚力量。

* 这是刘少奇为了总结一九二七年以来白区职工运动的经验，提出白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而写的一份工作提纲。

三、当着我们仅在某几个工厂企业中建立了强大的组织，并能实际指挥这些工厂的工人大多数时，那末，我们在这些工厂的工作任务应该是：（一）把组织更加巩固起来，培养与训练大批的工人干部和领袖；（二）派干部到其他工厂去，开辟工作和建立组织；（三）分派积极的工人到农村中去参加游击队、义勇军等；（四）参加一般的公开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把我们在这些工厂中的堡垒保存与巩固起来，以便在此基础上开展我们的工作，避免单独地和敌人作战，被敌人各个击破。

四、为着争取群众，创立和积蓄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领导这些斗争必须从争取胜利（即使是最小的胜利）的观点出发。要使用一切方法争取这些斗争之具体要求的胜利。对于完全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在斗争延长对于工人不利时，应该在某种相当条件下，“适可而止”地暂时停止战斗。在原则上我们当然反对国民党的强迫仲裁，但是，为着争取群众斗争的胜利，对于国民党的“调解”与“仲裁”，在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完全拒绝。在某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利用国民党的“调解”与“仲裁”，去取得工人某些具体要求之实现，并使我们更能公开地指导群众斗争。

五、国民党政府的工厂法、工会法，用了一切的条文来反对工人阶级与束缚工人群众的斗争。但是，这些法律主要的还是国民党用以欺骗工人阶级的，因此，它就不得不规定一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如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工人组织工会与罢工，规定了比现在较少的十小时工作时间，星期日纪念日休息，对于工人疾病年老死亡的抚恤救济等）。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利用工厂法、工会法上那些对于改善

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斗争，要求实现那些条文上所规定的利益，并就此揭破国民党的欺骗，这样才实际有益于我们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如果我们对于工厂法、工会法仅持“绝对反对”的态度，只在工人群众中去叫喊“反对工厂法，要求实现苏维埃劳动法”这样绝对的口号（这样的口号要在革命胜利后才能实现），那是等于一事不做，那是完全空洞的反列宁主义的关门主义（几年来反对工厂法、工会法的经验是如此）。

国民党政府的工会法、工厂法中某些条文对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好处，我们要求马上实现。但这样的规定太少了，我们要求增加。那些压迫、束缚工人阶级的条文，我们反对！这就是我们对于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所应该采取的态度。苏维埃的劳动法，在白区城市中目前还不能实行，仅仅是宣传的文件。

六、不独是工厂法、工会法我们应该利用，就是国民党在工人中进行的其他许多运动，如卫生运动、文化娱乐运动、民族扫墓运动、纪念节的运动，以至儿童节运动、植树运动、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等，我们都要利用来提出工人的要求，开展在工人群众中的斗争和工作。利用这些运动，一方面使国民党与资本家更难反对工人所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使我们更能取得公开的地位来领导工人的斗争，更易于使工人的要求和斗争得到胜利。唐山工人利用新生活运动要求开窗户、设澡堂、发新衣等得到胜利，就是很好的经验。因为他们不是采取关门主义的简单的“绝对反对”新生活运动的策略。

七、我们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在有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同志和革命的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各

种工作和活动，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群众和斗争。就是现在还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也要加入进去，就是仅仅利用黄色工会这一公开的招牌和地位，去公开团结与组织工人，也是必须的。在没有黄色工会组织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公开的与灰色的形式，来公开地广泛地组织工人群众。如同乡会、互助会、劝戒烟酒会（在理会）以及其他旧式的新式的团体，我们都要利用。在我们采取这样广泛的方式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时候，我们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要在各级党部内设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中的工作。

在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中，如果依照国民党工会法的程序（如立案等），我们能够在这些工人中公开地成立新的工会，那末，这种公开组织工会之可能的机会，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虽然做这件事是极不痛快的，要受国民党各种严格的束缚（如呈请立案，国民党派指导员来，干涉工会的选举，圈定名单等），但即使是在这种严格束缚的条件下，只要我们还能够借此公开去组织工人群众，我们是必须去利用这种机会的。我们不应害怕或者拒绝去做这种不痛快的事。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依照国民党工会法的程序，在各厂各业无组织的工人群众中去公开组织工会。如果这样做，国民党也不允许我们成立工会，那我们就有事实宣布国民党工会法是骗人的。我们反对合法主义，但是又必须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去组织工人。有些工作能够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去做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不去利用？

对这种公开组织工人群众与公开组织工会的策略，过去有人指责说“这是第三种工会”，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种指责是错误的。黄色工会的领导位置，黄色工会的领导机关，我们

都要用力去争取，为什么我们在某种条件下能够组织一个为我们领导的工会，而不去组织呢？只有十足的关门主义，才放弃这种可能不去利用。如果我们要在赤色工会的全部纲领被承认的条件之下，才去组织工会，那只有在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那末，革命胜利之前，我们就只好甘心满足于那种狭小的秘密工会的组织。

八、在黄色工会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形成与巩固革命者的阵地。黄色工会每一个选举的位置，黄色工会的全部领导机关（上级和下级的），我们都要努力争取到手里来。如果在黄色工会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全部的胜利，群众与领导机关都转到了我们的领导之下，我们亦不应该立即将这个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因为这在国民党统治下是不能存在的），仍应保持表面上的黄色工会的原状（如开会仍通知国民党，允许他们派人来参加，工人的要求亦可通知国民党，要他们实现工人的要求等等），应尽力巩固我们已得的阵地，实现工人更多的利益，培养大批的干部。只有到了革命爆发时，我们不需要黄色工会之外表的掩护了，这些工会才能公开转变成为赤色工会。

九、在反对资本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口号之下，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与各派的工人及其领袖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行动的统一战线（如罢工、示威、抵制日货，参加抗日运动等）。我们要在一切工人中努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鼓励与推动黄色工会去参加抗日救国的团体和运动，号召全国各党各派联合一致抗日救国，呼吁全国各军队的军官士兵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苏区的内战，并联合一致去抗日，组织全国一致的抗日反卖国贼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要在各城市中设法联合一切工人的团体与各厂工人，建立工人的抗日救国会，动员工人到农村中去领导与组织农民的抗日游击

战争，动员工人到红军中参加抗日反卖国贼的战争，特别要动员工人利用各人的亲戚朋友关系向国民党的军队去进行活动，去组织和影响国民党的军队进行抗日战争，拒绝蒋介石等进攻红军的命令。尽可能派工人到军队中去服务，去宣传抗日，反对内战。

在罢工委员会、反日会等组织中，过去我们排挤和打击那些可能和我们合作的各派工人的领袖，是不对的。我们应在一定的纲领之下，诚意地和他们合作，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坚决站在工人阶级与抗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立场上去领导群众斗争。对于他们的错误，应采取善意的态度去批评。只有对于工人中的汉奸分子，我们才应该坚决驱逐。

十、要特别注意保存我们在群众中企业中的干部和领袖。党在工厂中的支部，不应该使全部同志都去公开领导斗争及进行公开活动。一个同志和一个同情者，在公开领导一次至两次斗争之后，第三次斗争必须换人来领导，不能再要这个同志来领导了。让这个同志仅以同情斗争的态度一般地参加斗争，就在群众中把这个领袖保存起来。这样我们可以在群众中保存许多领袖，同时，也可以培养出许多新的领袖来。

十一、我们的许多同志长期在狭隘的秘密条件下工作惯了，现在要他们到广大群众中去，公开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要在复杂的环境下去对付狡猾的国民党、黄色工会领袖及各种派别，那自然可能发生许多错误，甚至有些人受他们的影响、欺骗、愚弄、威吓以至收买，而发生动摇、投降以至叛变。但我们绝不应该害怕发生这些问题，而重复把我们自己关在秘密的房子中。只有让我们的同志到广大群众中去，到十分复杂的环境与斗争中去，才能锻炼出真正能干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领袖。

十二、我们要加紧教育同志不论在如何复杂变化的环境下，不论使用何种灵活的策略去与反动派斗争，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我们在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纲领。任何时候，我们在主观上是不放弃这些纲领的。虽然这些纲领在白色恐怖下是没有可能实现的，但只要一有机会与可能，我们就一分钟也不忘记要部分地实现这些纲领，尽可能使工人群众的要求，接近我们的基本纲领。我们与各派的工人合作，不是我们放弃自己的纲领，去接受其他党派的纲领；相反，是努力宣传我们的纲领，去影响同盟者。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我们行动的自由。对于同盟者的动摇、叛变与投降，要使用批评的武器。要不断地在下层群众中进行工作，在群众中不断加强我们的组织和影响。同时，党的政治纪律性与警觉性应更加提高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克服各种右倾的错误。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毛泽东、朱德关于停战议和 一致抗日通电^{*}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自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队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臣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

* 这个通电原载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红色中华》。

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队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在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共青团中央给全国学生的信

(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

全国学生们：

对于你们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坚持不屈的英勇奋斗，深表同情和敬意！并慰问因救国而在狱的一切学生！

当你们在平津上海和全国各地，发动为民族解放的英勇斗争时，我们互相虽没有直接通信，但从简单的电讯和新闻中，我们已经知道你们英勇的行动。我们是在不约而同的相互配合着行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你们的佳音，同你们所盼望着我们的是一样！

中华民族正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只有中国人民起来一致团结奋斗，我们相信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一定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我们共同一致的信念。你们最近的行动和我们的事业，都是共同向着这个信念前进。

东北四省久已沦亡，华北现又名存实亡，眼见全中国快要变为奴隶；凡属不甘心作汉奸的中国人，谁能不切齿痛心。自学生界高举义旗，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以来，全国人民到处风起云涌的响应，加入民族解放的阵线，全世界凡属主张正义的言论，都在表示同情。

在你们的救国运动一开始，就采用罢课、游行、示威来抗

议日本强盗和汉奸卖国贼，站在民族解放的前线，号召全国人民参加，在请愿不遂，立即转变深入民间，唤起民众，拒绝参加蒋介石御用的代表所发表的宣言，最近又采取广大的国难教育，以反对蒋介石的亡国教育，这一切行动都是非常之正确。

学生们！继续坚持不屈、英勇奋斗的精神，不达目的，誓死不休，头可断，亡国奴不可做！

卖国贼蒋介石的统治，是卖国可图功，救国则有罪。一般亲日媚日的汉奸都可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升官发财；为民族奔走呼号的志士，则受尽逮捕、监禁、屠杀。蒋介石对学生赤诚救国运动，始则诬以受人利用，继则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到处摧残学生救国运动，最近则在各校大捕学生，卖国贼宋哲元更在传讯的名义之下，把平津的爱国学生大批捕杀。在卖国贼蒋介石的统治之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为犯罪；就是在阿比西尼亚皇帝的统治之下，救国也成为正义。这当是因为卖国到底的蒋介石与抗战的阿皇之间是有不同的。

全国的学生、全国的人民，并不因蒋介石的卖国而放弃自己的救国的责任。恰恰相反，正因为现在中国的政府是卖国的，而救国的责任完全放在全国学生、全国人民自己的身上。因此卖国贼的压迫屠杀，并不能阻止全国学生、全国人民的救国运动。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正在领导着红军，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全苏区的人民都在磨拳擦掌，紧急动员：上前线的加入到抗日红军去，在后方的努力一切工作，同你们是一条心，就是要打倒日本和卖国贼。但是，同你们处的环境不同，在苏区的抗日救国运动是公开的，得到政府的赞助的，救国不但无罪，而且确是“匹夫有责”，这因为苏维埃政府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这是你们能够深信的。

中国红军在战胜一切困难，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达到西北，现在又东渡黄河，目的就是要求得迅速直接对日作战。最近苏维埃政府又宣布要全国的红军集中河北，为全国人民打先锋，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迈进。

蒋介石据兵两百万，不但不把自己的军队向北开进，反而把自己的军队从日本占领的区域撤退。古话所谓：“兵可百年不用，而不可一日不备”。蒋介石平日搜刮人民血汗，养活数百万军队，并不用作抵御外侮，而只是惨杀中国同胞。蒋介石同中国过去一切军阀是一样一贯的勇于内战，怯于外侮。上海战争时，不去帮助十九路军打日本，而进行“围剿”红军。长城抗战时不帮助抗日同盟军，反而解决孙殿英的部队。福建事变时，不去打日本反而打十九路军。现在又是不去打日本而打抗日红军。红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救国。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意志，但是蒋介石违背民意，当日本进占河北时，蒋介石把自己的部队关麟征等从河北撤退；当红军要去河北打日本，又把自己的部队关麟征、陈诚、汤恩伯等开到山西来，挡住红军的去路。

学生们！四万万同胞中如蒋介石之流，只有极少数极少数；就是在南京政府中，蒋介石部队的上中级军官中，对于蒋介石卖国到底的行为，不赞许的也不乏其人。工农商学兵各界之广大民众，对于蒋贼之卖国更切齿痛恨！

亲爱的学生们！前进呀！黑暗、屈辱、恐怖和血腥的时代是快要过去了，在前面展开着崭新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时期。只要掀起直接对日作战的义旗，全国人民都会牺牲一切的争赴疆场。你们还记得，东北抗战时东北义勇军和全国人民风起云涌的响应，上海战争时全国人民的拥护。在东北和上海的炮火，全世界全中国的人民听到时，都在感觉为自己伸义愤。

东北和上海抗战没有得到最后的胜利，这并不是像汉奸群所说的中国不能抗日。这种汉奸理论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就是亲身抗战的马占山将军、翁照垣将军，也曾有论文坚决驳斥那种汉奸理论。要解救目前民族危机，只有迅速掀起直接对日作战。我们彼此共同的努力都向着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前进！你们目前更应为着下列的几个目标努力：

（一）创立全国各党各派抗日人民统一战线；

（二）停止一切内战，一致联合抗日；

（三）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四）全国红军与全国海陆空军集中河北打日本；

（五）争取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组织、集会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对于你们最近的行动除表同情外，我们准备用一切能够做到的力量帮助你们。

对于今后的工作，我们有下列的建议：

（一）中华民族解放是一个流血的斗争，而这种流血的形式，主要的是要在战争中表示出来。无论要战胜卖国贼也好，要战胜日本强盗也好，没有流血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华民族解放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战争不是很远的事情，而是要迅速的到来了。当然这决定于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因此武装民众的工作，是极重要的事情。发展抗日的民众武装、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学生不但要负担武装民众的工作，学生本身也就要武装起来。

（二）争取士兵抗日，争取军官抗日。要在军官士兵中广大的说明：军人的天职是保卫国土；现在土既不保，国也不卫，就失掉了军人的天职。要发动全国军队中的军官士兵要求

北上抗日。

古人说：“顽石可使点头”。难道我们一个热忱爱国的男儿，不能把热血的军人说动吗？难道中国的军人都是不称职的、不爱国的吗？不是，中国的军人都是称职而爱国，只要把道理讲通都会来。谁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谁不愿意打日本强盗？

全国海陆空军集中河北打日本，就靠你们的工作。要全国军队中的军官士兵自动向河北开，要把枕戈待命变为自动开拔。同时苏维埃主张红军集中河北打日本，也要在军队中人民中讲明：反对拦阻红军北上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日本去，欢迎红军集中河北打日本。

（三）要继续的到民间去，要扩大宣传和组织的工作。极端的注意把抗日的宣传与当地民众的生活联系，解决他们目前最迫切的痛苦，更容易使他们接受抗日宣传，同时更容易把他们武装起来，组织起来。

（四）集中注意于人民统一阵线的建立，不分党派，不分政治信仰，不分宗教信仰，只要愿意抗日救国的，结成联盟，反对汉奸卖国贼和日本。

团结学生内部，注意学生的本身问题，除少数汉奸走狗应排斥于学生界之外，其余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学生，都应当结成一气，反对汉奸走狗，打日本。

最后，欢迎你们派代表团或个人来苏区参观或帮助我们的工作。

致以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等关于西征 战役的行动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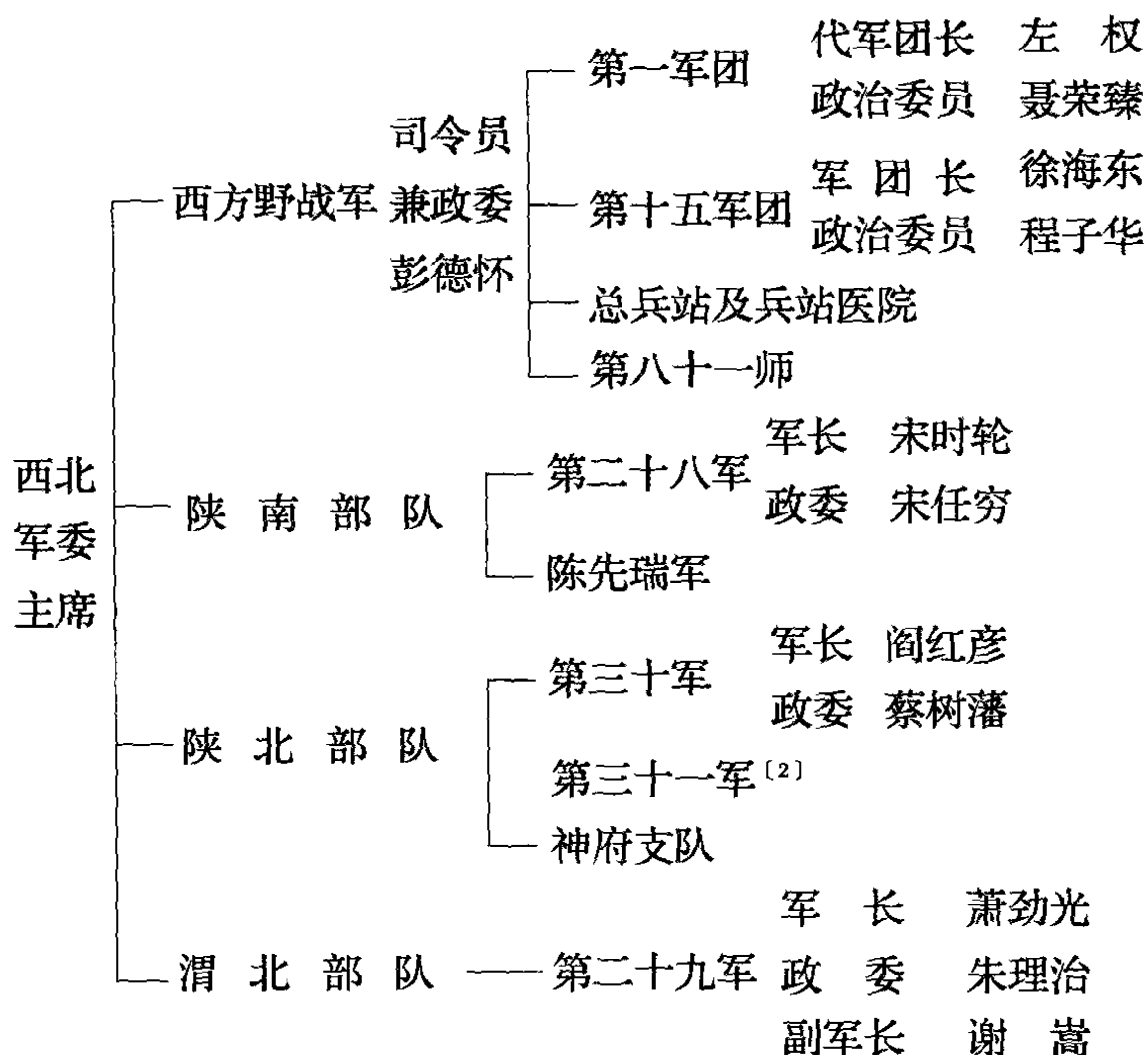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

一、蒋阎^{〔1〕}二卖国贼，以我军西渡，似有以四师以上兵力由吴堡入陕的企图。南线、北线及西线情况无变化。

二、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以红军之一部钳制蒋阎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另以有力支队，进出陕南，与我陈先瑞部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

三、依上述目的，重新规定我军战斗序列如下：

* 这是东征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发布的西征战役命令。此次战役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日开始到七月下旬结束，在两个多月的战斗中，除歼灭大量国民党军外，还俘旅长以下人枪二千余，战马五百余匹，占领了环县、豫旺、同心、定边、盐池等城镇，开辟了纵横二百余公里的新区，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迎接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



四、各兵团第一步行动指导如下：

(1) 野战军第一步以夺取并赤化安边、定边、环县、曲子之目的，在五月十九、二十两日由现地出发，分两路西进（行军计划另发），以七天行程到达新城堡、沙集、吴起镇之线集结，休息两天，一军团完成环县、曲子、庆阳一带侦察，十五军团完成安边、定边侦察，十五军团准备攻占安边定边两县城，左聂率一军团相机攻占曲子及环县。其战斗部署及后方勤务机关均由彭司令员规定之。

(2) 二十八军应于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一切南进准备，待命出动。

(3) 三十军以迟滞晋敌西进之目的，五月十八日由现地出发，取捷径以五天行程进到宋家川附近活动，相机破坏敌之碉

垒，并迫近河边游击，以阻扰敌之渡河。

（4）三十一军以进入神府区域活动并威胁高敌双成后方之目的，应于七天内（至五月二十四日止）完成一切准备，待命北上。

（5）二十九军主力（两个团）仍由副军长谢嵩指挥，在韩城区域执行原任务。其另一个团应配合保安独立团及关中红军之一个团（归萧军长统一指挥）于六月初开始活动于吴起镇与环县、曲子、庆阳之间，配合我一军团行动。

五、所有西北军委直接指挥之诸兵团，须经常用无线电与军委联络，以保证随时接受军委的补充指令。

六、此命令发至师及独立军为止，不得下达。

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五月十八日于大相寺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阎锡山。

〔2〕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曾酝酿以神府地区地方红军、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红军第三十一军，后未实现。一九三六年八月，这支武装组成独立第二师。

林育英等关于目前政治形势 及与张国焘关系问题 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

朱、张、刘、徐、陈、任、贺、萧、关、夏^[1]诸同志并转各负责同志：

甲、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苏维埃红军与同盟之友军于时机成熟时共同组织的，不是我们单独组织的，我们的组织仍是革命委员会与苏维埃。

乙、现在对外宣传口号是：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至于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在目前仅能使党内高级干部知道，对外应守秘密。

丙、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全国性与国际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布置，必须严密对付日帝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与军事进攻，对外尤须严守秘密。

丁、党的十二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与绍禹^[2]同志在七次国际大会的报告，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

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如李济深亦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南京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两派，正在斗争中。上海拥护我们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三十余种，其中《大众生活》一种销数达二十余万份，突破历史总纪录，蒋介石无法制止。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领导示威游行，许多外国新闻记者赞助反日运动，从蓝衣社、国民党起至国家主义派止，全国几十个政治派别在联共反日或联日反共问题上，一律起了分裂、震动与变化。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革命发展是取着暴风雨的形势。

戊、在国际各国备战益亟，意大利已占领亚比西尼亚，德国占领莱茵河，日本积极向外，如箭在弦上；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号召，已在许多国家得到胜利，特别在法、捷、西、美等国。苏法、苏捷、苏罗、苏蒙四种军事互助条约业已订好，和平阵线已有强大势力，英苏关系亦有进步，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

己、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出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希兄等共鉴之。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
博古^{〔3〕}、邓 发、王稼祥、凯丰^{〔4〕}、
彭德怀、林 彪、徐海东、程子华

二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夏曦已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牺牲，因通讯不便，中央当时尚不知晓）。

〔2〕即陈绍禹。

〔3〕即秦邦宪。

〔4〕即何克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对回族人民的宣言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回族的兄弟们：

帝国主义重分殖民地的世界第二次大战，快要爆发，我们中华五族的人民和土地，已一大块一大块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宰割。现在更向着绥远、宁夏、甘肃、新疆前进，破坏你们的根本，灭亡你们种族的大祸，已经临头。你们是甘就灭亡，任人宰割，还是奋起抗战，争取回族的独立与自由？土耳其回族复兴的荣誉，将为整个回族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南针。当此紧急存亡的关头，望即奋起！

回民在千余年以来，历受中国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特别是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统制之下的苛捐杂税，使回民的生活陷于艰难困苦不能生存的地位。复时常挑起回汉两民族的恶感，甚至互相残杀，最后则以大兵镇压，必使回汉两族民众的元气丧尽，然后得以遂其残暴贪婪的统治。近几年来，以卖国贼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阀，更丧心病狂的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将全中国及各民族的利益完全出卖，东北四省的丧失，华北五省的名存实亡，闽南的自治运动的活跃，现在更要把西北四省划为“防共”地带。南京军队之入甘肃，即是灭亡西北、镇压回蒙藏各民族独立运动的主要步骤。

中华人民苏维埃政府及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素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及其他各弱小民族为其基本任务。现鉴于东进抗日为卖国贼蒋介石所阻，认为：巩固后防，发展抗日根据地，联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及各民族，首先是联合西北的各民族的人民，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是更为重要的。所以抗日人民红军的西进，不仅是实际准备抗日的必要步骤，而且是蒙回及其他弱小民族特别是回族独立解放的大好时机。因此，我们谨向回族人民宣言：

一、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全是回民的区域，由回民自己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属回汉杂居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建立联合的政权，解决回汉两民族共同的问题。

二、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

三、武装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所不可少的条件。我们愿意联合回族中所有的一切武装力量，并帮助其发展，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我们希望回民的武装，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

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

五、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

六、回汉两大民族亲密的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七、联合土耳其、外蒙古、苏联及其他同情中国各民族彻

底解放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抗日。

亲爱的回族的兄弟们！现在是弱小民族被宰割的时代，同时也是弱小民族奋起图存、争取彻底解放的时期。你们处在已经解放的苏联、外蒙古、土耳其及正在谋解放的中华苏维埃红军之间，只要你们觉悟起来，努力奋斗，胜利必是你们的。谨此宣言。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林育英等关于目前形势与战略方针 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朱张刘，徐陈并转任贺萧关夏^{〔1〕}诸同志：

目前形势及战略方针：

(一) 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 西北的形势是：红军与东北军取得密切合作，与杨虎城邓宝珊亦有联系。胡宗南由山西向陕南，王均在汉中，毛炳文在甘南，阎锡山受红军重大打击后，现只能出八团入陕。汤恩伯率十八团（四个师）准备入陕，亦颇动摇。于学忠率两师在兰州、天水间，奉军主力在洛水、环水、泾水流域，陕军在韩城、宜川线，马鸿宾主力在宁夏，马麟在青海，一部在兰州以西。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三) 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

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四）兄处情况与计划甚盼速告。

育英 洛甫 泽东 恩来
博古 德怀 林彪 海东^{〔2〕}
二十五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夏曦已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牺牲，因通讯不便，中央当时尚不知晓）。

〔2〕即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徐海东。

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信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百川先生：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1〕}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2〕}带回，即祈审览。

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专此。即颂
勋祺。不一！

毛 泽 东

五月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郭登瀛。原是阎锡山部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的，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征中被俘。

毛泽东关于当前军情变化和基本任务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彭并告刘晓，左聂朱邓，徐程王^{〔1〕}：

通知下列数事：

甲、二、六军团六月中可到甘孜。四方面军已接受我们方针，六月底北上，七月底到夏洮，二、六军团跟进。如不生枝节，当是西北计划一生力军。

乙、对国焘^{〔2〕}关系承认暂时采取协商方式，并告国焘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之分歧，过去分歧不必再谈，务以协和团结为目标。

丙、估计六、七、八三个月形势：李生达、汤恩伯当进至绥德、清涧、安定之线，王以哲进延安、瓦窑堡之线，杨虎城在韩城、延长之线，东北军主力在庆阳、固原、平凉、隆德之线，胡宗南在汉中、碧口之线，王均、毛炳文在西固、岷州之线，何柱国骑兵军有进天水、陇西之可能。

丁、西边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争取东北军，为六、七、八月之三大基本任务。东南两面正着力布置，西面由野战军与陕甘宁省委集全力赴之。

戊、二十八军暂缓派出，候二、四方面军北上，胡宗南西进汉中时，再派赴陕南出河南，目前拟用于三边。萧劲光率两

个团用于环县、庆北方向。三十军在无定河东、宋家川南。

己、东边游击战争分为数个小军区，给以独立性。正作政治动员与完成组织事项。

庚、红校（一、二、三科一千四百人），以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周昆为校务部长，袁国平为训练部长。六个月毕业，开始着重政治教育，六月一日正式开学。

辛、瓦窑堡粮食仅够一个月，吴起镇以西须为后方筹粮三千六百担。

对四方面军北上，我们与东北军关系，二十八军将来行动，敌情将来变化等不得通知下级。

毛

二十九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

〔2〕即张国焘。

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 关于目前形势和陕甘党的 任务讨论提纲*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

一、红军东征得了些什么胜利？

甲、东征更清楚的证明了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更广泛的扩大了抗日红军的影响，取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乙、东征更明白的暴露蒋介石的汉奸面目，东征向全国人民指示出：要抗日就必须联合共产党，要防共就不得不投降日本。或是联共抗日，或是防共降日。东征把这问题尖锐的提了出来，使卖国贼的统治更加动摇，使全国抗日反蒋运动更加发展。

丙、东征中间，扩大了新红军八千人，消灭敌人七个团，缴了好多枪，得了许多补充，并且使红军本身受到了极大的抗日斗争的教育与锻炼。

丁、党以前决定用东征“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事实证明这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二、东征红军为什么回师呢？

甲、因为蒋介石帮助日本派遣十师以上的军队拦阻红军抗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斗争》第一〇二期。

日去路，筑起堡垒线，阻挡红军前进。

乙、因为红军不愿意用决战来消耗中国自己国防力量，使日本强盗欢心。

丙、因为红军要坚持并实行“停止一切内战，一致联合抗日”的口号去争取被蒋介石所欺骗、所压迫的白军官兵，到抗日战线上来。并且还要使全国民众更加相信和拥护红军的抗日主张。

丁、苏维埃中央政府提出“停战议和一个月”，希望现在还没有觉悟的白军觉悟过来。这不是和平主义，而是准备更多的抗日力量 and 更顺利的条件，去反对日本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三、目前全国的形势

甲、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大举进攻华北，使华北完全灭亡，并且还要进一步并吞西北，侵略华南（福建、广东一带）。

乙、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正在用力团结各派，来进攻革命。蒋介石来往奔走准备召集“国民大会”选自己做大总统，并且诬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诬蔑共产党和抗日人民是“赤色汉奸”，以便借口来压迫和进攻革命。

丙、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是往前急进着（以前反共的转到中立的，以前中立的转到联共，以前仅有抗日决心的现在进到有反蒋的决心）。

丁、白军里面发生分化，有一部分正在转变到抗日战线上来。

戊、苏维埃红军正在加紧扩大自己力量并且还要联合全国抗日力量，来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

总结起来说：目前全国形势，表现出是一个转变的过渡时

期，我们是准备着走向更伟大的斗争，走向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实际建立，走向迅速对日直接作战的时期。

四、陕甘苏区目前的形势

甲、敌人进攻的形势如下：东北线上蒋介石、阎锡山派三十个团来进攻。高桂滋、高双成也比前活动，蒋介石的部队是进攻的主力，他们要依靠堡垒来步步推进。

南线上东北军和杨虎城部队向北前进。

西北线上地域广大，部队不多（仅马鸿逵、马鸿宾部队），极便于发展。在这些进攻的部队中，有一部分是我们争取来共同抗日的。

乙、这次进攻和以前都是不同的。因为：第一，这次进攻，不是“围攻”（没有围的形势）；第二，在这次进攻的部队中，有好些是被蒋介石压迫和欺骗来的，他们是非常动摇的；第三，虽然我们部分苏区可能变为游击区，但是我们依靠老苏区可以在新的方向创造大块新苏区，我们不是放弃老苏区。

丙、我们更要准备将来的大举进攻。

总起来说：目前陕甘苏区也是处在一个过渡的转变的重要的时期。

五、陕甘党目前的三位一体的任务

在上述形势下面，我们的紧急任务是：

甲、依靠老苏区，向陕甘宁方面扩大和创造大块的新苏区。

乙、目前形势非常便于我们进行白军工作，我们要用很大

力量与一切方法去争取抗日的友军与我们一致来抗日。

丙、在敌人进攻之下，我们一部分苏区可能变为游击区，我们要坚持的发展游击战争，我们现在就要立刻准备，我们这些地区的党政机关，现在就要立即准备好打游击战争。

虽然我们部分苏区可能转变游击区，但是我们可以在另一方面创造更大的新苏区。我们联合许多抗日的大军，可以以雄厚的力量来进行抗日战争。我们是能够胜利的，我们的前途是远大的光明的。我们某些地方党不要因为失去自己本乡一块地方，就表示悲观，应该克服狭窄的地方观点。我们应该抱着坚决的胜利信心，从整个革命着想，来加紧实行上述三大任务，那末，我们在一个时期后将会展开伟大的胜利的新局面。

六、我们的口号

一般的：

1. 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
2. 红军与白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3. 反对中、日、“满”联合防共，灭亡中国！
4. 联俄联共，一致抗日！
5. 誓死收回东北与华北失地！
6. 为着民族生存，抗日到底！

苏区动员的：

1. 反对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拦阻红军抗日、捣乱抗日后方！
2. 开展游击战争，保卫抗日根据地！
3. 创造与扩大陕甘宁苏区！
4. 武装上前线，扩大红军抗日先锋队！
5. 全苏区人民武装起来，加入游击队、赤少队，保卫抗

日根据地！

6. 节省每升粮食供给红军！

中共中央局宣传部

根据档案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中) 刊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中革军委为两广出师 北上抗日宣言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

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大批增兵冀察以直接占领华北，组织全国性的走私，以破坏中国关税制度与国民经济，发动福建自治运动以侵略华南。无一不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预定计划，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前进。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但丝毫没有抵抗的表示，而且处处替日本帝国主义为虎作伥，镇压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救亡运动，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征抗日，签订《中日防共协定》，引狼入室，排除异己企图创立个人独裁，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为所欲为。一切有良心的、有热血的爱国军人、爱国同胞，际此日本强盗无耻汉奸横行华夏之时，无不义愤填胸，誓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到底！

两广此次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并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出兵一致抗日，义声所播，全国人民无不振奋。我们谨代表全苏区抗日人民与抗日红军对两广爱国军人、爱国同胞表示敬意与拥护，并首先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我们更号召全中国爱国军人自告奋勇，出兵响应，全中国爱国同胞再接再厉，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以配合两广的起义，务使此次

抗日的军事发动扩大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同时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翻然改悟，答应两广要求，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北上抗日。中国人民红军更愿首先全部集中河北，担任抗日先锋军的任务，开始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

然而自两广发难以来，蒋介石南京政府不但丝毫没有接受两广请求的任何诚意表示，而且一再迁移时日，公开诬蔑两广当局为鼓动内战破坏团结，而暗中却调集大军企图拦阻两广军队北上抗日，挑拨离间，发动内战以捣乱抗日战线。对于蒋介石的这种罪恶行为，全国人民决不宽恕！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应该要求蒋介石立即实现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同时要求与赞助蒋介石军队中很多有良心、有热血的爱国将校，立即脱离蒋介石的降日政策自动率领部队与两广及红军联合北上抗日！

事急矣！全中国的爱国军人爱国同胞大家立即紧密的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向着日本帝国主义一致进攻！中国人民现在比无论什么时候更迫切的要求着坚固的抗日的联合战线。蒋介石所要召集的一切降日卖国的国民党二中全会，或御用的国民大会我们都要坚决反对。我们主张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政治的、社会的、职业的团体与武装队伍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大会，并立刻实现下列的纲领：

（一）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

（二）取消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

（三）惩办丧权失地祸国殃民的汉奸卖国贼。

（四）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直接对日作战。

（五）没收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作为抗日经费。

（六）保证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完全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七）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八）联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的国家与民族，联合日本国内的一切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众。

这是全中国人民所要求的抗日救国的纲领，也应该是两广出师抗日的纲领。我们竭诚希望两广的爱国领袖们能够到处大胆的发动与拥护抗日人民的爱国运动，大量的武装与组织抗日人民，联合全国人民，为这一纲领的彻底实现而奋斗。我们相信只有当抗日的武装与抗日的人民打成一片。只有抗日的武装变成抗日人民的武装时，两广所发动的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拥护两广出师北上抗日！

全中国爱国军人联合两广一起打日本！

反对蒋介石拦阻两广义师北上抗日！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捣乱抗日！

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反对蒋介石御用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与国民大会！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私，没收一切私货！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全中国人民抗日的联合战线万岁！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 给红二、四方面军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

（甲）日本在华北的增兵，在全中国的走私，在华南的自治运动等灭亡中国、独占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国家间、中国各阶级间有了新的结合，这一结合使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

（乙）两广的发动，即是这一新阶段的开始的标帜。它表示：（一）中国人民武装抗日讨逆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开始。（二）太平洋上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英美帝国主义积极参加反日的开始。（三）反动统治内一个重要部分转向抗日讨逆的开始。因此这一发动带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可以得到最广大的最复杂的各种抗日反蒋的力量的拥护，从共产党一直到帝国主义，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的创立。

（丙）这一发动的弱点，即是代表英法帝国主义利益的中国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集团，还是占着统治的地位。因此：（一）他惧怕抗日反蒋运动成为群众的运动，甚至反对群众参加到运动中来。（二）容易妥协，动摇，中途分裂与叛变。（三）不敢提出明确的抗日讨逆的纲领。但这些弱点，并不减少这次发动的进步的革命的重要意义。

（丁）我们的策略是在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

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因此：（一）我们赞助与拥护这一发动，从各方面首先是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与配合这一行动。（二）反对蒋介石一切破坏这一发动的阴谋诡计，反对他制造内战，拦阻两广北上抗日。（三）提出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与它所应该即刻实行的彻底的抗日纲领。（四）对发动者的弱点，采取积极的善意的诱导方法。

（戊）我们关于两广出师北上抗日的宣言已送来，请查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林育英等关于红二、四方面军宜北出 甘南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九日)

朱张二同志并转弼时^[1]同志：

甲、时局形势已起重大变化，这使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党的任务是使抗日反蒋^[2]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

乙、西北国防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

丙、西北发动的时机与战略部署须以争取胜利为原则，依此原则并顾到各方面的条件。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其理由：

第一，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三马^[3]。过去回汉仇恨是非常之深的，我们欲在西北建立局面，必须联合回人，否则将有重大不良影响。如出夏洮则引起冲突之可能极大。

第二，甘南敌情较弱。胡宗南调走后，仅余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马步芳不会向甘南。若出夏洮则将聚王、毛、鲁、马各部于一狭小地区，红军行动将较困难。

第三，红军出至甘肃南，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

第四，甘南利于补充。

上述方针请考虑电复。

育英 洛甫 恩来
博古 泽东 德怀^{〔4〕}

十九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张国焘、任弼时。

〔2〕指蒋介石。

〔3〕指马麟、马步芳、马步青。

〔4〕即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彭德怀。

中共中央为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

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全体执监委员先生们：

当着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最后一瞬间，我们已顾不得你们还是对于我们怀着何等深刻的仇怨，还是集中全力向红军和苏区进攻，并在全国各地拘捕杀戮我们的同志，为了集中全国的力量，以挽救伟大的中华民族之灭亡，我们在屡次提议停止内战合作御侮救亡被你们拒绝之后，再一次的向你们正式提议：立即停止你们与我们之间互相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驱逐华北、内蒙的日兵并收复东北失地。

一切对外投降、退让与不抵抗的政策，是招来亡国灭种大祸的根本原因。为要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只有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武装抗战。这已经是不可争辩的真理，全国民众一致的要求。你们对于这个极明显的真理，当然比别人看得更明白。然而你们政府的负责人，如果不是甘心背叛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不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武装抗战？为什么要用一切力量去阻止与镇压其他军队和全国人民对日抗战？为什么尽撤华北、内蒙一切的军队和党部，继续承认日本一切无理的要求，对日屈

辱退让到底？

你们中有人说：“红军妨害你们抗日”。然而红军从“九一八”以来，已屡次宣言，向你们及全国各党派和军队提议：“愿意抛开一切仇怨，与你们联合一致抗日”。你们为什么屡次拒绝红军的这个提议？为什么继续集中全国的军队和资源去进攻红军，阻止红军抗日？

我们现在再一次向你们及全国民众宣言：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

我们欢迎贵党领袖冯玉祥先生的抗日言论与李宗仁先生的抗日主张；我们同意贵党西南执行部及许多领袖的抗日救国通电；我们拥护西南抗日救国军的动员令与改编；我们还欢迎国民党中任何领袖、任何党员来参与与领导抗日救国的神圣战争！

我们愿意以全力支持西南诸领袖抗日救国的英勇事业，只要西南诸领袖坚决执行抗日反汉奸的政策到底，并实现民主自由。我们愿意在一切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与西南诸领袖密切合作。今后国民党中任何领袖、任何委员起来抗日救国，我们同样愿意以全力支持他们。

我们与红军不妨害任何人抗日救国的行动，我们坚决拥护全国抗日领袖与抗日民众诚意的团结起来实现中国的统一。

我们认为用“破坏统一”与“内战”的罪名去责备西南抗日的英勇行动，是无理由的。如果没有人执行帝国主义的意志用武力去阻止西南的抗日行动，内战就不会发生。而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全国对日抗战的一致中才能求得。我们反对强迫西南取消对日抗战来实现统一，但我们赞成南京及全国各地

立即宣布对日作战去与西南统一。因此我们反对任何进攻西南的军事行动！

不立即动员全国对日作战，国家任何形式上的统一与纲纪，都是不能维持的。因为政府任全国家沦亡而不急起挽救，且多方镇压人民的救国运动，这就是政府最大的背叛国家民族的行为，就是严重的破坏了国家民族的纲纪。人民对这样的政府，是再没有义务来遵守他的法律命令，人民为着救国有权利来推翻这样的政府。

对日立即抗战与否是目前解决中国内外一切问题的关键。现在已经到了决定问题的最后一分钟。日本帝国主义也已明白的告诉你们：“你们只有在投降与抗战中找一条路走”。如果有人决心要走投降的可耻的死路，那我们不去说他，让他去继续“剿共”与“讨伐西南”，在各种借口之下消灭他一切的政敌与抗日的力量，让他去继续对日“提携”、“合作”，用“长期抵抗”、“秘密准备”、“等待机会”等言词去欺瞒民众。

然而民众是要走着抗战的生路的，民众也热烈的盼望你们之中任何人走上抗战的生路。这就要求你们立即接受西南抗日救国的请求与我们对于你们的提议，立即停止进攻红军与对西南的军事监视，立即将军队开入华北、内蒙对日作战，肃清汉奸，废除一切屈辱的条约，并立即实现民主自由，释放政治犯，另颁民主的宪法，召集全国各党各派的救国会议，组织抗日的国防政府，联合苏联与世界一切的反日力量。只有这些要求的完全实现，才能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取得全国民众的拥护与世界反日力量的帮助，创立最强有力的威权政府，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相信贵党有不少的军政领袖与党员，同样是中华民族最好的子女，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精

神，能够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英勇奋战。我们盼望这一切的民族英雄与忠诚的爱国志士，立即同我们诚意的携手，抛开已往一切的仇怨，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中共同奋斗！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我们伸着手向着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人们！

我们盼望你们对于我们这个诚恳的提议给以善意的考虑！我们等候你们对于我们这个提议的任何答复！最后，向你们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 工作的指导原则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

(一) 对东北军的估计

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

但东北军现在还处在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过渡的时期。现在一般的他还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指挥下的军队；蒋介石的爪牙法西斯蒂的政训处，在那里是处于合法的监督者与宣传者的地位。在另一方面东北军的最高领导者以及一部分高级将领，已经有了抗日的决心与诚意。中下级官兵中间的抗日情绪是很高涨的，这就便利于我们抗日救国的宣传与活动。

但东北军内部转变的速度是不平衡的，有的部分则处于最先进的地位，有的则转变的异常迟缓，有的则尚未开始转变，而在蒋介石法西斯蒂政训处的直接影响之下。因此东北军内部觉悟的程度也极不一致。但这种不平衡不一致，并不能否定全部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军队的基本估计。而且这种不平衡不一致就应该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

(二) 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 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要使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军队，就依靠于我们的争取工作。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目前超出于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

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于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争取他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从政治上去争取，而依靠阴谋诡计，是无法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到底。但这并不排除对部分的东北军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当觉悟程度不够的自骄自大的在蒋介石与政训处压迫与欺骗之下的部分的东北军，向我们采取积极进攻的敌对行动时，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可能与有利的条件之下应给以打击。这种行动一方面是为了自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这一部分东北军的教训，开辟以后在他内部能够顺利的进行政治工作的可能。所以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同样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

（三）目前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关键

要使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军队，目前的主要关键，是在使东北军脱离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蒋介石在东北军的代理人，就是那个法西斯蒂的政训处。

我们在东北军全体将士前面，应该利用蒋介石每一丧权辱国的事实，来揭破蒋介石与他的政训处的每一欺骗。对于政训处每次所提出的反对我们的口号，我们必须给以及时的有力的答复。我们的答复应该利用铁一般的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必须集中火力向着蒋介石与他的政训处猛烈进攻，处处把东北军的全体将士同法西斯蒂的政训处对立起来，使政训处完全陷于孤立，处于四面楚歌的环境中。也只有这种斗争，才能把东北军中个别最忠实于蒋介石的分子放到汉奸卖国贼的走狗的地位，放到东北军中的内奸的地位，而受到东北军全体将士的唾骂。也只有这种斗争，才能使动摇的、中立的分子转变到抗日的战线上来；也只有这种斗争，才能使东北军内部政治上的团结，更加巩固。

同时我们并不放松去分化法西斯蒂政训处内部的工作。在开展反法西斯蒂的斗争中，我们应该不断的号召法西斯蒂中一切有良心的有热血的爱国的青年，同我们联合起来一致抗日，使法西斯蒂内部分裂，内部发生斗争。这一定使我们能够更顺利的开展反法西斯蒂的斗争。

当部分的东北军从部分的反蒋反政训处的斗争转变到整个

东北军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反对法西斯蒂政训处的时候，也即是整个东北军公开起来号召抗日与实行抗日的时候。

（四）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

我们的目的是在争取整个东北军，所以我们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而且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即是使东北军成为抗日军的目的。

上层统一战线在东北军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东北军中许多军官都是东北人，所以他们中很多具有抗日的情绪与意志，便于我们同他们成立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成文的与不成文的方式（如互不侵犯、互相通知、互相协商等）。特别重要的，在统一战线中我们应该同他们力求接近，向他们竭诚提出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与方法，对于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应该给以最清楚的详尽的与诚恳的答复，对于他们所遭遇到的困难问题，应该站在友军的立场上共同协商，以求得适当的解决，决不因为某些部分的冲突与误会而妨碍大局。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应逐步的把抗日救国的方针具体化，以引导有准备的抗日讨逆的行动。

为了加紧准备，以争取有利的发动时机，东北军的首长在目前对南京政府、蒋介石以及政训处采取外交上的应付的办法，是可以容许的，在发动以前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办法不应该使东北军在全中国人民的前面失去抗日救国的政治立场，同时，凡同苏维埃红军有关的应协商决定。

在东北军中的下层统一战线，是为了使东北军的下层官兵在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下团结起来，给东北军造成一个坚强的下层基础与推动的力量。这样，个别上层官长的叛变，不能影

响下级的官兵，下级官兵可以拿他们的抗日的要求与情绪，去推动他们的官长走向抗日，坚定他们官长的抗日决心，而抗日的官长，也可以得到确实的依靠的力量。

下层统一战线也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从互不打枪或枪口朝天放起，一直到互相联络为止。下层统一战线应该对于东北军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表示消极怠工与敷衍塞责（如上级命令要筑堡垒，他们可以不筑，或筑而不坚等）。

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一定能够使东北军在政治上坚强起来，加速争取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过程。

（五）在东北军中创立坚强的领导的核心

我们各级党部现在对于东北军的工作，主要的还是从外面去影响东北军。我们利用我们的宣传品、喊话、谈话、联欢、慰劳、演剧等等方式，去影响东北军。这种方法开始是必须的，我们也必须经过这种方法才能在东北军的内部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领导的核心，在内面去进行工作。

东北军中现在极大的弱点是只有个别的领导的首长，而没有一个领导的核心。我们从外面去进行东北军的工作过程中，应该帮助东北军去发现、物色与教育一批东北军自己的勇敢积极的分子，使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坚强的核心，经过它来推动整个东北军中抗日救国的工作，同时也可以经过它来同法西斯蒂的政训处以及一切内奸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这个组织首先应该普遍到各军师团中去，这个组织可以用“东北抗日军人社”或“东北抗日会”、“复东社”、“东望社”等名称。没有这个东北军自己的组织领导，东北军的工作是无法步伐整齐的与顺利的

来进行的。

我们从外面对东北军中的工作，不但要找到个别的抗日的同情者与拥护者，而使每一个我们所找到的分子，本身在东北军中成为抗日救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我们不但要告诉这些同志以抗日救国的道理，而且要告诉他们以活动的方法与方式。我们要懂得，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是处在帮助者指导者的地位，而不是代替东北军包办一切；东北军中的工作，要东北军中自己的积极分子与干部去办理，没有无数这类积极分子与干部，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力量，没有基础。

(六) 东北军中应该有共产党的小组与支部

在东北军中间，应该吸收最优秀的分子到共产党内来。东北军中凡愿意加入共产党的，我们必须加以必要的选择与考察；共产党的组织应该完全是秘密的，小组间暂时不发生横的关系。但共产党员的活动除党内生活外，应该完全是公开的。因为共产党员在东北军中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与团结东北军中一切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使东北军成为一个坚强的抗日军队，他们在东北军中完全以抗日的积极分子的面目出现。在东北军的领导核心中，应该有共产党的精干的小组，以实现共产党在东北军中的一切策略与决定。共产党的组织愈有力量，则东北军亦愈是坚强。必须排斥共产党的发展会瓦解东北军的思想。

在每一个可能的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派出最好的同志到东北军内部去进行工作，并在里面发展党的组织。为了将来开展的形势，我们现在即应该培养与训练一批专门到东北军中去去的干部。

（七）凡东北军所驻扎的地方 都应该有党的工作

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党的支部干事会就是这一工作的领导者。但除了支干负总责外，支干中应该有一个同志去专门负责这一工作，由他去计划、组织与领导。经过党的支部，动员所有当地群众、妇女、儿童、游击队、赤少队去进行工作。区委、县委、省委都应该有专门的人或委员会（如省、县）负责进行工作。

地方党在东北军中进行工作的方法，不应该是刻板式的、到处一样的，他们首先必须考察当地东北军的表现、内中政训处的活动、他们同民团的关系，然后采取适合于这种具体条件的方法。如果他们是捣乱的、抢夺的、捉人的，那我们应该采取坚壁清野与发动游击战争的方式以打击之，造成各种困难，以促使他们的觉醒。同时在这种行动中，我们依然进行我们的宣传鼓动的工作（如到处散发传单、写标语、喊话等）。对于我们游击队所俘虏的士兵，在解除武装之后，应很好的给以优待，然后放回（有宣传品则给宣传品，能写信则写信），并同他建立经常的关系。对于那些万恶的法西斯蒂小头子或民团头子，如被俘获则枪毙之，并公布其罪状。如当地驻扎的东北军表现好，则可以用慰劳联欢等方式来争取他们到抗日战线上来。

共产党是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是站在敌人之上，他的目光是远大的，不论东北军的表现怎样，他决不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但他也不是傻子，不管东北军的表现怎样，总是拿一种方式去对付东北军，使自己受损失。他是要拿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各种各样表现的东北军。

（八）**办事处与工作委员会的统一与区别**

只有在东北军驻扎的重要地点，只有东北军已经同我们有协约的地方，我们才设立办事处。办事处是一个专门对东北军进行工作的机关。在办事处的周围，应该团结许多东北军中的积极分子。他对于当地东北军的一切行动与情况有最清楚的了解。办事处的组织应该简单灵便，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应该在政治上是很坚强的。办事处是地方性的组织，受地方党的直接的领导。凡不能解决的问题，以及一切关于东北军中工作的情形，应该报告省或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取得经常的指示。

除办事处在中央或省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下，应该有许多流动的小的工作委员会或特派员，这些委员会拿一定的部队做对象，那个部队移动时，他亦跟着移动，使各种过去的关系能够经常保持与发展。凡工作委员会在有办事处的地方即同办事处合并在一处工作，办事处应受其领导。

工作委员会较办事处应该是更轻便与简单的组织，为便于工作，与防止团匪与法西斯蒂的袭击，可采取化装等办法。工作委员会的干部，在政治上更应该是坚强的。

（九）**向苏区群众说明我们对东北军的方针 为保护苏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许多苏区的群众不了解我们对东北军所采取的策略，这是不足怪的，因为这种争取的方式是最复杂的，完全是新的方式，尤其是东北军中那些不好的表现，更使群众怀疑。

我们必须向苏区群众不断的解释这个问题，同时必须指出

东北军中的觉悟程度是极不一致的。东北军同红军不是一个东西，因此我们对于他们的争取方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争取东北军与保卫苏区群众的利益不是冲突的，而是互相配合的；牺牲苏区群众的利益以争取东北军不但是根本错误的，而且也无法动员苏区群众去进行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东北军就是保卫苏区群众利益的重要一部分。至于某一地区因为受到了东北军的摧残，而就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而心存报复，这无异因为部分的利益而牺牲整个革命的利益，这自然也是错误的。

在任何情况之下，党应该是群众行动的领导者，党应该掌握当地的群众在自己的手里。群众的组织、群众的武装和游击队的创立扩大，在任何情况之下是必要的。在和平的时候，这些组织与武装队伍，进行和平的工作；在战斗的环境下，那我们就进行战斗的动员。一切群众的组织与武装，时刻应该准备着应付一切新的事变。绝对防止某一事变的突然的发生，而仓皇失措，而组织解体。这是最大的危险。

现在是战争的时期，苏区的党与所有苏区的群众，都应该有战争的准备。我们要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而奋斗。

（十）同党内关于东北军问题的 错误倾向做斗争

关于东北军问题，在我们党内现在有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倾向。

一种倾向，以为东北军既然同我们联合，是我们的友军，那东北军同红军是没有区别的。这种倾向自然是错误的。因为东北军同红军有很大的基本上的与性质上的区别，红军是从中

国革命苏维埃革命中产生与壮大起来的革命军。而东北军则是有可能转变为抗日军队的可能的统治阶级的雇佣的军队（其他区别，不必多说）。

这种倾向的结果，必然使我们放弃争取东北军的战斗任务，放弃提高现在的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的任务，拿对付红军的态度去对付东北军，但这些同志在东北军表现不好时（这种不好的表现到处会遇到）就表示悲观失望，对于党争取东北军的策略就表示怀疑以至反对。

另一种倾向，因为到处看到东北军中的一些不好的表现，一开始就怀疑以至反对党争取东北军的策略。他们以为一切东北军同我们的联合行动，都是假的，都是为了要进攻苏区，达到他们消灭苏区的目的。这种倾向因东北军内部某些坏人的这种宣传而更加言之有据，这种倾向显然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根本否认了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极大可能，抹杀了东北军同红军合作的一切事实，结果也会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这两种倾向的错误的主要来源，即是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不看到事情的本质，而迷惑于一时一刻的现象。今天看到这部分东北军好，就说东北军同红军一样；明天看到那部分东北军表现不好，就说东北军根本要不得。这种朝三暮四的估计，使我们无法决定一个对于东北军的确定的方针，而始终摇摆不定。

在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我们来执行党对于东北军所采取一贯的坚定的方针。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林育英等庆祝红二、四方面军 胜利会师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

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各同志
转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

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之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中央及一方面军自去年北上与陕甘红军、鄂豫皖红军会合以来，首先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的“围剿”。在中央十二月政治决议案，及国际七次大会决议案的领导之下，组织了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渡河东征，占领了同蒲铁路，击溃了阎锡山的主力，推动了全国抗日反卖国贼运动的向前发展，唤醒了许多国民党军队同情于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第一方面军现在转向甘肃宁夏方面策应你们北上，又复连战皆捷，占领了定边县、盐池县、豫旺县、环县、宁条梁、曲子镇、洪德城、同心城等十余个大小城镇，消灭马鸿逵、马鸿宾的许多队伍，开辟了九个苏维埃县，夺取了出产丰富的盐区，

与长城外的蒙古民族及甘宁回族建立了良好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西北的政治环境是很好的，二、四方面军北上之后，我们就有更伟大的力量来进行西北各民族、各党派、各武装势力的大联合。目前全国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日本向华北大举进兵之后已经引起了与正在引起着中国内部许多重大的变化，平津沪粤各地如火如荼的抗日人民阵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大踏步的前进着，东三省境内的人民抗日联军是英勇的斗争着，两广当局抗日救国军的发动，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在广西是执行着联俄联共的政策，在各省已有许多反蒋势力正酝酿着继续的发动。蒋介石一贯的卖国政策，不但引起了全国的反对，而且把他自己系统里的势力，推进到动摇分化与缩小的道路上去了。各方面的特点都指出中国革命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了。在国际，苏联是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地位，他不但有力量防御外国的侵略者，并且能够广泛的援助世界上一切反对侵略的和平集团及一切弱小的国家与民族，苏联对于中国红军与人民抗日的集团是更加积极援助的。此外，法国人民阵线的伟大胜利，西班牙的革命胜利，欧洲反侵略阵线的扩大，英国和美国和平运动的增长，埃及、印度、阿拉伯民族斗争的展开，亚比西尼亚英勇战争的影响，中美洲与南美洲半殖民地各国革命运动的前进，主要侵略国家日本、德国、意大利各阶级营盘间的斗争与统治营盘内部间的斗争之极端的尖锐化，所有这些，指出世界革命形势，也是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上面去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与革命势力包括中国的共产党、红军、苏维埃与一切革命势力在内，通通都在共产国际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压迫剥削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之下而一天一天团结起来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联结起来了，革命在全中国全世界上的胜利是有了保障了。同志们：我们相信你们将更加激励你

们无尚热忱、勇敢与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全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为苏维埃红军的光荣旗帜而斗争，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斗争。我们是准备着庆祝你们北上抗日的伟大胜利。中国主力红军大会合万岁！西北革命大联合万岁！全中国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1]，彭德怀，王稼蔷^[2]，林彪，凯丰^[3]，罗迈^[4]，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罗瑞卿，张云逸，左权，聂云臻^[5]，朱瑞，邓小平，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王首道，周昆，袁国平，罗荣桓，陈赓，黄克诚，周士第，宋时轮，宋任穷，萧劲光，阎红彦，蔡树藩，王相传，冯文彬，郭洪涛，马明方，李富春，贾拓夫，朱理治，聂洪钧，蔡畅，邓颖超，刘群先，刘英，周兴，杨森，高岗，马锡武，崔田夫，贺晋年，张达志，霍维德，马义，刘英勇，钟赤兵，王达成，赖大超，马丕勋，刘子久，刘景范，史秀芸，白爱玉，崔田民，王世泰。及中国人民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国陕甘宁人民红军各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共产主义大学全体教职员学生，陕甘宁三省苏维埃政府、共产党部、青年团部、抗日人民团体、抗日赤卫军、抗日少先队联合致意。

七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 〔1〕 即秦邦宪。
- 〔2〕 即王稼祥。
- 〔3〕 即何克全。
- 〔4〕 即李维汉。
- 〔5〕 即聂荣臻。

毛泽东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和任务 给彭德怀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

德怀同志：

一、各电收到。宁马^①情况、红军情况、地方工作情况与西渡利害，大体已明白了。

二、二、四方面军业已开动，约七月半到松潘地区，八月初可出甘东南攻击王均、毛炳文。我方当派二十八军南下策应，尔后即转入陕南向河东行动，策应两广。

三、我野战军行动方针应依你的计划，七月以赤化现地为目标，八月以迫近河边求战为目标，九月以后依情况决定。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如须等候冰期，则十二月以前我军活动区域除灵武、金积外，自当展及固原、海原、靖远地区，将三边、靖远之间完全赤化。那时东北军当无理北进，甘宁之交当可巩固。

四、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可能。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局面当有变化，也许就在此时发动西北政府。我们方针力争此着。但即能如此，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不论为红军为东北军均须如此，不过彼时行动更有便利条件。

五、七月工作应以赤化、扩红、训练三件为中心。关于增加新兵之重要性，即是准备接受远方的赠品，因此连带问题要把队伍训得更整齐些。还有附带问题，即应注意征集大批骡马。新兵与骡马之数目，以准备负载步枪一万支，子弹三百万发为标准。再则西渡过冬衣服要多些，每人须准备棉衣、风衣，冬天是应该注意的。

六、为准备在二、四方面军北上后不久时间东北军能作政治军事上的发动（为策应西南甚宜早动），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部军师团三级。目前分工，甘肃境内完全由你任之，陕西境内周^[2]与我任之。办法：须派较得力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抗日”、“反蒋”、“联俄”、“联共”、“东北军本身问题”、“组织问题”等五六个根本而且具体的问题。现请先在前方征集干部（如邓小平、黄克诚等），经过你的训练，找得适当线索，派遣出去，往来于彼我之间。我们于若干天后或派克农、云逸^[3]二人来加强之。此事请大大注意。这边正动员剑英、克农、章伍^[4]三人向王、刘^[5]两部三师三旅十八个团分途突击，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至于上层及在东北军中建立党的基础，此间正在加力，并且大有希望。

七、此电不准告知下级，其中许多执行事项，统由你负责指挥之。

泽 东

一号二十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指马鸿逵。
- 〔2〕指周恩来。
- 〔3〕即李克农、张云逸。
- 〔4〕即叶剑英、边章伍。
- 〔5〕指王以哲、刘多荃。

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 关于抗日战争的新阶段和我们的 任务（讨论提纲）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

一、我们已经开始转入了一个新的革命阶段

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证明革命是已经开始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开始转入大规模抗日讨逆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

这一新阶段的标志是什么？

第一，是两广抗日军事行动的继续发展与扩大。两广现已进一步组织西南军事委员会（陈济棠为委员会委员长，李宗仁副）以与南京政府相对立，他们并组织了“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广东为第一集团军，广西为第四集团军，整个西南联军，以陈为总司令、李为副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并以前十九路将领翁照垣、张炎、区寿年等为第一、第二、第三师团的指挥。他们分四路出兵，主力向江西、福建，另二路向贵州、湖南出动。他们表示如卖国贼坚决拦阻，则不得不出于一战。这种抗日的军事发动，不仅限于两广。在福建，前人民政府首领陈铭枢、李济深等也组织抗日人民革命军，与两广联合行动。两广的发动，甚至影响了华北的部分军队，倾向于抗日。抗日的高潮，是蓬勃地怒发于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爱国的将士中。

第二个标志是抗日的群众运动的迅速发展。当日本大举增兵华北，逼迫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向南撤到石家庄、保定时，全国学生（特别是北平、天津、保定、上海、汉口、广州等城市）不顾如何严厉的白色恐怖，还是英勇的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华北许多学生并进到二十九军官兵中去宣传，将学生群众的抗日运动和白军官兵的抗日斗争联系起来。英勇的抗日斗争，不仅限于学生，而且发展于工农与商人的广大群众中。广州的商人随学生罢课也罢市五天。全国工农商学兵的群众抗日运动很快高涨起来了。

第三，新阶段的特别重要的标志，是我们红军的伟大胜利和西北抗日大联合的形成条件的逐渐成熟。我们红军在西征的一个较短的时期中，消灭了马鸿宾的主力三个团，而且严重的打击了马鸿逵的部队，缴获长枪二千支，无线电二架，俘获官兵三千以上，扩红八百余人，筹得抗日基金四万五千元以上，占领了宁条梁、定边花马池、环县、曲子镇、豫旺、豫旺堡、同心七营等重要城市，开辟了纵横七百余里的新抗日根据地。我们胜利的西征是依靠着老苏区，而不是放弃老苏区。我们胜利发展中的主力红军在将来形势有新的变更时，尽可以迅速移师向其他方向发展来取得更伟大的胜利。其次，我们的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已经完全会合，并且在创造西北大联合的任务之下，由西康进入了四川西北部。此外，福建红军张克武部最近占领大田、永春二城，声势浩大，陕南的红军也有了新的发展。可是我们的胜利，还不仅仅限于军事上的胜利。我们苏维埃红军的抗日影响，迅速的扩大，我们不仅深刻的影响了好些愿意抗日的白军，而且还影响了西北地域的蒙回等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我们的胜利，加速推进着西北抗日大联合的形成。

上述的这三个标志，都明白地证实中国革命是已开始转入

一个新的大规模抗日讨逆战争的阶段。

二、为什么我们一小部分苏区变为游击区？

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死亡，所以蒋介石除一面调集大军拦阻西南抗日外，更命令我们苏区周围的白军向抗日先锋的苏维埃和红军进攻。

但是在这些进攻的部队中，我们应当认清，蒋介石的嫡系只有两个师，其余有一大部分，是愿意联合红军抗日的。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脱离蒋介石的指挥，他们还不得不在蒋介石压迫下，向苏区前进。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是不是需要把正在胜利进攻中的主力红军从西线调到东北线上去呢？

不，不需要。为什么？因为：

1. 我们不应当把抗日红军的主力去和不久以后就可以成为我们抗日朋友的部队决战，使抗日的力量受到损失，使西北抗日大联合受到妨碍。我们不应当和他们决战，而应当努力争取他们来共同抗日。

2. 在敌人采用堡垒主义（东北线上）、粮食困难和蒋介石进攻主力不大的种种条件之下，我们地方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独立团等）和游击队，尽可以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来保卫苏区。我们红军主力在这种条件行动是不适当的。

3. 我们正可以大踏步的乘敌人的空虚，依靠老苏区，去发展更大的新苏区，而不应该将胜利进攻中的主力红军调回，去和敌人拼消耗。当然我们主力红军，在将来形势必要的时候，尽可以转向其他方向发展，在其他方面创造大规模的新苏区并恢复东线、北线上的老苏区。但是在目前，向西发展还是对于我们最为有利的办法。

因为这三个原因，所以我们陕北一小部分苏区（包括瓦窑堡）变成了游击区。

但是我们应当指出：一、白军所占有的只是一部分大道上的市镇村庄，其余大部分地方，还在我们的统治之下。二、就是白军所占有的少数市镇村庄，大部分也还是在那些愿意联合红军抗日的部队手里。他们目前虽还不可能公开的举起联合红军抗日的旗帜，但是已能相当保护抗日人民的利益。三、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游击战争，那么敌人所暂时占领的地区，不久就可以仍旧恢复成为苏区。保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保安正是我们用游击战争从敌人手里恢复过来的。

我们苏区被白军暂时占领的，只是部分县份的少数地方，但就这些地方，在将来西北抗日联合一经发动时，可以恢复为抗日根据地，而我们向西发展所得到的却有十几个县纵横七百多里的广大新苏区。我们有没有放弃陕北苏区呢？没有。我们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没有呢？没有，非但没有缩小，而且大规模的扩大了。我们是在胜利的前进，向西北抗日大联合的创立的大路上迈进。

三、使新都志丹成为创立西北抗日大联合的中心

因为敌情不明和指挥上的错误，我们没有能够消灭袭击瓦窑堡的敌人，但是我们是有序的退出，而且瓦窑堡现在已转到愿意联合红军抗日的部队手里，不久以后，仍旧可以变为抗日战争的据点的。

我们中央现在已经定都于志丹（即保安）县城。志丹县城在陕北与陕甘宁苏区之间，一方面，便于领导陕北的游击战争，同时又便于领导巩固陕甘宁新苏区的工作，此外还便于领

导争取抗日友军的工作。因此，志丹是我们很适当的新都。我们要用很大的力量凭指着老苏区，使志丹县成为创造西北大联合的中心，我们必须消灭一切零星团匪，解决群众切身问题，发展区乡党的组织，流通国币，使志丹县成为巩固的抗日的中心。

四、我们的工作任务

我们现在总的任务，是创造西北大联合，联合两广及其他抗日部队行动，来开展大规模的抗日讨逆的战争。

为着实现上述总的任务，我们具体的工作任务，依旧是党以前所提出来的。（一）在陕甘宁方面创造与巩固新苏区，使游击区迅速变成巩固的苏区。（二）在陕北坚持游击战争，保卫老苏区。（三）加紧争取抗日的友军。

为着完成这三大任务，我们目前特别要注意。

第一，细心的详细的向每一干部，每一红色战士与游击队员，以至每个群众，解释目前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使他们齐心协力有信心的有把握的完成自己工作任务。

第二，反革命必然要利用形势的发展中的变化来造出种种谣言，说什么“红军打败了”、“陕北苏区不要了”、“革命没有希望了”，来欺骗群众，破坏革命工作。我们必须以革命发展的铁的事实，来粉碎反革命的欺骗造谣，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大度的提高每一革命群众的积极性。

第三，我们加速完成上述三大任务，也就使我们能够更快的进到西北大联合的大局面。所以我们的工作速度必须大大加强起来，我们完成每一工作的期限，应当尽量缩短。

第四，我们必须克服一小部分干部及群众中所发生某些恐

慌失望的错误观点。这是因为他们只看到敌人所占的某些地方的情形，而没有看到整个苏区以至全中国的抗日战争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应当用耐心的说服方法，来教育这些错误的同志，使他们也能够坚决在党的领导之下，不屈不挠地克服一切困难（如粮食、财政、经济的比较困难），克服狭隘的家乡观念，来努力完成自己所负担的工作任务。

五、我们的口号

创造西北抗日大联合，进行对日战争！

反对日本大举增兵占领华北！

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

红军与白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誓死收回东北与华北失地！

反对蒋介石挑起内战，拦阻抗日！

反对卖国贼蒋介石捣乱抗日后方！

坚持游击战争，保卫抗日根据地！

创造与扩大陕甘宁苏区！

庆祝红军胜利，全苏区人民武装起来，加入红军游击队去！

各级党部：你们接到这一提纲后，必须详细讨论，发动每一党员向群众及武装部队进行深入的明白的解释。

西北中央局宣传部

七月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毛泽东关于外交问题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斯诺问：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是什么？

毛泽东答：在讨论政策问题时，我必须请你经常记住，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苏维埃的对外政策肯定受到这一斗争的制约。日本军阀想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奴隶。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斗争——这些主要任务是我们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不能忘掉的。

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

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 这个谈话原载美国《美亚》杂志一九三七年八月号。

我们期望于外国的是什么呢？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问：苏维埃政府如何区别友好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

答：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一般说来，我们看到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其次是一些长期处于侵略成性的强国威胁之下的国家和较小的民族、自治领、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胁。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至于奉行和平方针、无意于征服或剥削任何国家的苏联，自然是我们的好朋友。

因此，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

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中，凡是愿意参加这个共同战线的，都将作为友好国家受到我们的欢迎，不管它在促使这条共同战线成为反对侵略者的有效武器方面能作出多大贡献。

只有当南京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并同人民革命联合起来组织民主的国防政府时，只有到那时，这种援助才能对中华民族真正有益。援助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1）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信贷和借款，出售军需品和飞机；或（2）在抗战实际开始时对日本进行封锁。如果美国和英国能够提供这样的援助，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

问：苏维埃政府是否承认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

条约？如果承认，是哪些条约？

答：日本事实上已在破坏这些条约。他们通过对东北的军事占领，在华北走私，以及各种非法活动，正在逐步破坏这些条约。尤其在东北，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丧失其条约地位，正常的商务和外贸正在被日本破坏。因此，如果其他国家想同中国保持和平的通商关系，就必须制止日本，因为它们目前尚保有的贸易权利主要是受到了日本的威胁。

别国政府可能要问：“你们对于我们同以前的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明确的。什么更为迫切？是修改条约，还是民族救亡？显然，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抗日，因此苏维埃政府和中国人民将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这个任务上。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假如苏维埃政府打败日本，收复中国失去的省份，重新建立中国的主权，到那时它对类如治外法权这样的问题将采取什么态度？”

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到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中国人民政府而苏维埃是其一部分的话，我们将力主根据这些国家战时的表现来制订政策。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积极协助过日本的那些国家当然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例如，已同伪满洲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德国，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国家。

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

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

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对于日本，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但是同其他国家，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包括像何梅协定、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

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我们共产党人不赞成任何可能使中国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国际地位的步骤。

问：你们的政府是否承认外国在中国的财产权，也就是说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如不全部承认，那末哪些类别的外国投资将得到承认，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够在中国经营？

答：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

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

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或农业，救济灾荒等等的借款。

问：关于（甲）外国政治权利和（乙）外国投资，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同国民党的政策有什么基本不同？

答：国民党将其外债主要用于进行军阀内战或打红军，或者把钱浪费在其他愚蠢的行动上。它的借款给中国的政治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

问：苏维埃对外国传教士的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将承认他们的财产权？他们是否将继续享有传教、教书、拥有土地、办学校和其他事业的权利？

答：是的。但这不包括日本传教士。

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国政府和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

答：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许多美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证明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正同情。我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对“中国人民之友”的慷慨

援助和支持特别表示感谢。

但是也有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

答：我们对英国人民的态度同对美国人民的态度差不多。英国人民中也有类似“中国人民之友”的社团。我们尊敬并欢迎这种真正同情中国人民的英国朋友。

十分清楚，英国政治家中有一派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英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实际上使得日本占领中国领土成为可能，即使它在事实上没有鼓励日本这样做。英国政府似乎要采取新的策略，但看来它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在世界的这一部分贯彻它的信念。英国如继续动摇并像过去那样采取观望政策，如继续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将对英国毫无好处。日本帝国主义的面目已经一清二楚。对英国来说，它不是一张友善的面孔，而是破坏的形象。

问：很多人认为中国如果苏维埃化，苏维埃中国将受到苏联的支配，其内外政策将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

答：大家都知道，法西斯宣传中包含的真实性是如此之微小，肉眼几乎无法看到。当墨索里尼要征服阿比西尼亚时，他宣称他在解放非洲的奴隶。当希特勒在欧洲发动侵略时，他对德国人民说光荣胜于面包，对欧洲人民则说他是一个和平爱好

者。日本军阀在吞并东北时也说，他们是在解放中国人民。

现在，如你所说，法西斯分子正在叫嚣“莫斯科控制中国”。如果这一切都属实，那末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H. G. Wells）^{〔1〕}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

不管法西斯宣传多么愚蠢，少数人还是受了骗。因此有必要指出其根本的虚假性。由于中国现在谋求同苏联订立一个条约，法西斯分子就断言俄国企图“收买”中国。如果这样，那法国早已是莫斯科的一块殖民地了——欧洲其他几个同苏联签订条约的国家也都如此了。

事实上，法西斯分子的这个“逻辑”表明了他们自己要建立世界帝国的欲望——就像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行动，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行动等等。他们不能设想两国人民之间除了一个要吞掉另一个之外还有任何其他接触的基础。希特勒在欧洲某些部分的行动，日本在东亚的行动，意大利在非洲和西班牙的行动——其中的每一个行动，可以说都不仅是法西斯控制的威胁而且是确确实实的“法西斯控制”。但在这些地区和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都没有看到“莫斯科控制”的任何迹象。

可是，历史的发展毕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将能够把俄国人民当作真正的兄弟来欢迎，正如他们能把其他国家的自由人民当作同自己真正平等的人来欢迎一样。中国人民不仅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并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法西斯国家。

日本人现在叫嚷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就是共产党。但全体中国人民，除极少数卖国贼之外，都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中国人民看来，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抗日，意味着民族解放斗争，那末大多数中国人民就不怕这样的

共产主义，只有在汉奸卖国贼的恶梦里才存在所谓的“赤色威胁”。相反，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

假如你认为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民是个“威胁”，你就去找一位日本将领，问问他的意见。他将告诉你，共产主义在中国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自由和民族主权，这正是他所以要求同南京缔结条约来反对它的原因。但是，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这个，中国人民所要的就正是这个。中国人民不怕这样的运动，因为这恰恰是他们所要求的。他们将高呼：“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万岁！一个自由、团结、自主和完整的中国万岁！”

斯大林在同一个美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革命不能输出。”同样正确的是，革命也不能输入。中国人民为了生存，自然要采用反对日本的最好办法。

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定或在苏联的宪法中，我们找不出苏联统治苏维埃中国的任何规定。这样的事在共产主义的全部历史中当然也从未讨论过。但是，我们不用到远处去找，就在我们的邻国法西斯日本，就能看到对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十分具体的计划。

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可以知道，苏联以完全平等和真诚的态度帮助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我们知道，它不企图从任何其他国家取得一寸领土或一个人。

问：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张同外国组成一个反帝、反法西斯联盟，中国是否可能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这样的联盟？

答：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中国若与苏联缔结条约，那必然是因为法西斯日本既是中国也是苏联的敌人。“共同保卫和平”是现有法苏条约的根本基础。它也可以成为类似的太平洋各国抗日条

约的基础。

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

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完全殖民地化，还是抵抗侵略者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将非常之多，因为中国将获得自由，中国人民将成为独立的人民，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这样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将是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对这样一个中国的影响漠然置之。

但是，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着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和文化遭到毁灭的威胁，将是一长串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

必须作出抉择。中国人民自己将走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将同我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迈进，而不要走帝国主义血腥历史铺设的黑暗小道。

因而，在这个基础上，你听到我们苏维埃中国的人民在高呼：“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我们相信这种联合实际上可以实现，因为我们找不到正当的理由认为它不符合太平洋地区一切真诚要求和平和互相友好的文明人类的心愿。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 威尔斯，英国作家。早期写过一些科学幻想小说，如《时间机器》、《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

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刘 少 奇

在我党北方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这几乎已是北方我党工作的主要障碍。不肃清与改变这种空谈主义，我党的组织和工作是不会活跃起来、开展起来的。

但我着重地指出，空谈主义不存在于支部中，不存在于那些正在公开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与汉奸斗争的同志中，而严重地存在于我党高级和中级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中。我所指的，是这些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的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谈的领导方式。因此，我特别要求各省、县、市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提高自己的警觉，特别虚心地检查自己的工作方式与领导方式。在这里，我们不能容许用“空谈主义”去责骂支部与担负群众工作的同志。

我看过同志们写的一些带指示性质的文章、信件、工作报告、政治报告等，这些东西是特别长、重复、乏味，而内容非常空泛与不清楚。指示与文件的公式化、刻板化，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没有改正过来。或者是为着要“具体”，而把一切细小的事情毫无组织与中心地堆积起来；或者是为着“不脱离总的形势”而泛论全世界、全中国各方面的形势，玩弄许多政治名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火线》第五十八期。

词，傲慢地咒骂一切。我常用极大的忍耐看完一篇东西，但我还不能了解这篇东西到底是说的什么问题。如果用这些东西去指导工作与教育同志，那是只能得到极坏的结果的。

在京东与保属的干部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些干部不相信他们那样的工作情形可以把事情做好。然而我们的领导同志除开翻来复去地骂这些同志是“机会主义”之外，什么也说不出。来。“机会主义”骂过了，已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而新的问题又要发生。

我们说要反对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然而在许多地方这又成为佛经中的“阿弥陀佛”，把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诚心念它千遍之后，自己还没有懂得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在他那里是否也有这种东西。

常常一件活生生的事情，一个活泼泼的问题，一到这些空谈家的手里和嘴里，就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东西。本来是很活泼有生气的同志，一经过这些空谈家的责骂和搬弄之后，就变成了像失掉灵魂和前途的人一样。

同志们！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要求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同志们绝不要空谈。你们应该客观些、细心些、诚实些，有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懂得，你们就说懂，不懂得，你们不要说懂。你们应该特别虚心学习，把你们还没有把握没有了解清楚的问题，用各种方法去弄清楚。不要在你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导别人。与其对下面指导错了，不如少去指导还好。

我提议对下面除非有完全的必要，应少采取指示与命令的方式，多采用提议、建议与讨论的方式。绝对的东西应该少一些，多留一些回旋的余地。少去责骂下面，多去帮助下。尤其随便宣布下面或某些同志为机会主义，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

的。如果下面对于某些问题不了解或了解有错误，你们的任务是指正与帮助下面了解。如果下面对某些问题未注意或注意不够，你们的任务是提起他们的注意。在这里，板起教师的面孔责骂是用不着的，没有好处的。

目前我们的总任务，是准备大规模的抗日反汉奸的战争，而实现这个总任务的总策略是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详细分析了目前世界与中国的形势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我们每一个同志就应该把这些详细地研究清楚。但当我们研究清楚之后，如果形势没有重大的新的变动，我们就不要在一切文件上，在各种说话中，千遍重复地来分析世界与中国的形势（现在是天天在一切事情上都分析形势，但又很少有同志真正来研究一次形势），也不要拿着“准备抗战”与“统一战线”在口头上当作“圣经”来念，而是要我们各地的同志根据各地方、各工厂、各学校、各农村、各兵营的具体特殊环境，进行当时当地的准备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工作。总任务与总策略是一个，但一到实际工作上，各地方各部分就各有不同。我们的同志就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去决定在这个工厂、这个农村，在今天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样做法？这些做好了，明天又做什么？我们的同志如能这样去做工作，就不会不实际。

有些农村的农民还不了解民族危机的严重，他们还斤斤于自己日常的经济要求。如果我们的同志忽视这个特殊情形，到这个农村去号召农民来举行反日游行与组织救国会，那就会成为空谈。但在平津学生中这个号召就不是空谈了。实际工作总是根据各地方的特殊情形来决定的。忽视与离开各地特殊情形，一切好的决议都要变成空谈。但我们反对农村“特殊论”，因为“特殊论”认为农村根本不能有反日运动。如果农民对于

日常经济要求有兴趣，我们就领导经济斗争，同时我们向农民解释目前的民族危机，经过农民的经济斗争，是可以引导农民走上民族斗争的。经济斗争与民族斗争不会是矛盾的。

我们的同志还要严重地注意工作从哪里下手？从何处开始？这也是根据各工厂、学校或农村的特殊条件与同志的能力来决定的。这里可以从办报纸开始，那里可以从组织研究会下手；这里是发动经济斗争，那里甚至只能从找人谈话、介绍书报开始。然而只要我们能确实地走了第一步，我们就可能去走第二步；切实地抓住了第一个环子，就可以过渡到另一个环子。

各地方的领导干部还要特别注意那些中心支部、中心的群众团体和有能力、有信仰、有发展前途的个别同志，给他们以更多的帮助和训练，爱护与提拔他们，这样才能依靠这些支部、这些团体、这些同志使工作开展起来。

我还要求我们的同志用一番功夫去研究党的决议和文件，去把目前的形势和党的策略任务详细研究清楚，这也是使我们的工作进入实际的第一步。我们并不需要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我们需要同志们真切了解党的策略任务，并会拿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运用。我常奇怪，为什么新的决议与策略到北方来丝毫没有引起同志的争论与怀疑，但这不能证明在同志中就没有问题。实际上我看到满纸拥护新策略并用新策略去骂别人的文章，却对于新策略没有任何真切的了解。很明白，这些同志是用官僚主义与空谈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决议。我们不反对而且欢迎同志们对于党的文件和决议在某种程度上的争论，及提出疑问，要求解释等。对于实际工作的争论更是容许的。只要不把这种争论又变成空谈，对于党的工作是有益处的。

为着要使我们的工作开展和进步，我们不能不反对空谈。

然而我们又不要用空谈来反对空谈，用空谈的八股文章来反对空谈。而是要我们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洞的领导方式，要我们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了解环境，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

(一) 哥老会是中国许多秘密结社(如青红帮、礼门、三合会、红枪会等)中之一,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不满意当时统治的知识分子(如明末遗老、清时不得志的文人、富有民族思想与急公好义的有志之士)与所谓“下层社会”结合起来的非法的群众组织。这些下层社会的分子大都是农民、手工业者、士兵与游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是最受压迫与剥削的阶级与阶层。

(二) 在哥老会代表民族利益与群众利益(如主张兴汉灭满、打富济贫、反对贪官污吏等),举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时,他们常常尽着革命的作用。但他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动的色彩。因此他又时常为反革命的野心家与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而成为反革命的工具。这是他们得不到无产阶级领导时,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三) 目前我们对于哥老会策略是在争取哥老会。这一策略的决定,是由于以下的几个出发点:(甲)根据人民统一战线的原则,哥老会是有群众的,是可以参加抗日反卖国贼的一种群众力量。(乙)苏维埃是一切被压迫与被剥削的人民的出路与救星。凡属在国民党统治下非法的群众团体,苏维埃负有招待与保护的责任。(丙)使全中国秘密结社中的广大群众同

情与拥护苏维埃，为苏维埃的胜利而斗争。

（四）争取哥老会的策略应该依照下列方针：（甲）推动与吸引他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来。（乙）在哥老会中发扬哥老会的革命传统，逐渐消除哥老会中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动的思想与成分，使之适合于社会的与革命的发展趋势。（丙）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内公开存在，并招待与起用在国民党区域内一切被压迫的江湖好汉、英雄豪杰之士。

（五）在实际工作中，除一般的对哥老会首领与群众进行宣传与鼓动工作外，必须：（甲）注意物色与哥老会有关系的人物，最好是从前曾经参加过哥老会的同志或革命群众，首先同哥老会中的龙头大爷，特别是豪杰尚义之士，进行统一战线的谈判，并传达苏维埃对于哥老会的态度。（乙）鼓励与帮助哥老会中进步的优秀的分子，利用开山堂等方法，取得某一地区的哥老会的领导权，使他们担负起转变哥老会为革命的群众组织与领导群众参加革命的任务，吸收其中最可靠的分子加入共产党。（丙）选择干练的同志直接加入哥老会，去从内部进行工作，使哥老会转变为革命的群众组织，或争取其中广大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特别注意于这一工作同白区白军工作与利用公开活动的联系。（丁）对哥老会中有威望的龙头大爷以及一切旧道德、旧习惯或宗教仪式，应采取慎重的与耐心的态度，在工作过程中逐渐的使之改良进步。

（六）在苏维埃政权下，哥老会弟兄都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分得了土地、粮食、牲畜、房屋，解除了破产失业的痛苦，取消了一切政治上的压迫，哥老会的弟兄大多数都加入了苏区内各种革命的团体，因此像过去那样的哥老会也自然消失了他存在的基础，因此，也没有必要再从各方面集合哥老会的会员，成立哥老会的单独组织。在苏区哥老会最有利的组织

方式，是苏维埃政府下的哥老会招待所。它招待国民党区域的英雄好汉与在苏区内的龙头大爷，特别注意吸收过去没有职业的哥老会弟兄会员参加生产、成家立业，或根据于他们自己的志愿，分配他们在苏区革命团体中或到白区白军中去，进行革命工作，这样给他们以生活的保障与工作的出路。在必要时，苏维埃政府更应帮助（物质的帮助，出“公事”，派人指导等）哥老会中的进步分子开山堂。广招哥老会的“十辈弟兄”、“同路好汉”，使之在：（甲）抗日反卖国贼（乙）反对苛捐什税（丙）打富济贫（丁）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之下团结起来。今后更有计划的分配他们到白区白军中工作以加强国民党区域内哥老会的革命力量。

（七）对哥老会中的“混水”（又称“混水光棍”），即土匪流氓、鸡鸣狗盗之流，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应该反对过去统治阶级的传统观念，认为他们是“社会的蠹贼、人群的败类，人人得而诛之”。这类人是现社会制度之下的必然产物。他们在经济上是破产失业、走投无路，在政治上则完全处于最受压迫的地位。他们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不能不“逼上梁山”、“铤而走险”，这种偷窃掠夺的行为，当然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现社会统治阶级的罪恶与得不到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所致。其中一部分长久脱离生产的分子，就是在苏维埃政权下也不是立即可以改变他们的思想与习惯的。这必然要求一个耐心的教养时期。

（八）因为哥老会思想上组织上的弱点，往往易为其中反革命野心家及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这是哥老会历来不能成就大事的主要原因，也是哥老会中明达之士所引为痛心疾首而即想改革的。依照哥老会信条上说来，这种“卖友求荣”的勾当，轻则要“三刀六洞”，重则要处死刑的。在哥老会内部应

该提高对于这类反革命野心家与军阀官僚的愤恨，开展反对他们的斗争。特别对于那些甘受帝国主义卖国贼利用，破坏抗日战线，进攻苏区的分子，必须坚决的铲除之。这不仅是哥老会中的败类，而且是革命的罪人。但在这种斗争中，应该采取适当的方法与步骤，揭破一切他们的欺骗宣传，以达到争取在他们影响下的群众。在苏区内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的哥老会分子均应按照苏维埃法律处理，哥老会不得私用肉刑或死刑来对付自己的会员。在苏维埃法律前面，不论是哥老会的弟兄也好，不论是共产党党员也好，都是一律平等的。

（九）西北地区是哥老会组织比较普遍的地区。因此在创造西北大联合中，党必须特别严重的提出争取哥老会的问题。党必须教育自己的同志清楚的了解我们对于哥老会的这一策略，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之。对于那些过去是哥老会弟兄，现在是党员，或红色指战员或苏维埃与群众团体工作人员中所可能保存着的某些哥老会的落后思想与习惯的残余，我们应在加强政治教育中，及提倡亲密的同志的友爱与团结中消除之。只有为了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坚决斗争，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与全中国一切被压迫的与被剥削的人民大众！

（七月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毛泽东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

斯诺问：如果日本被打败，并被赶出中国，你是否认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大体上在中国得到了解决？

毛泽东答：是的。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那样行动，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这将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了，已经动员起来，并已取得了独立。因此，帝国主义的主要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

问：中国苏维埃政府发表了许多呼吁和宣言，主张建立一个由各党各派和各方面的军队等等组成的统一战线，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誓死斗争，把日本军队从中国赶出去。它是否相信中国目前能单独打败日本——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外国支援的条件下打败日本？

答：让我先提醒你，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国家，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有它潜在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中国想要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但是，这并非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战争。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有了同外国的联盟才能开始抗日。

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的斗

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在一九二七年以来反革命发动的长期内战中，中国人民早已对这股力量有了很多认识，并且找到了一个依靠共产党来领导它斗争的好办法。中国人民大众在其长期的政治经验中，已经掌握了反对敌人的非常有效的武器。

今天，特别是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来，卖国贼的欺骗宣传已经破产了，已经没有什么人会上他们的当了。人民群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是谁代表他们的真正利益，连某些国民党党员都已经参加或是打算参加抗日运动了。

我们深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我们深信他们会把他们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投到抗日的战场上去的，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对付侵略者的挑战。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地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因为日本是一个充分武装的强国，而且还会有它的盟国。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

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而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

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如果发生中日战争，你认为日本会发生革命吗？

答：日本人民的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问：你认为苏俄与外蒙会卷入这场战争并支援中国吗？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这样？

答：当然，苏联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

一旦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开始抗战，并且愿意与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建立友好同盟，我们相信，苏联将会站在与我们握手的国家的前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作为世界一部分的苏联和英美一样，是无法继续保持中立的。

问：中国的迫切任务是从日本手中收复所有的失地呢，还是仅仅把日本从华北与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上赶出去？

答：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至于内蒙，那是汉族与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区，我们要努力把日本从内蒙赶出去，帮助内蒙建立自治。当我们光复中国的失地之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我们将对他们的独立斗争提供热情的援助。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在实际行动中，共产党政府和红军怎么能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抗日呢？就是说，在一场对外战争中，必须将所有的中国军队置于统一的指挥之下。如果红军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中享有代表权，红军同意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和政治决定吗？

答：是的。只要这样一个委员会是真正抗日的，我们的政府将衷心服从它的决定。

问：红军是否同意除非得到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同意或命令，不把它的部队开进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也不调动它的部队指向这些地区？

答：是的。我们当然不会把我们的军队开进抗日军队占领的任何地区去——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也没有这样做过。红军是不会采取机会主义的办法来利用任何战争局势的。

问：作为这种合作的报答，共产党会提出什么要求呢？

答：共产党会坚持要求对日本的侵略展开决定性的、最后的抗战。此外，它还会要求实施我们在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国防政府的呼吁中所提出的主张。

问：为了进行抗日战争，红军需要多大的基地，需要外界的多少支援？

答：不论基地大小，红军都能进行战争。但是，基地越大，它能动员的抗日力量自然也就越强大。如果我们有三四个省，我们就能把一支比南京的全部兵力还要大、还更有效率的抗日队伍投入到战争中去。至于外援，我们非常需要，

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即使没有任何外援，我们也能对付得很好。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年的革命斗争了。

问：怎样才能最好地武装、组织和训练人民，使他们参加到这样一场战争中来呢？

答：人民必须享有组织与武装自己的权利。在北平、上海和其他地方，尽管有严厉的镇压，学生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并使自己在政治上有了准备。但学生与革命的抗日群众仍然没有自由，不能得到动员、训练和武装。如果情况与此相反，人民群众能享有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自由，那末他们的力量将能成百倍地增长，国家的真正力量将显示出来。

红军通过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中赢得了自由，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

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得与我们并无冲突的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站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将是：“团结起来，反对

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军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为着使苏维埃真正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必须使苏维埃现行各种政策具有明确的人民性质与深刻的民族性质。土地政策在苏维埃各种政策中，至今占着主要的地位。实现土地革命的意义，不但是给占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解除封建的剥削，而且同时就是推动这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强大民族革命力量。自去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苏维埃在土地政策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改变（如富农政策、小地主政策、分析阶级及一些特殊问题的决定等等），这种改变已经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在苏区里面已经收得实际的成效。但是，为要使土地政策的实施能够实现清算封建残余与尽可能的建立广大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需要进一步的审查现施土地政策，并给以必要的改变。

因此，中央对这个问题有如下的决定：

(一) 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等全部没收。

(二) 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地主耕种份地之数量与质量，由当地农民群众多数的意见决定之。

(三) 对于下列各种小业主的土地，不应没收：

(甲) 自由职业者、技术人员、教员、医生、学生、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等小业主的土地；

(乙) 凭自己劳动所得积蓄起来的工人所有土地；

(丙) 生活情况很坏的小地主；

(丁) 原非地主因失去劳动力而不得不出租土地的；

(戊) 将土地出租而自己仍受雇于人的。

右列各项小业主如有为汉奸卖国贼者，照汉奸卖国贼处置。

(四) 一切抗日军人及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

(五) 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等），均不没收。如果在基本农民要求之下，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土地也当拿出一块平分，但富农应照一般平分条件得到土地（即与一般农民得到同等土地）。

(六) 对于大农业企业主（主要的不依靠地租剥削而依靠大量雇农经营土地或畜牧的业主）的土地，因其生产方式带有进步的色彩，应按照对待富农的政策办理。

大农业企业主的土地、牲口、粮食等，如多数农民群众要求平时分时，应拿出平分之。

(七) 商人兼大地主时，其土地部分照一般地主办理，但不得侵犯他的商业部分。

(八) 对高利贷宣布取消。由苏维埃政府颁布新的借贷条例，限制苏区人民借贷利率。但商业借贷及劳动人民相互间的借贷，不在取消之列。

(九) 苏区内允许土地出租，但无论何种出租土地的业主，均须废除旧时残酷的和奴役的出租办法，一律遵守苏维埃政府所颁布的土地出租条例，无有例外。

（十）应改善农村工人生活条件，由苏维埃政府制定专门的农业雇佣条例通行之。

右列各项决定，在新开创的苏区中立即执行。老苏区已经分配土地的，照原办法不变更。实行这些决定的各种具体条例及其细则，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另行规定颁发之。

中 央
七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毛泽东等关于我军应继续执行三大战略任务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德怀同志并转左聂朱，徐程王，宋宋，萧，李^[1]，刘晓：

关于野战军的任务问题。

甲、两个月来西方野战军以其坚决机动的指挥与英勇牺牲的战斗，完成了在西方创造根据地的任务。东方的游击战争是坚决的持久着，南方的统一战线是发展了。中央与军委三大战斗任务^[2]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要求。

乙、目前情况是蒋介石压迫西北各派军队，为了阻止我野战军的发展，为了阻止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合，为了摧残苏区，指挥何柱国、马鸿逵、杨虎臣等对于我野战军、陕甘宁及陕北的进攻，并部署王均、毛炳文对二、四方面军的拦阻。

丙、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执行三大任务，争取三个任务在第二阶段上的胜利。在西方是打破马、何进攻，极力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在沈克、何柱国、马鸿逵三个集团中进行统一战线，并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到比较其他任务在政治比重上更加高的地位，虽然打破进攻是野战军目前中心任务。在东方亦是把争取汤、陈、二高^[3]加入统一战线作为第一任务，同时继续游击战争的坚持，以保老苏区。在南方最主要的是发展统一战线于杨王刘^[4]各部中。综合这些任务，在第二个阶段上完成，

就能使我们更有力量地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与完全会合，更有力量去造成西北大联合与打通苏联，使得我们有一切优良条件去准备打破蒋介石在两广问题结束后可能增加兵力到西北的阴谋，与争取迅速对日作战。

丁、野战军在集中时期宜注意如下六点：

- (1) 检查统一战线的成绩。
 - (2) 检查扩大红军与训练红军的成績。
 - (3) 检查干部教育的成績。
 - (4) 检查创造根据地的成績。
 - (5) 进行积极的训练。
 - (6) 完成对马、何作战的一切准备。
- (传达至团一级)

毛 周 彭 杨^[5]

七月二十七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左权、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宋时轮、宋任穷，萧劲光，李富春。

〔2〕东征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在陕西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东征战役作出总结，并布置西征战役。当时中央赋予红军第一方面军和陕甘苏区的三项战略任务是：向西面进攻，以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并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打通同红军第四方面军和红军第二、第六军团的联系；东面坚持游击战争；南面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

〔3〕指汤恩伯、陈诚、高桂滋、高双成。

〔4〕指王以哲、刘多荃。

〔5〕指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

左权等关于回民工作给 毛泽东等的报告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

毛周杨转中央并告徐程王富^{〔1〕}：

一、回民工作应以民族自决为基本原则。因为：

(甲) 回民是中国比较大、而且最团结的一个少数民族。

(乙) 不把回民首先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统治之下分离出来，争取最大多数回民到抗日战线上是不可能的。

(丙) 民族自决，可以吸引更多的回民、甚至部分上层分子，参加反日、反军阀的斗争。

二、甘宁一带，回民的经济条件与汉人一样，所以斗争的基本内容应是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民族自决是不冲突，而且是不可分离的任务。但因：

(甲) 今天回民中的民族和宗教意识还超过阶级觉悟。

(乙) 回民上层分子和宗教首领在回民中有很大的威信。

(丙) 回民要求打土豪，但仍表示不愿打自己不痛恨的土豪。

(丁) 回民上层分子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反对几马^{〔2〕}的力量，而几马最近在拼命团结回民，对付我们。我们在策略上不应树立更多的敌人，增加发展中的困难，而应该使几马孤立。所以，我们执行土地革命的方式不应与汉人一样，应该比较慎

重。开始以打反动、打日奸名义来没收回民最痛恨的土豪，对回民基本群众以采取发动，而且必须发动回民来执行。斗争的深入，必然是走上彻底土地革命。这一过程是很短的，但是必须经过的。

三、主张回民：

（甲）政权是人民革命政府，回汉什居处，组织回汉人民革命联合政府。

（乙）组织回民人民革命军，以现有之回民游击队为基础，同时扩大回民当红军。

（丙）不组织回民人民党，只组织共产党，因其任务为土地革命。

四、在工作上认为：

（甲）回民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同时进行，团结反马的力量。

（乙）加紧创造回民干部，这对回民工作有决定意义。

（丙）采取各种方法巩固回汉团结。

左 聂 朱 邓⁽³⁾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的
《左权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指周恩来、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王稼祥、李富春。

〔2〕指马麟、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

〔3〕指聂荣臻、朱瑞、邓小平。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苏区 群众组织的几个决定

(一九三六年八月四日)

苏维埃与红军正为着抗日事业而积极奋斗，苏维埃与红军是团结全国人民抗日的中心，苏区群众组织应适合于团结抗日人民、巩固苏维埃红军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苏区中有些群众组织的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加以改变，但必须符合于下面的原则。

(一) 估计到中农群众在以往土地革命斗争中，表现了积极和坚决的作用，证明了他们能够与无产阶级结成巩固的同盟，估计到以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中农将同样积极参加，应当使中农与贫农和农村工人的关系更加比前密切。因此决定：

1. 在以后发展的汉人区域中，开始可以组织贫农中农农村工人参加而富农除外的农民会（没有上层独立系统）。这种农民会应帮助革命委员会工作，使革命委员会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并顺利的转变为苏维埃政权。当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时，应依据苏维埃巩固的程度使农民会逐渐起贫农团的作用，即成为苏维埃在乡村实际生活的助手，并依据贫农团工作条例工作。

2. 在现在的新区之中，有农民会或农协组织而同时又有革命委员会组织的地区，依上项规定办理。在已有政权组织而

没有农民会或农协或贫农团的地方，则可组织农民会。

3. 在已有贫农团组织的地区，不需改变为农民会，可以吸收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加入，以更加巩固与中农的联盟。

4. 工会在农民会或贫农团中需要比以前更能起组织领导作用。

（二）关于苏区妇女的组织，应当依据中央组织局去年十二月的决定，不仅要包括一切女工农妇，而且凡是愿意参加土地革命或愿意参加反帝的妇女，都应该吸收到妇女组织之中来。

在组织方式上，不必采取一律的办法。在农村中，妇女代表会是一种最民主的组织，而且在老苏区中已经证明这是很有成效的组织方式，因此，在农村中仍有采用妇女代表会的方式。至于妇女代表会的组织方法，在地广人稀的地区里，可以为着工作的便利，给以适当的修改。

在比较大的城市中（如定边、盐池这类的城市）可以组织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或各界妇女联合会，党要在其中起领导作用。

许多地方党的委员会，至今对于妇女工作未能给以充分的注意。必须了解妇女工作的转变，决不是只依靠于组织形式的部分的改变，而主要的是要各级党委员会对妇女工作有更充分的注意。

（三）在苏区之中，群众抗日救国的活动和组织需要采取最广泛最民主的形式，因此，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应改变成代表会议的形式，一般的不需要有系统的组织与常驻机关。

1. 在乡与村，必要时召集全乡或全村群众大会，吸收全体居民参加，区在必要时召集由村或乡群众大会选出的代表会议。乡村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都是不定期的临时性质的，为着

抗日运动的一定的需要才召集（如为着传达白区抗日斗争的重大消息，某种民族性的抗日动员与抗日纪念等）。这些会议都经过当地党组织的宣传部门来领导。

2. 在比较大的城市（如定边、盐池等）中，组织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同样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之下进行工作。

3. 经过党中央和省委的决定，可以召集西北抗日救国代表会或省的抗日救国代表会，这种代表会议，必须多方邀请白区代表参加。

4. 西北抗日救国会的组织仍然存在，并可设立常驻机关。它的活动方向主要的是号召影响与联络白区的抗日运动。各边区党的白区工作部要多用西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去进行白区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并可以指定一人为西北抗日救国会代表。在工作开展的边区，可以设立西北抗日救国会的招待处或办事处。

（四）关于抗日赤卫军的组织应依据如下的决定：

赤卫军是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它的作用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武装自卫队。加入赤卫军的必须是工人、基本农民群众和一切苏维埃的公民，富农不应吸收到赤卫军中来（取得苏维埃公民资格的是例外）。小脚妇女或过于老弱的人，不要加入赤卫军。

赤卫军的名称不必机械的一致，按各个地区群众斗争的情形决定，但其组织的原则和内容，必须与赤卫军相符合，并且必须保证其在军事部指挥和领导之下。

所有群众中的武器，刀、矛、土枪、土炮和梭镖等，首先用来武装赤卫军。

（五）革命互济会的组织和工作必须加强起来，以适应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需要。在已有互济会组织的地区，须从新加

以整理，使之活跃起来；在没有组织的地方，应当着重组织。互济会的组织和工作，应依照中央四月九日决定执行。此决定在《党的工作》上从新发布。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北方局工作 给刘少奇等的指示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

胡服暨省委诸同志：

王^①同志等来，使我们知道了许多北方的情形。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主要的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表现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企图建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的成绩。表现在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因为没有得着你们书面的报告，材料尚不充分，对你们不能有确定的具体的指示，现在只能把我们所感觉的几个问题提出，作为你们指导工作的参考：

(一) 就抗日战线的阵容和成分说，我们在学生、军队、农民中虽已有相当的工作，但在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商人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中，则我们的工作，是极微弱的，特别是工会工作方面。我们要把为工人阶级行动的统一，统一的工会的问题，作为中心问题。要把为保护工人群众切身利益，为恢复

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停止活动的国民党黄色工会（即为恢复老工会），为反对增兵、走私、倾销等，使中国民族工业破产，工人失业，生活恶化等等的斗争，成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主要纲领，也即是参加抗日战线的纲领，要善于运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与民族统一战线的机能，以加强自己的力量与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可能以达到工会统一的目的。要利用小姚^[2]过去的经验与目前新的条件，采取具体的办法，并动员得力的干部去进行这一工作。至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商人、民族资产阶级亦要有计划的动员大学生及中小学校的教员，利用各种关系去进行工作，特别注意他们已有的组织及领袖，使之参加抗日战线。在抗日统一战线方面要应特别注意在各党各派影响下的群众及其领袖，并具体的分析各党派的特点，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以实际的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如历来同我们的党处在最尖锐对立地位的最右倾最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中的进步分子，现在竟把他的两个口号，加以新的解释，即“外抗强权”不是指苏联而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内除国贼”不是指共产党而指的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贼，如果他们实际的真像这样的话，国家主义派将不是我们的政敌，而是在抗日战线中的同盟军。相反的，陈独秀所代表的极“左倾”的托派的领导分子用尽了一切恶劣的字句，咒骂领导抗日的共产党，咒骂抗日主力的红军，为党所提出的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出卖中国的革命，他们实际上已成了日寇的代言人，他们不仅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而且是整个被帝国主义压迫到吐不出气的中华民族的汉奸。这自然不是说被他们“高尚理论”弄糊涂了的真正革命分子，相反的，我们要尽力把这些分子从反革命的泥坑中解放出来，争取他参加抗日战线。又如国民党的三个字，表面上似乎是代表全国的国民党，存在着差异，就是南京内部

各派别如冯玉祥派、蓝衣社、少壮派、亲日派、欧美派等等，亦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至于国民党的嫡系，与以加入国民党为妥协条件的各部队各机关，用名册加入挂名的国民党，和满洲的以至华北的国民党，与暂时在南京政府统治下的国民党，更存在着实质上的不同。秘密结社的青红帮、在家理、哥老会、红枪会等与公开的群众组织，亦有差异，已经在行动上事实上表现诚意参加抗日战线的如女中的社会民主党，陈铭枢所领导的民族解放同盟等等和仅在口头上表示要抗日，要联俄联共的西西（CC），更存在着原则上的差别。这些差别与不同，正是我们决定策略的出发点。

目前同各党派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中应当注意国民党内的政治的军事的各派别。国民党虽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党，但确是一个数量最多而又最普遍的党，它的动摇崩溃、意见分歧的现象，虽是层出不穷，但要脱离蒋介石的垄断，实际上参加抗日的行动，则不仅要从外面去打击它，而且必要大批的从内面杀出来。平津的国民党的各派别及黄色工会，在客观上已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我们应当尽各种可能，同他们进行抗日的统一战线，在进行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特别是同国民党的各派别进行抗日统一战线过程中，不仅要有明确的纲领，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民主，要使双方群众了解，我们是在什么纲领之下合作的，每个分子在这个纲领之下，应当做一些什么事。这样，不独可以巩固我们自己的阵线，并且可以使对方的群众能自动的监督他们的领袖，而不致受个别动摇或反动的领袖所领袖，北平某校与法西斯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是应当更进一步研究的。并望将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

（二）领导个别的小的经济或政治的斗争，以及发动广大群众的示威游行，是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扩大政治影响，锻

炼群众的战斗力，加强与巩固抗日战线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把个别的小的经济或政治的问题，都归结到抗日战争中去解决，在表面上看起来，虽也有部分的真理，但实际上不仅是放弃了与群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斗争，而且减弱了抗日战线中的力量，但领导斗争应注意每次斗争必须求得胜利的结果，虽然是最小的胜利也好，因为这样，不独可以提高群众的情绪，并且可以扩大和巩固群众的组织，以准备开展下次的斗争。若估计到某一斗争尚没有胜利的把握，则应停止举行，而作更进一步的准备，记住：我们是为保护群众的利益而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斗争，不是为斗争而斗争。

每次斗争，都要站在主动的地位，既不要为感情所冲动又不要受敌人的挑拨，要运用很灵活的战术，应进则进，应退则退，应守则守，特别要看清敌情，善于使用自己的力量，六月反日出兵大示威以后，继着的长期罢课的失败教训，应当成为以后最宝贵的经验。

（三）河北党的组织，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遭受敌人的摧残，这就在于组织方式上，一般的执行得正确，这是值得整个国民党区域的党学习的。胡服同志去后，更严重的注意这一问题，是非常正确的，现只有几点，希望你们注意：

（1）善于利用公开或半公开的可能，是今后开展救亡运动的重要关键。你们在二十九军中所采取的新办法，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有更广大的群众参加，我们手段不妨和平一些，因为目前最主要的：第一，要把群众（从先进的到落后的）推动。第二，则是要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秘密的活动方式与组织方式，是无论如何不能包括广大的群众的，只要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存在与活动的可能，就是用合法的手续也是应该的。

（2）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绝对的分，同时又要有紧密的

联系。这个问题，从王同志的报告中，可以知道党不仅严格的注意，而且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方法，但从另一同志谈话中则依然存在着危机，即学联从上而下，或从下而上的某一人或某一部分发生问题，便有可能影响全部，因此，我们希望胡服同志特别注意执行中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并把实际经验具体形式告诉我们。

(3) 要注意建立主要工厂（如电灯、电话、自来水、军事工业、交通工业中的主要部门等等）、有决定意义的军队中的堡垒，分配党的干部，去进行这一工作，不要随便运用这一种力量，凡不是群众的大多数的行动时则他们可以不参加示威游行等，以免暴露目标而引起敌人的注意（军队更不应参加）。要领导他们的斗争，但更注意得到胜利的结果，因为这不仅在秘密工作上的重要，而是在准备决定胜负斗争先决条件，至于创造运动中的群众骨干，使之成为一般抗日群众的模范与中心（如五卅的上海大学、沪西的内外棉）亦为重要任务。河北党在军队中，在工人中，在城市贫民及商民中，在山东，在河南，在山西，在绥远、察哈尔等地方，党的组织还须加强，有些群众组织中的优秀分子应大量吸收入党。为了扩大左联、社联的工作范围，发展他们的天才，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机会，我们提议，把左联、社联像上海一样的公开宣布取消，参加到其他广泛的群众组织中去，以扩大与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把左联、社联的分子尽量吸收入党，有计划配置到各部门各地方的群众中去，以发展他们的干才，建立党的细胞，请多多注意吸收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强有力的干部到各级的领导机关。

(四) 北平学联的活动，不仅在河北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意义，而且影响全国学生学联，省委应当特别注意其领导。特别注意吸收学联中能干、最先进、最积极、最忠实的同志参加省

市两级工作，以便更正确的领导学联，据报告“学联由西郊区委领导，对策略的指示，时常不能令学联满意”，如果学联真是由西郊区委领导的话，则区委的能力，是无论如何不能正确的灵敏的解决学联最复杂的问题，应当设法改正。

（五）我们非常欢迎省委更集中力量创办一个精锐的公开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如《大众生活》相似的刊物的企图，我们希望这一刊物能够多吸收名记者、政论家、大学教授、各界及各党派的要人参加，只要他们是主张抗日的。刊物的颜色，可以比《大众生活》灰色一点。至党的某种主张或号召，不要轻于在我影响下的刊物上登载，以影响该刊物的存在与吓跑落后的以至中立的群众，我们可以用某种代名词交公开的大报或小报发表，或经过某一新闻记者传出，或不署名的散发等等。

（六）关于 C. Y. 的问题，由 C. Y. 写专门信给你们，我们只在这里简单的提出下列的几点：1. 党要帮助团成立单独的组织，使之能独立发展。2. 要尽量帮助他们的工作。要使之尽可能的青年化、群众化。3. 要指导他们打进到各界各党派的青年的文化的体育的组织中去，争取群众在他的周围，发展他的组织，不用 C. Y. 的名字去开展青年的工作，而用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的名字以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存在，以便吸收各阶层各党派所影响下的广大群众，实现 C. Y. 是青年群众的组织的任务。

（七）请你们加强对于特科的领导，使他们成为取得情报的与进行上层活动的附属组织。望尽量多派一些可以培养的或环境困难不能活动的同志来我处受训练。其他文化教育的、技术工作的人，愿意来苏区的进政治军事学校的请多多派来。团的干部也要多派些来。现在应利用交通畅通的机会。

我们这信只能作为你们的参考。因为许多具体情况，我们

不知道。望经常给我们报告及你们的各种文件。

中央书记处

八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王世英。

〔2〕指饶漱石。

张闻天给刘少奇的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九日)

××^{〔1〕}兄：

一、你七月十九日来信收到。

二、对于法西斯派的斗争，的确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在各方面、各党派中是最有力的敌人。因此，用一切方法瓦解它，争取在它影响下的一部分优秀分子到抗日战线上来，是一个极重要的工作。我们党要善于经过各种社会团体在某些抗日问题上公开向他们提议实行统一战线，如果他们赞成，则公开经过某种组织形式来进行工作。一切问题的决定要经过最民主的方式，使每一个法西斯分子看到他们的领导者所做的工作，监督他们的领导者，使他们也参加到运动中来。这种统一战线不希望一下就是全市的，开始应该是局部的与地方的。我们过去忽视对于他们的思想斗争，现在应该转变。应该有系统的、坚持的揭破法西斯派的一切欺骗宣传，并利用他们的每一允诺（我们认为可以利用的），在求得兑现中开展反对他们的斗争。我们同时要派人到他们的内部，在内部造成一种左倾的派别，使他们内部分化。同其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亦应具体进行。陈铭枢派应很好的与之合作。

三、工人运动，应该从底下做起，不要一开始就建立什么上层机关。在工厂内主要的要从斗争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建

立支部。有了几个支部之后，再派某一个同志或几个同志负责领导。领导者除给各支部的负责同志以一定的指导方针外，一切厂内的斗争，由厂内同志自己领导，不要从外面去干涉。领导者的任务是要加强对于下面工作同志的教育工作，使他们自己能够运用党的策略。由一般的区委领导产业支部的办法是不适当的。

工人运动中一切赤色小组应该取消，所有同志应到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中去活动。过去洛佐夫斯基的所谓争取公开的方针，实际上是错误的。其实问题不是争取公开，而是利用公开，实际上就是利用合法的意思。一切可利用的公开组织，都应利用。一切合法的条文，可以利用的，也应尽量利用。如新生活运动中某些口号，在工人斗争中也是可以利用的。

在工人运动中，同在别的运动中一样，要注意建立坚固的堡垒与保存有生力量，一切没有群众的少数人的斗争应坚决停止。所谓厂内活动，不应只是罢工的活动，凡在党的方针下的活动，都是厂内活动。在某种情形下，主要的活动方式不是罢工，而是文化工作（比如说！）。在工人运动中，一切旧的关门主义的传统，应该克服。

四、在学生运动方面，我们觉得，近来在平津许多次的示威罢课的行动中，群众似乎在减少。党必须及时的估计到目前形势的特点，迅速转变斗争的方式。照我们看来，你们现在应该注意于学校内力量的巩固与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应使学生同志懂得，除了示威游行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

对于学生运动，我们不应该交普通的区委去领导。这种区委是脱离学生的，他们决不会很好的领导学生运动。我们应该在省委下成立学生委员会，领导学校各支部的工作与学联的工作。这些负责人应该都是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党的省委只要同

他们中的一人接头，经常说清学运的指导方针就够了。一切具体工作，让他们自去办理，因为他们自己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他们自己决定问题，一定更为适当。

对于学生中公开的领袖，务必使之继续进行公开活动。把公开活动的人都吸收到党内来做秘密工作的办法，应彻底纠正。这些公开的领袖，我们当然应吸收入党，但这些党员不应参加小组等党的组织的生活，不应受秘密党的“严格训练”，只要我们指定某一同志把党的方针同他们谈清楚就够了。对于他们，应以另一方法对待，不应该采取平均主义。他们应该是秘密党员，是“特别党员”。（在军队方面更应如此。）

对文化界救国会的领导，只要我们同志同它的领导机关中某些接近我们的领导同志共同协商，用共同同意的方式来解决，就行了。过去党团决定一切的方式，应该改变，或者不要党团的组织更好。对于文化工作的同志，我们更应该采取比较灵活的与机动的领导方式。

狭小的左联、社联等组织应该取消。党应该吸收其中许多分子入党，而所有这些人应该加入更广泛的学术团体或时事讨论会等中间去活动。许多人还可分配到其他方面去工作。

五、根据国际的意见及我们的经验，C. Y. 是应该取消的。像现在 C. Y. 这样的组织，结果会变成秘密的狭隘的第二党式的组织的。我们现在要利用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名称组织青年群众，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实际上就是这类性质的组织。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类公开组织，我们可到其他已有的青年组织中去工作，争取其领导。党的方面只要有负责青年工作的同志就够了。青年组织的名义不一定到处一样，只要能公开活动，吸收广大青年群众就好了。等到各地有了这样的群众组织，再来组织上层的总的组织。

这种青年的群众组织，应在抗日的号召下面团结最广大的青年群众。这样的青年工作的领导干部，在现在学生运动中真是多得很。问题是要拿完全新的策略去武装这些干部。

六、军队中特别是二十九军中的工作，现在特别重要，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应该从学生中或其他同志中调出同二十九军的官兵有关系的去同他们接近，坚持的向他们做抗日的宣传鼓动。特别要抓住官长中的工作，要有一定的人同一定的官长发生良好的关系。过去我们只做士兵工作不做官长工作的白军工作，是根本错误的。在工作的过程中，应从宣传进到组织。凡愿意加入党的白军官长应成为特别党员，便于他们的活动，使他们能够埋藏在内部。他们的活动方式应适合于他们自己所处的环境。在没有发动的必要以前，他们只能利用各种公开的活动，在部队中造成抗日的情绪与派别，准备在发动时，我们在他们内部有领导的人。这种力量平时不能随便使用，或使用超出他们可能公开活动的范围而遭受破坏。在士兵中当然应依照兵运原则建立小组。这种小组也不要过多。

估计到目前的时局，白军工作现在特别重要。

七、你应该把在北方不能立脚的干部如老柯⁽²⁾等调来苏区，吸收在斗争中表现坚定的干部，教育他们担负领导工作（“带徒弟”）。同时省委的组织方式与领导方式，依然应该进一步的改变。在省委下用不到组织很多的区委，只要几个产业的与职业的委员会，由他们负责独立的领导自己部门的工作。省委只要经常给以重要的指示，用不到天天接头，忙于事务。对外埠工作，也不要一开始就建立一个上层的机关，而应该从下面开始。工作的方面也不要太宽泛，似乎处处都要去做，处处都要派人的样子，而只着重于几个地方。这些派出去的人，要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与方法，不然，尽管派的多，结果一定是很

少的。

华南我们已开始建立关系。你们派往华南工作的同志在那里很难工作，请你写信去把他调回，送到我处来。你处现在应该避免多头的领导，而着力于华北工作的建立与开展。

八、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拟发一正式文件。今天我只把大意告诉你，作为你的参考。

北方工作，我们认为自你去后，已经有了基本的转变。大家都很高兴。望继续努力，并经常把新的问题与新的经验告诉我们。

敬礼！

洛^{〔3〕}

八月九日

再：

- 一、请多派一些人来受训练；
- 二、特科工作由王兄^{〔4〕}面谈。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注 释

〔1〕 应为胡服，即刘少奇。

〔2〕 指柯庆施。

〔3〕 指洛甫，即张闻天。

〔4〕 指王世英。

任弼时关于三个方面军大会合的 准备问题给陈伯钧等的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九日）

陈、王、张阅转贺、萧、关、甘^{〔1〕}：

（一）两广事件自余汉谋叛变后，内部即起分化，粤将领大部投蒋^{〔2〕}，陈济棠被迫下野逃往香港。但李、白^{〔3〕}尚据桂坚持反蒋，有组自治政府，又有组国防政府之说。李、白大约有正规军约五万，另有民军约十万，现蒋仍以重兵压迫桂境，在川之李抱冰师及六十一师均有调黔消息，顾祝同任黔省府主席。在此情况下，蒋敌主力仍在湘、黔，一时似难北调。

（二）一方面军主力现仍在预旺、环县、盐池地区，正进行巩固新区，整理补充部队，在陕北方面留有次要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他们来电说安定、保安、安塞、延川等县城仍在我手，并有一较大游击支队在陕南地区积极活动。

（三）敌已知我军进入川甘边境，蒋敌部署是企图集中陕、甘、青、宁等省军队约百五十团，首先击破一方面军，然后阻二、四方面军北上。目前对我们的处置是以王均之两个师（七、十二）布置于文县、武都、天水、西固地带，协同将集结平武、南坪、松潘之川敌孙震部，堵我东出陕、甘、川地区。另以毛炳文部之两师（二十四、八）位置陇西、兰州之线，将以一部向岷州增防，协同在岷、洮、西地带之鲁大昌师

（土匪队伍约三四团）堵我北进。

（四）我军第二步战役计划是迅速伸出进占岷、洮、西固，将以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天水、兰州间地区，求得在运动中击灭调动之敌，突破其天兰封锁线。二方面军拟先进至岷西、天水之间，休整补充一短时期，然后向天水东南方向伸出活动。二、四方面军以积极动作配合一方面军行动，以击破敌对一方面军之进攻。在我们进入甘南适当地区，一方面军将由北出击，争取在一、二、四方面军配合下，赤化陕甘大道广大地区，取得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造成西北新局面，并以此响应桂省，推进全国抗日反蒋新形势。

（五）这次二、六军在长征之后，继续一月余之草地行军，因未得到应有休息和物质上的准备不充分，故减员比四方面军及三十二军自然要大些，但一般说通过草地的成绩还算是很好，比之去年一、四方面军草地行军的减员要少得多了。目前的问题是要进入群众物质条件较好地区，争取短时期的休息补充。因此，二方面军在包座地区几天休息后，即宜继进天水附近，该地系汉人区域，人口颇密，冬季衣被可解决。望在部队中加紧政治上鼓动和作业，并即开始扩大红军的一切准备工作。我想在过去扩红经验基础上，补充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可在二方面军部队中提出扩红一倍的口号来号召，并且要实际向着这个目标努力。估计在目前的敌情下，我们伸出甘南后，虽无大的战斗，但小的胜利是可能争取的。我们进入天水东南地区，开始可能与王均部有小接触，因此部队组织上的整理，进行一些战斗的动员与准备必须加以注意。

（六）我这次随朱、张^[4]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昌浩、向前、傅钟、卓然^[5]等同志的谈

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近和会合时），已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国际^[6]正讨论这一问题，大概是可能批准这一会议的召集。我现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有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的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为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着重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上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只须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上的讨论，而应避免一些枝节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良好结果的小问题。

此外，我已向总政治部提出并已得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军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在四方面军中应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的印象。须有良好的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准备，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完全兄弟的亲密的团结一致。同时我已向陕北建议，在一方面军中也进行同样的动员和准备，已得他们的回电，现正在一方面军及独立军师团地方部队中进行这种动员。陕北最近有一告二、四方面军同志书，我们也准备用二、四方面军首长名义致书一方面军战士，以互相勉励，准备大会合。

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顺利的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哈达铺时（岷州、西固之间人口稠密的地方）再面谈决定。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最近此间与陕北电报关系颇密切，态度也比较诚恳。陕北亦有军委总政治部组织，他们与国际是有电报关系。

我们到包座后，朱、张等同志提出留我暂在西北局工作一时期，我以快将会合和随二方面军单独行动必要等理由多方拒绝，但会议上的决定是兼顾西北局工作，并以副书记职名义加之，说明必要时仍随二方面军行动。本来我预计在包座归还二军去，但现在还须随他们到岷州（因行动问题须共商），待二方面军集结哈达铺时我准备回二军。在二方面军单独出动时，我想以随二方面军行动较好。

二方面军到包座地区后，也不宜多休息，我想各部有三五天的休整即应继进，以进至条件较好地区，在战士情绪上和物质上都更便我们休整与补充。部队到包座地区，可在救济寺及以北通白骨寺或巴西、阿西方向，或其他附近部队少住过的地方集结休息。并设法找通事向导，问清由白骨寺通罗达、哈达铺的道路，如此路无险隘难走地段，则以另走此路为好，因现路通过部队太多，粮食卫生上均感困难。但如白骨寺路险隘太多，则仍走原路为妥。

在西倾寺、阿坝、郭曲河、上包座等地，前梯队是相当注意了后续、特别是对二方面军粮食的供给，各部（如三十军、四军、总直、九军等）均曾抽留牦牛，并派骑兵师找牛羊留给后面部队。但有些是因看守不力（如日庆寺、阿坝、郭曲河）被番骑偷走（如郭曲河确有八百牦牛、二千羊子，但实际作用的不过三百多牛、几百羊子）和过路部队乱杀一部分，以及赶牛技术太坏跑走落伍，如最近由救济寺送三百多牛、三十石粮到严头坝接济二、五、三十二军的，到上包座即只余六十余条了。

你们到上包座地区后，生麦一部可收割，队伍应准备五六天粮出发。

如走俄界、哇藏寺、罗达到哈达铺，据昌浩同志来□此路

有几处极险，幸沿途番骑未堵口，且系与之办好交涉通过，因此沿途须严格注意政治纪律，保持与番民良好关系，以便顺利通过。但两旁隘路密林中时常埋伏射击，干部须注意伪装、少骑马，且须在重要地段派小部队上山搜索，占领重要点，掩护通过。余后谈。

此致

布礼！

弼 时

九日上午十时

本日我们即由救济寺向俄界前进，前梯队是三十军，先头本晚可达岷州县城，并拟夜袭该城。

根据《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三期刊印。

注 释

- 〔1〕指王震、张子意，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
- 〔2〕指蒋介石。
- 〔3〕指李宗仁、白崇禧。
- 〔4〕指朱德、张国焘。
- 〔5〕指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李卓然。
- 〔6〕指共产国际。

毛泽东给章乃器等的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

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四位先生并转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诸位先生：

我们最近才从报纸上看到章、陶、邹、沈四位先生，在七月十五日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并且还看到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宣言和纲领。这些文件已经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和兴奋，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因此，我特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向你们致送热烈的敬礼！同时并向你们及全国民众申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同你们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

我们很感激你们在这些文件上，对我们所提出的一些善意的批评和希望！因此我们在这里似乎不能不郑重的答复你们，并简单说明我们最近的一些主张。

你们说：“我们所希望的，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这

样，救亡联盟战线的展开，才不至受到阻碍”。诚然，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做。我们从来就在行动上忠实于自己所提出的每一个主张。当着我们在九一八后屡次向全国各派提出合作抗日的主张时，有人说，我们的这种提议，仅仅是一种宣传作用，实际上并不会如此做的。然而几年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一种完全的诬蔑。我们曾经和十九路军与福建政府合作过，最近西南诸领袖通电抗日，我们又宣言愿意与他们密切合作。同时又向中国国民党，向全国各军政领袖，向全国各党派团体致送了我们关于合作抗日的提议，并准备和他们立即进行谈判。这些事实都证明我们不只是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愿意联合各党各派为祖国生存而奋斗的一片真诚。

一年多以来，我们为着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是经过了长期艰苦的奋斗。虽然我们已转到了华北，但至今还没有实现“集中河北，首先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愿望。在今年春季渡河入晋后，本来可以实现这个愿望的，然而不幸又遇到十余万中央军沿同蒲路线的层层封锁，在当时我们虽然可以集中力量冲破这一封锁线而至河北平原，但这必使双方都受到极大的牺牲。我们为着避免这种无意味的内战的牺牲，不得不暂时回渡陕北。在回渡以后，我们还是不记一切仇怨，重新向南京政府，向太原阎百川^[1]先生，河北宋明轩^[2]先生致送了我们集中河北抗日的愿望，并要求他们谅解。虽然至今还没有得到他们满意的回答，但我们也无理由因此就放弃素来这一抗日的主张。

当着整个民族生命将被斩绝的时候，我们已无兴趣进行任何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只要中央军不进攻我们，不阻止中国军队抗日，我们绝不愿意进攻中央军以及其他任何军队。

只要中央军及其他任何军队抗日，不压迫民众爱国运动，我们将竭诚的拥护他们，并愿以全力援助他们。

在抗日反汉奸与爱国运动自由的条件下，我们愿意与任何军队、任何党派合作。

* * *

有人怀疑红军现有的力量不能单独抗日，还有人说：“抗日必须全国统一与全国一致为先决条件”，甚至有人说：“局部抗日是于中国有害的”。然而我们不这样想。我们看了东北义勇军能够长期英勇抗战，据敌报说，敌人损失了十余万生命与数万万金钱。而且相当牵制了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本部的进攻。他们虽然还没有最后战胜敌人，但他们对于全国民族已经有了极大的功劳和帮助。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说东北义勇军不能单独抗日的話。红军与东北义勇军比较，在各方面都不会更弱，华北民众比东北的民众也不会更坏，如果不是有意的蛊惑民众，为什么能说红军不能单独抗日呢？上海战争与长城战争的失败，其原因怕是由于这些战争领导者的动摇，不坚持不采用高度的运动战，与不能和民众进行广泛的合作吧！然而这些缺点在红军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认为红军是能单独抗日的，而且不至于失败，至少是能长期抗战的。以红军现有的力量，单独的最后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但以红军现有的力量单独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是可能的。红军在长期对日抗战中，必然能够联合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与人民共同作战以取得胜利。

说必须集中全国一切力量，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对的。但必须全国一切力量集中之后才能开始实行抗日，就是不对的。因为一部分力量也是能够抗日的。因为敌人是不让

我们将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才去抗战的。敌人已经将中国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监视得不能动弹了，敌人已将中国的土地一省一省的狼吞虎咽了。在如此情形下，只有抗战发动后，才能进行全国的总动员。至少总动员开始，抗战也必然要同时开始。在“和平”的情况下来实行全国总动员，怕已经不可能了吧？即如你们向各方所要求的爱国运动自由，很明白，当局如允许这种自由，敌人就会用武力来压迫，战争就不可避免。情形是愈来愈坏的，现在不立即向日抗战，将来要实行全国一致的抗战与全国总动员是愈加困难的，到最后甚至是不可能的。满洲与华北一部分，现在就不能去动员了。将来大批汉奸军队的组成，与大半个中国被敌人直接统治，各重要城市与交通要道被敌人控制，那时候我们的动员范围就只能有小半个中国和乡村了。现在还能借口统一中国与准备不周来推迟对日抗战吗？我们不反对真正的准备，我们所反对的是借口准备来实行不抵抗主义。

任何对日抗战，绝不会妨害准备工作与全国的动员。任何抗战的本身，对全国恰是一个极大的动员，看过去上海与长城战争在全国的影响就可知道。而在平常时期，在敌人监视下，几年所能秘密进行的准备工作，在抗战发动后甚至只要几星期就可能做到。而且秘密准备的力量，绝不会超过失去的力量与敌人准备的力量。

有人说：我们单独抗日是捣乱了他们整个的抗日步骤。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整个的抗日步骤？我们只能要求走在后面的赶到前面来与我们的步骤一致，只能要求还没有准备立即对日抗战的军政领袖与党派，立即对日抗战与我们的步骤取齐，我们没有理由放弃与停止自己的抗日主张和抗日行动，去与他们的步骤和主张一致。

已经确定并在苏区已经执行的几个政策。我们绝不仇视各阶级的愿意抗日的人们。

至于将来，红军为着对日作战进入友军的区域，那末，只要红军当时的给养有保证，红军愿意遵守友军一切关于社会的法律和命令，不干涉友军地方的一切行政事件。

关于劳资问题，在苏区我们已经规定最低的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条件，根据各企业的情形由劳资双方协商同意签订合同，共同遵守。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罢工、怠工等纠纷。过去工人监督、工人管理等法律，已一概取消，并劝告工人不提出过高的、超过企业担负能力的要求。在非苏维埃区域中，我们虽然拥护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但同样我们不故意的加紧反对资本家。我们还相信，在收回海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工人和资本家是都能得到好处的。相反，在帝国主义侵略继续深入的情况下，工人和资本家的状况，就都没有改善的可能。工人与资本家所有的共同利益，是建立在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基础之上的。

至于在豫、鄂、湘、赣、闽、浙等处，我们有些游击队，没有遵照我们最近的这些法律执行，那是因为各种阻碍，我们这些法律和命令还没有送给他们的缘故。此外在那里“围剿”的紧张情况与他们被杀戮的残酷程度，引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采取报复手段，也是有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很愿意立即去纠正他们这些错误，或者在抗日的条件下使“围剿”和游击同时停止。但现在可惜的我们还不能做到这一步，而且决定的权力还不在于我们。

我们现在可以正告你们！我们认为苏维埃和红军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绝对的尊重与执行人民对于我们的批评、意见和要
求，并准备在各种问题上听凭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民主

的裁决。

* * *

目前在各地方的救国运动与救国团体，我们的党员自然是应该参加的，我们愿意经过这些团体和运动贡献我们所有的力量，并在这些团体中和各党各派及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共同为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而奋斗。但我们的党员绝对遵守服从这些团体的章程、纲领和大多数通过的决议。在行动上我们绝对服从多数——即使有时候，我们在原则上不同意多数的意见。我们的党员不反对不嫉妒这些团体中的其他各派取得群众的信仰和领导地位，相反，我们愿意拥护各派坚决抗日的领袖充分在群众中发挥他们的才能，并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工作。因为要战胜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不只是需要自己的胜利与发展，而且需要一切同盟的友军之胜利与发展。我们在联合战线内部的口号是：“一切党派、一切阶级在抗日反汉奸的目标下联合起来！”因此，我们认为在联合战线里面，提出打倒某某阶级某某党派的口号是错误的。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里面，我们认为还有不少的领袖、党员和官吏是能够抗日的，我们愿意与这些人联合起来。因此，现在笼统的反对国民党及其各级政府，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在救国运动中某些青年的宗派主义，包办、利用、劫持甚至强迫群众的工作方式，并不为我们所赞成，我们是反对这些东西的。现在对于我们有兴趣的与为我们所重视的，是各党各派在抗日救国这一个问题上，能够大体和我们一致，在其他问题上的不一致，已经不应该为我们过于重视。但有些人过于重视这些不一致的问题，或者是许多纠纷的来源。如果我们的党员在救国运动中犯了这些错误的，我们自然愿意纠正他们，但同时我们也愿各党各派的领袖与一切

热心救国的青年相互的彼此勉励。

我们相信，大家在抗日救国的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在一切细小问题及一切其他问题上的不一致，彼此互相宽容，全民族的联合战线是一定能够成功的，是有光明伟大的前途的。倚靠联合战线的力量，不独能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而且能使中国从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经过联合的阶段以至可能达到中国真正的民主的统一。因此，我们认为联合战线决不是短命的暂时的苟合。在联合战线内部个别的动摇、叛变与退脱，当然在各个时期都是不能免的，然而这并不是联合战线的破裂。现在的联合战线其所以比一九二七年的联合战线有更明显的前提与稳固的基础，就是现在的民族危机比一九二七年前有了更加百倍的严重，一九二七年的联合战线还是对内（北洋军阀）作战，而现在已是对外作战了。一九二七年退脱联合战线的人，还可以在中国建立半独立性的政府，而现在以后退脱或索性不加入联合战线的人，已经就不能建立半独立性的政府了，甚至永远不容在中华民族的集团内立足了。还有一九二七年的经验，对于各阶级都不会是空过去的。世界的情势，中国的情势，比一九二七年都有了极大的变动，而这种变动对于中国的民族联合战线正是有利的。所以我们对于现在联合战线的前途，完全不悲观，没有理由悲观。因此，我们在联合战线里面，也更不怕被其他党派利用，我们所有的是彻底的坚决的抗日主张。

我们准备和一切坚决抗日反汉奸的党派团体诚意合作到底！

*

*

*

但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一些人还在那里继续进行他

们个人的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很明白，武力统一中国，就是无穷尽的内战。从袁世凯以来历代军阀执行这一政策所受到的失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人的前途，是如何的暗淡！而在目前执行这种计划，危害中国民族的程度，是超过以前任何时代的。然而不幸，竟有人从旁歌颂这种计划。还有人甚至将所谓“统一战线”与民族联合战线对立起来。他们要打倒联合战线。很明白，这是联合战线不能顺利开展的最大原因。

你们说，过去的争论是在抗日的方法与手段问题上、安内与攘外的先后问题上。但我认为这些表面上似乎是方法与手段问题上的争论，而实质上则是某些人在汉奸与民族英雄之间动摇的问题、在抗战与投降之间选择的问题。那些主张先“安内”的人未见得就不清楚，“安内”的结果会要引来什么东西？而他们硬要主张先“安内”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我们不反对统一，我们所反对的是内战，是汉奸。我们认为现在统一中国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各派平等的联合，对日抗战，与实行大家听命于人民的民主制度。如果离开这条道路，而企图用内战与武力去征服一切敌对势力的方法来统一中国，那不会是中国统一，而会是中国分裂的灭亡。为着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反对这个企图。我们现在拥护平等的联合，抗战与民主统一中国的道路。这是目前和平统一中国的唯一道路。我们准备遵守与服从真能代表全国人民的代表机关之一切决议，我们准备将一切重要的问题提交这样的代表机关来公决，就是苏维埃制度是否在全国被采用或被取消的问题，我们也愿意提交全国人民作民主的公决。

但我们必须向你们声明，南京政府五月五日颁布的宪法与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我们认为是反民主的。根据这些法律组织的“国民大会”，我们不能承认它有代表全国人民和民

意的权利，因此我们不能参加这种“国民大会”的选举，我们与人民也没有义务服从这种“国民大会”的决议。我们认为这种“国民大会”的存在是有害的。但我们愿意参加一切基于民主原则产生的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

最后，我们希望你们及全国一切救国团体派代表来参加苏维埃政府！希望你们介绍与各派进行关于合作的谈判！一切愿意和我们谈判的代表，请直接来苏区，我们保障他们的安全。同时只要有安全保障，我们也愿意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进行谈判。

我们很荣幸的签字于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之后！

敬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 泽 东

八月十日

根据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
《火线》第五十九、六十期合刊刊印。

注 释

〔1〕即阎锡山。

〔2〕即宋哲元。

张闻天等关于今后战略方针问题 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

朱、张、任^①同志：

关于今后战略方针有如下的建议：

(1) 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②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2) 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割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3) 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甲、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李忠^③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为战略枢纽，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步芳兵力之东援，以便甲军派出一部接

防，使西路三州落于甲军之手；一在消灭青马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李毅^[4]现有代表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此外，再派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等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间实现之。在此期间二、四方面军努力解决人员补充与被服补充两问题，以免进到甘北较贫苦区域发生若干困难。

乙、完成上述任务之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

丙、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任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

(4) 巩固内部的计划如下：

甲、陕北、甘北、宁夏新老苏区之巩固及三个方面军之扩大与巩固，使之成为西北局面之坚强的领导中枢。

乙、甲军政治上的改造与军事上的立于不败之地。

丙、陕、甘、青三省各部统一战线的完成，三省反动分子肃清，三省民主纲领之初步实现。

丁、以上步骤的实现，使得西北局面政治上军事上均置于巩固的地位，一方面足以防御蒋介石在西南问题解决后转向西北之可能的进攻，足以防御日本向宁夏进攻而打断其隔离中苏关系之企图；另一方面，作为出兵绥远之准备，并准备使陕、甘、宁、青四省抗日革命化转向进一步的发展阶段。

(5) 甲乙两军^[5]各出一部合组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实行抵御德王^[6]与李守信蒙伪军之进攻，用此行动号召全国抗日运动，使之进到更高的阶段。

（6）所有以上各个步骤，都是为着形成并巩固西北国防政府，用此国防政府去推动全国统一战线，造成全国国防政府的基础。

（7）甲乙两军苏维埃政府与国防政府对于南京的策略，适用统一战线的一般的原则：

甲、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

乙、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目前不出河南；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

丙、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

丁、防御时用反对卖国贼捣乱抗日后方口号，进攻时用反对卖国贼拦阻抗日去路口号，但不论何时，均取一面作战一面讲和政策。

戊、向白军进行统一战线，注重其上级官长。

己、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

庚、所有以上对南京的策略，都是为着分化南京，揭破其欺骗，孤立其首领，争取其群众，排斥其汉奸部分，而推动其爱国部分，使之走向真正抗日救亡的道路。同时又影响南京以外各派，便利我们进行统一战线的谈判，求得党在全国活动的便利，求得人民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并求得创造西北局面的便利。

辛、不可忘记对于真正敌人之革命的警觉性。

(8) 以上意见请三兄考虑电复。

洛、育、恩、博、稼、怀、凯、泽^{〔7〕}

八月十二日

根据《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刊印。

注 释

〔1〕指张国焘、任弼时。

〔2〕指东北军。

〔3〕即于学忠。

〔4〕即张学良。

〔5〕指东北军与红军。

〔6〕即德穆楚克栋鲁普，蒙古王公。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

〔7〕指林育英、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何克全、毛泽东。

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1〕}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

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

公祺

毛 泽 东

八月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毛泽东给宋子文的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嚶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
公绥

毛 泽 东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毛泽东给傅作义的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作义先生主席勋鉴：

涿州之战，久耳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迩者李守信、卓什海^{〔1〕}向绥进迫，德王^{〔2〕}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 拜启

八月十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即卓特巴扎普，伪蒙古军副司令。

〔2〕即德穆楚克栋鲁普，蒙古王公。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

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

张 闻 天

向艰苦奋斗转战万里北上抗日的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致最热烈的兄弟的敬礼！

二、四方面军为着抗日战争的伟大的任务，不避艰险，不畏困难，不怕牺牲，克服了种种天然障碍与敌人的截击，以大无畏的精神，直出甘南，现在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正当一方面军在西线上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计划的时候。一、二、四方面军的共同的胜利，使甘、宁、青的敌人手忙脚乱，惊慌失措。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天然的或人为的障碍，能够阻止我们三个方面军的伟大的会合了。

这是红军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会合，这是兴奋全国抗日民众及全世界劳苦大众的光荣的会合，这是具有全国与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的会合。这一会合，首先给予占掠华北、侵略内蒙的日本帝国主义以最响亮的有力的回答。日本强盗为着进一步侵略西北，隔断中国与苏联的联系，来实现灭亡全中国进攻苏联的毒计，现在正向着绥远、宁夏伸张腥污的血手。在日本指挥之下的李守信部队，已于八月初向绥东直接进攻。用

^{*} 本文曾收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四二年编印的《军事文献》。

坚决的抗战来斩断日本伸向内蒙的血手，以保卫内蒙、华北，收复东北失地，这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一致的奋激的要求。抗日先锋的人民红军的一方面军，以其坚决抗日的主张和实际行动，已经使汉奸卖国贼焦急忧虑，三个方面军的会合的伟大力量，难道不使日本强盗和汉奸卖国贼胆战心惊吗？抗日红军的三大主力，同心一致的在全国民众面前宣誓道：“我们不怕一切牺牲，誓为抗日救国大业的胜利奋斗到底。”人民红军的三大主力，将永远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上，夺取日本强盗屠杀中国人民的刺刀，来为中华民族杀开一条自由解放的大道。

其次，三个主力的会合，一定要更进一步推进全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运动。“抗日则生，降日则死。”现在凡有血气有良心的中国人，没有不痛切的感觉到坚决抗日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我们党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显然已经成为全国广大民众心坎中所激发出来的呼声。抗日的群众的怒潮，不仅影响了国民党内的一派（两广）公开揭起抗日的大旗（广东虽受挫折，广西尚在继续奋斗），而且还影响着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将士，倾向于抗日。以共产党与红军为中心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运动，正以急速的步伐向前开展着，推广着。正因为如此，所以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及其力量的巨大的加强，不仅兴奋着全国民众的抗日斗争，不仅巩固着抗日联合战线，而且更推动着现在动摇中的政派与白军趋于抗日联合战线的道路。三大主力会合，无疑的更能使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上获得新的成功与胜利。

最后，这一会合，正是强有力的保卫着西北并促进西北抗日大局面的实现。由于红一方面军在西北战线所获得的胜利，由于我们抗日联合战线及蒙民、回民的工作的成绩，我们已经为西北抗日大联合造成了好些必要的条件。二、四方面军的到

达西北，更有利于促成西北大联合的具体实现。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正在焦急的企图消灭西北抗日力量，可是我们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着的铁拳，是要给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的这一狠毒的企图以当头打击的。我们要扩大联合抗日战线，联合回、蒙少数民族，要实际联合外蒙和苏联，来实现西北抗日的大局面。西北抗日大联合是全国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枢纽，是大规模民族革命战争的枢纽，而我们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足可以说是西北抗日大联合的枢纽。英勇的二、四方面军，增加到西北抗日前线上来，这是如何伟大的啊！这个日子，一定不会很远的了！那时候，在我们西北会建立起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而高高的飘扬起“西北抗日大联合”光荣的义旗。

全苏区的抗日人们：

热烈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

人民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铁的团结万岁！

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万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朱德给唐淮源等的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

佛川学兄并转治平、鼎铭^[1]学兄惠鉴：

别来岁久，殊深悬念。迺以山河修阻，邮电封锁，不获驰书通候故人，并商抗日救国大计，良用歉然。数年来日吞华北，得寸进尺，不仅东北、平津已成亡国失地，西北亦危急不可终日。全国皆危，而蒋介石氏始终媚日求荣，甘心卖国，对暴日不抵抗，反借日力剪除两粤抗日义举，阻止我抗日红军，并压制全国抗日民众，公然放言牺牲未到最后关头，言抗日者斩。此种卖国汉奸之面目，国人共见。我抗日红军，历年以来抱定抗日救亡主张，与蒋贼独夫作殊死战，惜孤军奋斗，未得肃清抗日障碍，达到直接抗日目的，深以为恨。迺者两粤兴抗日之师，全国军人早有同情，响应者实众。我等应全国民众之请，誓师北上，师行万里，假道陕甘，志在联合全国抗日爱国人士及我西北将士，与西南义师共歼日寇，收复失地，保存吾华领土完整。是以本军所至之处，即开诚布公，主张愿与任何阶级、派别及武装部队一致联合，共赴国难，决不与任何赞同抗日之部队为敌，甚望凡我同胞鉴此诚意，彼此停战议和，共商救国大计，共组抗日联军及国防政府。兄等与弟十余年患难交好，均在同一革命战线共同奋斗，虽中途分离，实亦时势迫成，当能共谅。处兹亡国大祸临头之今日，必能化除成见，共

襄义举，共以救国为重。吴越同舟尚知共济，同室操戈徒招日寇窃笑，弟素知兄等救国有心，当不以斯言为河汉也。如其不幸彼此发生冲突，不仅徒伤国防实力，于民族国家前途亦大不利。倘能彼此密派代表，共同协商则更妥当；抑或兄等迫于环境与职守关系，亦何妨坚守各城壁垒，使我军得以寻其空隙通过，达我直接抗日之目的。我军当亦退避三舍，或假作周旋，以为兄等留地步也，想兄等必有同情，专此再达。秋风多厉，诸为珍重。

顺询

安好

弟朱德 顿

八月十七号

益之^{〔2〕}学兄代为问好
诸同学统此致意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即王均、曾万钟。

〔2〕 即朱培德。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的指示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一) 据最近消息，内蒙绥远，形势非常紧急，日本帝国主义所制造的蒙古独立政府已经成立，其军队正向绥东大举进攻，目的在变整个内蒙为日本殖民地，以求再并吞全中国与进攻苏联。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内蒙，是打着内蒙“独立自主”的旗帜，他利用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内蒙的压迫和内蒙的不满，来挑拨内蒙一部分王公军人组织独立政府，脱离中国，而实际上把内蒙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权力完全握在日本侵略者的手中。这种奴役内蒙的政策确是一个恶毒的阴谋。

德王^{〔1〕}等所组织的内蒙独立政府与内蒙人民的真正独立解放没有丝毫相关，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只是利用这种方法，以求得进行在侵吞内蒙的时候避免内蒙人民的反抗。这种阴谋并不是特别新的，在日本过去占领朝鲜时，也利用过“朝鲜独立”的阴谋，但朝鲜得到的不是独立，而是最野蛮最残暴的压迫与剥削，变成供给日本资本家地主榨取的殖民地。在满洲也曾表示尊重蒙古人，但蒙古人的兴安省的重要官吏都遭受捕杀，更不说及蒙古人民所受的压迫与痛苦了。就是现在在内蒙，当日本侵略者还在大言“蒙古独立自主”的时候，就已经把一切权力握在手中，连蒙人领袖德王也受日人的严密监视，

握在日人手中的蒙古军队不是用以解放蒙古人民争取独立，而是用来攻打蒙古同胞与汉人劳苦群众。日本帝国主义对蒙古人民的奴役、压迫、榨取，一定要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蒙古统治权的过程而并进。一直要把蒙古变成朝鲜满洲第二。日本帝国主义所给与蒙古人民的命运，不是蒙古独立自主，而是蒙古亡国灭种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二）中国国民党政府及中国军阀在内蒙所实行的政策完全是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并未执行孙中山中国境内民族一律平等自由的主张，相反的代表着中国地主与奸商残酷的压迫剥削蒙古人民，蒙政委员会与蒙古自治都是一些欺骗手段，来加深汉人地主、资本家对蒙古人民的民族压迫而已。中国汉族、蒙族同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应当是两个民族亲密团结一致抵抗帝国主义，以求独立解放，但是中国国民党政府与军阀一方面压迫汉族人民的广大劳苦群众，反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向日本帝国主义让步投降，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同时，又压迫蒙古民族，增加蒙人与汉人中的离间与仇视，以便于日本帝国主义挑拨民族恶感，制造所谓“德王独立”以奴役内蒙。国民党军阀在内蒙的政策是代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内蒙扫清道路。

中国国民党与军阀对于外蒙人民之独立解放与繁荣向来采取敌视态度，对于外蒙人民英雄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以及外蒙最近与苏联签订抵抗共同侵略者的互助协定，不但不表赞助与同情，反而抗议再三与制造舆论，以反对外蒙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以迎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而对内蒙，始终是没有想到帮助内蒙人民来抵抗日本侵略者，也未见抗议过，反而在内蒙危急时，想出设县治、调老印、办保甲等等花样，来削弱蒙古人民的团结力。国民党军队聚集陕甘进攻真正抗日的中国人民

红军，威胁蒙古王公军官实行“防共”，以阻止红军、蒙古军队以及愿意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去帮助内蒙抵抗日本。这一切都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加速吞并内蒙。

（三）内蒙人民面前的严重问题就是民族存亡的问题，要就是听随日本帝国主义所制造的德王所领导的“独立”、“自治”，而实际是走向内蒙灭亡，变为日本殖民地，这是一条道路；另一条道路，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摆脱中国军阀的压迫，与中国人民外蒙人民以及苏联联合，而走向真正的独立自主与繁荣。前一条道路的结果只要一看朝鲜、满洲、兴安省等便可知道。□而外蒙人民的解放、建设与民族兴盛就是后一条道路正确的明证。

德王借外力以求独立，联合日本以脱离中国军阀的理论只有害于蒙古人民，我们向内蒙人民宣布我们丝毫不赞成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内蒙的压迫，我们坚决的赞助内蒙人民的民族自决与独立，但我们必须向内蒙人民忠告，借日本外力的帮助只有落到更悲痛的、更奴隶化的境地，因为帝国主义就是民族压迫，内蒙人民的真正独立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个斗争中，内蒙人民不是孤立的，中国人民、外蒙人民以及伟大的苏联都是它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都是这些人民的主要敌人，所以这些人民，应当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侵略者。

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是中国人民反日解放运动的中心力量，坚决号召一切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反对军阀投降卖国，坚决为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中国苏维埃红军与共产党坚决反对中国国民党对国内弱小民族的压迫，主张民族自决一直到弱小民族组织独立国家政府。在目前阶段上，中国一切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前面都发生亡国的危险，一切民族应当

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上最亲密的团结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应当彼此帮助，以加强抵抗侵略者的力量。中国各民族间的仇视与离散将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来奴役这些民族。根据这个原则，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主张红军与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彼此间的内战，共同出兵帮助内蒙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帮助内蒙人民的独立，但苏维埃坚决反对干涉蒙古内政，赞助蒙古人的事情应当由蒙古人民自己管理与决定，而主张毫无条件的废除一切中国军阀对蒙古人民的压迫与干涉。红军占领盐池后，把中国军阀从蒙人夺取来的盐池无条件的归还蒙古人民，便是苏维埃立场的最明显的表示。

（四）为了发动内蒙人民抗日救亡斗争，必须在蒙古区域中进行艰苦的工作，我们蒙委的工作虽然现在范围很小，并且刚才开始进行，但必须认识这种工作的重大的意义与前途，估计到内蒙处于中国与苏联外蒙之间的地理位置，估计到日本占领内蒙以作进攻苏联与中国的根据地，并且隔断他们之间的地理连系的作用，估计到日本以内蒙作为进攻中国苏维埃红军及西北抗日力量的前进阵地等等，帮助蒙古人民的反帝斗争与民族解放，联合他们一同进行对日抗战，乃是整个中国抗日斗争之重要一环。因此，把我们在蒙古区域中的工作认为是争取蒙民“中立”或建立“缓冲”地带等等观点，是不正确的。

根据现有的很少的材料，我们对于蒙古人民中的工作有以下

1. 蒙古人民的斗争首先就应当是民族解放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蒙古，争取蒙古民族的生存、解放与独立的斗争。我们应用一切方法，口头的、文字的、个人联络、结拜兄弟等等宣传方法，来向蒙古人民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内蒙的事实，和蒙古灭亡的危险，促起蒙古人民的民族觉醒。要着

重的耐心的说明日本侵略者所制造的“蒙古独立”是灭亡蒙古的阴谋，蒙古人民必须坚决反对这样的“独立”，才能不受日本阴谋的圈套。中国苏维埃共产党关于内蒙人民民族自决的立场，不仅要在口头上宣传上并且要从每一个具体行动上向蒙古人民表示出来，使他们相信，我们所指出的道路是正确的，同时应利用外蒙解放独立的历史与事实来证明这种正确性和斗争前途。我们在工作中联络中，必须以极忠诚的态度取得内蒙古人民兄弟的信任，蒙古人民的事情应当由蒙古人民自己去管理，我们只能站在帮助的地位，如把汉人区域的工作方针与方法向蒙古地区“输出”，不估计蒙古人民自己的意见而“代办”一切事情，以及大汉族主义的微小表现，都只会增加民族间的疑惧，障碍我们的工作，这一些都是为的争取蒙古人民自愿的来与中国苏维埃及红军联合起来。

2. 为了进行蒙古人民反日的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仅应当团结蒙古广大平民群众，并且应当把王公、军人、喇嘛、知识分子也都团结在内。估计到蒙古民族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估计到王公、喇嘛等在蒙人中原有的地位与信仰，应当欢迎他们中的进步分子成为目前阶段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同时组织与吸引广大群众到斗争中来，使抗日力量大大的增强起来，过早的发动蒙古人民的内部阶层的斗争把王公、军人等一律认为是“蒙奸”是不正确的，对于那些被日本侵略者所利用的少数王公领袖如德王等，也不是一开始便宣布他们是卖国贼，与他们对立起来，而是向他们要求实行他们的允诺真正有利于蒙古人民独立解放的实际步骤，在逐步暴露他们所做的不是有利于蒙古人民而是有利于侵略者的事实，来争取他们影响下的王公、喇嘛与平民群众。反日统一战线应当利用每一个具体事实，如派马、派学生去绥远训练等

等，来进行反日宣传与组织的工作。在目前最广泛的蒙人自救会应当成为反日反中国军阀的蒙古人民统一战线的机关与组织，并且争取它的存在与发展。

3. 必须把反中国军阀的斗争与抗日斗争联系起来。蒙古人民如不摆脱中国军阀官僚的民族压迫，是不能顺利的开展的进行反日的斗争，因为中国军阀是阻碍这个斗争的重要障碍。我们不仅是赞助并且应当发动蒙古人民反中国军阀斗争，最近国民党政府强迫改县调印、编立保甲、共同防共等等，引起蒙古人民的激烈反对，我们应抓紧这个事实开展反军阀的斗争，团结蒙古人民，组织起来开展他们的民族解放斗争。^{〔2〕}

4. 我们在内蒙人民中的工作必须从现实出发，把我们苏区附近的各旗作为工作出发点，熟习蒙古人民中的各种问题，考虑我们对蒙民工作的具体策略与步骤，积蓄蒙古工作的经验，特别重要是培养蒙古干部。由联络蒙古人民，把工作和影响再从这些地区推广出去。必须根据具体情形，进行我们的工作，把蒙古人民吸引在中国苏维埃的影响下，利用一些具体问题如退还盐池等，进行两个民族的联络，互不侵犯，但不要拘泥于形式的书面的协定，就是口头协定或相互默认亦好，这样逐步走到蒙古人民与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公开联合，从组织群众的蒙人自救会，团结蒙古人民将来走到建立内蒙人民党，从现在的宣传组织以及个别问题上的斗争走上将来的公开的独立组织内蒙政权与队伍，进行武装反日反中国军阀的斗争。一切脱离实际的过早行动，如现在立即组织独立政府或独立队伍，或其他过早的口号等等都是有害的，这当然不能曲解成为我们应当限制内蒙人民的斗争，相反的，应当尽量开展这种斗争，但必须正确的认识环境，规定正确的口号与步骤，这样才能巩固内蒙人民斗争的基础，向着大规模斗争前进。

正确的实行布尔塞维克的民族政策，耐心的艰苦的进行实际工作，一定能够取得内蒙人民大多数的同情与赞助，来联合内蒙人民与中国人民手携手去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取得蒙古人民与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与解放。

中 央
八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德穆楚克栋鲁普，蒙古王公。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

〔2〕本文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出版的《党的工作》第十一期发表时，此处还有一句为：“但当中国军阀参加抗日战争时蒙古人民应与之联合并给以援助。”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鉴：

自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以来，忽已一年多了。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倡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虽然得到了全国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的拥护，但因贵党及贵党政府迟疑不肯采纳，致使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直到今天还未发动。而日寇则已乘虚直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全国彷徨，不可终日，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掉转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为了这个原故，我们特以诚恳的态

* 本文是毛泽东起草的。

度致书于诸位先生及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之前。

读了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及蒋^{〔1〕}委员长在全会的报告之后，认为贵党二中全会对于全国人民日夜焦虑的救亡图存问题，依然没有肯定的答复，对贵党五中全会“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变，这对于全国爱国人民，不能不是非常失望的。

蒋委员长的报告曾经对贵党五中全会的政策给了新的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人民始终不了解如何方可称为“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的最低限度。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然而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因为蒋委员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又认为：“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因此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在全国人民看来，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

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国的公开走私，民族工商业的陷于绝境，国家财政的趋于破产，海关权的破坏，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关的遍设，日、伪蒙军对于绥远的大举进攻，内蒙独立政府的成立，敌机在我领空上无限制的飞行，日本浪人的横行无忌，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的遭受屠杀，许多爱国人民、爱国军人、爱国警察、爱国记者，甚至许多贵党的要员与贵党政府的官吏，无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军队的被迫撤退，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它的侵略方式的变换，侵略方向的转移，以及所谓“经济提携”的表示，丝毫不是因为它要停止侵略，而正是为了便利于侵略。所以如果以为冀察进兵之后，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五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看吧，正在先生们高谈和平尚未绝望的时候，察北的日伪军又大举向绥远进攻了。绥远、宁夏、内蒙、甘肃各地遍设特务机关之后，又在这些地方建立航空总站与许多分站了。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动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华北增兵之后，凶横的日军蠢蠢欲动，二十九军的防线时有小接触，华北局势

日趋险恶。日寇军事考察团、经济考察团等侦察集团遍行各地，无孔不入。日寇的侦探网遍布全国，并且遍布于贵党与贵党政府的各种组织中。所有这些，只是指明日寇灭亡中国的形势是十分危急了。和平绝不可能，抗战决不可免，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先生们的想法是完全错了。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中曾郑重声明说：“御侮之先决条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国力量于中央指挥之下，齐一其步调，巩固其阵线，故御侮救国之有需于统一与纪律，实为无可动摇之铁则，而军政军令之统一，尤为完成‘近代国家’组织之最低限度”。我们完全承认，为了发动全国人民的最大抵抗力量，为了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绝对必要的。还在九一八事变时，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即已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国军队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曾向围攻苏区的所有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武装队伍提议，立刻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华北事变之后，我们又提出了迅速组织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最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无数次地请求贵党及贵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立即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亡大计，由此大会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所有这些主张，是完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的，是救亡图存唯一正确的政策。全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要求停止内战，集中统一，以便一致抗日的了，只有日寇及其代理人，才会煽动中国的继续分裂

与继续内战，因为这只能给日本强盗造成灭亡中国的条件。

然而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十年以来的内战与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及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及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与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与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苏维埃与红军，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末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更是完全的空谈。

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民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真正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在现时代所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与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

信任，是决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我们认为贵党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党与贵党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党及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与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党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的不能有什么成就与不能得到人民的任何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党及贵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与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同本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与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

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及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之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负之职责”；本党“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然而在我们及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党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党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地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与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文化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与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与爱国之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

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与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地担负起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是坚决地赞助你们的，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现在是谁也明白，如果那时中国国民党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那中国就决不会有像现在这样任人宰割、沦亡及半的惨状，而决然是独立自主的中国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然而，日本帝国主

义与汉奸卖国贼们，则一定会又一次地来破坏这种合作，因为他们明显地知道这种合作会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向贵党政府提出的以“防共”作中心的所谓“三大原则”，就是这种预防及准备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但是问题是很明白的，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一切犹豫动摇，只是国家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诚如贵党二中全会所说：国家兴亡，贵党有责。如果贵党真正愿意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末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民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专此，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彭德怀关于西征中开展 抗日统战工作的指示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

各级首长：

各级政治部主任：

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的重要。但是，我们在这一任务的执行中，除在优待俘虏兵、散发宣传品、扩大影响方面有相当成绩外，是没有达到应有程度，没有收到可能的更大的效果。我们还是落在客观形势之后，这一现象在目前工作的需要上是不容许再继续下去的。各级政治部必须及时的转变，以最大力量把这一工作在更快的速度与更大的范围内开展起来，这就必须执行下列各工作：

一、首先要在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上有一个基本的转变。要使每个指战员深刻的认识：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这对于革命是有决定意义的。要能争取白军，就必须依靠于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广泛与灵活的运用。统一战线工作是为着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使民族革命战争组织与行动起来，达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实现。因此，这一工作，绝不是阴谋的，外交的，次要的。恰恰相反，它应是我们很诚恳的斗争与

最紧急的战斗任务。可是，我们过去在这方面认识是不够的，甚至有或多或少的错误了解，以至于影响到我们工作的紧张进行与广泛的开展。关门主义还没有完全从我们同志意识中肃清。因此，我们应在部队中进行最深入的动员，使大家都了解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与正确的认识。

二、正因为如此，统一战线工作必须成为最广大群众的运动。我们应抓紧一切机会，一切可能，一切社会团体，进行广大的宣传与活动，使得在社会上造成一种舆论，使群众认识只有红军的提议是正确的，只有接受红军的提议才有出路。要争取各阶层都拥护我们，团结主要力量向着主要敌人进攻。虽然这里有些是半路同伴者，但我们到他没有最后离开我们以前还不能放弃争取。我们在进行这一工作中，应时刻的不忘记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为着将来的胜利，是为着整个事业的成功。现在许多小的问题的放松，也正是为着大的获得。我们应估计到各种阶层有他的不同的观念，各人都有其不同的环境，对于工作进行是应适合于这些特点而采取不同的办法，也就更容易的争取。这里须要以最大力量反对关门主义，因为目前关门主义还是主要的危险。

三、对白军的争取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仅依靠部队方面的各种工作，还须经广泛的群众战线，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来推动这一工作的加速的完成。群众力量的运用，是统一战线工作中最重要部分。停战抗日促进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它可以团结各种各样群众在停战抗日的口号下，积极为统一战线实际活动。所以，这一组织应成为广泛的群众组织，各处去发展，不单单在苏区边境，还须向着白区进行主要方向的活动。抗日促进会主要的工作应在白军中。

四、适合于具体事实部队的特点，上下层了解的程

同，特别能抓紧事变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很薄弱的。这使得我们工作虽然有好的计划，但不能达到目的的很大原因。因此，这方面必须要有很大的转变，就是在宣传鼓动的艺术方面也须详加研究。今后我们的口号与宣传品的文句应是很通俗的，富于刺激性的，要能使这些宣传品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力量，要能使这些宣传品在看过以后不容易忘掉。短小精干，专对白军，偏于以客观事实来激起士兵抗日情绪的报纸，是非常重要的，是目前马上应做的工作。

五、要以最大的力量艰苦的培养干部。各级政治部马上在部队中挑选一些适合于做这工作的同志予以训练，使这些人变成统一战线中最坚强最活动的干部，能到各方面进行有效的活动。责成在最近期内各军团须培养至少二十个这样的干部。干部的培养，基本上应在白军自己身上。俘虏的，学生，对抗日同情的以致失业军人，都应广泛的运用，吸收他们到政治部来，以诚恳的谈话、耐心教育、很艰苦的说服、自发的讨论以及生活上的优待……等办法来训练他们，争取他们，把这些人下决心的创造成为最活动的干部。在适当的时机，派到各方面活动。以后，对俘虏官兵，不应随便遣散，应予以耐心争取，给他们最深刻的教育后，再有计划的目的的来处理。最后，部队中抗日战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没有必要时不准随便调动。

六、估计目前日本在绥远的积极进攻，日本在宁夏与阿拉善旗飞机总站的建立与特务机关的活动，使宁夏的群众与军队更实际看见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更急迫的感到宁夏的危机，而更加提高了他们反日的情绪。我们应抓紧这一时机，在宁夏军队中扩大抗日救国的影响，发动保卫宁夏的运动，争取他们到抗日战线上来。我们应向着他们开门，这一工作是目前很重

要的工作，各兵团，尤其是在北线活动的部队，应采取下列步骤来进行这一工作：

1. 由我们发布向马鸿逵、马鸿宾宁夏当局提议书。提议在日本帝国主义处处凶恶的进攻、宁夏危在旦夕的时机中，我们应停止一切战争，共同去抗日，为保卫宁夏、保卫西北而奋斗。这一提议，应在宁夏军队中、群众中公布。

2. 由红军指战员名义发表一个宣言，说明红军西征任务，目前时局与他们自己家乡的危急，我们不愿打他们的诚意，并要求与他们讲和，共同去抗日，去保卫家乡，要他们要求官长与红军停战抗日。

3. 经过各种社会团体与社会关系，进行一个广大的和平停战抗日运动，我们可写信寄给宁夏各机关、各名流，建议和平，加紧准备抗日。

4. 加紧在回民群众中动员，经过群众关系，阿訇、教主的关系来影响他们。

以上的工作是目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中心问题。各部队应根据这些问题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的检查与动员，并须立即具体的布置自己的工作。政治机关应把统一战线工作看作是我们战斗任务之一。对于这方面的领导与督促的加强，应与其他政治工作提到一样的高度。

这一指示信应成为目前部队中主要政治教材之一。

兼政委 彭德怀

八月三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

(一) 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二) 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

(三) 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此要解释我们是真正主张“和平统一”的，我们的主张同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并宣布他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出的全国的国会，拥护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破坏和平统一的。南京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是不能集中统一全中国抗日力量的。

(四) 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

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对广西方面我们赞成他们的抗日发动，是正确的。但我们更应要求他们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他们抗日的诚意，主要的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一切民主权利，发动群众的抗日运动。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抗日运动坚持与扩大出去，才能使抗日运动成为有力的运动。对他们的错误决不放弃批评的自由。对蒋方应指出用内战决不能解决集中统一的问题，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的争论，应付之全国人民的公决。

（五）在对付宁粤两方这种冲突时，我们应力求避免在全中国人民前面，袒护一方面的态度。在全国人民前面，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种态度最能争取广大抗日人民的同情与拥护，在国民党区域中也便于我们的活动。

（六）关于建议“国共合作”的宣言，下次交通即带上，到时广为翻印，分发南京及各省党政军学商工农各界。

中 央

九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周恩来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1]从金陵来，知养甫^[2]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央，与蒋^[3]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

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颖神弛，伫待回教。专此，并颂
时祉！

周 恩 来

九月一号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周恩来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 〔1〕指张子华。
- 〔2〕即曾养甫。
- 〔3〕指蒋介石。

张闻天等关于抗日反蒋不能并提 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朱张任^[1]同志：

甲、来电收到。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2]，并派邓发经新疆去莫申请，他们正等邓发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们来电已经转去。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

乙、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3]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在南京方面不单是我们问题，还有联俄问题。依南京发表蒋廷黻为驻苏大使看来，联俄问题也有成就之望。我们现已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是我们新的宣言，包括了民主共和国、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等新的内容。国际对中国党的政治指示已到，政治局讨论之后即可告知你们。

丙、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向毛、王^[4]等部派出人员进行接

洽，仅在我们必要占领的地方遇到他们的反对才与之作战，但同时进行宣传与接洽。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造一下。

丁、对张学良任何部分都不要取真正攻击态度，应向他的师、团、营长写信，向士兵作普遍宣传。在我们与南京谈判没有成就以前，张学良指挥下的西北各部，包括东北军在内，都还不能停止对我们的敌对行为。东北军之何、于^[5]两部受我们影响尚少，何与蒋有联系，张不能以联红事告他，你们更要加紧工作。

戊、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

己、德怀^[6]在前线指挥野战军，育英^[7]在环县进行东北军工作，我们在保安。

洛、恩、博、泽^[8]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张国焘、任弼时。

〔2〕指共产国际。

〔3〕指蒋介石。

〔4〕指毛炳文、王均。

〔5〕指何柱国、于学忠。

〔6〕即彭德怀。

〔7〕即林育英。

〔8〕指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 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 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策动华北独立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没有一刻停止的，不论它侵略的方法与方式怎样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它并吞全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始终不变的。在华北进兵之后，高唱着的“经济提携”实际上不过是以经济的侵掠与方法巩固已得的阵地，并给新的进攻准备基础。平津与察北的增兵，绥东的进攻，成都、北海、海口、上海、丰台等地的挑衅，表示出日寇的新侵略行动又将开始。民族危机，较之过去，是更加严重了。这指出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更加严重的放到革命政党与全民族身上了。

(二) 一年来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广大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发动，已经给了日寇侵略计划以相当的打击，暂时的阻止了日寇建立华北国与建立“防共统一战线”的实施，这是中国人民一年来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然而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还不够广泛，它的力量还不够雄伟，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有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时还仅在开始的阶段，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及其领导与影响下军队还没有

参加这个战线，国民党的政策还没有基本的转变，因之，民族革命战争还没有能够发动，以致我们不但没有能够停止日寇的继续侵略与保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再不受到损害，而且日寇还巩固了他在华北的地位，获得了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的新的侵占，并准备新的大举进攻。这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但是需要全中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共同行动与艰苦卓绝的奋斗。

（三）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的表现在全国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增长，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抗日救国主张的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赞助与全国主力红军的集中于西北抗日前进阵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开始转向抗日战线，国民党军队官兵中广大成分抗日情绪的增长，和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分化与动摇。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的表示出他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

（四）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寇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但这绝对不应放松对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的批评与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党南

京政府内部的抗日倾向日渐发展，扩大抗日分子的影响，克服其本身的动摇，战胜亲日派，而走向抗日救国的大道。中央必须着重指出：共产党在为着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不但对于统一战线之公开的或秘密的敌人，应该进行严厉的斗争，而且对于口头上赞成而实际上消极的假抗日分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应该保持批评有完全自由。同时中国共产党赞助一切真正的抗日战争之发动，即使这种发动是部分的。但是主要的，应用尽一切方法与力量，最迅速的促进与组织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真正对日武装抗战。为此目的，共产党应继续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反对一切在民族危亡面前自相残杀的内战。

（五）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他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六）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

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坚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的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应该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始，一直到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

（七）去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决议上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大半年来党在执行这一总路线下，虽然得到了许多成绩，主要的在于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是加强了，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是扩大了，向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是进步了，这些成绩应当成为今后工作的有利基础。但是，许多党的组织极不善于具体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武装队伍、每一阶级与阶层，常常不善于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与要求，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求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这种具体实际的行动纲领，并在为着实现这些纲领的共同斗争中，引导推动与组织他们走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或国防会议）、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以至民主共和国。我们许多党的组织不善于这样做，而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满足于少数先进分子的活动，以抽象的、刻板的与机械的方法方式去对付各个具体的问题。同时在统一战线一时不能

建立的场合，却又表现出：“共产党员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之放松或不足。这些弱点，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到今天还没有成为千千万万抗日大众实际参加的主观上的重要原因。

（八）中央认为必须及时纠正那种以为阶级斗争的发动会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民族革命的胜利决不是少数上层分子所能完成的。不吸收成千百万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就不能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就不能推动与逼迫动摇的游移的上层分子与当权者走向真正的抗日的道路，就不能实现民主共和国。而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解决他们迫切的生活要求，是组织他们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关键。但在领导这种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中，共产党员要同样的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到斗争中来，并根据于他们的觉悟的程度与组织力量，把群众的日常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使这种斗争成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继续发展与继续前进的力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的基础。

（九）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过程中，绝对不应该削弱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苏维埃红军在一定纲领上同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所成立的政治军事协定，但并不与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但并不取消苏维埃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须充分注意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那种不经过选择的允许学生及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加入红军的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样足以破坏红军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充分注意加强苏维埃的领导成分，那种

允许资产阶级参加苏区政治管理的意见，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内部来破坏苏维埃机关。即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共产党也决不放弃对于苏区人民与原有武装力量的绝对的领导。相反的，党在坚决领导全中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与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中要坚持着扩大与巩固自己的政治的与军事的力量，保障抗日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彻底的胜利，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

(十) 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苏区内特别在非苏区内有系统的征收党员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须避免大批入党的办法，而只吸收经过考察的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在这个意义上，去年中央十二月决议中“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与“党不怕某些投机分子侵入”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采取实际办法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因为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在彻底实现党的政治路线上，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优秀干部，有着决定一切的意义。动员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到一切无组织与有组织的群众中去争取千百万的群众在自己的周围，正确的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为着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治任务面前一刻不可放松的任务。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对于忽视党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忽视巩固苏维埃与红军，放松对于广大下层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对同盟者批评不够等等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及时的给以纠正。但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彻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的危

险。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的发展，将是完成党的一切政治任务的有力武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毛泽东等关于发展重点在宁夏 不在甘西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

朱张并致任贺^[1]：

篠申电十九日十二时收到，敬复如下：

甲、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2]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

乙、我们已将宁夏、甘西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且城坚难破之困难条件报告国际，并说明须取得苏联飞机、大炮之帮助，才能破城。现据回电说，到宁夏地区后给帮助。则我军只要能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

丙、外蒙、宁夏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路，过去即从这些道路接济冯玉祥。邓小平同志亦亲从定远营汽车路走过。他们从外蒙接济，我们先占领定远营。

丁、据宁夏同志云，宁夏因有贺兰山，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实行攻甘西，亦须得到苏联协助才能攻克甘凉肃三州等坚固城池。现盐池、定边可大批买布，我们在向李毅^[3]借款，为你们制备一批衣服。从中卫到红水、永登，沿黄河西岸并不通

过沙漠。

戊、攻宁夏须待结冰（无造船把握），结冰从阳历十二月开始，距今还有七十天左右。此七十天内，四方面军占领静宁、通渭、会宁、靖远、海原、中宁（中宁县在金积县西南）及金积之一部，粮食不成问题。一方面军则占领固原、灵武、同心城及金积之一部，准备十二月初渡河。

己、因马鸿逵有二十余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成等军在我军侧后，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占静、会地区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

庚、据最近调查，靖远以上至兰州不结冰，靖远以下均结冰。

辛、目前对胡宗南不宜进行决战，只须速进静宁以西，占领广大阵地，让他展开筑碉。我在七十天内逐步北移，至十二月一四两方面军各以一部拒止南敌，各以主力北进攻宁，配合苏联帮助，夺取宁城，至明年春暖再行决定分路西进、南进、北进。

壬、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毛 周 彭^[4]

十九日十五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张国焘，任弼时、贺龙。

〔2〕指共产国际。

〔3〕即张学良。

〔4〕指周恩来、彭德怀。

毛泽东给蔡元培的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子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倡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子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

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李石曾先生，吴稚晖先生，张溥泉先生，于右任先生，孙哲生先生，居觉生先生，覃理鸣先生，柳亚子先生，叶楚傖先生，邵力子先生，汪精卫先生，陈璧君先生，经亨颐先生，陈公博先生，顾孟余先生，曾仲鸣先生，甘乃光先生，张静江先生，戴季陶先生，陈果夫先生，丁惟汾先生，宋子文先生，陈树人先生，褚民谊先生，彭泽民先生，李任潮先生，李德邻先生，陈友仁先生，邹海滨先生，徐季龙先生，朱霁青先生，白云梯先生，恩克巴图先生，李福林先生，陈护方先生，程颂云先生，唐孟潇先生，朱益之先生，李协和先生，柏烈武先生，刘震寰先生，谭逸儒先生，张知本先生，冯自由先生，谢慧生先生，茅祖权先生，蒋雨岩先生，

孔庚先生，郭沫若先生，沈雁冰先生，陈望道先生，李鹤鸣先生，胡适之先生，章行严先生，周作人先生，钱介磐先生，傅斯年先生，罗家伦先生，段锡朋先生，陈宝锷先生，张东荪先生，彭一湖先生，彭泉舫先生，杨端六先生，胡子靖先生，陈夙荒先生，周谷城先生，舒新城先生，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

道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介石先生：

自先生揭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惟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

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先生素以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传统为职志者，十年秉政，已示国人对外妥协对内征服之失策。现大难当前，国人抗日之心甚于“五卅”，渴望各党合作之忧甚于民国十三年改组，先生其亦有志于回到孙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之传统而重谋国共合作乎？当先生实行孙先生革命政策时，全国群众闻风景从，先生以之创黄埔，练党军，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直抵武汉。及先生背弃孙先生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内乱

不已，继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先生抚今追昔，其亦有感于内战之不可再长而抗日之不容再缓乎？苏维埃与红军为此呼吁，至再至三，但仍不得先生之坚决同意。前者东向抗日被阻于晋，今者全国主力红军集中西北，目的更全在抗日，乃先生又复增兵相逼。先生岂竟忘日寇已陈兵绥东，跃跃欲动，即欲变西北为殖民地耶？来敢正告先生：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特以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祸无穷。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欢，停战议和，未可骤信，则先生不妨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必知红军力守信誓，只愿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一定防线，以其全力献之于民族解放，他则一无所求也。先生其亦有意于一新此民族壁垒而首先在西北实现乎？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此共产党、红军确定之政策，将千回百折以赴，不达目的不止者也。

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党政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奉上八月二十五日敝党中央与贵党中央书，至祈审察。迫切陈词，伫候明教。顺祝
起居住胜！不一。

周 恩 来
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周恩来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果夫、立夫两先生：

前由黄君^[1]奉陈一书，想已入览。关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日寇图我益急，弟方停战要求已至再至三。乃蒋^[2]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3]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窃以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养甫^[4]先生曾数数以书信往还，弟方更屡次竭诚相告，而蒋先生迁延不决，敌对之势非但未变，且更加甚。此徒长寇焰，丝毫无益于国难之挽救者也。

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汉同志是联络代表，他不负任何谈判责任），到时希赐接洽。临颖匆匆，不尽欲言。即颂
时祺！不一。

周 恩 来

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周恩来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 〔1〕指张子华。
- 〔2〕指蒋介石。
- 〔3〕指胡宗南。
- 〔4〕即曾养甫。

周恩来关于中央长征到达 陕甘北部后的情况给张鼎丞等的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鼎丞、子恢、震林^{〔1〕}诸同志：

一年来从报上，最近复从南来人口中得知你们的苦斗不懈，中央各同志对你们表示无限的敬意和欢慰。我们长征一年由各方到陕甘北部，一年后二四两方面军又续来，现亦抵甘肃南部，不久将可会合。中央到陕甘后即以建立统一战线号召全国，去年十二月成立政治决议案。今春发布致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公函，均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向全国提议召开抗日救国代表会议，成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以统一抗日领导。一年来，这一运动颇着成效，上下层统一战线均见开展，尤以西北红军之胜利及南方游击战之坚持，更推动了这一运动。现由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又迭致公函，向国民党申述愿谋两党合作诚意，主张为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与抗日的国防政府而斗争。（下略）

此致

周 恩 来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陕北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邓子恢、谭震林。

朱德、张国焘等关于目前作战部署 问题给毛泽东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毛、周、彭并贺、任^[1]：

(甲) 我们完全同意国际^[2]指示，实现红军主力进到宁夏及甘肃北部的计划。

(乙) 并具体实现一、二、四方面军在这一地区的会合。

(丙) 估计到一、二两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

(丁) 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前有敌人封锁，如在该地区作战须停留六个月，物资补充不便，万一决战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敌人时，则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

(戊) 为迅速实现夺取宁夏和甘肃北部的战略方针，和实现全国红军的大会合的目的，我们提议为如下的部署：

(1) 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经乐都、享堂附近一带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扼阻兰州敌北进；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并监视西宁、河洲之敌；以两个军暂在岷州、漳县一带活动，将胡敌向岷州方向吸引。这一任务完成后，上述三个军即迅速全

部转移到凉州、永登一带地区，以主力扼阻兰州敌，以有力一部向一条山、静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完成会合和互相策应形势。

(2) 一方面军即在现地区活动，将敌人逼向西兰公路，并从侧面牵制之，尔后在结冰期或一、四两方面军渡河，工兵队的隔岸互相接应，实现一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相机消灭马鸿逵一部，占领宁夏、中卫一带地区。

(3) 二方面军完成在两当、宝鸡牵制胡敌东进任务后，即经枸邑、郿县、庆阳中间地区打通一方面军，在一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即依据原陕甘北苏区向南活动。

(己) 依据四方面军造船技术，即永靖、循化两桥被敌破坏时，亦能达到迅速渡河之目的。两个军由洮洲到永登连造船时间在内，约需十二天。时机急迫，千祈采纳，并告国际。

朱、张、徐、陈^{〔3〕}

二十二日二十二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

〔2〕指共产国际。

〔3〕指徐向前、陈昌浩。

朱德关于少数同志拟推翻静会战役 计划原案给林育英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英、洛、毛、周、彭、贺、任、刘^{〔1〕}：

(甲) 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2〕}，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

(乙) 现再将西北局同志集中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

(丙) 子昆^{〔3〕}、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朱 德

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刊印。

注 释

〔1〕 指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

〔2〕 指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的关于北上夺取通渭、庄浪、静宁、会宁的战役计划。

〔3〕 即周子昆。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斯诺问：能否请你解释一下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它对国民党政府态度的改变。

毛泽东答：有三个主要因素使我们决定最近的宣言中所公布的政策。

首先是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它日益加剧，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以致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面前团结起来。除了共产党以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如果不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

第二，从去年（一九三五年）八月以来，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一直在呼吁全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对于这个纲领，人民群众的反应是赞同的。今天，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热切盼望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标团结起来。他们热切希望结束内战。这一点不实现，抗日运动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 这个谈话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

第三，即使在国民党内部，现在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鉴于民族的危急存亡，准备实行联合。

以上这些就是当前中国形势的主要特点。由于有这些特点，我们必须重新仔细地考虑能够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具体方案。事实上，这种方案已经在最近和国民党的谈判中提出来了。我们所坚持的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实现这个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抵抗外国侵略者，二、给广大人民以民主权利，三、加速发展国民经济。

这样一个纲领符合当前人民的意愿，并将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苏维埃政府赞成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理由也即在此。

我们将支持成立一个有国会的代议制政府，一个抗日救亡的政府——一个保护和支持一切人民爱国力量的政府。如果这样一个共和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将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的地区将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采取同样的措施以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

问：这是不是说，这样一个政府的法律在苏区也同样有效？

答：是的。

问：这是不是说，苏区的现行法律，特别是有关土地问题的法律，将被废除？

答：如果同南京政府建立了统一战线，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当然，我们知道日本与中国的亲日派会强烈地反对这个纲

领，这个纲领的原则是和他们的利益直接冲突的。但是中国人民将会欢迎这个纲领，我们相信他们将进行斗争以促其实现。每一个有良心的人一定会看到，如果不这样做，就要被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就要灭亡。

我们知道，一部分国民党人已在反对进一步向日本人屈服。正如在我们自己的工人和农民中一样，在广大人民中，在各阶层中，在军人、科学家、学生、商人、警察和自由职业者中，已经出现了有组织的抗日爱国团体，我们衷心希望同这些团体携手合作。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会组成一个联合的力量去压倒亲日派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会帮助恢复并再次实现孙中山在大革命时代实行的基本原则，即（一）联合苏联与一切平等待我的国家，（二）联合中国共产党，（三）保护中国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能帮助实现孙中山的遗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如果这样的运动在国民党中发展起来，我们准备同它合作，给予支持，并同它组成一条反帝统一战线，就像一九二四——二七年存在过的统一战线那样。我们深信这是救国的唯一途径。如果这样的纲领实现了，我们是不必惧怕日本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无法打败真正团结、武装和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的。

不过，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打算组成它自己的反共战线。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实际上是一条灭亡中国的战线。我们要建立一条民族解放战线，它的成功将意味着抗日斗争的胜利，这个胜利，归根到底，也就是世界和平的胜利。因为只有获得这样的胜利，中国人民才能和世界上所有的自由人民并肩前进。

问：你所说的“代议制”政府的确切涵义是什么？例如，在选举权方面，你将坚持什么样的最低条件呢？

答：选举权应该是普遍的，不受财产、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和性别的限制。

问：如果南京接受这样的纲领，红军将同意改变它的名称，并服从南京的上级命令吗？

答：我们承认，在一场抵抗日本的战争中，全国军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但是我们也认为军事委员会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应该强调指出：这一点只有在成立抗日民族解放战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有些国民党分子也在谈什么“统一”，但是却不支持民族解放和反帝运动。实际上很清楚，没有真正的反帝斗争就没有国家的统一。

至于红军换不换名称，要视重新联合的情况而定。

问：这一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承认，必须首先实现民族解放，然后才能完成阶级革命？

答：在现阶段，必须将反帝运动进行到底，这是共产党目前的而且也是历来一贯的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强调抗日民族斗争并不是什么新的论点。同时，正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我们相信，只有同时实现被压迫农民的解放和孙中山的第三条原则即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抗日运动才能有效地开展。

问：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愿意放弃，或者无限期地推迟执行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其重新分给贫穷、无地的农民的政策？

答：这也要取决于抗日运动的发展。不过，我们深信，如果不减轻农民的负担，抗日的纲领是无法实现的。土地革命，正如你知道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并不反对目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这一原则是符合国内一切民主人士的要求的，我们衷心支持它。

问：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统一战线，是不是实际上意味着立即向日本宣战？

答：是的。很可能是今天宣布联合，明天就会爆发战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周恩来给胡宗南的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宗南同学：

前由沪上转致一函，不识能达左右否？兄十年“剿共”，南北奔驰。今番转师南下，兵不血刃，不可谓非蒋^{〔1〕}先生接受国内停止内战之一致要求为国家保此元气也。今闻兄已奉命来陕，重整师干，向红军进攻。在蒋先生或以为红军非易与者，非以重兵压境不能逼使就范。但兄不能无视过去战况。远者不论，松潘之役，兄固控制战略要点矣，且更借自然屏障，企图困我于蛮山草地，然包座之战竟不能阻我长驱。今者形殊势异，我三个方面军已联成一气，所求者又在北上抗日。兄率孤军深入，匪特名不正言不顺，即以势言也不利。且兄更不能无视日寇侵入西北之急，相凋则徒损国力，相持则坐使日寇收渔人之利。西北再失，则同陷浩劫，同为奴隶，尚何胜负可言！故红军非不敢言战者，更非压迫所能就范者，要以国脉垂危，诚不欲斫伤过甚，是以不惮再四呼吁，祈求停战御侮。现特再以共产党致国民党公函附陈省览，希加审察。吾侪均为有民族血性者，又同与于大革命之役，虽中经乖异，但今当大难，应一切以救亡为前提，共矢御侮真诚，吾兄其有意乎？夙闻黄埔同学中，颇不乏趋向于联俄联共以救国难者，蒋先生亦曾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言，兄果能力持大义为同学先，则转瞬之

间，西北得救，合作告成，抗日前途实深利赖。兄若以奉命为辞不便独断，则建议于蒋先生，一面按兵待命，犹愈于拼命屠杀为国人笑。此为国家留元气，为抗战保实力，不仅民族之幸，抑亦兄与蒋先生之所福也。倘愿遣使相商，尤所盼祷。专此。顺候
戎祺！

九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周恩来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朱德、张国焘等关于红四方面军 今后行动方针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

英、洛、泽、恩、博、稼、贺、任、关、刘^[1]同志：

甲、我们首先申明对国际^[2]指示和统一战线进展情况不甚明了。

乙、根据已经知道的材料，我们有如下的估计：

(一) 国际对红军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请求帮助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大批新式武器。据我们估计，国际的帮助现在还只能是秘密的。交通线如只有定远营这一条，易受日本特务机关和内蒙王公反动势力的妨碍。遵照国际指示，先机占领甘北更为有利，因甘北有更多道路通外蒙和新疆，交通易于秘密，不受日本势力阻碍。

(二) 胡宗南入甘必然会向我们积极进攻，且有后续部队增加可能。张学良在蒋^[3]势力压迫下，对我军有可能采取较积极行动。来电谓恩来将去南京，我们对此不大懂得。

(三) 如果一、二、四方面军都集中西兰公路以北，万一敌将宁夏兵力加强，甘北凉州、古浪、永登线形成封锁，敌主力由西兰公路向北压迫，整个红军将陷于狭小地区。

(四) 如果准备决战，红军集中在一块是有益的，否则不

如在宽广地区互相配合行动，以至互相接通，更为有利。

(五) 应当估计须首先求得战斗胜利，和先机占据有利地位，国际帮助才能获得。

(六) 因此，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环，既可接通外蒙、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又可接引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地区。

丙、根据上述估计，因此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经绪化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将胡敌向甘北吸引，对一、二两方面军实为有力配合。敌若以主力入甘北，又给一、二方面军在现地区大大活动机会，由四方面军以有力一部接引一、二方面军合力取宁夏，则宁夏更有把握取得。现部队已按此决定调动，不便再更改，千祈采纳。

丁、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日，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的，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的，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

朱 徐 陈⁽⁴⁾ 张

二十六日十二时

二

毛、周、彭⁽⁵⁾：

甲、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此计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乙、我们提议一方面军主力不必延伸到西兰公路，防敌从黑城镇、同心城截断我一方面军。

丙、我们在一月内能到靖远附近会合，请□□□解决。

丁、勿使全党、全军对会合失望。

朱 张 徐 陈

二十六日二十二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

〔2〕指共产国际。

〔3〕指蒋介石。

〔4〕指徐向前、陈昌浩。

〔5〕指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 关于红四方面军宜迅即北上 给朱德、张国焘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朱张，陈徐同志并致贺任刘^[1]：

甲、迭接二十六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

乙、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2]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3]敌因西兰路断怕我夹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4]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僻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虑。

丙、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5]，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

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一方面军目前一面确占界石铺，一面立即出四个团以上通过隆静线，直迫秦安、天水，使胡敌不敢动作，以便四方面军十分安全的北上。务请朱张陈徐四兄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亦即九月十八日朱张陈三同志之方针。

丁、请诸兄速决速复。

毛 周 彭

九月二十七日十四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陈昌浩、徐向前，贺龙、任弼时、刘伯承。

〔2〕指共产国际。

〔3〕指胡宗南。

〔4〕指毛炳文。

〔5〕指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的关于北上夺取通渭、庄浪、静宁、会宁的战役计划。

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十月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等为庆祝红一、二、四 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彭司令员兼政委、贺总指挥、任政委、徐总指挥、陈政委转一、二、四方面军各军事政治机关、各军师团营连排班首长及全体红色战士同志们：

(甲)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谨以热烈的敬意与欢跃的贺忱，致之于我们的民族英雄与红军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张国焘同志、周恩来同志、彭德怀同志、林彪同志、徐向前同志、陈昌浩同志、贺龙同志、任弼时同志、王稼蔷^[1]同志、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萧克同志、徐海东同志之前，致之于各军军长同志、政委同志，各师师长同志、政委同志，各团团长同志、政委同志之前，致之于各级参谋机关首长之前，致之于各级政治机关首长之前，致之于全体红色军事政治指挥员、战斗员、全体光荣的民族英雄之前。

(乙) 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决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

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丙）我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也将向正在革命怒涛中的西班牙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反革命的好朋友；将向法国、比国、捷克国及全欧洲各国爱好和平的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防御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好朋友；将向英勇抗争至死不屈的亚比西尼亚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意大利侵略的好朋友；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好朋友；最后我们将向苏联共和国、外蒙共和国、内蒙民族、西北回人证明，我们是与他们共同奋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世界侵略者的最切近的好朋友。

（丁）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万岁！

中华民主共和国万岁！

中华苏维埃万岁！

中华民族自由平等独立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一九三六，十，十

根据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出版的
《斗争》第一一四期刊印。

注 释

〔1〕即王稼祥。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 关于十月份作战纲领给朱德、 张国焘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

朱、张两总并告贺、任、彭、徐、程^[1]：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战略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下：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以有力部队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取得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靖远、会宁地区筹粮休整，派出数支队，筹好后立即出动，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前进我不能与敌对持，应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尽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川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宁、隆德线以南，威胁胡^[2]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固原、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及豫旺城于我手。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

军到达静宁、隆德后，向北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3〕}支队暂在黄河东岸向海原威胁与留干部，使敌不敢东进，尔后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军，集中定边、盐池地区，一部逼进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县、曲子镇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边、盐池一部等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主力，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庚、十一月一号前各部注意整理、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的执行新任务。

辛、宣传鼓动以庆祝三个方面军会合，消灭阻拦抗日红军去路捣乱红军抗日后方之敌，争取国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等口号为中心，不提宁夏任务以免泄露。

壬、本纲领以情况变化得部分更正之。

癸、本纲领不得下达，各部任务由朱、张两总转及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

中央及军委

十月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贺龙、任弼时、彭德怀、徐向前、程子华。

〔2〕指胡宗南。

〔3〕指陈漫远。

毛泽东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

(一) 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党革命军之任何行为进攻。

(二) 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要之自卫手段。

(三) 凡属国民党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

(四) 如国民党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党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目前察绥晋三省形势已属危急万状，吾人极愿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达援绥抗日救亡图存之目的。如南京政府果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师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决一死战。

根据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红色中华》刊印。

^{*} 这个谈话是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表的。

怎样进行群众工作^{*}

——给群众工作的同志们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刘 少 奇

我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只有先锋队，是不能战斗的。必需组织无数千万的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才能战胜我们强有力的敌人。因此，在政治上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尤其重要的是广大的组织群众，就成为我党准备革命唯一重要的任务。

组织无产阶级的群众，是党的基本任务。组织一切劳动群众，组织小资产阶级群众，组织一切抗日的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联合各党各派建立抗日反汉奸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这是我党目前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的总方针。然而这一切，都依靠我党极能干的在极大范围之内的群众组织工作，才能达到。因此，我党必须把群众的组织工作，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上来。

为要真正广大的组织群众，必须努力造成下列的条件：

一、争取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的自由，尽量的广泛的利用现有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的《火线》第六十三期。

二、创造群众运动的、获得群众极大信仰的无数的领袖。

三、采用完全民主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

必须具备上列三个条件，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才能大踏步的前进。用秘密的方式是不能组织广大群众的。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是不能坚持、没有方向的。不采用民主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是不能发挥群众伟大创造力的。然而，我党过去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错误，是无视上列三个条件，采取与上列三个条件相反的方针，所以使白区群众组织，到处受到失败，不能获得任何成绩，现在必须改正！

（一）

一切参加群众组织的同志，必须正确的了解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群众组织是独立的。它在组织上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党与任何一个自由的群众组织，是处在平等地位的。但是任何一个党派都可以要求群众组织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路线。我们要求群众团体接受我们的政治主张，但是我们反对群众团体在组织上隶属于党。因为群众团体隶属于党隶属于政府，那只能是御用的、官办的、没有自由的团体。国民党、国民政府“指导民众运动”，命令民众团体，就是取消民众团体的独立。而我党与苏维埃政府的方针，则完全与此相反。我们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与自由，并且反对任何方面妨害它的独立与自由。我们在政治上要求群众团体接受我们的领导，但在组织上绝不妨害群众团体的独立，因为我们只用说服群众的方法使群众自愿的接受党的政治主张，而绝不采用强迫的手段压迫群众依照党的方向行动。当着我们说服了群众的时候，群众自动接受我们的政治领导，这正是群众的自由。

可是上面这种粗浅的原则，常为我们许多同志所不了解或误解。他们以为党应该领导群众，就是群众应该服从党。他们以为群众团体应该受党的领导，就是群众团体应该隶属于党，成为党的附属物。如是他们可以破坏群众团体的独立，劫持群众，命令与强迫群众，甚至玩弄与欺骗群众。他们站在群众外面直接去决定与干涉群众团体的一切行政，或者他们在群众团体里面又不服从、尊重群众团体领导机关的决定、委托和权利，他们破坏这些决定、纪律，而自由行动。他们屡次的公然的进行这些行为，而不知错。他们的观点和国民党一样，群众团体不隶属于国民党就得隶属于我。这样，他们就自然和群众对立起来，群众反对他们也会和反对国民党一样。

我们不尊重群众，不信仰群众，就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能取得群众对于我们的相信和尊重。我们不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自由和权利，就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团体。因为不独立、不自由、无权利的团体，是无用的团体。我们党是最尊重群众意见的党，我们的党员将应该是最尊重群众权利的人员。我们的党员既加入群众团体，不论是作会员，作职员，作领袖，都应该首先尊重这个团体，尊重它的一切机关、决议、命令和权力，成为一切会员的模范。遇有损害这个团体尊严和权利的事件，不论是从内部发生或从外部来的，我们都应该反对，为拥护这个团体而斗争。只有这样，群众团体的权利和威信才能建立起来，我们的同志才能在这个团体中取得信仰和地位。

(二)

民主的工作方式，是群众工作的基本方式。我们拥护群众

团体的组织章程完全合于民主主义，反对限制会员群众与代表机关的应有权利，反对任何派别任何方式的包办群众团体。少数服从多数，在群众团体中是必须拥护的制度。我们在群众团体中的提议，只有取得多数的赞成与通过之后，才能执行。倘若大多数不赞成我们的提议，而通过其他派别的提议，不管我们的提议是如何的正确，而大多数的决议是如何的错误，我们一方面在组织上要服从大多数，依照大多数的错误的决定行动；另一方面我们不放弃自己的提议，继续宣传我们提议的正确，指出大多数决定的错误。只有等到大多数明了，接受我们的提议，抛弃原来错误的决定之时，才能执行我们的提议。

争取群众，说服群众的大多数，是一个长期艰苦的工作过程，往往不是一下能做到的。往往需要多少年的千百次的说服与斗争，才能获得大多数。

当着我们还是少数，我们的提议被大多数所否决的时候，如果我们不顾大多数的决议而根据自己的意见自由行动，那就是我们与大多数分裂。如果这种分裂对于革命、对于群众是不利的，那我们这样做就犯了一个大罪。

可是上面这一个粗浅的原则，又常常为我们许多同志所不了解或误解。他们以为少数服从多数，只是要人家服从他们，他们不服从多数。罢课可以不经过多数赞成，“全体”的名义可以随便冒用，代表可以冒称，决议可以由少数人通过，委员会、代表会的决定，人家都要服从，可是他们可以不服从，可以随便修改、取消。他们只管党的决定，依照党的决定直接执行，他们不管群众团体的决定，他们没有服从群众公意的义务。他们不知道党的决定仅是对群众的一种提议，必须经过群众的通过之后，才能以群众的名义去执行。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超于群众之上的一种权力。他们常常是不自觉的破坏群众运

动，使群众及各派感觉我们是在进行阴谋，利用他们。

我们同志在群众团体中，必须非常公开坦白的工作，必须采用完全民主的方式工作。群众团体的职员、代表，必须由群众选举，代表必须尊重与执行群众给予他的训令，并向群众作报告。一切的决议要经过多数的通过。要吸引各派的人及多数活动分子到领导机关来。各种提议要分作许多人提出，不要总是一个人来提。领导机关的工作要经常向群众作报告，请求群众批准。要接受群众的意见，撤退一切不称职的人，而我们的同志必须完成群众或领导机关给予他的每一个任务和工作。必须如此，我们的同志才会取得群众的信仰与爱护及各派诚意的合作，而这个团体才会有生气有发展。

(三)

要广大的组织群众，就必须采用公开的方式，至少是半公开的方式。现在全国各地虽然是极端反动的环境，但是还有不少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给我们利用。救国团体可以半公开的组织，一切文化、娱乐、研究等组织可以完全公开进行。社会上还有各种各色合法的团体给我们利用。而我们最近又主张停止内战、和平统一，与取消打倒国民党、反对各地方政府的口号，也更便于我们活动。现在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去组织广大的群众。但是现在我们的党还是处在极端秘密的环境下，因此，要取得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的公开，必须使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在表面上完全离开党。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不要着上与我党有任何组织关系的痕迹。不要使敌人从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中找到任何我党的组织关系。因此，我党在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中一切负责的同志和领袖，必

须与党在组织上断绝一切关系，不要使任何人知道他们是同志，仅仅只与一个特定的同志发生关系，取得党对于他的指导和帮助。他们不应参加党的任何会议，不担负党的任何其他工作，他们完全以群众中之一员的资格来参与领导群众运动（但同志加入群众团体作会员的还应参加支部）。他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应该完全群众化、社会化，避免用一切党化的名词、言论、文字和方式。他们的行动应该完全公开，不要鬼鬼祟祟、也不要怕侦探怕奸细，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组织关系。如此，才能使党的破坏不会影响到群众团体，同时也不至因为群众运动联系到党的破坏。同志才能放胆活动。

可是上面这一个粗浅的道理，又为许多同志所不了解。他们用党的工作方式去进行群众工作，同时又用群众工作的方式进行党的工作，使二者混淆起来。如是弄到应该公开的不能公开，应该秘密的不能秘密。结果是党与群众工作都被破坏。有时候他们甚至在党内党外公开宣布某某团体为党所领导，某某领袖与党有关系。有些人住在党的秘密机关内去进行公开群众工作，担负公开群众工作的同志同时又担负党的秘密工作。他们冒称“群众”，冒称代表，冒称职业，用假姓名，在群众面前的态度方式，一切都是鬼鬼祟祟的。这种混乱的情形，过去是不知造成了多少罪恶，然而到现在还是没有改正。这都是因为不了解这个粗浅道理所致。

所谓争取公开的说法，是错误的。把不能公开的东西和人员强行要去公开，那是冒险，那是罪恶。

（四）

党应该派大批在环境上允许公开的干部去专门进行群众工

作，已经在担负群众工作的干部绝不要调到秘密机关来（除非不得已），并要切实保护他们的公开地位。党要培养与创造大批群众工作的干部与领袖，而秘密机关的人员则应该减少。这是两批不同的人才。群众工作是要委托那些群众工作的干部全权去进行，完全依靠他们，并且信任他们。他们应该在党的方针之下独立的去进行活动。凭他们在群众中的地位和信仰，凭他们的聪明才智与英勇的工作能力，凭他们在政治上的觉悟与对于党的忠诚，他们应该独立的去领导群众运动。他们应该不是小孩子离开党就不能行动的。他们应该自己估计环境，自己提出主张，自己确定办法，向着党所指定的目标行进。党的秘密机关只应该在各时期在政治上给他们以原则的指示，并在各方面援助与帮助他们。党的秘密指导机关应该避免在工作方式和方法上以及在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上去干涉他们，不要代替他们在工作方法和方式及技术问题上去决定一切（当然一切都可以和他们讨论，并提出意见去帮助他们，但无论如何党不应该决定一切）。只有这样，他们才有伸缩的余地，在群众中去执行党的决定，才可以提高他们的自动性与责任心，才能造成真正的群众工作人才。

然而这个粗浅道理又为许多同志所误解。他们以为群众团体的党团，应该绝对执行党的决定，如是他们就决定一切要党团拿到群众团体去“绝对执行”。不只是决定政治方针和政治口号（这方面他们反不注意），而且在各种具体问题、技术问题上代替群众决定一切。然而因为他们坐在秘密房间内，对于这些具体与技术问题是不了解的，一切决定又是不正确的。如是党团的同志不包办，不用强迫手段，是无法“绝对执行”这一切决定的。许多的错误也就由此产生。群众工作的干部也就变成机器人，党没有决定，他就不动，他怕动，不敢动，他的

聪明智慧与自动性就被窒息，顽强的就被认为不执行党的决定而受到制裁。难道这种情形现在不是还继续着吗？有人不是为着三日刊、五日刊的问题闹到不能开交吗？九一八纪念不是有人决定要如何讲话吗？然而在这种情形下，群众工作是无法做好的，秘密工作也是不能允许的。

党的指导机关要和群众工作的同志讨论一切方法方式等具体问题甚至技术问题，党应告诉他们许多方法，和他们详细讨论，帮助他们。但党不应该决定所有这些问题，要同志去绝对执行。这些问题允许同志们根据群众中的实际情形去变通办理，党只不能允许群众工作的同志违背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方针。党应该训练群众工作的同志，使他们了解党的主张与策略路线。他们了解了，就让他们大胆的放手的到群众中去活动，党经常的在原则上给他们以指示，并时刻从政治上、方法上、经验上去帮助他们。这是以后应该采用的办法。

为秘密工作的关系，某些团体的党团最好不要，只由个别同志分别接头。群众的领袖应该注意保存，如果敌人注意他了，他应该减少或停止活动，以免被捕或被开除。运动即让给别人来领导。

（五）

群众团体是各种各样的，有各种不同的性质。我们的同志参加这些团体总不要忘记这些团体原来的目的。比如工会必须为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学生会必须为学生谋利益，学术团体必须研究学术，文化教育团体必须办文化教育工作，同乡会必须实现同乡的互相帮助等，而且要使原来的这些目的实现，办得有成绩有信仰。但同时我们在另一方面必须接近与团结其

中进步的分子，设法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并谨慎的设法吸引他们来参加政治活动与抗日运动等。必须这样，才能吸引更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才能保持它完全公开的地位。然而这也常为我们许多同志所不了解。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作政治运动，他们对于各种团体原来的任务根本没有兴趣，忘记它，抛开它，把一切学术团体、文化教育团体、同乡会等变成单纯的政治机关。结果，这些团体不是自己塌台，就是受到敌人的打击。我们公开工作的地盘也就因而愈加缩小了。这是以后必须改正的。

我们要长期坚持进行公开的群众工作。千辛万苦建立起一个公开群众团体，不应该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就根本把它弄塌台。同乡会来举行“八一”纪念，如果是不适合的，只好不举行。救国运动由救国会来领导，其他学术文化团体参加可以，如果这些团体在环境上不适合公开来领导救国运动，只好暂时不公开来领导。

(六)

日本帝国主义目前在我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亡国灭种的大问题，我们要吸引一切团体、一切人民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要建立各党各派的人民阵线，这就开展了我们群众工作的更好的条件。我们在各种群众团体中，应该向各党各派的领袖和群众提议合作。我们对蓝衣社、国民党、胡适之派以至杨立奎等都可以而且应该向他们提议合作，邀请他们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如果他们拒绝参加，拒绝合作，那就明显的证明他们是分裂救国运动。如果他们来参加，那就应该和他们在群众运动中来比较谁是群众真正的领袖！

在目前人民阵线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对于那些愿意参加救国运动的派别要有适当的让步，以便吸引他们和我们合作。我们应该用诚恳的同志的态度和他们讨论一切问题，并批评他们的错误。我们要使他们在群众中能够宣传他们自己的观点，并在群众运动中使他们占有相当的地位，我们要吸引他们来经常参加和援助群众的行动。我们不要有拒绝任何派别参加群众运动的态度。

但是，我们既在群众运动中和各党各派合作，而各党各派就各有自己的立场与利益，因此，在统一战线中，各党各派互相的批评与“斗争”，是经常不能免的。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避免这种批评与斗争，我们主张各派都有宣传自己观点与批评别人观点的自由，而一切取决于群众大多数的公意。在这里，我们的同志在群众中，就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并利用一切的机会宣传自己的观点，同时要批评各党各派错误的观点，使群众了解我们与其他各党各派有什么不同？不同在哪里？使群众自由选择。但我们目前对各党各派的批评，都应该避免采用敌对的、蔑视的、谩骂的态度，对法西斯派也应这样。而且对其他各派我们虽然应该与最进步的一派接近，但当着他们互相冲突时，我们在态度上要避免在群众面前袒护任何一方面。

我党目前在救国运动中的立场，就是：（一）武装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复失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与解放；（二）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反对汉奸；（三）实现民主自由，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四）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提高与改善工农劳苦民众的生活。我们的立场就是如此。只要我们在群众中工作的同志，在任何时候都不动摇这个立场，那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其他各派，取得群众最大多数对我们的拥护。只要我们善于宣传自己

的观点与批评人家的观点，并不断加强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和阵地，结果，我们与各派合作，不会是我们的失败，不会是我们去投降其他各派，而会是我们的胜利，使其他各派依据我们的立场行动。所以我们的同志应该抛弃畏惧其他各派的心理，大胆的与一切派别在救国运动中合作。

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人力、物力与注意力）来开展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这是我们目前唯一重要的工作。全体同志要来讨论与研究群众工作中的一切重要问题。只要我们准备了千千万万的群众到民族革命的战场上去，就等于准备了我们在决战中的捷报。

让我们的党变成群众的党！让我们每一个在群众中工作的同志变成广大群众的领袖！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刊印。

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

张 闻 天

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

共产党有着它自己独立的组织，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员应该同群众脱离关系而生活在社会之外。相反的，共产党员应该生活在社会中间，在群众中起核心的领导作用。

在目前形势之下，在国民党区域的共产党的组织是应该秘密的。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员都要秘密起来，离开一切公开的活动。相反的，共产党员除参加党的秘密组织外，其余的活动均应该公开。

有自己独立的秘密的组织，而同时又需要在群众中进行公开的活动，这个课题必须正确的解决，方才说得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正确联系，方才使共产党员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

要正确的解决这一课题，必须清楚的分别党内工作方法与众工作方法的根本不同。

党内工作的对象是最少数的最先进的共产党员。关于党的任务与策略等问题，只要向每一个同志解释清楚，就够了。这

^{*} 这是张闻天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举办的白区工作训练班上的讲稿，全文共四节。这里节选的是前两节。

里宣传说服的方法，占主要的地位。而群众工作中的对象则是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水平极不相同的千百万广大群众。要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接受党所提出的主张与口号，单靠宣传说服的方法，是不够的。这里需要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因此，党内工作方法要简单得多，率直得多，容易得多，而群众工作方法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变幻得多。因此，党内工作，现在应该而且也是可以秘密的，而群众工作的方法，却无论如何是必须公开的。

共产党员参加到群众组织中去工作，他必须以群众之一员的面目出现。如果他在群众中挂出一块共产党员的招牌，那他就会立刻被敌人捉去坐牢杀头的。因此在共产党内的工作方法，在群众中是不能拿出来运用的。在共产党内所讲的话，在群众中是不能赤裸裸的搬出来讲的。我们的一切行动都需要群众化，适合于当时当地所处的环境。比如我所参加的群众团体，是国民党的群众团体，在那里开会时照例要背诵《总理遗嘱》，那我就不应立异，说，共产党员决不能背诵《总理遗嘱》。相反的，我完全可以同他们一起背诵。比如，我参加了哥老会，那里有许多的宗教仪式，那我也不能立异，说，共产党员决不做迷信仪式。相反的，我完全可以同他们一样举行宗教仪式。总之，我的行动都需要同群众一样。我决不要因为在这样问题上暴露出自己是共产党员，使我不能立足，白白牺牲送命。

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员一到群众中去就完全变成一个普通群众了。不是的，我依然是共产党员。因为我仍旧要在群众中进行共产党的活动，以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使群众最后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与口号。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暂时抛弃党内工作的方法，而采用群众工作的方法，我暂时不

讲群众今天所不了解的或不赞成的话，而只讲群众所了解与拥护的话。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细心的分析我所处的环境，深刻的了解群众心坎中所要求的与希望的。然后我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斗争能力，提出大多数群众所要求的与希望的口号，采取群众所拥护的斗争方法与手段。这样，群众不但不会把我看做“外面来的捣乱分子”，而且反会把我看做他们自己的人，他们的领袖。这里我完全不是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而是以群众的一分子、群众的领袖的面目出现。我所代表的是群众的血中血、肉中肉，我与群众是不能分割的。

我这样在领导群众的斗争中，我决不要因为群众今天还没有接受党的主张与口号而着急。如果在斗争中群众还是宣言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我暂时可不必同他们争辩，因为我相信在斗争的过程中，群众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会了解国民党是反对他们的利益，而共产党是拥护他们的利益的。在开会时，群众认为有必要读《总理遗嘱》或挂一下青天白日旗，我们是完全不用去反对的。问题是：只要群众真正开始为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参加斗争时，他们就会在斗争中走向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上来。我虽然是领导着群众，然而我依然是群众中的一员，我决不提出群众现在还不能了解与不能接受的主张。如果我能够这样做，虽是统治阶级还可能利用共产党的罪名来逮捕我，但是，因为我是群众中的领袖，所以群众一定会起来进行反对敌人逮捕我的斗争。他们拥护我，不是因为我是“共产党”，而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头子”。

这种例子我可以举得很多。在目前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产党员如果坚持抗日救亡的立场，进行公开的活动，那统治阶级虽是要用“共产党”的罪名来逮捕我，但在群众前面我被逮捕却是因为“爱国有罪”的关系。这样，一切抗日的人民都会反

对这种逮捕，而使斗争继续前进。

群众的力量是我党的最后依靠。为了民族的与民众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职。共产党员决不怕这样光荣的牺牲。然而，由于我们自己的错误与幼稚，由于我们不懂得如何在群众中工作的方法，而遭受逮捕与屠杀，那是可惜的与不值得的。这种牺牲应该竭力避免。

那末，我这样不公开我共产党员的面目，是否会失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呢？完全不会。我这样做，我正是为了要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共产党的面目不是在公开说我是共产党员，让敌人把我捉去，而是坚持的在群众中进行争取群众的工作。对于党的公开宣言、传单、口号，共产党员有散发的责任，但这种散发的方式方法，是应该完全秘密的。

然而，这是不是说，共产党员必须成为群众的领袖，在群众中露头角，以至必须最先受到敌人的打击呢？也不尽然。照一般的规律，因为共产党员是群众中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又是最活动的分子，所以共产党员经常成为群众的领袖，因此在长期的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员也牺牲的最多。但这种情形也是可以改变的，共产党员虽是必须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然而他不一定把自己放在领袖的位置。如果我所提出的主张与口号，的确是最大多数群众的主张与口号，那我可以担保，一定会有不少积极分子起来为了这种主张与口号而斗争的。这样的积极分子在群众中是非常多的。我应该推举这些积极分子起来做群众领袖，而我只站在帮助的与推动的地位。这并不是因为我怕死，怕负责，而主要的是因为我们需要不断提拔新的群众领袖，培养新的干部，使他们也负担起领导群众的任务，同时这样做也可以更好的保存党在群众中的核心，使党的组织，不论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都能继续存在。特别是最负责的同志不要

轻易的暴露，以免遭受到敌人的打击。

无疑的，共产党员是应该过秘密党的组织生活的，没有这种生活就不能清楚了解与完成党的任务与策略，就不能经常得到党的指导，就不能培养自己成为更好的共产党员。但除了党的生活以外，除极少数上层领导分子根本无法公开、不能不专任党内秘密工作的以外，最大多数的党员，都应该在群众中间公开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上层领导的秘密机关缩小到最低限度，减少无数靠党生活的同志，而主要的可以使党在群众中有坚固不可拔的基础。这样，共产党员除了每星期开次把秘密会议，花上一两点钟时间外，其余就都在群众中间。就是少数秘密机关也能够埋藏在社会内部，使敌人无法破坏。这样敌人破坏党的组织的机会就会减少到最低限度，而群众工作的效能却大大增强了。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过去头重脚轻、秘密机关内塞满干部，而公开工作却无人去做的不正常现象，加以彻底的改变。

也只有严格分别党内工作方法与众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且遵守这种不同的规律时，我们才能使许多公开的群众团体继续存在与发展，我们才能创造许多公开的群众团体。过去曾经有许多群众团体，由于我们的同志把党的基本主张与口号赤裸裸的拿到那里去发表，把党的工作方法任意搬到那里去运用，甚至把党的组织混入群众团体中去，结果使这许多群众团体完全坍台，或者变成了少数先进分子的狭小的第二党的组织。

我们现在必须把党的组织与众团体的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群众团体的一切活动应该完全公开（至少半公开）。必须使每一共产党员了解，共产党的组织是应该而且可以秘密存在的，但广大的群众组织是不能长久秘密存在的。凡是群众组织

变成秘密时，结果一定会变成为少数先进分子的组织。这种例子，是不胜其多的。

比如现在一切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都应该完全采取公开的活动方式，内部的一切生活完全要采取民主制度，一切决定都应经过大家讨论通过，丝毫用不到少数人的包办。“光明正大”、“理直气壮”，这是每一个群众团体所应该有的特点，在里面活动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恪守这个原则。

一切公开活动的群众团体，不要惧怕合法的外形，不要惧怕同某些有权力的人们发生关系。共产党员在某些条件之下，甚至可以拿黄色工会的外形去进行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会工作，拿民团的形式去进行武装农民的工作。

许多共产党起领导作用的群众团体，共产党决不应该向外面公布说，某某团体是我们领导的，这种公布无异是向敌人告密。在那里的共产党员，决不要因为他们在那里已经起了领导作用，就以此自骄自满，采取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他们应该很谨慎的虚心的进行自己的工作，一切自己的提议应该经过一定的民主的组织方式，而且尽量的经过非党的群众领袖去做，尽量提高其中优秀分子的地位与威信。

我们常常在共产党内讨论如何争取领导权问题，这种讨论丝毫也不应该去发表。这是党内的秘密，是党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要到群众中去议论的题目。某部分群众或某个群众团体是否在党的领导之下，不是依靠于我们的宣言，而是依靠于我们的实际工作。党是否取得了对于这个团体的领导，要看那里的群众是否接受了党所提出的主张与口号，依照党的指示而进行工作。我们要做到那些群众团体事实上在我们领导之下，而外面却不知道他们是在我们领导之下，以至团体里面的群众也不必知道他们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对于我们没有丝毫

的损失，相反的，这却有许多的好处。

许多问题在共产党里要说的、要讨论的或已经决定了的，在群众团体里则是我们只要做而不要讲的。把自己的一切秘密告诉人家，使人家戒备起来，那种幼稚的愚蠢的办法，现在应该终结了吧。

党必须吸收工人中的、农民中的、革命知识分子中的群众领袖入党，但这种领袖入党后，仍然要保持他们过去的公开地位，决不要因为入党而变为不能公开的分子。研究过去许多群众领袖加入共产党后即不能公开活动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往往要他们完成过高的任务，要他们做不适合于他们地位的工作。结果，使敌人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使他们不能继续立足，继续公开工作。好的分子，则抛弃一切，到党内过秘密工作的生活；有的则表示不如意而消极，以至最后又离开党；有的则很快的被捕牺牲了。

必须用尽一切方法，发挥群众领袖公开活动的才能，给他们以能够胜任的任务，给他们想出许多领导群众的具体办法。如果认为必要，这样的分子，不一定急于吸收他们入党，即使在他们自己屡次要求的条件之下。党的周围应该有许多这样能够公开活动的群众领袖，同他们建立很好的同志关系，给他们一定的指示，但决不要过分的干涉他们自由，相反的，应尽量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与天才。

为了能够公开的活动，共产党员应该在各种现存的与任何反动的有群众的组织中去进行工作，去同那里的群众发生联系，拥护他们切身的利益，争取对他们的领导。

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共产党员应该决然取消那些最少数的先进分子的秘密的群众组织，如像共产主义青年团、赤色工会、社联、左联等团体，把这些分子放到许多更广大的公开与

半公开的群众团体中去，不论这些团体是在什么反动分子领导之下，或者根据各地的具体环境，使他们去创造能够公开的群众团体，首先是抗日救国的团体。那些叠床架屋的狭小的秘密组织只有使党脱离群众，使他们从这一秘密机关到那一秘密机关，从这一秘密会议到那一秘密会议，给敌人以无数破坏的机会。

可以供我们活动的公开组织为数是很多的。除现在许多救国团体外，还有许多公开团体。举例来说，如像工人中的黄色工会、帮口，农民中各地方的民团保甲，国民党的军队，各种封建的秘密结社（如哥老会、清洪帮等），各种文化教育团体（如教育会、学生会、体育会、戏剧团体等）、青年会、童子军、各地同乡会等。只要有群众的团体，我们就应该进去工作。

就是在反动的群众组织中，共产党员也不要惧怕取得领导的位置。相反的，那里的共产党组织应该指定适当的同志，帮助他去取得这类的地位。但这类位置的取得，一般应在群众拥戴之下，而且是为了便利于我们的工作。比如在黄色工会中，我们是让最坏的工贼盘踞在里面反对工人利益为有利呢？还是把代表工人利益的分子推举上去代替他，更为有利呢？当然是后者有利，不是前者。如果这个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人员都改变了成分，那这个黄色工会虽是名义上不变，然而实际上不是变成工人自己的工会了吗？其他许多群众团体都是如此，在军队、民团、保甲中，虽是情况有很大不同，使用方法要更为曲折，然而这种位置的取得，还是可能的。

对于这种取得领导地位的同志，当地党方面应该给以经常的监督，另一方面应该绝对避免给他以不能执行的过高的任务。这种任务的执行或提出，立刻会使敌人发现他的真相而使

他坍台，使他牺牲。当地党应该帮助他维持已得的地位，给他解决困难，使他能够敷衍上级，而同时能够取得群众的信赖，掩护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当地党千万不要因为那里的领导者是自己的同志而为所欲为，好像这里已经是革命胜利了的地方一样。如果这样做，必然立刻要遭受失败。这类教训过去也是很多的。应该清楚了解，我们的同志取得的地位，是在敌人统治之下取得的，是在维持敌人的统治之下取得的，也是在敌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的情形之下取得的，而不是推翻了敌人的政权取得的，也不是因为敌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而取得的。如果认为今天还没有到暴动起来以推翻当地旧政权的时候，那我们只能满足于在敌人统治之下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而不必希望过高的超过这一限度的东西。这在军队中尤为重要。

为了使得这类同志能够维持已经取得的地位，当地党不应该使一般同志知道他是同志，以防止泄漏秘密，前功尽弃，而只由最负责的一个同志与之接头。这类同志一般的不应该参加支部生活。他的一切活动，应该完全公开。

有些地方，为了求得隐蔽，不使敌人注意，我们的党除在群众中进行公开活动外，不做党的秘密活动，比如散发党的宣言、传单、标语等。

只有这样看到党内工作方法与群众工作方法的根本不同，才能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划分清楚，不相混淆，并且把它们正确的联系起来。不然，名义上是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而实际上是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混淆，把应该秘密的拿去公开，应该公开的拿来秘密，结果使秘密组织与公开组织都坍台破坏，使党的工作受到极大的损失。

领导群众斗争的几个原则

党目前的战略方针是在组成千千万万中国抗日人民的革命军队，率领他们进入抗日的革命阵地，选择有利时机，从防御转向进攻，战胜日寇与汉奸卖国贼，以争取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但是要组成这样强大的革命军队，要率领它进入革命阵地，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持久的与艰苦的群众工作是不可能的。

训练与教育共产党员，使他们懂得领导群众斗争的革命原则，是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的重要关键。

像前面所讲过的，领导群众斗争的首先的任务，就是必须清楚的了解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群众的迫切要求，他们的觉悟程度与斗争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出为群众所拥护的适当的要求与口号，找出适当的斗争方法与手段。

但这只是准备斗争的第一步。在我们提出要求与口号之后，我们即应利用宣传与鼓动的方法使我们的要求与口号在群众中普遍起来，使我们的要求与口号成为群众自己的要求与口号，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使群众了解，应该用何种斗争的方法与手段以达到自己的要求，实现自己的口号，并且开始为准备这种斗争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

这种斗争的准备工作，是为了争取斗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准备工作而发动斗争，结果必然是步伐混乱，此起彼落，被敌人各个击破。这即在一个工厂的罢工，一个地方的示威游行，都是如此。

但有了准备之后，是否应立即发动斗争呢？这里要注意发

动时机的选择。这种时机，不但要在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时候，而且也要在其他条件最有利的時候。恰当的发动时机的选择，对于斗争的能否取得胜利，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斗争发动之后，形势的发展对于我们非常有利，那我们必须力求满足原来的要求，取得胜利的结果。比如，罢工发动之后，求得工人要求的全部满足。

在斗争胜利之后，如何利用胜利的形势开展更大的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的问题，必须依据当时具体的情况来决定。

如果因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当时任何的具体情形而继续“扩大与深入斗争”时，那结果常常会遭受到敌人的打击，而使已得的胜利也完全失去。这样的教训，对于我们是太多了。罢工胜利之后，不知道胜利的结束罢工而继续“扩大与深入”，结果不但已得的胜利完全失去，而且原来在那一工厂中的党的组织全部坍台，使许多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不能立脚而脱离生产，许多被捕牺牲。这是胜利后的冒险主义。

如果由于斗争的胜利，群众斗争的情绪大大提高，敌人更加张皇失措，各方面形势均非常有利于斗争的继续开展，那我们应该大胆的组织进攻，取得更多的胜利。比如，工人由于罢工斗争的胜利，大大地提高了他们参加抗日斗争的积极性，那无疑的，我们应该领导他们继续参加抗日的斗争。或者由于一厂罢工的胜利，使我们有组织几厂同盟罢工的胜利的可能，那无疑的，我们应该组织这类的同盟罢工。或者由于一次示威运动的胜利，而广大群众要求组织更大的示威游行，那无疑的，我们应该组织这类的示威游行。特别在目前形势开展的情形之下，斗争的发展，常常以很快的速度前进，稍一迟缓犹豫，即有变成群众尾巴的危险。如果不管形势如何顺利，在一次胜利后而满足于已得的一点胜利，这是胜利后的尾巴主义或保守主

义。

不论是胜利后的冒险主义或是保守主义，对于我们都是危险的。

但如果斗争发动之后，形势的发展不利于我们时，那我们即应该机动行事，比如减低工人原来的要求，以取得部分的胜利。如果就是这种胜利也是不可能时，那即应该实行暂时的退却，结束斗争，以保存实力。坚持没有胜利可能的斗争，结果一定会遭受失败。

在各种情况之下，斗争的形式可以从请愿、示威、包围、抗议、罢工以至武装斗争的发动等。斗争的性质可以从防御、反攻以至进攻。共产党员必须要懂得在环境改变时迅速改变斗争的方式与方法，依照斗争发展的程度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这是困难的任务，然而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但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党都要善于保存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在胜利之后，应很好的巩固已得胜利，利用胜利以提高群众的自信心与积极性，扩大群众自己的组织，巩固党的基础。即在失败之后，也应很好的组织退却，隐蔽自己的力量，不使遭受损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积聚雄厚的力量，以准备将要到来的决胜负的斗争。

对于自发的斗争，过去那种跟着每一自发的斗争而转移工作方向与注意力、从外面调集力量去取得对于每一自发斗争的领导的做法，是应该抛弃的。在全中国，这种自发的斗争不知道有好多，我们的注意力决不能随着自发斗争的方向而转移，我们也没有力量去领导每一个自发的斗争。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一定的工作方向与对象。如果这个自发的斗争正发生在那个我所要建立工作基础的地方，那我当然即应利用机会去活动，以便在这次斗争中去开辟我的工作。如果那个自发斗争同我的目

标不相合，那我只有暂时听之而已。

从外面临时调动力量去领导自发斗争的方法，是很危险的。第一，派去的人对于内部的情形是不了解的，他很难正确的领导斗争。第二，派去的人是外来的，他很容易为侦探走狗所认识而被捕牺牲，并连带到许多其他组织的破坏。第三，这种做法使党的组织天天忙于应付，疲于奔命，而缺乏一定的方针，失去工作的中心。

但常常有这样自发的斗争，虽是那里有我们的核心，但斗争却超过我们的领导而自动爆发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党的同志一般的应该参加斗争，尽可能的推动斗争走向胜利的方向。如果当时情形证明无胜利的把握时，党的同志在一般的参加斗争的过程中，要避免暴露自己，避免受到敌人的打击，而使已有的组织坍台。

至于每当纪念节不顾具体环境必须“纪念”，必须发传单，写标语，出刊物，到马路上去喊口号，组织游行集会等等，这种传统是必须废止的。但这里需要废止的是那种不顾具体环境而组织的“纪念节”活动，不是一切纪念节。如果形势非常有利，利用纪念节有动员广大群众到马路上的可能时，那我们应该组织这类的纪念节活动。比如正在日本进攻中国、形势紧急、群众愤激的情形之下，“一二八”与“九一八”这种纪念节是最能动员群众的。在这种具体情形下，党应该组织这种纪念节活动。但如果到那一天，敌人方面戒备严密并决心制造流血而我们动员的群众依然不够广泛时，如果举行集会或示威有给先锋队遭受严重打击的可能时，那我们仍应该停止这类的集会或游行。所以，问题不是一般地要不要纪念节，而是在何种条件之下利用纪念节，以动员群众。

在斗争中间，要注意在某种环境下，斗争所能达到的最高

限度。比如过去在上海等地所要“争取公开”的一些赤色工会，纲领上写着“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等要求。这种赤色工会，显然只有在苏维埃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公开存在的可能，而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是无法“争取公开”的。如果一定要“争取公开”，那这种争取必然是一种冒险的行为。

在目前形势之下，要使抗日救国运动成为公开的运动，那在抗日救国团体的纲领上，决不能写上“打倒卖国的南京政府”的要求，而只能写上“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这类口号。这些口号是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所能做到的最高限度。

当然这种最高限度，只是在某种具体的形势下的最高限度，而不是任何形势下的最高限度。如果形势变化，“打倒卖国党”成为千千万万抗日群众的要求时，则打倒的口号的提出，就成为正确的了。

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所谓部分的口号与基本的口号的联系，是指在一定的斗争过程中，把部分的口号提高到基本的口号，不是一开始就把部分口号与基本口号“联系起来”（即并提出来）。这种联系，是完全错误的。比如某地农民开始了反对某种苛捐的斗争、要求取消某种苛捐时，党的任务首先是在领导这种斗争，扩大这种斗争，组织群众的力量，巩固党的领导作用，依照斗争形势的发展，再来决定何种口号的提出为适当，不是一开始就把“反对某某捐”的口号同“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的口号，或进一步同“打倒抽收苛捐杂税的某某军阀”的口号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只会吓退群众，使斗争在开始时即遭受到敌人的镇压而失败。

至于共产党在发表某种对于时局的宣言时，当然要提出对于时局的基本主张，把群众当前的痛苦，同斗争的最后目标联

系起来。这种联系是必要的。但这是共产党的宣言，这种党的工作方法，拿到群众斗争去用，是完全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一节中已经说明了。

在领导群众斗争中，任何时候不要提出过早的、群众还没有了解的口号，不要把这种口号同他们迫切要求的口号联系起来。

而且在一定的形势下，斗争口号的提高也有它的最高限度。比如上海某一工厂中，我们党掌握着绝对领导，以至我们如果提出组织苏维埃时，群众也会拥护，但整个上海的形势，还没有达到可以组织苏维埃的程度，那这种口号依然不能提出。如果我们同志一时狂热而实行这种尝试时，他一定会遭受严重的失败，使全部工作坍台。在这类工厂中，我们还是应该遵守最高限度的原则，依照一般的条件进行工作。譬如党的组织依然应该完全秘密起来，不要公开出来，以防随时可能的袭击。

必须纠正那种以为共产党员除了领导斗争（如罢工示威等）以外就无事可做的观点。共产党员领导群众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要在斗争中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斗争力量，加强共产党对于他们的领导作用，以准备同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战以解放自己。因此一切其他工作，凡是能够帮助达到这个基本目的的，共产党员都是要去做。如文化、教育、互助、合作以及各种团体结社方面的工作，我们都应该参加进去，认真的工作，以具体揭破剥削者的罪恶，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加强他们的组织能力与集体生活等。共产党也只有在这些工作中，更能深切的了解群众，体验他们的痛苦和要求，同他们发生最亲切的联系，更能正确的领导他们的斗争。我们过去对于这种工作的忽视，是错误的。

在领导群众中，还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集中力量消灭当前的主要敌人。这就是要善于取得各种同盟者，不论是暂时的也好，动摇的也好。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环境的非常复杂，在各种各样派别领导之下，所发生的各种各样带有革命意义的斗争，是非常多的。问题并不是大家怕共产党，因此使共产党找不到同盟者，而是由于共产党自己高慢的宗派主义，拒绝了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过去常常发生这样的例子，当某一派别领导下的群众斗争发动时，共产党员不是想法如何去参加这一斗争，引导斗争到胜利的结果，而是站在旁观者的地位批评这一斗争如何不彻底，斗争领导者的话如何是“反革命的欺骗”等等，甚至号召斗争的群众立刻驱逐他们的领导者。结果往往是相反的，斗争的群众不但不相信共产党的话，反而说共产党“唱高调”，同时那些领导者便振振有辞的在群众面前宣布共产党“破坏斗争”，而斗争也因为得不到共产党的援助与合作而失败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员的首先任务，不是站在旁边唱高调，而是实际的参加到斗争中去，真正代表斗争群众的利益，帮助斗争群众取得胜利。在斗争中，如果看到其他派别的分子也是真正为了群众当前的利益而斗争的，那末应该亲密的与之合作；如果他们是欺骗群众的，那末在斗争中很容易在群众面前揭破他们的欺骗，用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驱逐出去。只有这样做，才真正能够发展斗争，取得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而真正揭破反革命派的一切阴谋诡计。

这种利用各种各样的同盟者以反对主要敌人的方法，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尤为重要。不论是抵货也好，缉私也好，我们必须参加进去，真正为抵货为缉私而斗争，扩大这些斗争为广大群众的运动，在斗争中同其他派别联合，在斗争中批评某

些派别的动摇、不彻底，同叛变的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做，共产党员才能成为抗日运动中的领袖，使群众团集在我们的周围，并使抗日运动成为千千万万群众的运动。

对于同盟者的态度，有时应该赞扬，有时应该批评揭发，有时却需要斗争，这都要看同盟者当时所表现的具体情形来决定，即要看他们对于我们的共同事业（如抗日救国）的是否坚决或动摇来决定。

这个斗争的原则，现在必须广泛的运用，当然必须严格注意不是投降同盟者，不是做他们的尾巴，而是使自己成为有坚定立场的领导者。

最后，必须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每一冲突与矛盾，以达到革命斗争的目的。千万不要把敌人内部看做清一色的整体，他们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各种各样的集团，这些派别间与集团间常常有许多矛盾与冲突，特别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之下。我们在斗争中必须极端注意敌人内部的这类矛盾与冲突，使这种矛盾与冲突扩大化与尖锐化，推动这一派别这一集团去反对另一派别另一集团，以削弱敌人对付革命的总的力量。我们不是圣洁的清教徒，说，我们决不应采取纵横捭阖的手腕。相反的，应该不失时机的利用这种矛盾与冲突，使这种矛盾与冲突扩大化与尖锐化而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

千万不要由于我们方面“打倒一切”的策略，使敌人内部更加团结起来。我们的策略是在打倒今天最主要的敌人，今天敌人中最反动的派别或集团，其他在今天不是主要的或次要的敌人，我们不妨暂时放松些，并尽可能的在我们与主要敌人的斗争中使之中立。只要我们今天能够把主要的敌人打倒，则其他不是主要的或次要的敌人，我们就比较容易的去对付他们。打倒一切敌人的策略，结果使你什么也打不倒，反而给予革命

以重大的损害。

举例来讲，今天英国同日本的冲突是加深了，我们即应利用这种冲突以反对日本。我们今天首先应打倒日本，对于英国不妨暂时放松些，并尽可能的使之在我们抗日斗争中采取中立态度。在事变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更不拒绝采取联合英国以反对日本的策略。

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不要拒绝在敌人中间利用纵横捭阖的手腕，共产党员不是小孩子，只知道高喊革命的口号，同敌人进行正面的斗争。共产党是最先进的革命的政党，它应该使用一切武器去对付敌人。

斯大林同志说，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是革命的间接的后备军。这是值得我们深思而熟虑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周恩来关于希望南京当局 对日取强硬态度给彭雪枫、 张子华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雪枫交张子华同志：

甲、粤来俭电悉。兹复一电，内容：

(一) 希望南京对日取强硬态度，我方愿以全力为助。

(二) 要求停止军事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谈判。

(三) 恩来已奉命为谈判代表，地点以西安为宜。

(四) 南京代表希望陈辞修^[1]、曾养甫、陈立夫三先生中有二人来。

(五) 一俟军事进攻停止，南京代表人选与谈判地点确定，并得到通知时，恩来立即起程。

乙、你以陈诚所委调查员资格，与晏道刚接洽，发电发给广州行营，转曾养甫。你在西安等候回电，内容勿告晏道刚。

丙、雪枫不须向蒋^[2]活动，暂在西安待命。

恩 来

十九日二十一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 即陈诚。
- 〔2〕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等为追悼鲁迅先生 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之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锋，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

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甘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的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已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及全世界拥护和平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人士，一致起来要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南京国民政府执行上列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尤其是文学界，一致起来继续鲁迅先生光荣的

事业，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十月二十二日

根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出版的
《斗争》第一一六期刊印。

毛泽东给傅作义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宜生先生主席勋鉴：

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1〕}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之促进。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红军虽志切抗战，但在未得友军谅解，尤其在未得抗战地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之谅解以前，决不冒然向抗战阵地开进。在已得正式谅解而向抗战阵地开进与实行抗战时，自当以其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兹派彭雨峰^{〔2〕}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百川先生处，今春曾数数致书，夏时又托郭团长^{〔3〕}将意，久未得复，祈先生再行转致鄙意。如有可能介绍彭同志赴晋一晤，实为公便。叨在比邻，愿同仇之

共赋。倘承不吝赐教，幸甚幸甚。专此。即颂
戎绥

毛 泽 东

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阎锡山、蒋介石。

〔2〕即彭雪枫。

〔3〕指郭登瀛。原是阎锡山部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征中被俘。

红军将领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 西北各将领书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蒋总司令，张副司令，阎主任，傅主席，杨主任，朱主任，于主席，宁夏马主席，青海马主席，陈总指挥，王治平军长，胡军长，毛军长，王鼎方军长，董军长，何军长，孙军长，冯军长，汤军长，萧军长，高培五军长，高双成军长，邓军长⁽¹⁾，暨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师旅团长公鉴：

我苏维埃红军自去年八月发表宣言，提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来，转瞬一年多了。这一年向日寇的侵略有加无已，国土日蹙，国势日衰。现在日寇的凶焰益张。华北分离，绥宁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即长江沿海亦莫不敌船云集，蠢蠢欲动。亡国灭种的条件，接连提出。亡国奴的命运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和平久已绝望，牺牲是无可幸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共信。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这不能不使全国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称快。

时至今日，贵党政府犹欲以捣乱抗日后方加罪于苏维埃和红军吗？诸先生亲在西北，应知真相。红军自去年北上后，即向四周各军倡议停战抗日。今春借道过晋，屡屡声明系东向抗

日，又不蒙蒋、阎两先生见谅，只得半途折回，另辟途径。现在全国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于西北，正拟与诸先生所部共赴国防前线，合力抗战。乃蒋先生忽于绥东告急大祸临头之际，不加调兵力增援绥远，反而派来甘肃进攻红军。这是谁来捣乱抗日后方？难道中国可亡，日寇可以听其长驱直入，惟独愿意抗日的红军非扑灭之不止吗？恐怕红军未灭，日寇已来，诸先生纵欲继续内战，全中国的人民，诸先生的部下，也决不会再让诸先生自相残杀了吧！

虽然蒋先生声势汹汹，扬言聚歼红军，但我们认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故苏维埃及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谓：“（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帮助。”依此命令，红军前线各部迄未向诸先生的部队作激烈的抗击，且逐步退让，以期诸先生的自觉。但是如果诸先生以为这是红军的示怯，那末未免大错。在十年对垒之中，为民族、为自由、为正义而战的红军的士气与战斗力，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训者。现在集全国精锐于一处，用以抗击诸先生的师出无名和内部充满停战抗日情绪的部队，胜负之数，即诸先生亦当了然。

我们敢以军人的坦白与热忱敬告诸先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我们现更代表全中国红军负责宣言：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

你们合作到底。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一定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不得抗日友军的同意，红军决不开入抗日友军的防地。

民族危机已到最后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决定的关键是操在诸先生手里。全中国人民所希望于诸先生的是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不愿诸先生继续内战成为民族罪人。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即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热诚地盼望诸先生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我们深信，绥东抗战一起，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地联合起来，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中国而战，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致以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彭德怀	林 彪	贺 龙	任弼时
徐向前	陈昌浩	王稼蔷 ^[2]	刘伯承
叶剑英	徐海东	萧 克	罗炳辉
董振堂	杨尚昆	关向应	左 权
聂荣臻	程子华	张云逸	罗瑞卿
陈伯钧	王 震	张子意	陈再道
王宏坤	黄 超	孙玉清	陈海松

程世才 李先念 周纯全 周子昆
李卓然 何 畏 王维舟 阎红彦
陈先瑞 周 昆 袁国平 宋时轮
宋任穷 朱 瑞等 同启

十月二十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这里依次指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杨虎城、朱绍良、于学忠、马鸿逵、马步芳、陈诚、王均、胡宗南、毛炳文、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孙蔚如、冯钦哉、汤恩伯、萧之楚、高桂滋、高双成、邓宝珊。

〔2〕即王稼祥。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一九三六年十月)

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矢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 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

(乙) 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丙) 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

(甲) 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 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

* 这个协定草案是毛泽东起草，准备由周恩来在同国民党谈判时提出。后来没有签订。

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

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

(己)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四、双方共同承认，为完善地执行本协定起见，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五、双方互相承认，两党应忠实地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之一切原则与事项，但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

六、在本协定的原则下，双方得订立关于许多个别问题之协定。

七、本协定在双方代表签字互换后发生效力。

八、本协定之修改须得双方之同意。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周恩来给陈诚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

辞修学长先生：

别十年矣！每于两军对垒时，犹想像先生风采。“一·二八”以后，亦曾闻先生数数请缨抗日，惜见阻于时，竟使相持于抚、赣者间数年。今春先生整军北上，以为已不难相见于抗日战线，孰意敝军被阻回师，先生亦即率兵南下，抗日缘慳，兹番顿挫，然犹未促使仰望先生抗日者灰心，想先生亦绝未馁抗日之气也。

敝军今春东向原冀，御敌于燕赵之间。今者日寇侵绥，更设航空总站于定远营，分布航空线于陕、甘、宁、青四省，已使环西北而军者，除联合抗日外，再无退让回旋之地。乃清、绥国军近犹以先生之名，着着向我区进逼；而日寇久已窥伺于傍。此事宁非至痛。或者将有人以转戈抗敌，红军或不见谅为词。弟敢负责声明，红军五年来一贯主张联合全国部队一致抗日，兄部果挥戈杀敌，红军全部誓为后盾，并愿担任一定战线，共效驰驱。敝方现正送致公函于贵党中央，表示敝方抗日救国之一般方针及对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微闻贵方当局亦渐有趋向于重谋国共合作者。兄匡佐蒋^[1]先生最久，英名亦特著，其亦愿进一言，以谋统一战线迅底于成欤。英明卓越如兄，知于民族英雄与民族罪人之辨必也至精，且确诚使国人皆

曰陈辞修乃真正民族英雄，则唯岂故人之幸，真乃中华民族之福。窃谓如是英雄，曰时势造之，实大有造于时势也！

寇深祸急，愿赋同仇翹南中。

伫候明教，专此。即颂

戎祺

恩 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周恩来给陈诚、汤恩伯等的信

(一九三六年)

辞修总指挥

恩伯军长并转万龄、仲廉、仙洲^[1]诸师长勋鉴：

红军自去岁北上，即志在迅赴抗日前线。今春入晋，不图不为贵军所谅，为保存双方抗日实力，当即半途回师，呼吁停战。乃不旋踵，贵军又渡河相逼。敝方以长此相残，徒快敌意，仍一方将主力西移，避开决战，冀以诚意相感，徐图协作；一方继续致书贵党及蒋^[2]先生，要求迅停内战，共谋抗日。虽尚未见回应，但联合抗战之呼声，已盛倡于朝野。良以今日国势，已届最后关头。和平久已无望，牺牲必不可免。日本外相亦已公言：日本在采取最后步骤之前，容忍现已余极小限度。若以华北与西北之局势观之，则分离华北进攻绥、宁，日寇之最后步骤已势在必行，决无任何容忍。凡属国人，宁能再忍！矧吾侪同为中国人，同处西北前线，虽互战十年，但今大敌当前，舍同仇御侮、共谋民族出路外，则只有相率为奴耳。既为人奴，尚何分国共，何分红白？故吾侪今日之战，已成鹬蚌，再不停止，必将自焚。现苏维埃中央政府及红军军事委员会已发布命令，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仅许被攻击之自卫。如有缴获，在抗日时一律送还；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

助。苏维埃与红军深冀以此进一步举动，促进诸先生及贵党当局之觉醒。在诸先生所率师干，或曾与于上海抗日战争，或则出身直、鲁，情切桑梓，果肯枪口对外，则陕、绥接壤，转旌援绥，岂惟绥东可保，全国抗战亦将由此发动，先生等之功将不朽矣。

微闻蒋先生及晋绥当局均有意于抗战，而贵军及一切“剿共”军队，所以迟迟未动且日见加多者，岂以有红军在，增多顾虑，非远驱之、“围剿”之不敢开往前线耶？鄙人敢正告诸先生：红军抗日一秉血诚，非驱之“剿”之所能屈，更非驱之“剿”之所能安于后方者。今日国军以枪口内对，苏维埃、红军犹愿以停止攻击相倡，若贵军及其他国军一旦开赴前敌，苏维埃与红军必誓以全力相助。凡国军向抗日前线转移时，所取道路红军决不破坏，所设后方红军不侵扰，所移防地留有国军接收者红军决不攻占，沿途及前进阵地红军并愿动员群众相助。在红军自己，则愿同赴前线，共效驰驱。诸先生须知，贵我双方今日虽为敌对，一旦杀敌于同一战线，血迹凝结，宁复再分彼此？请寄语晋绥当局及一切愿赴抗战前线者，红军主力今已会合，所望者为抗战先锋，决不愿偷生苟安于后。至若捣乱抗日后方，阻拦抗日去路，不仅红军立誓不为，亦甚望我全国武装部队共以此为戒也。

塞外杀声已震天动地，同来奋起抗战是所望诸先生，诸先生其亦有以约我耶？专此布臆。顺颂起居！不一。

弟 恩来

附：共产党致国民党书

毛泽东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周恩来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即王万龄、王仲廉、李仙洲。

〔2〕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

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剧烈的变动，最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到救亡运动与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来，在中国共产党前面提出了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把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把建立为发扬文化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广大的青年运动，当做自己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最中心任务。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央特有下列决定：

(一) 国民党区域内，原有第二党式的共产青年团的组织应该取消，所有青年团团员都应该依照各地的具体环境与需要，去参加一切现有青年群众的合法的与公开的组织，利用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的去建立包括不仅青年工人，而且包括广大青年农民学生及失业青年的民族解放性质的群众组织，在青年群众各种需要与要求的基础上，创立各种各样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妇女的、文化的、教育的、体育的与军事的青年群众组织。应该依照各地的具体情况，使各种青年组织，在抗日救国、民主自由的共同目标之下，实行合作联合与统一。

(二) 苏区与红军中的青年团，必须把教育训练青年成为

自己的基本任务，使全苏区的青年成为全中国广大青年群众的模范。青年团的组织必须全部改造以适合于这一任务，使之成为全苏区青年的各种文化、教育、体育、军事等团体的联合组织，在组织内实行广泛的民主，并用一切方法同国民党区域内的青年团体取得联系。

（三）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每一具体环境的认识来教育青年群众。这在目前阶段上，即是以仇恨日本帝国主义是忠实于本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教育来教育他们。要善于根据青年群众自身的经验，要善于采取一切适合于青年心理的方法，来提高青年群众的觉悟程度，引导他们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在苏区与红军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应该公开进行。

（四）必须大批吸收过去的青年团团员加入共产党，特别在国民党区域内，这些青年团团员的工作与生活都同共产党员没有任何区别。但他们一般的仍应负担青年运动的工作。在一切青年组织内必须组织共产党支部或党团，有系统的发展共产党员。没有加入党的过去的青年团员，应该成为党的支部周围的积极分子，不再组织团的支部或团组。在共产党各级组织内应该有青年部或青年委员会及青年干事，在各级党部总的领导之下，担任青年运动的工作，共产党应该是青年运动的唯一领导者。

（五）应该彻底改变在青年运动中的工作方式，抛弃一切第二党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采取青年的、群众的、民主的、公开的工作方式。国民党区域内青年群众组织中的共产党员应该清楚了解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分别与联系。应该培养大批青年的积极分子，担负青年运动的各方面工作，特别是那些忠实于民族革命事业的青年，同群众

有联系的不怕负责的，活泼的有学习精神的，有一艺之长的青年。

（十一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河西部队 称西路军及领导机关名称人选问题 给朱德、张国焘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

朱张，徐陈李^{〔1〕}等七同志：

甲、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2〕}，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他们来电批准。

乙、二兄有何意见，请复。

张 毛

八日二十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徐向前、陈昌浩、李特。

〔2〕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徐向前、陈昌浩和李特等在给中共中央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张国焘的电报中说：“（一）为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我们提议左岸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

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以昌浩、向前、传六、李特、国炳、克明、树声、先念、海松、义斋、卓然等各同志组织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传六等五人组织常委，以昌浩同志为书记。（二）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三）上二项提议当否请中央及军委复准，以便遵照。”

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 的中心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刘 少 奇

资产阶级现在来参加民族统一战线，是好的现象，但同时也带来了危险。这个危险是由资产阶级获取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产生，最坏的结果可以使统一战线破裂，革命失败，无产阶级受到牺牲。无疑的，资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每一个动摇和叛变，都要引起统一战线内部的危机。这种危机的程度，要看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及其对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军队的影响，与当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和策略而决定。为着减少这种危险，并使这种危险不至于危害革命，无产阶级从与资产阶级开始合作的第一天起，就应该注意从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军队中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并加强自己的影响。无产阶级对于这种危险不是惧怕，不是逃避，而是要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克服这种危险。所以，无产阶级不是因有这种危险而拒绝民族统一战线，而是要积极地参加到统一战线中，在长期的工作中去克服与战胜这种危险，中心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

* 为了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刘少奇撰写了题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的党内教材，全文分上、中、下三篇。这里收入的是下篇，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火线》第六十七期。

问题。

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

在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将在一些什么问题最容易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呢？总的问题当然是革命领导权的问题。而在革命领导权上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就常常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估计不正确，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足，对革命转变问题不了解，对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联系不了解。因此，就使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运动中放弃与忽视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取消无产阶级的独立，放弃与停止对于阶级斗争的领导，放弃对同盟者的批评，放弃对于工农群众的独立组织与教育工作，放弃对于军队的争取和领导等。很明白，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是要葬送民族统一战线与民族革命的。所以我们在提出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时，就特别要注意到这些问题，防止右倾机会主义。

* * *

所谓革命领导权，就是谁成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袖，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关于这个问题，有人因为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和革命性估计不正确，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足，就说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所以革命的领导者“当然”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只能帮助资产阶级革命，待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再来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如是，他们就不参加统一战线的革命政府，认为这个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现在是援助

它，将来还要打倒它。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这种思想已使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了，在以后还要危害革命的。

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在目前民族革命的高潮中，虽然还有暂时的革命作用，但因为这些阶层的特别软弱及其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各方面（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习惯上）的密切联系和无产阶级力量对于它的威胁，它的这种革命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要求彻底的民主革命，而且反对彻底的民主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完成，而要由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来完成。所以，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当然领导者就等于葬送革命。

有人因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足，就怀疑或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成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领袖。他们不了解中国的资产阶级软弱，而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强大的。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投资，中国国家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使得中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力量上都要强大得多。而无产阶级为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就必须首先肃清封建势力与驱逐帝国主义。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给农民与小资产阶级以出路，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他们的彻底解放而斗争，而中国资产阶级就不能给他们以出路。因此，无产阶级就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他们的革命领袖。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应以中国革命唯一领导者的资格，率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叛变，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去。所以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

* * *

为着要建立与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无产阶级自己必须组织成为坚强的独立的力量，因为只有自己力量的不断加强，才更能团聚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到自己的周围来，才能使自己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而成为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坚。为要组织与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要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加强与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建立强有力的工会，加强与扩大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工作。这些，就成为十分必要的工作。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如果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有任何的忽视，都要成为严重的右倾危险。所以，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认为可以降低入党条件，可以放松党的纪律，可以在党内容许自由主义、投机分子和各种不正确倾向的存在，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思想可以危害党的独立和一致，可以使我党受到资产阶级的侵蚀和破坏。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认为可以放松工人运动和劳苦群众中的组织工作，可以模糊或者隐瞒党的政治主张与政治面目，都是错误的。因为这要损害无产阶级的独立。

无产阶级必须自己确实地、不动摇地独立起来，然后才能与别人进行平等的联合。若是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能独立或取消自己的独立，那就不能联合别人，只能供别人利用。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无产阶级怎样才能保持与加强自己的独立呢？（一）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二）对于每一个重大事变和重要问题，都要根据自己的观点给以分析，提出自己独立的主张和办法，并根据自己的主张行动；（三）要在群众中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评论各党各派的主张，使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与其他各

党各派的观点和主张在群众面前分别得清清楚楚，让群众来选择；（四）要建立无产阶级群众独立的组织和独立的力量，要加强巩固我党的组织和一致。无产阶级必须如此坚决地独立起来，然后才能用自己正确的革命主张去影响别人，推动别人跟随自己的主张行动，而不至于去接受别人的影响，在别人的主张下动摇自己，甚至作别人的尾巴。

当着同盟者起来向敌人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给同盟者以援助是必要的。但无产阶级不只是援助同盟者，必须自己也起来向敌人斗争，而且要站到斗争的最前线，要批评同盟者在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要向同盟者及群众提出自己在斗争中的独立主张。最近，有些救国团体在援助绥东事件中，没有提出对绥东事件的整个主张，没有批评晋绥当局单纯防御战略的错误和冀察、南京当局的错误，没有组织义勇军去参战，而仅仅只是募捐援助，应该说是重大缺点。

* * *

在统一战线中，同盟者的错误、动摇和叛变所引来的危险，常常难以事先被人察觉。所以，无产阶级不得不提高自己的警觉性，不得不对于同盟者任何一个小的动摇都给以最高的留心。对于同盟者的批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同盟者的每一个动摇和错误都可能给统一战线内部带来危机，都是离开无产阶级的开始。无产阶级如果不给这种动摇和错误以批评、揭发和指正，那就不能提高群众的警觉性，不能停止同盟者的动摇，不能巩固统一战线，而无产阶级也无法在群众面前阐明自己的观点，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并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虽然这种批评尽可以采取和平诚恳的态度，然而在思想上观念上的明确性，不应该有丝毫的含糊，不应该不使用批评的

武器。在细小的不重要的个别的问题上，不应该和同盟者引起过多的不必要的纠纷；但在主要的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就必须毫不放松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些批评要公开进行，要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有人觉得对同盟者的批评，会引起同盟者不快的情绪，促使同盟者离开无产阶级，因而惧怕使用批评的武器，企图在统一战线中与同盟者和平相处，抹煞自己与同盟者在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无疑的，这种思想是非常错误与危险的。

有人认为，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应该停止或减弱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他们认为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是不能联系的矛盾，这也是一种极危险的右倾思想。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消灭社会各阶级间原来的矛盾和冲突。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这些矛盾是依然存在的，所以阶级斗争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工农群众阶级斗争的发展，并不会削弱统一战线反帝反封建的力量，相反，还会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

工农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力量。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参加和积极拥护，统一战线是不能有力树立起来的，革命是不能胜利的。但当工农在重重的压迫与剥削的情形下，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形下，他们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斗争的热情，就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就不能充分发扬他们伟大的创造力。只有当他们的生活地位已经改善了的时候，他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减轻了的时候，才能使他们的热情、积极性和对于革命的忠诚发展到最高限度。所以，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运动中，必须为改良工人的生活状况而斗争，为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而斗争。如果工农群众的这些要求获得满足，就可以发扬数万万工农群众在民族革命战场上无限英勇的牺牲精神，就能造成世界上任何帝国主义不能战胜的力量，相反的这种力量要战胜世界上任何

帝国主义。民族统一战线要不断地吸引这些伟大的力量来加强自己。因此就不独不应该反对而且应该拥护工农为改良生活待遇与获取土地等要求的各种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愈是迅速有效而正确地进行，就愈能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相反，如果去阻止与压制这种斗争，就要削弱统一战线的力量，就要失去广大工农群众对统一战线的拥护与热情，统一战线就有被敌人战败的危险。所以，这个问题也是统一战线运动中最基本的重大问题之一。

自然，工农阶级斗争的发展，是会损害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给他们以威胁的，因此，资产阶级和地主就反对这种斗争。右倾机会主义怕吓坏资产阶级与地主，主张停止这种斗争，然而，无产阶级是不能这样做的。中国的封建势力本来就是汉奸的社会基础，是在反帝革命中所必须清除的势力，为着满足对日战争与工农的需求，而牺牲封建地主的利益是应该的。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固然要受到一些损失，但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收回海关，抵制帝国主义的货物，提高工农购买力等，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内市场扩大，又可以增进资产阶级的利益，打开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前途。所以资本家在这种斗争中并不是绝对的损失，部分资本家还有参加统一战线的可能。

* * *

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运动中，绝不停止与忽略阶级斗争，统一战线也需要这种斗争来充实自己。但在进行这种斗争时，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不故意加紧反对资本家的方式，如不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特别是影响抗日军事的罢工、怠工及冲突，用政府颁布法律命令等方式来满足工人的要

求，从各方面采取办法来实现工人的要求等。但当资本家顽固地拒绝工人要求的时候，非用罢工不能实现工人的要求的时候，工人就绝不应该避免采取罢工等手段。此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要特别注意到，一方面不要在阶级斗争中损害他们的利益，在为了满足工人的要求而必须损害他们的一部分利益的时候，就应该在另一方面特别注意增进他们的利益，如减低捐税等。

统一战线的进行，不限制无产阶级组织与斗争的自由，这种统一战线才是革命的。上层统一战线是为着更顺利地去组织下层的群众。如果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运动中，自愿取消或限制下层群众的斗争和组织的发展，那对于革命、对于无产阶级当然是一种极大的危险。

*

*

*

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指导之下，将集中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战胜封建势力与汉奸，战胜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变，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尚理想。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在中国文艺协会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毛 泽 东

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因为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首先我们就要停止内战。但现在有人不愿停止内战，反而来进攻抗日主力的人民红军，要消灭抗日的领导者和核心的苏维埃，要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文艺也要消灭。所以我们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红色中华》。

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不管在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毛泽东关于捉住敌军矛盾彻底击破 胡宗南部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朱张，彭，贺任^{〔1〕}：

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2〕}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我们的任务是捉住这些矛盾，更加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忍受与克服一切困难，不失每一个有利时机，灵活调动部队，准备连续战斗，坚决地各个击破进攻之敌，首先是彻底地击破胡宗南。

毛

二十三日十二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

〔2〕指蒋介石。

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 康东北长征经过^{*}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任 弼 时

关于行动的方针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红二、六军团自桑植的刘家坪出动，经湘中湘西，横贯贵州云南，渡金沙江入西康，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计费时七个月零十天，行程约一万余里。整个长征经过可分下列四个时期说明：由刘家坪至石阡、江口为第一时期；由石阡至黔西、大定、毕节退出为第二时期；黔西、大定、毕节退出后至中甸为第三时期；中甸以后为第四时期。

第 一 时 期

第一，二、六军团冲破敌人“围剿”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形势和我军退出苏区的决定。

(一) 二、六军团在龙山、来凤、宣恩地区将敌“围剿”

* 这是任弼时的一份手稿，原题为《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途远征经过报告大纲》。

冲破后，主力进入津市、澧县、临澧、石门地区补充整理，开辟东面广大游击区域，威胁常德、岳阳。

（二）敌在“围剿”失败后，继续布置新的大举“围剿”，一方面以原有的兵力共约八十七个团，巩固和增筑南西北三面封锁线；另由鄂赣增调新的兵力约四十二个团，从东面向西压迫，企图逼退我军于龙山、桑植、永顺间狭小地区，包围封锁而聚歼之。这时南西北三面之敌为防堵性质，东方为攻势。

（三）当时各方面的条件：

1. 日本正积极图华北，白区反帝斗争高涨，宁粤冲突呈现紧张。

2. 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并开始突破敌之封锁，进入成都、雅安附近活动。

3. 我主力经半年战斗后，在津市、澧县、临澧、石门地区得到约六千新战士补充，计有四、六、十七、十八师十二个团，红校约一个团，四个独立团（约等于两个团）及少数游击队。

4. 原有活动地区，东西约三百里，南北百余里，地方工作基础薄弱，粮食缺少，地形上不利大兵团进行战斗。

5. 二、六军团及湘鄂边苏区位置长江中部，接近武汉、长沙，它的存在发展对一、四方面军的配合作用与对敌威胁均颇大，故蒋介石决心以大力进攻。

（四）行动方针决定的经过：

1. 最初拟在一、四方面军东进川陕地区配合下，依据原有苏区及东部游击地区，抓住有利时机击破东面急进之敌，破坏其向西逼退我军包围于龙山、桑植、永顺狭小地区之计划，再寻求机动，在运动中击灭其他方向之敌。但因一、四方面军未有东出计划，以及东部地形关系和主观方面条件，认为在当

时敌情下，依据活动在不宽广地区击破敌新“围剿”是困难的，因此向军委建议主力转移到石阡、镇远、黄平地区活动。

2. 军委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对我军行动的指示是：“在现小地区内固守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以击破之。”十月十九日又指示：“取守势是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但说明这是一些建议，由我们按实况决定。

3. 按当时情况，北面除敌封锁外，地形极坏，且有清江、长江；西面附近地区敌兵力较大，有碉堡网，且西北有乌江、长江；东面地区狭小；南面有澧水、沅水之隔。且我主力突出封锁线外，敌必进入苏区，不易再回原区；而在附近虽可能取得战斗上的一些胜利，但难能久停。因此，最后决定突出封锁线，向湘黔边之石阡、江口、镇远、黄平方向转移（本拟由西南突破向湘黔边前进，因敌特别防我由西南面突出，故决由东南渡澧水、沅水）。

第二，出动前后部署与经过。

（五）出动的部署：

1. 原有区域内留一个主力团，并以地方游击部队在主力出动后集中编为一个团，担任龙山、桑植、永顺地区游击战争，尽量吸引周围敌人，掩护地方组织工作（准备秘密条件下工作）。

2. 将地方独立团分编为第五师及第十六师，随主力行动，以后方机关裁员补充主力，出动时全部人员近一万七千人。

3. 当时估计，敌在我军突出后，重新部署追堵，有短时间间隙可利用，决定采取逐步向湘黔边转移（不直接走到），尽量避免部队减员。拟首先分布在湘中沅、资两水地区，进行

补充、筹款，扩大抗日反蒋号召，发动群众斗争。争取在广大堡垒稀少地区，当敌尾追部队接近时，集中力量求得运动战中击敌。并预定先打击尾追之蒋系主力樊嵩甫纵队，尽可能避免进入桂粤边境。

（六）突出沅水南后的形势与经过：

1. 顺利地渡过澧水、沅水之封锁线后，二军团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占辰溪、浦市、溆浦等城镇，六军团同时期内占新化、锡矿山、蓝田。长沙、宝庆震动。

2. 敌在我军突破澧水封锁线时，即开始新的追堵部署，其大要是：以樊纵队四个师和李觉纵队三个师为“追剿”主力，樊敌经慈利渡沅水，向新化、溆浦开进，李敌由沅陵、泸溪向辰溪、溆浦开进。以陶广纵队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八个团进沅水西岸，为堵截部队。以汤恩伯纵队两个师（十个团）调长沙、岳阳防守，并作预备兵力。新化、溆浦以南较空虚（仅几个保安团）。敌似防我西进，如不能给我打击，则极力将我向南（两广）压迫。

3. 在我军占领新化、溆浦、辰溪后之两三天，李纵队先头即逼近浦市、辰溪，樊敌进至新化、溆浦以北地带。我军当即放弃辰溪、新化，集结主力第四、五、六及十七师，远出迎击樊敌之右纵队，调集余部任对李敌钳制之任务。但因情况变化，樊敌未打到，而李敌乘虚进占溆浦城，当时樊、李靠近，陶、郭分布沅水西岸，溆浦、新化间地区已不能停留。

4. 依据军委当时电报，首先向东南再求西进之指示，我军分途向东南的宝庆、新化间移动（曾企图打击南追之樊敌，但因李敌迅速靠拢未果），造成再渡资水之形势，迷惑敌人（当时樊、李两敌靠拢尾追，汤敌由长沙向宝庆开进，陶敌到溆浦南沅水东岸之龙潭），再向西急进，并决心侧击阻我之陶

敌（陶敌向南急伸阻我）。瓦屋塘战斗，因陶敌先一日到达布防，战斗无结果（我伤亡三百余）。我军继经绥宁、洪江间北转渡沅水（此时桂敌廖磊部约六个团进入桂湘边之会同、绥宁等县境防堵），转入全部追堵的敌军之西面，进到湘黔边广大地区。

第三，湘黔边活动与继续西进之决定。

（七）适应我军在湘黔边创造新根据地之总目的，决心在晃县、芷江间反击尾追之敌，以求得新的有利局势之开展。便水战斗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仅给急追之敌以创伤（敌我均伤亡在一千左右），但表示我军有战斗能力与决心，使其不敢轻于猛进。

（八）便水战斗后，我们向西北转进，占领江口、石阡，并准备休整几天打追敌与西打黔敌。敌对我军估计与调动是：

1. 敌防我由湘黔边北进再转回原有苏区，同时防我在湘黔边境创造新根据地。

2. 其部署是：以李纵队尾我进路后追，以樊、郭、陶三个纵队绕至我军东北，防我北进；以许绍宗及徐源泉之一部巩固酉阳、秀山；开始调动驻黔部队从西面防堵；汤纵队则调回湘南防粤桂。敌此时不能打击我军，仍企图将我军向桂黔边压迫。

（九）我军向北迷惑敌人，在敌重新部署下，大部在石阡、江口线得到近一星期之休息。依据下列敌我形势和各种条件，放弃在湘黔边创造根据地企图：

1. 因便水反击敌人，未能给敌以有决定意义之打击，开展新的有利战斗局势。

2. 敌依据原有碉堡线（已成碉堡网地区），已成包围逼近形势，我军处在狭小地区，渐成被动局势。

3. 以石阡为中心地带内，粮食缺乏，居民稀少，地形不利进行运动战。

4. 军委指示：“在未给敌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离敌策源处较远的地方活动，但勿入太荒野地，敌力虽多，我能进退自如，主动在我。”“乌江下游障碍大，上游障碍较小，黔南黔西均少大河障碍，给养亦不困难。”同意西打驻黔蒋军，但须取进攻姿势。

根据上述情况及军委指示，乃决继续西移，寻求在广大地区进行运动战，并拟在黔省西部争取创立根据地。

第二时期

第一，由石阡到黔川滇边——黔西、大定、毕节。

（十）我军突破镇远、黄平、余庆封锁线后，占领瓮安、平越，侧击黔敌未收大效，进入黔省中部逼近贵阳（占领扎佐、修文），有北渡乌江形势。当时堵我之黔敌急赶贵阳，李敌随后跟进，郭、樊纵队向遵义地区转进，郝梦龄敌沿乌江北岸防堵。但陶纵队停止在松林麻江线，追敌此时不甚积极。

（十一）军委指示：“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时根据地。”据此我军即渡乌江，进占黔西、大定、毕节等城市。

（十二）到黔西、大定、毕节后，军委指示：“建议你们的行动有二：（1）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2）入川……与我们直接会合作战，一三军亦可出陕南配合。”“目前你们战略当以第一项为宜”。

（十三）根据军委指示及我们估计，在全国革命形势激剧

开展条件下，二、六军团应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黔西、大定、毕节在地形、群众、粮食与反动统治力量等条件上，均有利我军活动，故决在该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第二，黔西、大定、毕节根据地布置及斗争经过。

（十四）敌之部署是：以万耀煌、郝梦龄两纵队为主力，配合樊、郭敌由遵义向黔西逼进，以九十九、二十三等师及李纵队布置乌江上游防堵，以川敌约三十个团位赤水河北及长江一带防我入川，以滇敌孙渡纵队八个团在威宁、宣威地带堵我入滇，企图包围消灭我军于黔西、大定、毕节地区。而以东面之万、郝、樊等蒋系部队行动较积极。

（十五）我们除以小部任钳制方面并担任掩护地方工作外，集结主力迎击东面急进之敌，争取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灭东面敌人，消灭其一部，以开展有利局势。

（十六）与敌战斗经过：（1）有力地阻止了东南面敌人，但未能迅速占领东北面有利地势（三重堰），又未能坚决打击首先急进之敌；（2）未完成西南移动及东北伸出击敌之计划；（3）对万敌估计之错误；（4）几次迎击敌人，因敌情变化未收大效；（5）最后敌靠近，而我成被动局势。

第三，黔西、大定、毕节之退出。

（十七）因未能给敌以致命打击，东面敌占黔西、大定，三路靠拢，逼近毕节城（地形上毕城不保），周围约一百二十团敌人，包围线内之活动范围狭小，而短期内地方工作基础薄弱，给养条件困难，故决自动退出毕城。

（十八）在黔西、大定、毕节时军委曾指示：“（甲）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月内将武力夺取华北五省。（乙）你们即应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区域作运动战，争取你们的新根据地。”在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的原

则下，我们在东、南、西南三个方向中选定向安顺地区转移，进行运动战，创立暂时根据地，准备在时局大变动时再东向湘黔边转移。

（十九）我军退出毕节城后，敌企图逼我在毕节、威宁道上（该地带粮极少，居民稀，山大而道路面简单）而歼灭之，当时李敌进水城、羊场，郝、郭敌由毕节、大定急向水城协同李敌堵截我军南进，樊、万敌由毕节向西急逼，滇敌孙纵队集中威宁及附近坚工防堵，川敌西移防我渡长江及北进。

（二十）因情况变化，南进困难，改向滇东转移，李敌急由水城伸入威宁与孙敌会接防堵，西南进又未成，乃被逼于毕节、威宁道北之彝良、镇雄间狭小困难地区。在天候给养困难情况下，敌以高度积极动作企图在该区域内消灭我军，亦为我军长征中处境困难时期。

（二十一）我军在迎击樊敌未收大效后，即以急行军拟向东再南移，突破敌之包围，进入安顺地区，但敌迅速东调防我东向，中途遭遇于则章坝、财神塘而未果，乃继以急行军乘虚绕过威宁进至滇东，至是乃最后脱离黔滇川边而开始进入黔滇边广大地区。此时敌我均疲苦，敌比我更甚。

第三时期

第一，滇黔边的活动。

（二十二）我军神速进入滇东时，敌主力樊、万、郝、李等尚在毕节、镇雄、黑章地区，仅孙、郭尾我跟进。宣威战后，我军东移滇黔边界并占盘县，有东渡盘江姿势。此时疲劳之敌主力不甚积极，拟移盘江东岸防堵，似有暂隔江休整，重作进攻部署之形势（敌一部万耀煌及傅仲芳等师移贵阳安顺地

带整理)。

(二十三) 我军根据下列条件，拟在滇黔边活动，并创立根据地：

1. 北盘江以西，南盘江以北，牛栏江以东乃一广大地区，群众、地势、粮食条件均有利我军活动。

2. 反动统治力量较薄弱（滇军作战经验少，战斗力不甚强，黔西为犹国材统治区域），距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武汉较远，交通不便，增敌进攻困难。

3. 当时周围敌兵力减少，只孙、郭、李、樊、郝纵队约五十余团。川敌在长江北岸；附近黔敌一部如九十九、九十三、二十三师等，退出“追剿”，巩固黔防（对桂），且敌极疲劳，减员大，士气极坏，一时无援兵。宁、粤矛盾下，桂敌不致积极，且兵力亦不大；李、郭自称减员过半，早请调回湖南；仅孙敌较积极。这有利我军各个击破，是我军远征过程中最有利环境。

我军曾拟集全力首先击溃孙、郭两敌，以开展新的局势，创立根据地。

第二，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之决定经过。

(二十四) 宣北战斗以后，军委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指示：“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如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

(二十五) 因军委无肯定之指示，我们不知是因战略上的要求必须渡江会师北进，或恐主力将来北进后，二、六军团在长江南岸活动过于孤立困难，而要我军及早北渡，或是军委估

计我们现在处境很难战胜敌人而要我们北上。三月二十九日在盘县，我们曾请求军委决定我们行动，其电文如下：“在目前敌我力量下（即包括敌之樊郝万郭李孙等纵队），于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受大的困难。”“最近国际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能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活动是否孤立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以上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二十六）军委三十日复电：“1. 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能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亦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2. 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3. 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须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4. 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因为军委复电虽未肯定决定，但其意是以北渡为妥，故最后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

第三，北渡金沙江之经过。

（二十七）当时敌主力在盘江东岸，距我有四五日行程以上，孙、郭两敌在我西北成对峙停止状况，我军决经昆明以北渡普渡河，争取在元谋北渡金沙江，经华坪、永北北进。

（二十八）我军突过孙敌，逼近昆明，孙敌以急速行军赶至昆明、普渡河，会合昆明及迤西驻军，扼阻普渡河，严防我入迤西地带，企图压迫我军于功山地带消灭之。与敌接触后，我再逼昆明，乘虚在富民西渡，因求脱离追敌（孙、郭），防

川敌北阻，顺利渡过金沙江，乃以急行军到达金江（最后路线）之江边，虽接应部队未能赶到，亦顺利北渡。

（二十九）我军北渡后，孙敌达江南岸停止，李敌继到，郭、樊敌赶到永北、华坪，我军乃进至中甸集结休息，与主力会合计划大体告成。

第四时期

蒋敌“追剿”最后决心之失败与我军继续北进。

（三十）当我渡过普渡河进入鹤庆、丽江时，蒋敌尚决心消灭我军于长江天堑以南之狭小地区，并有万一北渡之后消灭我军之部署。迄我军进入中甸后，因藏民区物质、地形上限制，“追剿”部队过于疲困，乃停止而成防我南进之部署。另以川军（刘湘部李家钰）及驻川西蒋军，由大渡河及理化、巴安截断我们与四方面军联系，并向西南金沙江边逼迫。在四方面军配合接应下受阻后，其“追剿”消灭二、六军团计划乃全归失败。

（三十一）自中甸以后，乃纯藏民区域，气候、生活习惯全异于汉民地区，藏民民性强悍，给养困难。我军在中甸短期休整，即分途经德荣、巴安、白玉及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向甘孜北进。中途只与藏骑接触。

（三十二）中甸以后行军最缓，部队一般的情绪虽好，但因粮食困难，居民逃避及生活不惯，病亡大增，体力甚疲劳。

二、六军团长途远征的经验教训

第一，这次远征的成功：

（一）二、六军团突出敌之包围封锁后，蒋敌以最大力量与决心，企图乘我脱离根据地用“穷追猛剿”办法消灭我军。在第一时期追堵敌力计有七十余团，第二时期内前后计一百三十余团，第三时期内六十余团，最后时期尚有五十余团，努力阻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万余里长征中，敌曾几次努力“包剿”（溆浦、新化间，江口、石阡间，黔西、大定、毕节间，彝良、镇雄间，金沙江边等），我军并未受到损失，虽未能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但仍给敌一些小的打击（瓦屋塘、便水、平越、将军山、黄家坝、以则河、则章坝、宣威、六家、小松元等战斗），最后能胜利地与四方面军会合。蒋敌“追剿”消灭我军之企图一般是失败的。

（二）七月余经万余里之长途远征，大小十余战，一般的尚保存了有生力量。行军作战中，虽有不小的减员，但沿途曾有很大补充。黔西、大定、毕节退出时两军团共比桑植出发时增加三千余员。盘县时尚保存桑植时数目。盘县后的急行军到中甸，比桑植时约减少一千名。进入藏区后得不到补充，比桑植时乃成减少趋势。现在两军团人员计有一万四千，比桑植出发时少三千余。武器虽沿途落伍逃亡中有些损失，然现在尚保持桑植出发时的数目，部分的还有增加，如五师增加一倍。

（三）这次远征，活动于湘黔滇康广大地区，前后攻占三十余县城，是广泛地传播了党和苏维埃的政策，特别是扩大了抗日反蒋主张的影响，组织和发动一些群众斗争，揭破了国民党卖国殃民的罪恶，再一次证明红军是不可摧毁的力量。

第二，我们未能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原因与错误：

（四）我们脱离湘鄂边苏区转入湘黔边创立新根据地的决定，一般是正确的。这一企图失败的原因：

1. 对敌估计上的错误。认为敌不能迅速追进，未估计到

敌新“围剿”部署已成，兵力集结，易于转为“追剿”部署。

2. 因此在湘中时我军兵力过于分散，失去消灭敌人时机（如打陈光中及李敌之时机）。

3. 瓦屋塘、便水战斗又未能给敌有力打击，致成被动局势。

4. 发动群众斗争与统一战线策略具体运用得不够，最后政治纪律松懈。

（五）放弃湘黔边及转入黔西、大定、毕节，在川黔滇边创根据地的决定亦是正确的，未能成功的原因：

1. 进入黔西后，未能乘胜占领有战略意义之地区，又未能以坚决的战斗夺取这些地带。

2. 未能乘敌调动兵力部署未妥之有利时机，坚决各个击破敌人，东北出动计划过迟。

3. 对敌估计上的错误，如对万敌之急进估计不够，以致失去一些战略要地（如大定瓢儿井），各方敌又逼近，我成被动局势。

（六）几次战斗中某些战术上的错误（未有总结）。

第三，我们所得的主要经验：

（七）在不可免的脱离根据地而采取长距离之转移时，为保持有生力量，可采取逐步转进这一策略。

1. 可以减少部队远行军的疲劳，减少落伍和疾病。

2. 可在中途停留时，争取人员物资的补充，可能使部队扩大，保持有生力量，惟须避免进入过穷僻地带。

3. 但力量不宜过于分散，要准备在有利时机消灭敌人。

4. 更便利做群众工作，扩大政治影响。

这种策略下完成远征计划不一定是削弱有生力量，正确的运用甚至可以壮大部队，造成创造新根据地更有利的条件（我

军若非中甸后进入藏民地区关系，可能比桑植时还要壮大）。

（八）为着顺利地创造新的根据地，必须：

1. 在到达预定根据地地区前，求得运动中取得有利战斗的胜利，求得消灭敌之有生力量，并可采取曲线的行军，声东击西以迷惑欺骗调动敌人，造成有利消灭敌人的良机，握住主动地位，以疲困敌人。

2. 既到预定根据地地区后，必须抓住敌进攻部署未妥善的时机，克服暂时的疲劳，集结主力，乘敌调动而各个击破之，巩固战略要地。必要时应伸出基本根据地以外，远出迎击单个前进之敌，或调动敌人于有利地带求得击灭之机动。要力求连续胜利的战斗，以挫追敌，使之疲困而停止急追，转入缓进或不得不重新部署。这才能保持基本根据地，并使我们能得到休整与补充，开展根据地之基本群众工作，聚集力量，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

（九）我军在远征中，不应避免有利的战斗，并应抓住有利时机求得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总要以能取得大小胜利为前提，不可避免的战斗自在外）。这不独不致损坏战士情绪，反可增高勇气，同时使敌不敢轻于猛进，我取得休息的可能，但须避免无利的战斗。在夺取要点，通过封锁线与抢渡口时，应不惜疲劳和不可免的减员。若处处避免战斗，见敌即走，反增部队之疲劳，降低战士情绪，增大敌人勇气，实际是一种退却逃跑。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中共中央、中国苏维埃 中央政府关于绥远 抗战通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党派各界各武装队伍及全国人民均鉴：

日伪匪军进攻吾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侵掠战争即将爆发。当此中华民族生死关头，非动员全国兵力人力财力以抗战，则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准备全国性的抗战。

二、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三、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立即释放政治犯及上海各爱国领袖。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商讨救国大计。

我们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实行上述迫切要求。若再因循延误，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而仍旧专心致力于压迫人民抗日救亡

运动与进攻抗日红军，则其结果不但将给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

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我们更号召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督促南京政府实现我们的主张，克服一切困难，自动的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斗争着的英勇将士。抗日救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也只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逼使南京政府决心抗战，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红军，一年来艰苦奋斗，东进山西，西出宁夏，无非要寻找一条抗日去路，以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然而南京当局总不见谅，一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当此晋绥危急，全国人民均愿效命疆场，为民族争生存之时，南京当局偏又调动大军向抗日红军进攻，此真令人百思不解。此次红军在山城堡消灭胡宗南军一部，实出于不得已的自卫行动，向对外妥协、对内黩武之主持者略施警告，我们认为今日而犹继续内战，实属对民族国家之罪恶行为，实际上不啻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之使命，而遗民族国家以无穷之祸。

我们现在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我们希望南京政府立即承认我们的要求，希望全国人民拥护与赞助我们的要求，我们对于中国

人民的最后胜利是有充分信心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毛泽东等给蒋介石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

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蔷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 同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提议 东北军确占兰州、汉中战略要点 给张学良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李毅兄：

关于军事方针提出下列各点，请考虑见复：

甲、刘峙有指挥河南集团，进占潼关极大可能，似宜提起杨虎臣兄注意，以主力集中潼关而坚拒之。

乙、为确占兰州汉中两战略要点及隔离甘肃蒋^[1]军为二部起见，提议：

(一) 于^[2]军全部巩固兰州城，严防毛炳文及西北补充旅之进攻。

(二) 兄部王董^[3]两军及骑兵军集中平凉、会宁线，将该线上之蒋军压向陇南一面，拒止胡曾关^[4]毛南下，将海原、固原防务交于红军。

(三) 红军以主力进至海、固地区，以有力一部尾随胡军于豫旺地区，配合在静宁、平凉之兄军，乘机消灭南攻之胡等。如胡等在现位置不动，则压迫之入宁夏为最好。

(四) 商刘甫澄，调川军十五团至二十团进据汉中。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统祈见复。军事大计，祈兄主持，随

时示知为盼。

弟东 来 叩

元申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指蒋介石。
- 〔2〕指于学忠。
- 〔3〕指王以哲、董英斌。
- 〔4〕指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

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张 闻 天

第一，政治形势很紧张，不断发生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在抗日问题上表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妥协派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总要发生一种突变。第二，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我们到西安就开始组织这一行动。第三，我们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第四，群众抗日更发展。第五，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在这阶段中不是斗争的减少，而是斗争更尖锐化。

在这形势下，我们要做的：

第一，是巩固我们的力量，尽量争取时间，巩固自己部队，把西安、兰州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与苏联打通。

第二，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1]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第三，组织群众，进行群众运动，武装群众，到处开始组

* 这是张闻天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织，大批的武装群众。这样，补充也很容易。在西安、兰州尽量武装群众是巩固我们自己力量最好办法。无论如何要把这一地区巩固起来。实际进行援绥运动，组织募捐队，把抗日为最高旗帜，应与绥远问题密切联系。要争取妥协派，也要加紧这一运动。

第四，党的工作首先注意西安工作，继续不断的派人出去，同时应利用外面干部。当然，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现在有新的困难、新的矛盾，需要我们慎重考虑。这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我们应领导走到顺利的方向，不要急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张闻天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西安事变后促进南京当局 停战抗日运动的方针办法 给刘少奇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胡服：

西安事变后，南京在亲日派影响之下，已下令讨伐张学良。陕甘宁绥豫的中央军已开始调动，向张、杨^[1]进攻，即已开绥远前线的汤恩伯部，亦将开始撤回陕北，以扩大内战。日本方面更公开宣传张之赤化，以扩大灭亡中国的防共战线。我即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2]，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并要求南京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在各地可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议、全国救国会议促进会之类的团体，以扩大运动。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但对于亲日派降日卖国，进行内战，镇压民运的罪恶行为应坚决反对之。必须多方面的活动，住华北名人及各实力派，特别是阎、傅^[3]等起来响应张、杨等的抗日

主张。此电速转上海。

中央书记处
十二月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杨虎城。

〔2〕指张学良、杨虎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通电全国宣布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3〕指阎锡山、傅作义。

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 给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1]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2]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央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萃沿海长江守备之军，大兴讨伐于西北一角，姑无论西

北苦寒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取青济，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3]	徐特立	王稼穡 ^[4]	彭德怀
贺 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 彪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删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指蒋介石。
- 〔2〕指张学良、杨虎城。
- 〔3〕即林伯渠。
- 〔4〕即王稼祥。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 致国民党中央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蒋介石氏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介石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须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疲唇焦，一再向贵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对于绥东阎、傅^[1]两将军的英勇抗战，依然坐视不救，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摧残不遗余力，反而调集大军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最后并欲压迫提议抗日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以继续扩大内战。此种举动诚为错误已极。在此情形之下，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2]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在日寇加紧侵略，晋绥危急关头，此种扩大内战行动决不能为爱国人民与爱国军人所见谅，即贵党明达之士，想亦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祸患。试看日寇自蒋氏被幽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甚阴毒计，昭然若揭。想贵党决不至如此轻举妄动，中彼日寇之奸谋。退一步言，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堵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

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

（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

（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果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决，民族存亡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时机紧迫，敢贡刍蕘，尚希明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十二月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阎锡山、傅作义。

〔2〕指张学良、杨虎城。

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后的情况 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

毛并中央：

一、宜^[1]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国际^[2]意见。彼衷心甚虑因此内战绵延，有碍抗战。我已明告国际及苏联意见尚不知，但如日本及汉奸硬要挑起内战，我们只有在坚决防御下，坚持抗日动员，争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汉奸，缩小内战，并连接到抗战上去。杨^[3]认开火可团结内部，失利可放弃西安，以甘为后方，但对持久战则无把握。杨知其部下不固，又不敢急切改造，现须多下功夫。

二、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

恩 来
十八日

二

毛并中央：

情况：

一、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4]。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汪^[5]）。孔祥熙企图调和。宋

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二、晋阎^[6]向张提议，将蒋送山西。冯^[7]亦企图利用此事变。

三、鲁韩^[8]认为南京现在办法不能解决西安问题。宋哲元、刘湘尚无表示。

四、李、白^[9]表示，张之出此乃逼不得已。余、何^[10]企图骗钱，表示拥护中央。

五、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非降、非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

恩 来

十八日九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 即张学良。
- 〔2〕 指共产国际。
- 〔3〕 指杨虎城。
- 〔4〕 指蒋介石。
- 〔5〕 指何应钦、汪精卫。
- 〔6〕 指阎锡山。
- 〔7〕 指冯玉祥。
- 〔8〕 指韩复榘。
- 〔9〕 指李宗仁、白崇禧。
- 〔10〕 指余汉谋、何键。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 我们的任务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

(一) 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

(二) 南京政府正面对着这一迅速发展着的抗日运动，它被迫着很迟慢的与不坚定的改变着它过去对日退让的政策。在这转变过程中，它还是对日力求妥协，对绥远局部抗战表示不积极，对全国抗日运动，采取压抑政策，对红军不肯停止进攻。

(三) 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将士，在全国与西北人民及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与推动之下，抗日情绪特别高涨，因此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但他们的这种要求，为蒋介石所严拒。

二、西安事变的意义

(一) 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

* 这个指示是张闻天起草的。

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二）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三、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

（一）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了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掠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造成的。

（二）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四、为实现第二个前途 中共的基本方针是

（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

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1〕}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十二月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张学良、杨虎城。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 对西安事变通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焕章^[1]，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2]，杨虎城，王鼎芳^[3]，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机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 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 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 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 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办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置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孔祥熙，孙科，冯玉祥。

〔2〕即张学良。

〔3〕即王以哲。

进行和平调解，不站在 恢复反蒋的立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张 闻 天

我们上次开会至现在开会已有六天。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显得更充分，所以，我们今天的方针，比前次是更进步的。

(一) 这次事变的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全国的舆论是不希望内战的扩大，然而国民党是企图尽量这方面的扩大，这是两个阵营。我们在这情况下，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更高的组织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这一立场可得到全国的拥护，这是完全正确的。

(二) 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

(三) 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只要所谓拥蒋潮流过后，他的内部矛盾更要发展，这是有利于我们的。

(四) 具体的积极的援助张、杨^[1]，最主要的是使他们部

* 这是张闻天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队的巩固，大规模的发动群众。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

（五）对东北军应尽量与之配合，而他亦应采取我们的许多办法，尽量争取同情者，不要太红，尽量争取时间性。

（六）失败的可能如弄得不好是有的，而且相当的大。胜利的可能是有的。失败了怎么办？应尽量争取其一。困难的前途亦应准备。

（七）苏联的舆论，是应该解释的。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说。同时苏联如表示同情，便可以使与南京对立。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然而我们是不是能采取这一立场？当然是不能的。然而我们这样做，与苏联实质还是一样的。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要着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张闻天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张学良、杨虎城。

毛泽东关于配合张学良、杨虎城部 消灭东来之敌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周：

甲、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

乙、苏维埃、共产党十九日主张召集和平会议之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

丙、西安抗日军亦应本此共同之总方针而前进。

丁、坚决消灭进攻之敌，为执行此总方针之重要手段。

戊、红军决向西安集中，配合张、杨首先消灭东来之敌。

毛 泽 东

十九日二十三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新发展地区的 地方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目前极有利于我们发展工作的形势之下，我们必须分别各个地区不同的特点，来进行地方工作，不然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我们现在把新发展地区分为三部，即恢复地区、友军撤退地区与友军统治地区，并给如下的不同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恢复区域的地方工作

(一) 原为苏区或游击区，后被敌军或友军占去，现在友军或敌军已退出者，谓之恢复区域。恢复区域的工作，应恢复过去一切工作的内容。但按当地情形和一般抗日运动发展的需要，须改变工作的形式。

(二) 在陕北恢复的老苏区，仍可恢复苏维埃政权，但亦可经过抗日革命委员会的过渡时期。在关中恢复的区域及新区，则一律改变为抗日救国政府。

(三) 过去已分配土地的区域，在恢复后不管用苏维埃或抗日救国政府的名义，仍恢复原先土地分配的情形。在恢复的游击区内土地原先未分配者，现在依照工作进行的程度决定之。

（四）在恢复的区域内，对富农的策略，对选举问题，均照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的新策略执行之。

（五）在恢复区域内，均应广泛的发动群众的抗日运动，恢复与组织各种抗日的群众团体，特别是抗日的武装组织。凡脱离生产的武装队伍，均称为抗日义勇军，凡不脱离生产的（如过去的赤少队），则称为抗日自卫军。

（六）在恢复区域内或周围的敌军及民团，应极力进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运动以争取之。在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后，我们可停止对于他们的攻击，但党在任何时候，绝不放弃在他们区域内争取群众与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的工作，在他们不肯停止向我们进攻时，我们在自卫的立场上仍应给以坚决的打击，促其反省。切勿疏忽对于敌军民团的严密警戒，即在订立和平条约之后。

（七）普遍恢复与建立党的组织，在边区仍应建立秘密党的组织，在老区除公开的外，还应有秘密组织，慎重的审查过去的老党员，并吸收在过去斗争中表示坚定的分子入党。特别在基干的武装力量中应保证党的绝对领导。

（八）对过去叛变投敌的分子，一般的应采取感化教育的策略。真正罪大恶极为群众所痛恨的分子，则经过群众路线，给以应有的处分。

（九）苏票流通应逐渐使之恢复常态，设法多购工业必需品，建立合作社，以实行调剂。

（十）对过去被难家属及红军家属，应进行救济。

撤退区域内地方工作

（一）在友军撤退后，当地政权随同友军撤退，交由红军

接防，这些区域谓之撤退区域。在这些区域的地方工作，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与过去红军占领区域的地方工作不同，也与在友军统治区域的地方工作有差异。

（二）我们的目的是要使这些区域变成为模范的抗日区域，为了忠实的执行抗日纲领、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必须改变在苏区或和占领区域地方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以适合于撤退区域新的环境。

（三）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运动，建立抗日救国政府、抗日群众团体、抗日义勇军及抗日自卫军（不脱离生产的）。

（四）抗日政府应即宣布抗日纲领，确立民主权利，取消苛捐杂税，按照当地情形初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五）凡属抵抗红军与抗日军、阴谋破坏抗日运动、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者均以汉奸卖国贼论罪，并没收其一切财产分配给人民。过去同旧政权及国民党有关系的人物，凡不为推翻新政权活动者，不得以反革命看待，其中愿意积极抗日的分子应争取之。

（六）在开始阶段上对当地的豪绅地主，在有钱出钱的口号下，募捐抗日经费和粮食。在群众斗争开展的过程中，应赞助当地群众没收平素他们最痛恨的和大的豪绅地主的要求。没收的土地财产应该首先分给贫苦的农民与手工业者。

（七）保护商业，除汉奸卖国贼外，没收不能及于商业。对于抗日军人的家属应特别优待。

（八）文化机关和文化事业一例保护，对原有学校帮助复课，加强学校中的抗日教育。保障信教自由，对确以传教为职业的教堂与牧师、神父等不得侵犯。

（九）对原有群众团体或旧式群众组织不必解散，加强对

于他们的工作，吸收他们到抗日运动中来。

（十）特别注意于每一地区基干武装部队的组织，加强党在其中的绝对领导作用，挑选优秀的工农分子为骨干，使之成为当地政权下最可靠的武装力量，以掩护当地的工作并抵抗任何方面来的突然的袭击。

（十一）普遍建立共产党半公开与秘密的组织，加强政权机关中及各种抗日武装、抗日群众团体中党的领导作用。

红军在友军区域的地方工作

（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红军将进到友军的区域，对于这些区域的地方工作需根据于共同抗日纲领，争取群众和友军共同抗日的原则下，改变地方工作的内容、方法和方式，以实现红军是民族革命中领导的与团结的核心，是抗日武装中的模范。

（二）广大的发动群众抗日运动，组织各种各样的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如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妇女的、青年的、文化的等等抗日救国会和抗日义勇军。在发动群众抗日的基础上，建立某个区域的抗日救国会；如在当地已成立抗日团体则不必另成立新的，采取加强对它的领导，扩大它使包括更广大的群众，扩大内部的民主等；对当地旧有群众团体不必解散，也采取上述态度。

（三）在友军指挥下的旧政权采取尊重联络的态度，不得采取直接摧毁的办法，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逐渐改组旧政府，在加强抗日救国会的作用的过程中，使之逐渐成为该区域的实际政权机关。

（四）凡对红军不取敌对行为或同情抗日主张之民团，应

竭力争取之，依照情形可改编为抗日武装，逐渐改造之，以保证抗日分子及党的领导作用。

（五）红军到达的友军区域应即宣布抗日纲领，确立民主权利，依照各地不同情形，实现人民生活之初步改善，如减租、减税等，但这些要求的实现，应依靠在群众自己斗争的基础之上，应是群众自己斗争的结果。

（六）在友军区域除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外，一般不采取打土豪的办法。凡属领导武装抵抗红军和抗日军队者以及直接与日本勾结危害红军和抗日军队者，均以汉奸论罪；对豪绅地主在有钱出钱的号召之下，动员募捐钱和粮。红军的给养由募捐解决，募捐的负担，应放在有产者身上，极力禁止使募捐成为摊派。劳动者在自愿的原则下，可接收他们的慰劳品，关于这些工作的进行与决定至少应由师政治部负责。

（七）特别注意城市中公共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的爱护，工商业者的保护，维持商业的流通，绝对禁止使用苏票，城市工作应该归那里的最高政治机关指挥。

（八）号召广大的群众加入抗日义勇军，加入红军；争取抗日义勇军的一部接受红军的指挥，配合红军行动，以便经过这种方法达到实际上扩大红军的目的；强迫拉伕的办法，应坚决反对；应特别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

（九）对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应采取他们的官长所可能容许的一切方法，如联欢大会，互派代表，发扬友爱与谦恭的精神，给他们以良好的影响，坚定他们的抗日信心，巩固相互间的联合；必须以诲人不倦的教师的的精神，在每一具体问题中教育他们，使他们同当地民众建立良好的关系。使每一个红色指战员懂得红军是与友军不同的。排除一切把红军同友军看做完全一样或希望友军立刻变为红军的幼稚观点。

（十）最大的努力放在严肃红军纪律上。红军的模范纪律是争取友军，争取群众的最有效的武器。

（十一）不论在地方上、武装部队中，到处应该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教育党员如何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注意挑选可靠的有能力的优秀分子入党。

（十二）宣传工作应集中于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严格遵守自己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纲领。不执行自己所说的话，会使自己的影响以无穷的损害。

（十三）在红军进入一个友军地区之前，普遍运用先遣政治工作团的方式，把最强的政治工作者加入进去。

（十四）整个政治机关应注意地方工作，大大加强地方工作的干部。

（十五）友军区域内的地方工作及友军政治工作是一个完全新的问题，上面所说的几条，只是一般的、原则的、初步的指示，须在实际工作中使之具体化与补充。政治机关应注意每一个新的经验与教训。

（十六）这一指示，应该深入的传达到连队中去。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恩来同志：

(甲) 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一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

(乙) 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

(丙) 请与张、杨⁽¹⁾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

(一) 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

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

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

第三，保障民主权利。

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二）依上述条件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二陈^{〔2〕}派等谈判。

（三）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

（四）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来西安谈判。

（五）招致英美顾问再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

（六）巩固西安军事阵地，使尽可能持久，以待政治谈判之成功。

（七）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松甫、董钊等进行接洽。

（八）兄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陈、宋、阎、于等，基于上述条件与谈判，调停双方。

中央书记处

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张学良、杨虎城。

〔2〕指陈立夫、陈果夫。

毛泽东关于实现国内和平 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 给潘汉年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汉年同志：

即向陈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 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 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 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 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 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毛
二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周恩来关于同张学良商定的 作战计划给毛泽东等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朱张^[1]：

甲、胡、毛、曾、关^[2]向天水集中，对我们战略后方之安全极端有利。

乙、潼关、华县间五个师今未急进，估计敌有待西路军集中天水后，再向西安实行总攻可能。

丙、顷与张商定作战计划，采用我们提议的第二种即在西安以东大会战的办法，其方案目前东北军、西北军尽量迟阻刘^[3]敌于临潼、渭南间，待东北军主力集中完毕，红军由庆阳、西峰分经正宁、彬县在咸阳（有桥）、兴平过河，转到蓝田、商县以南地域，后即与东北之敌决战。

丁、此诱敌深入计划，张、杨^[4]坚决主张，但决定关键在红军。请以我军到达咸阳、兴平时电告。被服、子弹亦可在咸阳补充。

戊、对胡敌，张坚请以红军一部尾胡，我意以三十二军或独立军尾胡，可与静宁、庄浪谋扩大我主力，全部南来，可得到扩大。胡敌既三边，可抽出一独立军至富甘、富延宜接防。

己、守西安计划在布置，后方第一步移咸阳（辎重太多），第二步以洛川、西峰两点为好，韩城不相宜。

庚、你们布置如何，请告。

周

马申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指朱德、张国焘。
- 〔2〕指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关麟征。
- 〔3〕指刘峙。
- 〔4〕指杨虎城。

毛泽东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

接到了你们的信，完全同意你们信上的意见。我们与晋绥当局之间尚缺乏必要的与诚意的联系，对于当前迫切的救亡任务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坚决申明：完全同情于晋绥当局及军队与人民真正抵抗日寇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我们愿以全力为他们援助。今年春间红军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1]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静待他们之谅解。红军虽迫切愿望迅速进入抗日阵地的最前线，但必须先求得当地友军之谅解，在没有取得谅解以前，红军决不贸然开进。如果晋绥当局真心抗日，而又于他们认为必要时，红军当与之订立合作协定，在协定中规定划分防线，互相援助，保证给养补充，并统一作战指挥等事项。如果此协定能够订立，红军依据此协定进入晋绥抗战地段，则红军当唯抗战之利益是务，决不干涉当地之行政与决不对友军有任何不利的行动。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我们现已向西北一切国民党军队发表申明：红军自动地停止攻击他们，仅在他们进攻时采取必需之自

卫手段，在为自卫而缴获他们的人员武器，如果他们转至抗日时，一律送还，他们向抗日阵地转移时，不许红军任何人员有任何妨碍他们的举动，并须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总之，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你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我谨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与我们的红军，向你们献上热烈的敬意，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专此奉复。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 泽 东

十二月二十二日于陕北苏区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阎锡山、蒋介石。

周恩来关于同宋子文谈判情况 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中央书记处：

(甲) 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昨到西安。蒋^[1]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乙) 今日我及张、杨^[2]与宋谈判。

第一部分，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

第二部分，宋提办法及讨论情况：

子、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

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我们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宋力言此为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面幕揭开后，再彻底改组。我们原则同意，要宋负责；杜、沈、章等可为次长。

丑、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到后再释爱国七领袖^{〔3〕}。我们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

寅、我们提议在这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负责接济。宋答此事可转蒋。

卯、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

（丙）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恩 来

二十三日二十二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张学良、杨虎城。

〔3〕指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

周恩来、秦邦宪关于同宋子文、宋美龄 谈判结果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央书记处：

(甲) 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子、孔、宋^[1]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2]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3]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4]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

与他秘密接洽。

（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丙）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5〕}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丁）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戊）现在军事布置仍旧，并加紧戒备。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周 博

二十五日十九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孔祥熙、宋子文。

〔2〕指蒋介石。

〔3〕指张学良。

〔4〕指宋庆龄。

〔5〕指杨虎城。

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的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并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

(一) 宣传此次和平解决的胜利及日寇与亲日派挑拨内战阴谋的失败，号召全国人民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亲密的联合起来，实行改革国内政治与对日抗战。

(二) 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

(三) 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赞助张、杨^[1]改造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把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

（四）继续推动各地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同西北民主抗日力量实行合作，以促进南京的改革与抗战的发动。在南京政府中，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

（五）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

（六）在严肃基础上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的组织。

（七）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

（十二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张学良、杨虎城。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毛 泽 东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

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

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周恩来、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 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处：

我们以下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一、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

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

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

寅、国内统一战线之初步的局部的形成；

卯、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

二、西安事件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特别是资产阶级营垒之决定的分化的过程，其意义就在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中左翼之集中，打击了中间的道路的幻想。然而分化过程没有终结，大致的情況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抗日、降日、中间。新的变动就在：

子、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至少部分地）；

丑、亲日派遭受一些致命打击；

寅、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虽然依旧不免动摇地迟慢地即保存中间之基础）。

方针：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派。

三、孔、宋^[1]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这个政府在目前基本问题——对日问题上将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在民主问题或许可有一小部分之前进，但显然在许多方面仍然会继续着旧的路线。我们对孔、宋政府，应该当以过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动与赞助其抗日倾向，争取逐步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丝毫不放松对他的批评。如一切过渡政府一样，有着必然的摇摆与不同的可能的前途，我们应与他每一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

四、在这个情况下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的运动，在发动、觉醒、组织群众及推动时局的进展上，均具有重大之意义。应该把要求南京的召集和平会议和人民的促进运动联结起来。但会议召集的时期及胜利的保证，依靠于促进运动之开展。这是局势开展之一个重要的环境，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性的关键。

五、局势开展另一个中心环境是巩固西北，将西北变成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需要：

子、规定和实现三方面共同合作的纲领和西北的军事计划；

丑、张、杨^[2]两部之巩固与改造，红军的休整与在新的基础上之正规化，以及三方面的休戚相关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和互助；

寅、群众运动之开展和发动——在这个基础上地方政权之民主化与改造；

卯、宁、青、甘西之解决——回民问题。

六、外交方针：

坚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发动者的立场：一方面，在抗日与打击亲日分子的基础上，和南京左派合作，吸取中间派到我们方面来；另一方面，结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为中心，以抗日为目标，作为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

七、党：转变党的全部工作，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

子、恢复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阶级中的党的工作；

丑、改变各地零散的游击队为农民自卫武装，并成为农民运动之策源地；

寅、迁移中央至便于领导全国政治生活之地区；

卯、教育与重新教育干部。

周 博

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孔祥熙、宋子文。

〔2〕指张学良、杨虎城。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毛 泽 东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战争

第一节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

* 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据著者说，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结论，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移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随即在十二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又写了这部著作，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

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再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就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们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应该刻板地抄用，因为我们现时战争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

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第二节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

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疑问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毫无疑问又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问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第三节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

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那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说到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就是实例。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规定。在给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饱，在给养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战士饿肚。在白色区域，可以因为仅仅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败；在红色区域，则走漏消息的问题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战役，高级指挥员有亲自参加之必要，其他则无此必要。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

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第四节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为什么要组织红军？因为要使用它去战胜敌人。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规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战争史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

那末，关键在哪里呢？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

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着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

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说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

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 and 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人。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

学习罢了。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

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以上是我们的方法。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亿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

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

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时常提到错误方面的意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第三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第一节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的人，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这点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们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我们，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的失败。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

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军事原则产生的过程。

然而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军事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第二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

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现在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一看：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

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中国红军是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的面前。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

中国红军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们的政权是分期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

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

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拼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

第三节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有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第四章 “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做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没有起落的。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

红军的失败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说，只有反“围剿”根本没有成功，才叫做失败，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因为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这就是说，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然而等到红军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我们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

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所谓敌人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的战略失败，就是他们的“围剿”被我们打破，我们的防御变成了进攻，敌人转到防御地位，必须重新组织才有再一次的“围剿”。敌人没有如同我们所谓一万多公里的战略转移的那种情形，这是因为他们是全国性的统治者，他们比我们强大得多的缘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过的。若干根据地中被红军围攻的白色据点内的敌人突围而出，退却到白区里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的事是发生过的。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

起来。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在一九三〇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福建的两次“围剿”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跟否认“围剿”反复的“左”倾机会主义直接联系，而说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的一种意见，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

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〇六年、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条约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围剿”反复的形式如何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第五章 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

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据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

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员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

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第二节 反“围剿”的准备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

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

所谓红军的准备退却，就是说不要使红军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不要进攻得太远了，不要使红军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夜主力红军的必要的处置。这时红军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

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征集新兵须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顾到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又一方面顾到当时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消耗的可能限度。

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对“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应当计算，主要的是红

军，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节 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

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

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 and 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

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 (一) 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 (二) 有利作战的阵地；
- (三) 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 (四) 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 (五) 使敌人疲劳沮丧；
- (六) 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

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

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 AB 团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赣抚两河间前进的敌人军力，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终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会昌、寻乌、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東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

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

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给予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

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不少的。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第四节 战略反攻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

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

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 AB 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 AB 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一〇）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

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

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乃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

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

建议，追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

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第六节 集中兵力问题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

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

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

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支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围

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第七节 运 动 战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

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实实在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

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第八节 速 决 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

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没有打破“围剿”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的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

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第九节 歼 灭 战

“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